



像者作錄笑苦

畢去城到碼頭，汪先生的船剛開抵武昌，馬玉和道中央黨部不在武昌而在漢口，原船又折回北岸。汪主席回來了。汪的欢声立時傳遍了武漢，而南京的國民政府也在那時正式成立。

在武漢三中全會閉幕之後，在白運生和何敬之指揮之下的軍隊已由浙江襲取了上海，江左軍的系統都認識在軍的程頌雲也聯合了襲取了南京，蔣先生經由蕪湖而至南京，而且到上海了。由汪先生帶來的消息，候在上海已見已蔣先生在批李白備人，就是留守廣州的李任潮和廣西的黃季寬也都以開約或秘密的到了上海。蔣先生向汪先生的要求是要把國民政府遷南京，同時分共。而二李和自黃向汪先生的要求，是只要汪先生答應分共，對於蔣先生可以備其下野。汪先生對於那時分共是極<sub>極</sub>以為國民革命正在進

# 苦笑錄

李鐸 · 汪瑞燭 · 趙令揚 編註

李鐸，香港大學文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香港大學歷史系。

汪瑞燭，香港大學文學士、美國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澳洲麥高萊（Macquarie）大學歷史、哲學、政治學院。

趙令揚，香港大學文學碩士，澳洲雪梨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

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一九二五——一九三六）

李 鏗 汪瑞燭 趙令揚 編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亞洲研究中心專題討論第三十六

港幣八十元

總編輯：景復朗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為進行東亞及東南亞地區之研究，特設立亞洲研究中心，從事有關之研究工作。本中心對學者進行有關亞洲，特別對有關香港之專題研究工作，擬供給研究工作上所需之便利，並舉辦各項有關傳統及現代亞洲研究方面之研討會與學術會議。

承印者：和記印刷有限公司

# 前言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陳公博在香港完成他的回憶錄，命名爲「苦笑錄」。那時，他剛從歐洲官式訪問回來，寄居香港。但在寫作期間，既沒有在國民黨領導之重慶政府擔任官職，亦未決定參與汪精衛在籌劃中之南京政府。雖然陳公博在一九四〇年還是接受了汪精衛的邀請，參與南京政府，但他的回憶錄（即「苦笑錄」）是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完成；亦即是說，在陳氏寫畢「苦笑錄」時還未打算追隨汪氏。在時間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同時在評價方面，也直接反映到「苦笑錄」的歷史價值。其實從離開成都的一剎那開始，陳公博已極表懷疑汪精衛在日本佔領區內組織敵對國民政府是否明智之舉。這充分顯示出他當初是不願意投身於一個與蔣介石敵對的政府，以致中日戰爭之局面更趨複雜。其次，陳公博雖曾一度爲三十年代初期「改組派」的中堅份子，但在一九三九年實在覺察到組敵對政府是無濟於事的。因爲無論他如何反對和不信任蔣介石，他仍感到應先以國家的整體利益爲重。這種心情，在「苦笑錄」中常常可以覺察得到。在「苦笑錄」中，陳氏都能夠冷靜地回想自一九二五年以來的事，並分析當前局勢。正如他自

已在序言中說，「苦笑錄」應視爲他本人從一九二五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至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這一段時間親身體驗到的史實及紀錄。這些紀錄之可貴處，不單在它們是尚未會面世的重要資料，更在於它們能填補國民黨正史上的「遺漏」。

在這裡，我們要探討陳公博書成「苦笑錄」前後那種心境。陳氏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四川省黨書記的身份被中國政府委派往訪歐洲各國，其主要任務爲要求義大利之嚴守中立。在訪歐期間，與當時各國政要包括義大利總理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英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等會晤，商討國際大事如英美合作、歐洲形勢與遠東戰爭、中日和平、及歐美援助中國等。回國後，他一直在武漢的戰時國府及三八年十月成立的重慶政府服務。汪精衛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推動他的「和平運動」時，陳氏亦相繼離成都赴河內。數天後，陳氏轉赴香港。於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四〇年三月一段期間滯留香江，並且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寫成他的「苦笑錄」。

在香港的一段期間，陳氏並不反對汪精衛從事「和平運動」，但他却於一九三九年堅決反對成立另一個中國政府。當他在三九年夏末與汪氏會晤於廣州時，亦拒絕隨汪氏赴上海，商討組織政府各項事宜。同年八月，汪氏在上海召開高級幹部高峰會議時，陳公博仍然逗留在香港，只派何炳賢先生代表他到上海參加會議。何氏到達上海後亦轉述陳公博反對在淪陷區內建立政府的決心。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左右，陳公博終於改變初衷，再次投入「和平運動」的行列。

至於編註「苦笑錄」的經過，我們也要在這裡有所交代。大概在兩年前，陳公博公子陳幹教授數度與編者磋商後，渴望編者能代編註「苦笑錄」。又蒙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前所長韋慕庭先生(O.

Martin Wilbur) 的協助，把藏在哥大圖書館的原稿影印寄贈，在這裡特別鳴謝。在這兩年來，參與編註的助手有何冠彪、蘇維初、盧佳定和袁國強，並得摯友陳炳良博士（港大中文系講師）給予寶貴的意見及批評，衷心感激。本書由香港大學亞洲中心出版，編者對中心及其主任景復朗先生多方的協助，致萬二分謝意。至於本書英文版，希望能在最近將來面世。陳氏在「苦笑錄」的序言中，曾聲言「苦笑錄」的出版期須待書中人物三分之二作古後方可，而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已成歷史人物。

我們更要強調一下我們對處理這一套珍貴歷史資料的立場。在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的中國，有許多關於政治鬥爭方面的事件、陰謀、及黨與黨之間的矛盾，到現在還未有一個完滿的解釋。例如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的「中山艦事件」，促成蔣介石奪取國民黨黨內的政權，又直接牽涉汪精衛及影響共產黨在統戰期間與國民黨合作的機緣。對這一事件及其他重要的政治關鍵，陳公博每能夠從他自己的角度、立場及個人黨內的經驗分析各事。又如北伐及寧漢對峙那一段期間，他因職務關係，與蔣氏非常接近，往往奔走於國民黨各派之間。他更透過「苦笑錄」作詳盡的交代。我們在這裡希望掌握這些重要的資料，尤其是要分析陳氏對當時政局的觀察與定論，以務求達到求真之理想，所以在註釋方面，我們下了相當的工夫，參攷現存中西方對這一段歷史所發表的文章及書本，以保存歷史家應有的客觀態度及立場，避免牽涉入任何的政洽辯論。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張國燾與李宗仁的回憶錄。它們是近十年來所發表的珍貴資料。（按：張國燾「我的回憶」，已由香港明報月刊社於一九七三年單行出版；而「李宗仁回憶錄」，現在「明報月刊」按期登載，到本書付梓時，剛發表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的史事。）現在「苦笑錄」的出版，更加增進我們對民國史的認識，去蕪存菁，在攷證上望能得到更客觀的結論。「苦笑錄」包括之重要史料，只涉

及中日戰爭前的一段民國史，所以後來的「和平運動」及陳氏與汪精衛携手合作組織淪陷區內的南京政府之發展，是我們未及兼顧的，亦不便在篇幅有限之情況下加以定論。只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苦笑錄」可以代表陳公博對當時黨內各重要人物的評價，尤其是在中日戰爭前夕的一段時間；此外，他對內政、外交，尤其是在中日關係方面，也有一個明確的立場。這些判斷及分析，往往代表汪氏領導下的左派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從而直接影響到他對中國當時對日本的外交政策。及至中日戰爭爆發後，左翼國民黨在這方面的立場仍然持續，因而導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產生了「和平運動」的局面。



# 苦笑錄自序

這本書是紀載過去幾件大事的實錄，清楚了它的事件，同時也明白了它的意義，內容既這樣簡單，實在沒有「序」之必要。但我想一想，爲什麼我名之爲「苦笑錄」呢？又似乎應該畧畧加以說明，既要說明，那便是序了。反正要寫幾句卷頭語之類，我不如索性直喚它是「序」。

政治的內幕，太複雜而且太變幻了；彷彿夏天的天氣，萬里晴空，驕陽如火，你偶然見着天際橫着一抹淡淡的微雲，也許不大而且絕不經意，然而這一抹淡淡的微雲，一陣便倏然變成了驟雨，一陣或者倏然變成了狂風。身當其事的人們，自己也難得知道它變幻的來源，也難得知道它演化的結果。要防患未然罷，本來似乎沒有患；要補救事後罷，竟直使你來不及救，只有像大風雨裡的孤舟，聽着它漂流，聽着它簸蕩，有時連身命也要聽天由命的讓其浮沉。在當時遇事時，固然使你哭不得，笑不得，只有苦笑一下，即在今日我把筆紀載，事已隔了許多年，還是感覺哭不得，笑不得，也只好苦笑一下。

我寫這本紀載，是不希望讀者當作正史讀的。正史是什麼？等於我們過了一天，拿鉛筆在月份牌那個

日子畫一個符號。例如今日是一月一日過去了，就在一月一日那格上橫一畫，但一月一日之內所經過的事情太複雜而且太變幻了，那橫的一畫絲毫也不能表示它的原因和結果！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①我知道將來正史是必會大書特書「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但國民政府成立前所醞釀的種種喜劇，正史是不會記載的，國民政府成立後所引出來的種種悲劇，正史也不會記載的。並且歷史是人做的，人有時老老實實的在製造一段歷史，也有時虛虛偽偽的會磨滅一段歷史。歷來正史的編年紀事不必談，即自創業的皇帝以至於揭竿的英雄，關於他們的本身誰沒有過奇異的傳說？祇是成則爲王時候，那傳說便變了神蹟，敗則爲寇時候，那傳說倒變了鬼話。就算是不值一談的鬼話罷，有時也會被人磨滅得乾乾淨淨，一點不給它記上歷史。

我不希望讀者把這本書當正史看，難道我希望讀者把這本書當小說讀嗎？那又不然，大凡小說多少總帶點臆想，帶點虛構，否則情節和詞藻都太平凡，動不起讀者文學上的興味。可惜我這本書根本沒有臆想，也沒有虛構，情節是那麼平淡無奇，詞藻是那麼單調乏味，它也沒有文學的價值，它也不合小說的體裁，只好當作一種零碎史料，幫助讀者於讀正史時候，偶然「疑不能釋」，拿它作翻案的張本。

什麼是寫這本書的動機呢？那是我完全爲着打不平。我知道將來國民革命正史出版時，一定有許多事實被抹煞的，一定有許多朋友受冤枉的，我爲着打不平，所以要寫這本書，我固然喚它是「苦笑錄」，但讀者喜歡時也未嘗不可以喚它是「洗冤錄」。②

爲着從事政治十幾年，境遇把我挫磨到一點稜角也沒有了，一點脾氣也沒有了，祇是愛打不平的天性，無論政治怎樣把我壓迫，始終沒有毀滅，依然特立。我想想大概爲着遺傳的關係罷，也許爲着陶鍊的關

係罷！我爲什麼提起遺傳呢？我父親生就是一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一流人，他爲革命丟了他固有的地位不惋惜，他爲革命花了他整個的家產不懊悔，我身上有了這種倔強血液的成分，自然帶了只問心之所安不問事之成敗的天性了。我爲什麼提起陶鍊呢？我在少年時即在革命裡翻觔斗，兒童時代便學會那馳馬試劍，聽慣了那任俠仗義，使得我後來成功了一個重然諾輕生死的一個傻子。

血統既有倔強的遺傳，環境又有那奢遮的陶鍊，所以我一生做事都愛犯困難和冒危險。難道我真愛困難和危險嗎？絕不，祇是我遇困難時，心想我今日真碰着困難了，如果我能夠把困難克服，豈不極有趣味？我碰着危險也有同一的想像，假定危險終於跳不過，最險也不過是死，無緣無故而碰到死，你想天下事更有比它有趣味的麼？

我自少很有愛好文學的傾向，我發夢也想不到會做政治家。我不但對於政治沒有興趣，而且素來就對於政治討厭。滿清時代的政治已夠我討厭了，民國時代的政治更夠我討厭了。大概也因遺傳關係罷，終於命定了要我要走上政治的一條路。誰叫我生就打不平的天性呢？少年時候跟着父親鬧革命，自己何嘗有見地，有主張，不過看見滿洲人統治了中國，故而要打不平罷了。民十四由美回國，③何嘗想從事政治，祇見國民黨偏促一隅，一般所謂老同志的，都避義如旄，袖手不顧，故而要打不平罷了。對於反蔣，我何嘗想兩次首先樹起大旗來作急先鋒，也是看見蔣先生陰鷲譎悍，要硬碰硬的搶領袖，故而要打不平罷了。

除了打不平之外，寫這本書也恐怕帶幾分浪漫的氣息。我始終當人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做人有做人的責任，而做人也有做人的興趣。我對於事是絕對負責的，但責任完成之後，我要保持我的性靈。遠的不必說，就在實業部的當時，④我辦公比別人到得早，退值又比別人走得遲，但一離辦公廳之後，把門一關

## 苦笑錄自序註釋

- ①國民政府成立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有關國民政府成立情況，見鄒魯：「回顧錄」，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七四年，第一冊，頁一九一至一九三。
- ②在「苦笑錄」中，陳公博並無特意著重於替任何人洗冤，但對某些事件之內幕情況則有詳細分析。
- ③周化人：「陳公博先生年譜」，見本書附錄；及陳公博：「我與共產黨」，見「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社，一九四五年，頁甲二二六至二二七。
- ④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陳公博任實業部部長，見「陳公博先生年譜」。後陳氏著有「四年從政錄」以紀錄此段期間之工作。
- ⑤直到現在，除一二人物如何應欽、張學良外，書中人物大部份已作古，依照陳公博遺願，此書當可付印。

## 卷頭的預白

(一)這本紀載是從民國十四年七月起，至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止。中間少不免還有大事漏了敘述，但凡我沒有參加，或者不是親自與聞的，恐怕犯了以耳爲目的弊病，不敢強以不知爲知，一概從畧。至於民國二十六年的中日戰事發生後，更有許多大事，那我打算另寫一本專書，在此也不枝節的再提。這本書寫成以後，還有大事繼續發生，是不是我還補述呢？我目前也沒有這樣計劃。

(二)「蓋棺論定」四個字是中國人臧否人物的忠恕之論。這本書是寫成於民國二十八年的夏天，以後書中人物必定還有變化的，但我再不等他們去蓋棺，我就以今日我認定的是非爲是非。他們若再有變化，有機會時只好另寫一篇文章去敘述，我決定不再變更這本既成的紀載。

(三)書中有兩位先生我對他們是稱先生而不名；一個是汪精衛先生，他是中華民國的革命元勳，又是國民政府的創業者，所以我常稱他爲先生而不名。一個是蔣介石先生，他是國民革命軍的領袖，也是統一中國的大功者，所以我也常稱他爲先生而不名。自然我對於他兩位都難保無微詞，尤其對於蔣先生不滿

，但我依然對他們表示尊敬。

(四)中國人的名字最難記憶，他們有大名，也有別號，往往有人知一個人的別號，而不知他的大名，也有人只知一個人的大名，竟直不知他的別號。書中有許多人物，我只喚他們別號，原因不是我故意謙抑的代他們諱名，而是我對他們太熟了，平時叫順了口，提筆記載時，似乎叫他們大名，反而覺得太生硬。這本書出版一定距離寫書的時間很長很長的，恐怕年代湮遠，讀者不一定知道某人別號就是某個大名，我所以不憚煩的照着筆畫的順序，編定一個名號表，至於我單寫他們大名的，那就不再煩贅。以下是一個名號表：

王法勤號勵齋	王寵惠號亮疇	孔庚號安軒	孔祥熙號庸之	古應芬號勳勤
白崇禧號健生	朱培德號益之	朱暉日號步雲	朱家驊號駟先	伍朝樞號梯雲
李濟琛號任潮	李宗仁號德鄰	李章達號南溟	李品仙號鶴齡	李江號冠洋
李烈鈞號協和	李福林號登同	李文範號君佩	李銘號酸菴	何應欽號敬之
何鍵號芸樵	狄膺號君武	吳鼎昌號達銓	沈鴻烈號成章	林森號子超
居正號覺生	胡漢民號展堂	胡宗鐸號今予	胡瑛號經武	陳濟棠號伯南
陳銘樞號眞如	陳誠號辭修	唐生智號孟瀟	唐紹儀號少川	徐景唐號廣陶
徐永昌號次辰	徐謙號季龍	孫科號哲生	夏威號煦蒼	馬超俊號星樵
陶鈞號子今	張人傑號靜江	張繼號溥泉	張發奎號向華	張定璠號伯璇
張學良號漢卿	張羣號岳軍	張治中號文白	黃實號蘅秋	黃郛號膺白

黃紹竑號季寬	黃鎮球號劍陵	鄒 魯號海濱	許崇智號汝爲	馮玉祥號煥章
商 震號啓予	鹿鍾麟號瑞伯	郭泰祺號復初	傅汝霖號沐波	傅作義號宜生
程 潛號頌雲	覃 振號理鳴	葉恭綽號譽虎	彭學沛號浩除	經亨頤號子淵
賈景德號毓儒	鄧演達號擇生	鄧世增號益能	趙丕廉號芷青	熊式輝號天翼
劉文島號塵蘇	劉 興號鐵夫	劉 峙號經符	劉 驥號菊村	劉維熾號季生
魯滌平號詠龔	蔣方震號百里	蔣光鼐號景然	薛 岳號伯陵	薛篤弼號子良
蔡廷鍇號賢初	閻錫山號百川	謝 持號慧生	戴傳賢號季陶	蕭振瀛號仙閣
譚延闓號組安	羅文幹號鈞任	顧維鈞號少川	龔 浩號孟希	

## 第一章至第四章說明

國民黨興國民革命（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五月）

在「苦笑錄」第一章至第四章裡，陳公博很明確的分析了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對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更有詳盡的交代。在這四章裡面，讀者可以更清楚認識到蔣介石如何在短短的兩年間崛起，取代了汪精衛，領導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

「苦笑錄」首先介紹國民政府成立前後的政局，引導讀者了解汪精衛領導的左翼國民黨如何在一九二五年間爭取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但是國民黨設立國民政府的計劃並沒有因此而受到阻礙。事實上，繼位的問題正促使了國民黨從速選舉新政府的主席。在他們的心目中廣州是一個理想的基地，但當時却受着楊希閔與劉震寰二軍閥的侵擾割據。表面上，他們都是國民黨的聯盟友好，但楊氏實與北洋軍閥段祺瑞勾結，而劉氏則暗請雲南軍閥唐繼堯支援，希望彼此合作，剷除廣東地區內國民黨的勢力，以便自己成爲廣東省總督。

關於以廣州作爲政府陣地的問題上，黨內高級幹部都一致通過，然而對於收復的方法，需否同時剿滅楊、劉或只消滅楊的問題上，黨內發生嚴重的歧見。據「苦笑錄」的記載，廖仲愷極可能代表着汪精衛，贊成前者，而胡漢民則堅持後者。最後，基於楊、劉二人都已違反黨的指引的理由，國民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軍事行動，剿滅楊、劉，收復廣州一帶，以備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於此。



這一次軍事行動，雖能順利完成，却造成了黨內高級幹部的嚴重分裂。黨內的著名右翼老將如鄒魯等，在這次事件中極力支持胡漢民的建議，在剿滅楊、劉的軍事行動間，竟毅然放下黨內一切任務，離開廣州往香港。當時剛被廖仲愷說服加入國民黨的陳公博，恰巧在香港遇到鄒魯，從而知道黨內高級幹部分裂的嚴重性。翦除楊、劉二人的決策是經過黨內投票決定的，胡漢民當然要同意。然而，在實際軍事行動中，胡氏雖身為廣東省總督及代理大元帥，却處處顯示躊躇不決，甚至在一次緊急的軍事會議中，竟抱着置身度外的態度；將自己的責任推卸給廖仲愷與加侖將軍。

在「苦笑錄」中，陳公博描述胡漢民此次與黨內幹部意見的分歧，在軍事行動中的躊躇，以及他對黨內幹部如許崇智等的冷嘲熱諷，實是造成他在黨內聲譽日漸式微，甚而失去領導地位的主要原因。陳公博更進一步論斷在六月三十日政委會會議之前，黨內大部分幹部已暗定選舉汪精衛為新政府主席。

這些論點都足以置信。在五月於北京召開「中全會」之前，汪精衛已離開北京。而後來在汕頭與廣州國民黨幹部（包括廖仲愷、許崇智與蔣介石等人）舉行一連串會商，表面上，汕頭的會議是為翦除楊、劉二人的軍事行動而設，可是這次會議並非是正式安排的，會前既無通告，而會議中的決定也沒有發表。I. R. Shirley推測在這會議中極可能預先安排新國民政府內重要職位。在「苦笑錄」中，陳公博記載自己被委任為黨常務秘書後的六月三十日——即新政府成立前一日，（按：原誤作兩日。）突然接獲一項「中央執行委會」及「中央監察委會」發出的通告，謂成立新政府的計劃乃非法之事。我們相信此事可能與胡漢民有關，由於胡氏發現黨內對職位的委任已有暗中的安排，所以極力阻延甚或推翻次日政務委員會會議的決定。但他的計劃終告失敗。

雖然在政委會的會議上，辯論激烈，意見分歧，但終於達成幾項決議。汪精衛當選為國民政府及軍委會主席，廖仲愷為政委會及軍委會會員，同時保留以往職位。胡漢民則被委派一個不大重要的外務長之職。在不大願意的情況下，胡氏還是接受了這個新職。而一概人等便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正式上任。

表面看來，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了。新的政府可以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繼續未完成的革命，務求重新統一全國。然而，這表面上的和諧，很快就為「廖仲愷被刺」、「西山會議」和「中山艦事件」等一串事件所打破。

「苦笑錄」的第二個主題，是引述廖仲愷被刺一事對國民黨內鬥爭的影響。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的清晨，廖仲愷在國民黨總部門外遇刺。他此行是參予一個會議，隨行的還有他的夫人和他的朋友陳秋霖。陳氏亦身受重傷，廖夫人則能倖免。

廖仲愷之死立刻造成黨內互相猜疑的恐怖氣氛。然而，自始至終沒有人完全明白這次事件的經過，及後來如何導至胡漢民被遣往莫斯科和許崇智被逼放逐。在「苦笑錄」中，陳公博給予我們極為詳盡的報導。倘若將他所提供的資料與他有關的事實配合起來，我們不難發現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在行刺發生前約兩星期，廣州已謠傳國民黨中八位領導人物被列入刺殺黑名單，其中包括汪精衛與陳公博。汪氏本來打算出席當日早上的會議，但他因手腫未能出席而倖免大難。

在「苦笑錄」中，陳公博認定這次行刺乃黨中右翼分子所為；因為他們以為廖氏是共產黨員，是消滅楊、劉二軍閥的策劃人，亦是致令胡漢民失去所有重要政職的幕後主腦。故此，在他們心目中，必須除掉廖仲愷。

其中一名行刺者亦身受重傷，在他身上搜獲的手槍證實爲廣州市內一名莽漢朱卓文所有。事後兩年（即一九二七年），朱卓文投奔陳濟棠，並在中山縣擔任官職。但是在這一段時間內又因謀奪政權，爲陳濟棠逮捕入獄。當時胡漢民遠在香港，聽聞此事，立即以個人名義致電陳濟棠，請求釋放朱氏。最後朱卓文仍被處決，但罪名並非行刺廖仲愷。通過這件兩年後發生的事情，足證陳公博以上推理有其可信之處。

廖仲愷死後成立的特別調查委員會，成員包括汪精衛、許崇智及蔣介石。雖然他們沒有確指胡漢民有否直接參與其事，但站在所謂要負政治責任的立場上，他們實在追討了胡漢民。胡氏的家屬和部下都受到制裁，他的兄長胡清瑞被捕，堂弟胡毅生涉嫌爲幕後主謀，則逃之夭夭。軍隊中胡氏的部屬一律革職，其中包括第一軍軍長梁鴻楷和兩名廣州游擊隊隊長。胡漢民本人則以受保護爲名被安置在黃埔軍校中，兩日後更以觀察員的身份被遣送往莫斯科。黨內的右翼分子因此受了嚴重的一擊。

據「苦笑錄」記載，許崇智之被蔣介石放逐到上海是因爲誤用公款所致，與廖仲愷無關。不過，許氏在調查廖案中曾向汪精衛提議借機除掉胡漢民而遭汪氏反對，而此項建議無疑令汪、蔣二人對切身安全問題提高警惕，加上廣東軍隊長官又有涉及此事的嫌疑，所以許氏身爲軍長，自當負起相當的責任。這樣看來，放逐許氏顯是由蔣氏下令。汪氏無疑爲了本身利益極表同意。

廖仲愷事件所產生的後果是汪精衛與胡漢民之間的嫌隙更形破裂，而且這不再是二人性格方面的分歧，而有兩種思想體系的鬥爭。汪氏代表了左翼國民黨，而胡氏則代表了右翼國民黨。而其間之爭衡，促成國民黨官方歷史上的一頁空白——「西山會議」。同樣，許崇智之被逐亦使汪、許二人之間關係惡化。雖然許氏沒有出席在北京舉行的「西山會議」，但當會議移往上海舉行，許氏遂成爲其中一份子。

### 中山艦事件（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當國民黨左右兩派在一九二六年勢成水火之際，蔣介石乘着這個機會發動政治攻勢，到三月間遂先發制人，制肘了汪精衛的領導權，更積極地籌備北伐以達成國民革命的目標。至於中山艦事件發生的原因，蔣介石的解釋，是爲了制止共產黨積極破壞統一戰線和北伐計劃。但當時共產黨仍是秉承共產國際的指示，務須與國民黨並肩達成「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即國民革命）後，方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當時共產黨與俄國顧問對國民黨的實際威脅程度，委實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而且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北京的俄國大使館搜獲的文件中，並沒有透露共產黨有破壞統一戰線或除掉蔣介石的計劃。

陳公博的「苦笑錄」爲「中山艦事件」的真相帶來一個明確的定論。陳氏指出此次事件實爲右派國民黨的陰謀所致，而與共產黨無關。「苦笑錄」面世之前，吳天威教授曾暗示右派極有可能參與是次政變；而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證明此事變與共產黨無關，且暗示與右派相關。陳氏所披露，不但坐實吳、張二氏的論點，且爲廓清國民黨史中的烟幕，作出重大貢獻。

關於右派爲何採取這種政治行動，編者在這裡要畧爲交代。汪精衛的左派國民黨，自一九二五年國民政府成立至廖仲愷遇刺後，消除了右派份子（即所謂「西山派」）的重大威脅，一直穩操大權，而且與共產黨員在統一戰線上，尤其關於工農運動方面，有着緊密的關係。蔣介石也隨着汪氏領導下的國民革命不斷在軍事方面增加了自己的勢力。但是在汪氏看來，任何蔣方勢力的超升，都是對他在黨的領導地位有必定性的威脅。而以張繼、鄒魯、伍朝樞、吳鐵城爲首的右派，亦與蔣氏不和，伍、吳二人組織的三民主義學會，便是威脅蔣氏在廣州的勢力。然而，右派的不滿還是集中在汪氏身上，西山派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間在北京舉行的「中全會」，就是抗議汪氏對黨的控制。他們且進一步利用汪、蔣之間的矛盾，使蔣介石懷疑汪氏欲排斥他，從而藉着二人的爭鬥，坐收漁人之利，使權力得以均衡，「中山艦事件」遂應運而生。

歸納陳公博所透露之史實有三：（一）從陳氏與蔣介石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圍攻武昌時在湖北李家橋的一段對話，知悉蔣氏認為革命行動只需要一位領袖，他和汪氏不能共處；其次，他深信汪氏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有陰謀綁架他往莫斯科。（二）在陳公博與鄒魯於一九三〇年九月國民黨在北京舉行擴大會議的交談中，鄒氏透露右派在胡漢民被逐後，欲陰謀離間蔣氏與共產黨員來破壞廣州的局勢。他們利用蔣氏猜疑的個性，由伍朝樞展開計劃。首先在某一個晚上，邀請俄國領事赴宴，又於翌晚邀請蔣氏的部下赴宴；席間先散播謂俄國領使嘗提及蔣氏行將往莫斯科，然後追問蔣氏的行程。由是，蔣氏懷疑共產黨員或汪精衛想消滅他。為證實其事，蔣氏諸多藉口，兩度要求汪氏批准他往莫斯科小休，又要求陳璧君及曾仲鳴同行。然而，最後決裂乃因蔣氏被邀參觀一艘停泊廣州的俄國船，而汪氏因已參觀該船，故婉拒蔣氏同遊。蔣氏遂相信汪氏與共產黨意欲謀害他。（三）在陳公博與李之龍於一九二七年在武漢的談話中，李氏否認當時受命於共產黨往襲擊黃埔。反之，他解釋是次駛往黃埔，一如慣例，先得到蔣氏辦公室的電話指示；而且他接獲命令時，並非在船上，而是在家中。所以他事後極驚詫自己因此而被捕。

雖然蔣介石始終強調不知中山艦駛進黃埔，但從這事件發生後一連串的行動，足以證實上述陳公博的記載甚為可靠。蔣介石於四月二十日在黃埔演說，暗示整個事件與共產黨無關；而在四月十四日，李之龍已被釋放了；反之，在三月二十日會積極行動並任海軍臨時總指揮的歐陽格却被通緝，似是洗刷了共產黨方面的責任。

蔣介石在黃埔的演說中也曾表示反對西山會議派，以示他的行動並未受右派影響；此外青年軍人聯合會和三民主義學會同時被撤銷，也似乎顯示無偏袒任何一方。然而，分析這段歷史的重要關鍵是在同一時期間，蔣氏在其他方面的行動。蔣氏在四月十四日下午與張人傑、宋子文等商談時謂他在事變後恐右派搗亂；其次，吳鐵城之被拘禁，伍朝樞的被勒令離開廣州，是這次事變與右派互相關連的鐵證。

至於蔣氏在黃埔軍校演說謂事變與共黨無關一事，無非是恐懼共產黨份子在統戰營中有所行動，所以必定要先安「軍心」，以防範共產黨先發制人；而黃埔軍校，正是蘊藏着共黨實力的地方之一。據「苦笑錄」記載，蔣氏對汪精衛解釋「中山艦事件」謂共黨意圖謀亂，實在顯示出蔣氏意欲先發制人，打擊共產黨及汪氏，從而爭取領導黨的地位。在這種情景下，當右派的伍朝樞策動他的「計劃」之時，蔣氏便發難而造成了「中山艦事件」這一段歷史了。

## 第一章 國民政府成立的前夕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於十四年七月一日，現在雖然不列入於國家紀念日，而在政府方面每年都有照例的紀念，不過在人們的印象，似乎還沒有四月南京政府成立那樣深刻。倘使沒有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自然也連帶沒有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祇是歷史是人造成的，而有時歷史也會被人抹煞的，現在人們似乎對於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的印象很模糊，其原因就是後來南京國民政府的人們極力想抹煞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那一段艱難締造的歷史。

在孫先生逝世之前，本已擬定成立國民政府的方案，無如當時大元帥所佔的地方僅僅得一個廣州市，在東江方面有陳炯明①統屬下的林虎和葉舉軍隊，在南路方面又有陳炯明統屬下的鄧本殷軍隊，②北江雖然有譚組安先生③的湘軍和朱益之④先生的滇軍，西江雖然有李任潮先生的第一師，可是都有些殘破，力量未能充實。就是廣州市罷，那時還有著名的楊劉軍隊，所謂楊劉軍隊就是雲南楊希閔和廣西劉震寰的隊伍，他們自從由廣西東下，便盤據着廣州，把小小一個廣州市劃區防守，不過他們劃區並非爲着軍事需要

，而爲着開烟和開賭的關係。他們的目的既在烟賭，對於大本營的命令是絕不服從的，這樣大本營還不能算健全，怎樣可以改建國民政府？⑤

說至此地，我可以回述我個人回國的經過了。我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廿九抵美國的紐約市，在哥崙比亞大學的大學院整整研究了兩年，於十四年二月八日離開紐約取道歐洲回國。當時雖然把博士必修的課程學完，但實在沒有一點動機要東歸，有之就是經濟發生了奇窘。我在哥崙比亞時候，廖仲愷先生恰恰做了廣東省長，⑥我還算是一個廣東官費留學生，祇是兩年沒有領到一文的官費。我侍着曾和廖先生同過事，在民國十年和十一年的廣東省教育會，大家同爲評議員，⑦因此給他一封信，希望他能繼續匯款給我，同時還給汪先生和陳秋霖先生一封信，希望他們替我說幾句話。不久我接秋霖的來函，說汪廖兩先生都有同一主張，即是我若答應回國，他們會給我籌旅費，若繼續求學，那麼他們便不負責任。那時我真進退兩難，結果只好決心同意他們的意見。

在十四年一月底我接到從廣州匯來美金六百元，這筆款不是從省政府匯來的，因爲省政府很窮，這筆款算是廣東大學（後來改爲中山大學）⑧匯來的，那筆款算是預支，而以我回國當廣東大學教授爲條件。我既有了旅費，遂定於二月八日離開紐約往倫敦，經過柏林、巴黎，而抵羅馬時，知道孫先生已在北京逝世。我原想更往東歐一遊，至是恐怕廣東又有變動，祇好將原來計劃變更，就在義大利的納波里登船，直航歸國。

我到廣東的時候，已是四月中旬，那時汪先生隨孫先生北上，孫先生逝世之後，他病在上海未歸。而廖先生則因東江初平（那時蔣介石先生已帶黃埔軍隊佔領潮汕，是爲第一次東江之役），⑨也往了潮汕，



只有胡展堂先生以省長資格（那時他接了廖先生省長之任）兼代大元帥職務，留守廣州。⑩我和胡先生是不大熟悉的，因是我祇往廣東大學找鄒海濱先生接了一次頭，在家整理和預備下一年度的功課。

不久汪廖兩先生都回到廣州了，他們告訴我大本營是不能號召的，必得要改組國民政府，不過國民政府成立的先決條件必得將楊劉兩軍隊救平，否則不獨政府命令不能出國門，恐怕還不能出府門，這樣雖然把大本營改組了國民政府，也恐於事實無益。

那時國民黨的兵力太弱了，要奪回廣州市，勢必放棄東江，但兩利相權取其重，只有命令蔣先生回師會同湘滇兩軍來消滅楊劉軍隊。楊劉在廣州也實在太胡鬧，除烟賭之外，什麼也不管，廣州差不多每一條大街都有烟賭，他們的軍隊就是煙賭館的衛兵，官長則淫亂驕奢，士兵則荒縱橫悍；這樣的軍隊不除，國民政府真無從成立，國民革命也無從談起。⑪

廖先生是比汪先生先回廣州，我回國頭一次再會見他，還是黃居素代我約時間的。一日清晨，我和居素到百子路見他，那是九時左右罷，我看他客廳坐了不少人，一回他匆匆下樓，見了各人打一招呼，對我說：「公博，你回來了嗎？很好，我們改日再談罷。」那時各人一哄而起，包圍着他，言語嘈雜，他似乎無暇應付，敷衍了幾句，也不知是說什麼，便坐上汽車走了。我想仲愷怎麼忙到這樣，約了人而無暇談話，這太越乎事理，在外國住慣了的留學生，實在有些看不慣，我告訴居素說：「我們走罷，我實在看不起這種亂局面。」

過了兩日廖先生派人送信來，說約我夜裡見面，那夜我們畢竟面對面的談了很久。這一席話遂決定了我以後的事業命運，我真想不到我會從事政治，更想不到我素來對於政治冷淡的人會從事政治。

「公博，你回來了，你打算怎樣？」廖先生問。

「我沒打算，我還是決定在大學教書，因為我沒有出國之前就在法政專門學校教書，所以我還是打算教書。」我說。而且我當時對於教授很感覺興趣，對於廣州的政治實在看得太不順眼。

「那是你的打算了，不過這並非我們對你的期望。我們希望你回國，不是教書，而是幫我們的忙。」廖先生這時對我有點失望，但依舊帶着希望的神氣。

「不過我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我還肯定的說。

「我不管你對政治有沒有興趣。我一定要和你辯論，你看中國這樣落後，政治那樣腐敗，要不要想辦法？」

「自然要想辦法。」

「既要想辦法，要不要組織？」

「自然非有組織不行。」

「你看國民黨有沒有希望？」

這一問太難倒我了。平心而論，當時國民黨雖然說已改組，<sup>②</sup>但離所謂「組織性」還遠。我只有說：「恕我大胆批評，國民黨還沒有組織嚴密。」

「你的批評很不錯，但你還有大錯，即是祇會冷靜的批評，而不肯努力的參加工作。這樣，國民黨永遠沒有辦法，而中國的國民革命也永遠不能實現。」那時廖先生已把握着我的辯論弱點，直接採取攻擊的姿勢。

「廖先生究竟要我怎樣呢？」我心坎中的火燄已給他燃燒着了。

「我們不要你教書，要你入中央黨部。我和你約約我們失敗一起的失敗，我們成功也一起的成功，我望你立刻答應我。」廖先生很興奮，那時他站起來，很像不答應就要決鬥。

「好！我答應你，從今日起我將我的身命交給黨便了。」我不猶疑的說。

我既決定我的命運，我們便開始談到包圍廣州的計劃，談到宣傳的方法，談到國民政府成立的以後及其一切。我反覆提出「廉潔政府」的口號和決心，否則不能做到廉潔政治，國民政府雖改組，依然不能號召，因我迷信「事實勝於雄辯」的真憑實據，徒事宣傳，毫無故實，是沒有用的。廖先生很贊同我的意見，那樣我便決定了即日開始工作。

這次消滅楊劉的計劃，實在並不怎樣困難，因為楊劉的軍官和士兵都有了錢，根本沒有打仗的決心，東江回師的遺將調兵，成了公開的秘密，楊劉始終沒有什麼軍事準備。大本營本來設在河南的士敏土廠，省政府也臨時移駐那裡辦公，我們日夕往來於河南省城之間，楊劉像睡着了一樣，並不加以干涉。我替大本營作了兩篇文告，一篇是本着中央黨部決議案，宣言統一軍政、民政、財政。一篇是力闢中國國民黨共產化的謠傳。我送了這兩篇文告過士敏土廠，想想政治的事已了，以後完全是軍事行動，我遂送母親到香港暫住，因為我家適居於城內炮火應該集中之地，我不想老人家担受驚恐，所以送她至香港。

我原想到了香港便趕回廣州，但到了香港便碰着兩件大事。第一件上海已有了五卅事件，省港正醞釀着響應，預備作政治罷工。第二件香港政府因預防罷工，特別注意於國民黨所辦的「新聞報」，因此「新聞報」館被搜查，該報的社長陳秋霖也因此入獄。對於香港罷工，我正注視它的發展，而秋霖入獄，我

爲公誼私情，都難得猝然回廣州。因此汪先生在我離廣州後找我參加宣傳，我也不能回粵工作。

楊劉的軍隊不幾天便消滅了，除了楊軍旅長趙成樑被炮轟斃之外，其餘的官兵不是歸附就是逃亡。不過我在香港時，知道爲着消滅楊劉，國民黨的最高幹部已起了破裂。有一天我碰見鄒海濱先生，我非常駭異的，他也住在香港。我那時還沒有官守，居住那裡都不成問題，而鄒先生是中央黨部的常務委員，又兼着秘書處的職務，在那時軍事正在緊張時候，怎樣可以優游的住在香港？

「鄒先生，你爲什麼來香港？」我很驚訝的。

「這次軍事，我真不願意過問。他們既然主張打，讓他們打便了，我是不願參加的。」鄒先生很安閑的回答，而且帶點不大高興的神色。

打楊劉不是最高幹部決定的嗎？鄒先生是常務委員，豈有不參加決議之理？鄒先生這樣說，我知道裡頭必定有文章，我雖然不好再問下去，我心裡總是懷疑滿腹。這段啞謎直至我回廣州之後才瞭然，因爲最高幹部對於楊劉還有輕重之分，對於打楊是一致的，而對於劉震寰，最少胡先生和鄒先生不贊成用武。當時爲什麼要打楊劉呢？除了他們違抗命令，包庇煙賭之外，楊希閔已和北京段祺瑞有了默契，劉震寰也到過兩次昆明和唐繼堯聯絡，希圖打倒國民黨而做廣東省長。在最高幹部會議之時，胡廖兩先生主張各不同，胡先生主張單打楊，而廖先生則極力主張對於楊劉一起解決。⑭兩個人爭執了許久，胡先生拗不過多數的意見，只好服從決議。胡先生的主觀和個性本就很強，而且他的脾氣很喜歡卵翼幾個軍人作撐腰之具。他對於這次軍事行動，雖然名義上以代帥的資格主持，但實際上不大願意過問的。⑮有一次正在軍事緊急時期，有一個問題急待解決，有人問胡先生怎樣處置，胡先生冷冷的回答：「我不管，你們問仲愷和加倫

罷。」<sup>⑭</sup>照這樣態度，那麼海濱先生宣告中立也是不足為怪的。

楊劉救平之後，汪先生為着別的事故到香港來，要我即日回中央黨部辦事。我告訴汪先生我正在等秋霖出獄，否則我難於回粵，所幸沒有幾天秋霖已被釋放，這次算是返解出境，「新聞報」也復版無期，我和秋霖一起回廣州了。

我在中央黨部任什麼事呢？廖先生告訴我，打算在中央黨部添設一個書記長。其時中央黨部的制度，在中央執行委員三十六人中推選九人為常務委員，<sup>⑮</sup>而在常務委員之中又推出三人組織秘書處，秘書處只有書記一人秉承那三位秘書辦理日常公事。那種制度自然不大方便，因為常務委員都很忙，每天能來辦公不過兩三個鐘頭，書記又只能起草文件，無法提挈秘書處的事務。而且中央又有好幾部，所有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工人部、商民部、青年部、婦女部等，每日都有事接頭，常務委員既不常在，而書記又無權處理，故有書記長設置之必要。其實當時書記長也是為我而設的，說到辦事，還有許多棘手。<sup>⑯</sup>因為我當時既非中央委員，對於各部事務也不見得都能指揮和聯絡，我也知道辦事必感困難，祇是汪廖兩先生既懇懇切切的要我幹，我不好知難而退，立刻辭謝。

楊劉軍事既告救平，國民政府的組織便馬上着手。汪廖兩先生囑我起草國民政府組織條例，定期於七月一日國府和省府同時就職。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廣州六二三的奇變又已來臨。原因是民衆為着響應上海五卅事變，遊行示威，至沙基時英兵開鎗，屠殺民衆，又闖下了一場大禍。<sup>⑰</sup>因着這次事變，更促成歷史有名的省港大罷工，<sup>⑱</sup>直至我們北伐進至長江流域，國民政府將近北遷，此事才勉強告一段落。

在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兩日，我在中央黨部辦公室，接到中央監察委員會對於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彈劾文

，說國民政府成立是一件非常的大事，中央執監兩會事前並不與聞，此舉實爲違法。彈劾文的領銜人是鄧澤如先生，<sup>②</sup>這個彈劾顯然的給將近出胎的國民政府一個大打擊。我接到公事是在下午四時，第二天便要開常會，第三天國民政府便要宣告成立。<sup>③</sup>事出非常，這件事怎樣辦呢？我不提出罷，我在職權上是違法，我提出罷，國民政府便難於如期成立。我想了一想，還是找仲愷先生罷。我打了幾處電話，才知道他在省長公署開會。我通電話至省長公署找廖先生，據說他正在開會，不能接電話。我說這是十分緊要的事，非立刻通話不可，廖先生終於離開會議席，問我有什麼急事。

「監察委員會剛才來一公事，彈劾中政會，說成立國民政府爲違法，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廖先生一定事前不預聞的。

「我一點也不知道，是誰幹的？」電話裡廖先生的聲音顯然現着駭異。

「是鄧澤如先生領銜的，你想該怎麼辦？」

「不要緊罷，明天在會議上把它打消便了。」

「我想不好，因彈劾是對中政會的，不是對個人的。我想最好通知胡先生，勸鄧先生撤回。否則縱使能於明日會議打消，也著了痕迹。而且這幾日間外邊謠言很盛，縱使他們的彈劾不能成立，也於國民政府前途的印象不好。」我給廖先生一個貢獻。

廖先生算是對於我的提議同意了，我立刻將原文親自送至省長公署，並請廖先生無論如何夜間總要將原文送回，因若不能勸中監會撤消，翌日還須提出的。我心知這事情並不那樣簡單，若中執會沒有委員同意，鄧先生這個老實人絕不會擅自提出這種重大問題，並且非有大力的委員主使，鄧先生也沒有那樣胆量

提出彈劾。

那時還有一個嚴重問題，即是誰當第一任的國民政府主席。在我起草國民政府組織條例的當時，廣州社會的推測，國府主席不是推汪先生，<sup>②</sup>就是推胡先生。依常例判斷，似乎國府主席應屬胡先生居多，在國民黨汪胡都有一樣深長的歷史，但胡先生目前還是代理大元帥，由代理大元帥一躍而為國府主席，那也很順理成章。不過熟悉政治內幕的人，已經明白汪先生會當第一任的國府主席，祇是當日空氣中充滿汪先生再三辭謝的消息，尤其他的夫人陳璧君<sup>③</sup>不贊成他負那種大任。

胡先生爲什麼不被推爲國府主席呢？也有近因，也有遠因。那近因即是在這次楊劉之役，胡先生只贊成打楊而不打劉，現在楊劉既同被救平，即是主張同打楊劉者得了勝利，而胡先生算是主張上的失敗者。加以在戰爭期中，胡先生似乎太過於冷淡，楊劉既滅，人望更是不歸。至於遠因則說起來很長，那是胡許的交惡。自革命二次失敗之後，本來胡先生和許汝爲<sup>④</sup>先生很要好的，然而兩個人的脾氣總似先天似的合不來；胡先生素來自負聰明，而許先生則素來慣於驕蹇，祇是一則在失敗時期，沒有可以衝突的地方，二是一個是文，一個是武，一時也沒有利害的矛盾。一次他們終於破裂了，那是陳炯明反叛之後，許先生由江西回師救粵，不幸在北江失敗，許先生便帶領着殘部，和黃大偉、李福林等軍隊去打福建，胡先生以文人在軍無用，由江西間道回至上海見孫先生。胡先生是當時大本營的秘書長，論起失敗責任，自然也不能完全諉卸。然而胡先生是素來自負聰明的，聰明人焉可以打敗仗？所以雖然沒有一定的要成則居功敗則諉過，但至少對許先生下了許多苛刻的批評。許先生在福建時已經聽見胡先生的評語，怒不可當，迨後來由福建回師廣東，中途又打了幾次敗仗，孫先生對之更感不滿。許先生以爲孫先生對他不滿，其故都由於胡

先生的中傷，以一個素來驕蹇的人，自然更不會和他認為對頭的自負聰明的人合作。這次統一東江和收平楊劉，粵軍第一軍都建有殊勛，許先生是第一軍名義上的主帥，這次改組國府他倒成爲一個重要角色。他於是結合了一般將領的力量，得了最高幹部的同意，內外合力，共同擁汪，遂使胡先生失却了把握中的國府主席。

以上的遠因和近因都是胡先生的致命傷，除此之外，胡先生更素來好罵人，他的詞鋒尖酸刻薄，經他批評，身受者都有些像挖心之痛。當時軍隊的數量以許先生的粵軍爲最多，軍隊的質素以黃埔的黨軍爲最銳，其次譚組安的湘軍，朱益之的滇軍，對於胡先生皆惡感多而好感少，在這種錯綜複雜情形之下，大家對於國府主席皆矚望於汪先生了。<sup>26</sup>

記得當日中政會的情形，大家差不多不歡而散。因爲國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都推定了汪先生，祇把政治委員會主席讓之胡先生，那種冷暖之情，已使胡先生極感不滿。後來更因國府草創，僅先成立兩部，財政部定了廖先生，而把外交部定了胡先生，胡先生便借題大發脾氣，說他本人不懂外國語而任爲外部部長，迹近玩笑，不待議終，當即發怒離席。鮑羅庭花了許多唇舌，扮作調人，說李鴻章也不懂外國語而爲有名的外交家，在國府籌路藍縷之時，非有一人才幹如胡先生者不能勝任，這不是玩笑，而是大任。<sup>27</sup>這樣唇焦舌破才把僵局挽回。後來廖先生的被刺，西山會議的召集，種種惡因，都種於國民政府改組的當日了。

當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夕，那真是危難四面，侷促一隅。蔣先生由東江回師之時，陳炯明的軍隊又佔領了東江，重要城鎮的惠州且告失陷；南路則爲鄧本殷所據，漸漸迫近了江門。<sup>28</sup>尤其困苦的是六月二十三



日的沙基慘案，省港罷工，英法兵艦雲集廣州，差不多隨時可以惹起嚴重外交，顛覆政府。然而時期已定，決心不再變更，國府終於七月一日依期成立，我也徇了汪廖兩先生之約，任職廣東省府的農工廳，兼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這是國府成立之前夕，且是我個人從事政治事業之始。

## 第一章註釋

① 陳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原名陳捷，字鏡存，又字贊三，廣東海豐人，參與反滿清革命，民國成立，被委為廣東省省長。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凱撤職後，乃參與反袁運動，並領導孫中山的護法運動。一九二〇年十月，陳氏佔據廣州，孫中山委為廣東省省長兼廣東軍統帥。一九二二年，孫中山解撤其職，陳氏再不支持孫氏，而割據廣州，經歷國民黨軍兩次東征，陳氏終於一九二五年敗退，逃居香港。

氏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I, 173—180. 及康白石：「陳炯明傳」，「南北極」，第八十四期，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頁廿五至卅二；第八十五期，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頁五十四至六十三；第八十六期，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頁三十九至四十六；第八十七期，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頁三十九至四十二；第八十八期，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頁七十九至八十五；第八十九期，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六日，頁六十六至七十二；第九十期，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頁七十二至七十七；第九十一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頁七十至七十五；第九十二期，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頁七十五至八十。

② 陳炯明部屬多駐於東江一帶，如葉舉，林虎等部。鄧本殷亦為陳炯明屬下一支，但駐於廣州西南，瓊州一帶，見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出版地缺，一九三〇年（？），下冊，頁二五〇至二五二；及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畧」，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一年，頁一五一至一五二。

③ 譚延闓（一八七九——一九三〇），字祖菴，號無畏，湖南茶陵人，清翰林院編修，曾任湖南諮議局議

長。從一九二四年起，歷任中央與廣州國民政府要職。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任國民革命軍軍長。及建都南京，任國民政府主席。見 Boorman, III, 220—223; 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革命先烈先進傳」，台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一九六五年，頁九七八至九七九。

④朱培德（一八八八——一九三七），字益之，雲南人，國民黨軍事將領。北征期間，任第三軍軍長。一九二七年至二九年，任廣西省長，後歷任總參謀長，軍事訓練會主任委員，軍事委員會行政局主任。見 Boorman, I, 453—457; 及吳相湘：「民國百人傳」，台北，傳記文學社，一九七一年，頁一一一至一二〇。

⑤滇軍楊希閔及桂軍劉震寰本為地方軍閥，一九二三年鄒魯曾分派人往洽商，促其發難，後兩者乃投入孫中山廣州軍政府陣營，事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五年，頁一〇六六至一〇六八。

⑥廖仲愷（一八七八——一九二五），原名恩煦，廣東惠陽縣人，生於美國，受外國教育，國民黨之理財家。勤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並領導右派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統一戰線的合作。一九二五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以一身兼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長、財政廳長諸要職。同年八月二十在中央黨部門前被刺。見 Boorman, II, 364—367 及 Chan Fook-lam, "Liao Chung-kai (1878—1925): The Career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載於「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香港，一九七〇年，頁三一九至三四八；及「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七三至四八二。

⑦見「陳公博年譜稿」。

⑧國立廣東大學，在一九二三年冬創辦，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四〇四。

⑨第一次東江戰役，見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二三三至二四〇；及國防部史政局編：「北伐簡史」，台北，正中書局，一九六六年，頁十五至廿五。

⑩一九二四年九月五日，孫中山在決定出師北伐後，任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兼廣東省長，胡漢民至十月三日宣誓就職。見羅家倫：「國父年譜」，下冊，台北，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一九六九年，頁一一二四及一一三五。

⑪當時廣州之情況，見蔣中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軍事報告」，載於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一九五三年，第十一輯，頁七五六至七六三。及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社，一九七三年，第二冊，頁四四五。

⑫中國國民黨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發表改組宣言，而改組工作之完成，始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至三十日所舉行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三五六至三七六。

⑬上海之五卅事件及省港方面的反應，見 Jean Chesneau,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62—289.

⑭陳獨秀亦曾在「响導」上報導廖仲愷當時是主戰的，見陳獨秀：「廣東戰爭的意義」，「响導」，第一二一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六日。廖仲愷在出席一個工人代表會上，亦有畧提及楊劉事件，見廖仲愷：「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七次大會上的報告」，載於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廖仲

愷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頁二四七。

⑮關於胡漢民主張打劉不打楊一事，並無旁證可資證明。至於陳公博所說及關於胡漢民很喜歡卵翼幾個軍人作撐腰，當時的共產黨報「响導」，則有此報導，見亦農：「形勢嚴重下之廣州政府——廣州通信五月三十一日」，「响導」，第一一八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廿日。而蔣永敬及李雲漢對此事則有不同記載，兩人皆言胡氏堅決頒發命令討伐楊劉，見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二〇九至二一二；及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頁三六七至三七二；此外，湯良禮對當時胡漢民之態度亦有記載，見 Tang L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 1930), pp. 200-201.

⑯嘉倫，原名 Vasilii Blyukher (或作 Vassily Blucher)，俄國將軍。一九二四年到廣東，化名 Galin (或作 Galen)。參閱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 1920*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pp. 191—193; 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57; C. Martin Wilbur, "The Ashes of Defeat——Accounts of the Nanchang Revolt and Southern Expedition, August 1—October 1, 1927, by Chinese Communists who took part," *The China Quarterly*, 18: 7, 45—52 (April—June, 1964).

⑰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後，國民黨選出中央執行委員共廿四人，並不是卅六人，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二六七；而在第一屆通過之中國國民黨章程第五章第三十四條，則列明在中央委員中，互選常務委員三人，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三九三。及至一九二六年一月之第二屆全

國代表大會閉幕後，國民黨始選出中央執行委員三十六人及常務委員九人，見李雲漢，前引書，頁四七二至四七三。陳公博謂當時（二屆大會之前）已有中委卅六人及常委九人，容或記憶上有錯誤。

⑮中央秘書處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互選常務委員三人組織而成，見一屆所通過之中國國民黨章程，載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三九三。一屆所通過之章程，無秘書長之設置，此職位容或當時之需要而成立。

⑯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三日廣州沙基事件，見Chesneau, p. 291.

⑰一九二五年之省港大罷工，見Chesneau, pp. 290—318.

⑱彈劾文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鄧澤如所提出，原文見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上海，正中書局，一九四八年，頁二八九至二九一。

⑲鄧澤如之彈劾文標明日期為一九二五年六月卅日，而翌日，即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即宣佈成立，故此點與陳公博所記載的有所出入。

⑳當時廣州政治情況，對胡漢民已不利，見James R. Shirley, "Control of the Kuomintang after Sun Yat-sen's death,"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 1: 69—82 (Nov. 1965).

㉑陳璧君（一八九一—一九五九），汪精衛之妻。一九四六年，被控以叛國罪，終身監禁。一九四九年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與廖仲愷夫人（何香凝）欲營救她，但陳氏拒絕公開悔過的條件，終告無效。後病逝獄中。見Boorman, 1, 218—220.

㉒許崇智（一八八七—一九六五），字汝為，廣東人，助孫中山建立軍事力，一九二三年，執掌廣東軍

隊。一九二五年，其事業達至巔峰，出任廣東省長兼軍事部長。一九四五年後，定居香港。見Boorman, II, 124—126.

②⑥根據湯良禮之記載，當時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是由許崇智所提議，及廖仲愷和蔣介石積極支持，可知當時汪氏在國民黨內有巨大支持，見T'ang Leang-li, pp. 206—207.

②⑦胡漢民當時之態度，在其就職演說中，可見一斑。見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之廣州「民國日報」，載於蔣永敬，前引文，頁二一四。當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一職，實是閒職，無大權，因當時之國民政府未被任何國家所承認。

②⑧在第一次東征後，廣東軍事形勢，可參閱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二四三至二五二，及「北伐簡史」，頁三十一，及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畧」，頁一五一。

## 第二章 廖仲愷先生的被刺

國民政府成立之翌月，那就是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先生被刺於中央黨部的門首。

在廖先生未遇害的前兩個星期，社會上已有若干的謠傳，說某人對某人如何如何的不滿，某派對某派如何如何的批評，某人和某人已被列名於殺害之列，一時謠言四起，風雨滿城。

就是八月二十之前兩日罷，這種謠傳已吹進了國民政府。有一次在會議席上，廖先生剛坐於汪先生的側邊，汪先生會寫一張條子給廖先生，說聞得有人將對於他不利，請他注意。廖先生聳聳肩頭笑了，說：「我們都是預備隨時死的，那有什麼關係！」

那日清晨，我剛到農工廳辦公，中央黨部的庶務科長劉陶打給我一個電話：

「廖先生被人打了。」劉陶在電話中的聲音很急促。

「怎樣打法？」我問。其時我的態度還鎮靜，因為廣東話的「打」字含義太模糊，而且工會終日罷工，示威遊行，互相鬥毆，因打架而殃及旁人，事所常見。



「是用槍打的。」劉陶的聲音顯然露了顫抖。

「在那裡？不要緊嗎？」我那時陡然憶起近來的謠言，知道事態很嚴重。

「在中央黨部，現在已送『公醫』了，請你到『公醫』看他罷。」電話立刻收了線，大約劉陶要趕到廣東公立醫院了。

那時農工廳的地址在西門內的光孝街，而公醫院在東門外的百子路，那兩所地址正處於東西兩極端，我們那時做廳長的大多沒有汽車，每天辦公往來完全以人力車作代步。這樣我要走到百子路，起碼也要一個鐘頭，我立刻叫人僱了一部汽車，苦的是等了半個鐘頭，汽車還沒有到。在等汽車的時候，心內真是又焦急，又悲痛，只有自己安慰着，希望所傷的不是要害，而且更幻想着，或者我到時，廖先生已包裹好已經出醫院。

我到百子路時，已經是九點多鐘，我進公醫院門首，已有不少的人進進出出，我看多數的人都是中央黨部的職員，面上露着沉默和嚴肅。其時劉陶已先到，我問他：「不要緊嗎？」劉陶哽咽着說：「大概沒有希望了！」我剛上樓梯，汪先生的眼已滿含着痛淚走下來，一見我便說：「公博，你也得注意：暗殺名單內你也是有名的。」我其時只顧着看廖先生，對於汪先生的警告也無暇回答。

廖先生躺在一間病房的牀上，鮮血滿身，兩隻眼微微的睜開，眼球凝住，顯然的再沒有希望！①醫院那時顯出混亂的情形，我看見廖先生再無回生之望，不覺悲從中來，禁不住大哭。廖先生的夫人何香凝②女士已止住了哭聲，告訴我們廖先生被害的情況。

原來那天早上中央黨部開會，廖先生是八時以前坐汽車去中央黨部的，剛出百子路碰見陳秋霖，廖先

生知道秋霖有事和他商量，拉他同車一起到中央黨部談話。汽車進了黨部的門首，廖先生下車時，便見幾個人由大門衝出來，開槍向廖先生轟擊。

「我當時只見火花瞭亂，也不知道廖先生受傷，及見廖先生倒下地來，我也覆在他身上。我問廖先生受傷沒有，廖先生已不能答，我於是抱他乘着原車到公醫來。」廖夫人這樣一邊啜泣，一邊訴說。

眼見廖先生不能再活了，這是對於黨國何等的損失！同時我已知道陳秋霖腹部也受了傷，而兇手之一的陳順，已被鄧澤如和廖先生的隨從擊傷，現在也抬到公醫院療治。我神態稍為安定之後，便去探問陳秋霖，那時他神色還很鎮定，只是醫生不許我們談話。至於兇手陳順已受重傷，入了昏迷狀態，看當時情形，自然主使者大有人在，而兇手也不止一人，不過兇手重傷，當然得不到口供，等到他傷愈之後，始可審訊。

正待重入廖先生的房間，許汝為先生已來，他告訴我們暗殺的名單共有八人，汪先生和我的名字都在內。汪先生那天因為手腫，沒有到黨部會議，否則或者已經和廖先生遭遇同一命運，也未可知。許先生並囑我趕快到粵軍總司令部一談，因為緝兇善後，非詳細商榷不可。而且許先生說，在這個時候沒有衛兵是不行的，硬要派八個衛士跟我進出。

我們出了公醫院便到粵軍總司令部，那時粵軍總司令部設在東門外省議會的舊址。總司令部的參謀們和副官們面上都露出惶惑和緊張，路上的行人和道旁的樹木入我眼裡似乎都在表示一種說不出來的憂鬱。無疑的這次事變是予國民黨以重大的損失，因為十三年改組國民黨，廖先生主持最力，改組之後他贊襄孫先生也最多，這次損失固然難以計算，而今後國民黨的前途，在一般人們的心中已橫了一重陰暗的雲霧。

誰是幕後的主兇呢？在中午時候，情況漸漸明瞭。兇手陳順昏迷時候頻頻呼叫「大聲佬」，「大聲佬」是朱卓文的譯名，而且兇手被擒時候，遺下一枝頭號曲尺的手槍，在廣州當時，人們有這類手槍是很少的。許汝爲先生想起梅光培認識朱卓文，遂叫人找梅光培來，看他能否認得這枝兇槍的物主。

說到此地我似乎應補述一下朱卓文的歷史。朱卓文曾做過孫先生的衛士，歷來廣州有事，他都是「攪民軍」一個角色，有一次他居然做過很短時期的民軍統領。梅光培也是歷次「攪民軍」的，廣東所謂「攪民軍」，即是組織和運動土匪流氓的意思，梅朱兩個人因「攪民軍」時常往來，粵軍中人誰都知道，所以這次汝爲先生一找便找梅光培來認那支曲尺。梅先生來了總部之後，果然認出這支槍是屬於朱卓文的，他舉出證據，說有一次他和朱卓文玩鴉片烟，朱卓文因帶了手槍累贅，捆着烟床不舒服，遂解出來擱在烟炕。頭號曲尺是很難得的，梅光培欣賞好些時，因此確認這支手槍是朱卓文之物。兇手既已得了主名，粵軍總部派兵到朱卓文寓所圍捕，但朱卓文行刺得手，立刻走過了河南，並駕了一隻汽艇逃到了鄉下了。後來朱卓文投到一個土匪喚做雷公全的，那土匪把他監視起來，要求國民政府給他一筆贖金。但不知什麼原故，往返磋商，沒有結果，國民政府在廣州始終沒有拿到歸案訊辦，至到民國二十五年才給陳伯南<sup>③</sup>拿住槍斃。不過他槍斃的罪名不是爲廖案，而爲的是他陰謀想推翻陳伯南本人，我打算敘述這件案件之後，才補他一筆。

朱卓文固然是主兇，但他這個人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顯然他的背後還有主使的人物，於是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三個人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主持緝兇事件。這個委員會的委員是汪先生、許汝爲、和蔣介石三個人，委員會的權力是受之中政會，不止可以調動軍警緝兇，而且可以擴張範圍乃至於鎮壓反動。

中央黨部爲鎮壓反動起見，加緊宣傳，除了決定國葬廖先生之外，更以中央黨部禮堂爲廖先生停靈公祭之所。當時我爲着醫生囑咐，還見不着陳秋霖，廖先生的逝世，我們也瞞着陳秋霖。無如廖先生逝世是一件大事，秋霖雖然被瞞着，但到廖先生靈柩離開公醫院那天，秋霖已是知道了。秋霖睡在病牀聽見禮堂奏哀樂的聲音吹進耳中，問看護是不是廖先生已逝世。看護說不是，秋霖嘆口氣說：「你們也用不着瞞我，那哀樂一定是爲着廖先生奏的。我沒有別的痛惜，祇是國民黨前途不知將來弄成什麼樣子罷了！」離廖先生逝世的幾天，秋霖也是不治，因爲秋霖雖然中了一槍，但是在腹部，開刀經過雖然還算良好，但希望不要發炎。然而秋霖的熱度慢慢高，醫生遂宣告束手。我們也把秋霖的靈柩抬到中央黨部，安在廖先生之旁，這場慘劇算是告一段落。

廖案主謀是什麼人？那顯然是黨內左右派之爭，④右派認定廖先生是中央黨部的把持者，認定廖先生是共產黨的羽翼者，認定廖先生是消滅楊劉的主動者，認定廖先生是改組國民政府的幕後者，更認定廖先生是排斥胡先生及右派的有力者，積累種種原因，而廖先生於是乎不得不死。特別委員會對於廖案，認爲若不澈底辦去，反動即生，於是將先生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極有關係的林直勉。同時得許汝爲的同意，革去第一軍長梁鴻楷而代以李濟琛，扣留兩個粵軍統領梁士鋒和楊錦龍；更解散幾枝雜牌軍隊，因爲這些軍隊都與右派有淵源，而於這次暗殺案恐有相當的關係。⑤不過認爲主要人物胡先生的堂弟胡毅生是逃走了，當時哄動一時所謂右派十人團的組織因此受了打擊，然而以後許多黨的問題依然還是無法解決。

胡先生因爲他的兄弟被捕，那天倉皇避到他親戚的家中，汪先生怕胡先生不安全，請他的夫人陳璧君

陪他到黃埔軍官學校暫住。汪先生後來告訴我，許汝爲還想藉這機會殺胡先生，汪先生對於這個提議不贊成，說胡先生只負政治上的責任，不負法律上的責任，因此通不過。不過因此胡先生的威望大損，難於安居廣州，及後算是由中政會派他到莫斯科考查政治，暫離中國，而胡先生則認爲這是一種放逐，引爲終身之恨。

平情而論，這次有組織的暗殺是不是和胡先生有關呢？汪先生說得好：「胡展堂只負政治上的責任，不負法律上的責任。」這個解釋也很明瞭，自然不是胡先生當面指使兇手，但團體裡醞釀暗殺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阻止，這是事實。⑥

後來許久汪夫人告訴我，當時所謂鐵血團的李天德在廖案之前曾見胡先生。問胡先生：「外間有人說先生要殺廖仲愷，是不是？」胡先生不答。李天德出來對人說：「你們怎說胡先生要殺廖先生呢？我問他是不是要殺廖仲愷，他始終仰着頭沒有答我。」聽的人答道：「你真是傻瓜，他的不答，就是答應。難道他當面叫你去殺嗎？」我們於這種問而不答情形之下，大概十九得其真相了。

固然我不願意深文周納，也難得到實據真憑，不過後來民廿五的時候，朱卓文已大搖大擺做了中山縣的沙佃局長，陳濟棠發覺他有顛覆他政權的陰謀，捕獲就地槍決時，胡先生旅居香港的妙高台，還正式打電陳濟棠保他。依公義而論，朱卓文還是被通緝的犯人，實在不應委他做官，捕獲之後，尤不應明電保障。依私交而論，胡廖無論政見如何不同，終做過出生入死的患難交，明明是廖案的主兇，而胡先生不卹人言去電保。我們後來論史的，似乎於此有以窺其微罷！⑦

跟着廖案不久，又有蔣先生驅逐許汝爲的事件，這件事自然和廖案無關。當時蔣先生對於中政會的報

告，有數許汝爲十大罪狀之事，這事的內容非常複雜，而最大的問題爲着許汝爲把持財政。在該事發動之前，蔣先生已商好許汝爲部下第一軍的李任潮和陳真如，而許先生自己嫡系之第三師譚曙卿又早已爲人收買，因之半日戒嚴，而許先生不得不悄然赴上海了。這事本與廖案無關，我之所以補此一筆，因爲汪胡後來之極端交惡，與此也有極大的關係。我前文不是說許先生藉着廖案想要殺胡嗎？許先生這次走滬，自然恨極汪先生，因爲他的意思，以爲汪先生之任國府主席，他有殊助，此次蔣之敢於驅許，勢必先得汪之同意。因此到滬之後，後來會見胡先生，反說廖案之時汪實在要藉故殺胡，所以沒有實行，完全靠他反對的力量。胡先生平常已很難容物，現在先入許先生之言，真以爲實有其事，後來汪胡始終不能合作，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 第二章註釋

①據廖夫人何香凝憶述，廖仲愷大概是在送院途中絕了氣。見何香凝：「回憶廖仲愷」，載於廖夢醒：「我的母親何香凝」，香港，朝陽出版社，一九七三年，頁四十九至六十六。

②何香凝（一八八〇——一九七二），廣東南海人，廖仲愷妻。一九〇五年，參加同盟會，為第一位女成員。一九二六至三一年間，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後來脫離國民黨，協助建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解放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等職。見廖夢醒：「我的母親何香凝」，及 Boorman, II, 67—68.

③陳濟棠（一八九〇——一九五四），字伯南，廣州軍事長官。一九二八年任第四軍軍長，明年任粵軍總指揮，後因反蔣，割據廣東，至一九三六年下野。見 Boorman, I, 160—163.

④廖為聯俄容共政策的熱心推動者，以致一般右派國民黨黨員皆認為廖是共產黨員。參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頁三七五至三八二。

⑤同上書，頁三八二至三九二。及陳克華：「中國現代革命史」，香港，春風雜誌社，一九六三年，上冊，頁八十三至八十四，及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上冊，頁廿七。

⑥胡漢民與暗殺事件的關係，可參考汪兆銘就廖案在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中所作的報告，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頁三九一。亦可參考 T'ang Leang-li, pp. 217—219.

⑦關於朱卓文的下場可參考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頁三八六至七。另胡漢民電保朱卓文一事，詳載於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三一八。



## 第三章 西山會議

「西山會議」，到了今日，人們對它的印像已慢慢模糊了，也許簡直已經忘記了，不過西山會議在十四年時的確是國民黨內一件大事。它影響三月二十之變，它影響寧漢分立，它影響到寧漢合作後的特別委員會，它影響到民十九的擴大會議，直到四全大會之後，西山會議派才慢慢的消滅。

構成西山會議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國民黨內的反共空氣，<sup>①</sup>第二個是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失意份子反攻。<sup>②</sup>就第一個原因說罷，到了民國十四年，共產黨的氣餒的確咄咄迫人，差不多一切黨部和民衆團體的下層組織都充滿共產黨，尤其軍隊的黨部和政治部更充滿共產黨。這班共產黨的確犯了列寧所謂的幼稚病，就其大者來說，只知道本身的利益，而不知道革命全體的利益。在廣州時候，無日不見工會分裂，工人罷工，我在農工廳時候，門口排列行打行的工人請願，是日常司空見慣之事。他們提出的要求都是不經過考慮的，這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共產黨要抓工人，勢不能不煽動罷工，工人一罷工便勢不得不請求援助。共產黨把持操縱的總工會便趁勢出頭，一面派人指導組織，一面予以經濟援助，更一面遣派代表至官

應替工人要求；這樣經過一次罷工，共產黨便多抓到一些工人，或一個工會。可是共產黨當時忘記了它是和國民黨合作的，它是贊成國民革命的。廣州既是國民政府的治下，而在那裡煽動罷工，那無異乎挑動民衆向國民黨反攻，而且一個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現在沒有一天不罷工，沒有一個工會不罷過工，那麼政府維持秩序的作用已完全失掉。這樣情況慢慢惡化，於是變成共產黨是革命的，國民黨是不革命的了。③共產黨當時也未嘗不感到這個矛盾，但因為要抓工會和工人起見，也不得不走這條歧路。那時不止廣州爲然，在國民黨治外的各地也莫不然，祇是在國民黨治外，這種矛盾減了一點直接摩擦罷了。雖然在國民黨治外減少對立的矛盾性，可是同時發現了別一種的工作問題，就因為國民黨的工作顯然沒有共產黨的努力。那是不是國民黨人的能力比不上共產黨呢？那不是的；第一，共產黨的宣傳，說三民主義不徹底，共產主義才徹底，學校未入世的青年都是好奇立異的，也是比較單純的，三民主義太複雜了，焉有共產主義那樣明瞭！④誠然他們對於馬克斯的資本論，剩餘價值，辯證法，也都摸不清，而且根本中國便沒有人能夠翻譯。但他們索性不去研究，只拿着陳望道先生所譯的「共產宣言」作法實便夠了。共產宣言那麼的明瞭，開始說明世界都是鬥爭的，平民和封建鬥爭，農奴和地主鬥爭，及資本主義勃興，又變爲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鬥爭，結果資本主義自掘墳墓，而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勞工專政。這樣簡單的說明正合中學生的程度和脾胃，又加上中國非科學的社會，一切數字和統計又很模糊，就是要用功研究也無從着手，於是三民主義真太複雜而共產主義真太簡單了。第二，所謂各地工作，無過於罷學與罷工，國民黨對於這些工作沒有特別的預算，而共產黨有它的特別費，所以除非學生不遊行，工人不罷工，如果有遊行和罷工，只有見着共產黨的活躍，而見不着國民黨的活躍，國民黨就有活動能力的黨員，也不得不依共產黨爲附

庸，這樣一來，便相形見絀，在國民黨內反共的空氣遂覺得「放之則彌六合，養之則退藏於密」，所以就使沒有西山會議，反共行動遲早也會在國民黨內爆發的。⑤

說到第二個原因，那更明瞭，其初國民黨幹部有打楊打劉不同的主張，其後有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失意份子，更且有廖案的嫌疑犯，和盤居上海的失職軍人。這一班人不止主張不同，自胡先生出遊蘇俄之後，更懷有人人自危之念。廣東對於這一班人也加以不斷的注意；在上海的自然無法監視，在廣州以內的，自然希望他們早一點離開。當時這個算盤在我事後平情的觀察，不能說是有什麼惡意，祇是希望他們不再在廣州搗亂。不幸的很，這個計劃頭一步便落到廣東大學鄒海濱先生身上。⑥鄒先生對國民政府實在太不滿意了，第一，他是贊成打楊希閔而不贊成打劉震寰的，後來畢竟楊劉同歸於盡，使他不能維持對於劉震寰的友誼。第二，他當時辦成廣東大學，很算經過一番辛苦經營，到了國民政府成立，廣東大學便頭一個受了嚴重的打擊。原來當日的廣東大學，便是今日中山大學的前身。廣東向來沒有大學，只有高等師範，和法政工業兩個專門學校，鄒先生自從陳炯明叛變之後，已丟了兩廣鹽運使，他很想專心辦教育，所以想出一個廣東大學計劃，把高師改爲文理科，把法政和工業專門學校改爲法科和工科。不過那時一切財源都落在楊劉軍人的手，政府人員的薪俸尚且無法維持，那裡更有錢來辦廣東大學？鄒先生靠的是劉震寰友誼，於是在劉震寰手裡讓出幾項稅捐來辦大學。到了國民政府成立，標榜軍民財政統一，廖先生當首任的財政部長，便提出廣東大學所包辦的捐稅要收歸財政部，由政府支配統籌，而廣東大學的經費以後由國庫支出。但廣東那樣窮困，誰人能相信政府能夠守約呢？於是鄒先生認定這是廖先生特予他個人的打擊了。

鄒先生既對國民政府不滿意，自然時常有些辛辣的批評，而國民政府也認鄒先生爲不穩分子，希望借

個題目使鄒先生能夠早日離開廣東，免得再有別種意外的舉動。恰巧在國府成立之前有沙基慘案發生，國府於是用人民名義組織一個宣傳團到南北各省宣傳沙基慘案的真相。誰作領隊者呢？最好是鄒先生和林子超<sup>⑦</sup>兩先生了。當日我想鄒先生作領隊是國府打算請他暫時離開廣東的，而林先生作領隊，因為他有當過參議院院長的資格，請他湊數的。

鄒先生到了北京之後，便計劃着擇地開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反對廣東，但因後來人數不能超過半數的法定人數，才於十一月十二日在西山碧雲寺孫先生靈前開會，開除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的黨籍，和警告國府的當局。這個會議自然算是非法，但國民黨內也有一部分人在那裡支持。例如一班老先生如張溥泉、<sup>⑧</sup>居覺生、<sup>⑨</sup>謝慧生，<sup>⑩</sup>那是公開活躍的；許汝爲，胡展堂，也是支持的；就是吳稚暉<sup>⑪</sup>先生和戴季陶先生<sup>⑫</sup>也表示同情，不過不大主張這樣幹的；孫哲生先生，伍梯雲先生，和古勤勤先生也有若干關係的。

西山會議的一羣自然還算鄒先生爲最活躍，在西山會議之後，他還在上海召開一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廣州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遙遙相對，照例也選出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舊址成立中央黨部，同時也照例指派各地地方黨部，在中國內地沒有什麼活動，然而在海外倒有幾處支部非常活躍。

我敘述這段西山會議，算是告一段落了，至於它的後來影響，我以後敘述別事的時候，再附帶描寫，不過當中牽連到我身上的還有短短一段滑稽故事，我很想補它幾句。

鄒先生在離廣州的時候，大約也不打算南返，於是廣東大學遂鼓起罷教風潮。一般鄒先生所聘來的教授，自然不便說要挽留鄒先生，因之抬出經費無着的口實，開始罷教。

廣東大學當時已經有了無數的小組織，共產組織有郭壽華，黃光明諸人，反共組織所謂士的派有張農，何覺甫諸人。鄒先生既已遠離，學校是無主了，教授又都罷教，學校更是騷動了，但共產的組織是反對鄒先生的，同時而連帶反對罷教的。就是反共產的組織，當時有力的分子多在三四年級，他們行將畢業，也不願就此散夥。教授只管罷教，而學生還要求上課，廣東大學當口的情形，很有點騷亂而無法鎮定的樣子。

爲了廣東大學的校長問題，遷延兩個星期，中政會無法解決。誰來當校長？很是一個問題，到了最後，汪先生只好逼我出馬了。我還記得在會議席，曾經有過這樣的討論。

「廣東大學校長問題，再不能遷延不決了。」汪先生坐在主席的地位，在討論一般政治問題之後，慎重的提出。

「最好汪先生自己兼，我想沒有別人比汪先生更適當的。」譚組安先生笑着提議。

「國府主席怎好兼大學校長，就縱使我能分開身的話。我看還是組安先生罷，因爲你是一個翰林院。」汪先生也笑起來，提出了對案。

「若以翰林而論，我是老翰林不中用了，倒不如梯雲先生，他是洋翰林。」組安先生望着伍梯雲，他知道以汪先生來兼校長也不會通的，所以修改了他的提案。

「我不是不願幹，我實是怕麻煩，如果有人能夠把罷教風潮平息下來，我也願意幹。」梯雲先生倒不客氣，但露出非罷教完畢，不輕於嘗試的口氣。

汪先生知道這樣拚讓還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於是望着我說：

「公博先生，還是你去罷。」

我聽了汪先生的提議，倒出乎意料之外的嚇了一跳。我首先申明我實在沒有工夫，因為我已經兼了兩個職務，一個是政治訓練部，一個是農工廳，<sup>③</sup>兩者有一於此，已夠我忙，何能再兼大學的校長。其次，辦教育一件事不可視為兒戲，尤其教育行政，萬不可以兼職，我雖然也學過一些教育學的，但校長是一校行政之首，絕不應更使一個百忙的我來兼。如果汪先生一定要我幹，須先把我兩個職務免職。

「你先去把罷教風潮平息，然後另找別人去幹怎樣呢？」汪先生提議。

「公博先生去很好，他必定有平息風潮的能力。」組安和梯雲為圖卸身事外，趕快和議。

我知道當時決沒有人肯衝這度難關。汪先生自然不會兼校長，而組安和梯雲又都是有經驗的聰明人，誰也不願去找麻煩，大概也因為我當時太豪氣罷，於是挺身答應，祇是聲明僅僅維持三個月，把罷教風潮平息之後，請汪先生另行派人接替。

我到廣東大學不出三日，果然教授都復教了。那自然不是我的功勞，因為學生無論左右派都願復課的，至於教授真要罷教的不過少數人，大多數的教授祇要經費有着，也不願把這學府毀壞。我到廣大接事之後，便召集教授學生在禮堂講演，起初四座有些吁吁的聲音，及我再申敍我對於廣大的意見，四座再聽不見噓聲，迨至末了反而鼓掌羣起。我自然也不以噓氣為損害我的尊嚴，因為那反對空氣早在我意料之內，我也不以鼓掌為滿足，因為歡迎空氣也在我想像之中，不過我的原則，以為無論什麼問題，你若把你本身問題攔在問題之內，自然解決困難，你若把本身問題攔在問題以外，自然解決容易，我解決廣大罷教問題，也是應用這個原則。

教授是沒有問題了，祇是學生問題沒法解決，學校雖然復了課，但學生的小組是無法打破。我當時實在太忙，有時竟直兩三天騰不出工夫到辦公室。一羣學生更和工人勾結在一團，左派學生勾結省港罷工委員會，右派學生也勾結了反共的各工會。學生參加工會遊行示威，大家採取了對立的形勢，有時左右派的學生衝突，竟勾引工人至校內鬥毆。我雖然嚴厲的處置了幾次學生，但想一想，我不辭校長，只有辭政治部或農工廳。我向汪先生辭職好幾次，汪先生都躊躇，有一天他很歡喜告訴我：「褚民誼<sup>①</sup>回來了，你可以卸廣大的責任了。介石也說：『讓公博再幹下去，廣大必會大亂。』」

我很高興辭去廣大校長的兼職，祇是我這一辭倒出乎廣大教授意料之外。原來外間的傳聞，說我之長廣大是共產黨陰謀奪校的一種計劃，就是鄒先生在上海發表談話也如此說，我的老友周佛海先生在上海發表文章也如此說。有一天法學院長余愷湛來見我，說有人在蔣先生處告發我在廣大蘊有陰謀；事實是這樣，在夏天的一天，廣州公安局長李南溟家內來了一位蔣先生的秘書，因為夏天，熱氣太薰人，他一到便脫下長褂子，嘆一口氣。李先生問他爲什麼嘆氣，那位秘書先生說：

「有人在蔣校長處告陳公博辦廣大有陰謀，蔣校長叫我去查。你想既是陰謀，那裡能查得出呢？這不是苦差事麼？」

「誰去告發公博的？」李南溟問。

「聽說是褚民誼。」那位秘書又嘆一口氣。

這一段故事，又離奇，又滑稽，但我既已脫身苦海，也不再追問。此事後來在北平擴大會議時碰見鄒海濱先生，有一次閑談接收廣大的經過，鄒先生忍不住笑起來：

「真的，我們以爲你接廣大是共產黨的陰謀，那裡知道那樣左推右推，才推出你來受苦。」這一段滑稽故事，遂在彼此一笑了之之下結束。



### 第三章註釋

①國民黨黨內之反共空氣，源於部份黨員對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之反感。在孫中山未逝世前，早已有此醞釀，在孫氏逝世後，反共空氣更加激烈，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四章第三節及第五章第三、四節；及李雲漢：「孫文主義學會與早期反共運動，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中華學報」，一卷一期，一九七四年一月，頁一八七至二一七。

②孫中山死後不久，國民政府在七月一日成立，而一大批革命元老均被投閒置散，不在要位。此後被稱為西山會議派人氏，如林森、鄒魯、張繼、居正、謝持及田桐等，均不掌要權，故陳公博言西山會議其中一原因是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失意份子反攻，是有所感而發。

③這一時期之工人部長為廖仲愷，秘書為馮菊坡，廖氏職務甚繁，兼職甚多，工人部事乃交由馮氏辦理。馮乃共產派，故工人運動，落在共產派手上，當其時之廣州工會，無日無事，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四〇六至四〇七。當時工人運動之發展，可參考 Chesneau, Chapters 10, 11 and 12。

④五四運動後，有大批知識份子及青年，均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而且對蘇俄十月革命嚮往，見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09—214 and 239—253。

⑤西山會議之前，國民黨內部早已有反共空氣，見註①。

⑥鄒魯（一八八四——一九五四），字海濱，廣東大埔人。國民黨右派領袖，一九三二年至三九年任國立

中山大學校長。四九年赴台灣。爲辛亥革命與早期國民黨史之權威。見 Boorman, III, 317—318。及「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八五九至八六八。

⑦林森（一八六八——一九四三），一名長仁，字子超，號青芝老人，福建閩侯人。參與辛亥武昌起義。護法之役，隨孫中山往粵，任大元帥府外交部部長。自一九三二年，就任國民政府主席。見 Boorman, II, 379—382。「革命先進先烈傳」，頁八一三至八一五；「民國百人傳」，頁三七至四二。

⑧張繼（一八八二——一九四七），字溥泉，河北滄縣人。參與推翻滿清運動，繼章炳麟而任「民報」編輯。爲國民黨元老派，並爲西山派之領袖。見 Boorman, I, 15—20。頁七五四至七六〇。「革命先烈先進傳」。

⑨居正（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原名之駿；字覺生，號梅川，湖北廣濟人。同盟會之中堅份子，參與護法之役，並爲西山派成員。一九三二至四八年間任司法院院長。見 Boorman, I, 469—475。「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七七一至七八四；「民國百人傳」，頁八三至九六。

⑩謝持（一八七六——一九三九），字慧生，四川富順縣人。參加反清革命，後任孫中山廣州政府秘書長。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大本營，就任大元帥，謝持被委任爲全權代表，主持國民黨上海本部。其後加入西山派，參與一九三〇年北平擴大會議運動。見 Boorman, II, 95—98。「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八四一至八四五；「民國百人傳」，頁一五七至一六二。

⑪吳稚暉（一八六四——一九五三），名朥，亦名敬恆，字稚暉，江蘇武進人，近代著名學者、教育家、社會改革者及革命志士。吳氏極反共，與蔡元培、張人傑、李石曾合稱「國民黨四大元老」。Boorman,

III, 416—419。「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七三〇至七三六；「民國百人傳」，頁四〇三至四二二。

⑫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字傳賢，號天仇，浙江吳興人，客籍四川成都。孫中山私人秘書。孫中山逝世後，成爲擁護三民主義之反共理論家。國民政府肇建，被選爲委員。一九二八年，實施五院制，首以委員兼政試院院長，至四八年始辭去。晚年信奉佛教，漸退出政治。見Boorman, III, 200—205。「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八一七至八一九；「民國百人傳」，頁一二一至一三六。

⑬據Howard L. Boorman 記載，一九二五年七月廖仲愷任廣東省長時，陳公博爲廣東省農工廳廳長，是年八月，當廖氏被刺殺後，陳氏擔任國民黨農民部部長及軍委會政治訓練部部長，見Boorman, I, 198. 並參閱周化人：「陳公博年譜稿」。

⑭褚民誼（一八八四——一九四六），字重行，浙江吳興人。汪精衛親信，一九三二年至三五年充任行政院秘書。汪氏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褚氏任秘書長。一九四六年，以叛國罪處死。見Boorman, I, 467—469.

## 第四章 三月二十之變

有名的三月二十之變，也和西安事變一樣，同是一個難解之謎，不過三月二十之變，其難解是在原因，而西安事變，其難解是在結果。我聽說蔣先生曾在他的日記畧述三月二十之變的來由，不過截至我寫這篇記載為止，蔣先生還沒有將他的日記公佈，①他的記載只是一種非賣品，專用以爲對於他的部屬宣傳，我始終沒有讀過。祇是有一次汪夫人陳璧君對我說過，她一日無意中在湯山俱樂部見過一次，我問她怎樣說法，她笑一下說：「還不是說那次因爲汪先生要殺他嗎？」

事變的時候，我住在廣州的東山，那個地區是在廣州中比任何地方爲幽靜的，蔣先生的住宅離我不遠，而在沿河的地域，住滿了俄國顧問團。三月二十的晨早，大概還沒有到六點鐘，我還睡在床上，站在門口的衛兵直入我的臥室報告，說東山地區全部已戒嚴，許多軍隊把俄國顧問的住宅包圍起。我心內狐疑這是什麼一回事，說解決不穩的軍隊嗎？當然我會預早得通告。說是一種政變嗎？自然我的住宅也會包圍，因爲我那時總是被目爲左派，而又爲當政人們的一個比較重要角色。我穿好衣服之後，打一個電話到國民

政府，問那裡有什麼人，國民政府的副官回答，現在還早，不到辦公時間，還沒有人到辦公室。我問那副官有沒有軍隊包圍國民政府，副官在電話回答說是沒有。我再搖一個電話到西華二巷汪先生家中，無論軍用電話或普通電話都一樣的沒有聲息。我想或者是有事了，還趕快盥洗，穿上軍服，吩咐汽車夫直駛汪公館。我出到東山馬路鐵路的旁邊，看見戒嚴的軍隊都是第一軍，更見陳繼承團長帶了士兵在那裡警戒。我知道問陳繼承是問不出什麼原因的，但因為士兵都屬於第一軍，心裡倒放下一個重担，知道並不會有什麼改變。因為當時第一軍都叫做黨軍，廣州無論朝野都以為最靠得住無過於第一軍的軍隊，那裡會有黨軍叛變黨的呢？

我到汪公館門首，倒看不出什麼異樣，汪先生早在十九日請假不到國府辦公，我是知道的。因為我最後見汪先生是在十八夜，那天汪先生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資格，在省政府的洋花廳宴請各軍政治部主任，是夜參加宴會的有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軍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五軍政治部主任李朗如，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至於第四軍的政治部人選還未任命，所以沒有人參加，我是全部軍隊的政治訓練部主任，②自然是一個半主人的陪客。席間汪先生對我說：「今日不知為什麼，在黃埔軍校演講時，有些頭暈，現在還是昏昏鄧鄧的，大概老毛病又要復發了。」我說汪先生太辛苦了，應該休息一下罷，汪先生笑一下說：

「那能夠！我說給你們一段故事。有一次監獄裡頭有一個囚犯患了病，獄醫來看過之後說：『最好你遷地療養一下』，話是好聽的，你想一個囚犯怎能可以自由的搬到別處療養？我現在就是十足那個囚犯。」

汪先生拿出這個譬喻來，大家都笑了。然而十九日下午我在國民政府已見不到汪先生，我問起秘書長

陳樹人先生，③才知道汪先生因病請假。我問陳先生說：「昨夜汪先生還不願請假的，怎麼今天倒不來？」陳先生笑說：「大概汪先生的病給汪夫人發覺了，汪夫人一發覺，那肯讓汪先生來辦公。」

我到汪先生樓上，汪先生倒不在臥室，而睡在樓上廳中一張帆布牀，面色蒼白，顯然病很沉重。④汪夫人見我來，問我有什麼要事，而會仲鳴夫人方君璧正在調藥遞給汪先生。

「外間戒嚴，汪先生知道嗎？俄國顧問的公館也被包圍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急促的問。

「我完全不知道，正在有人來報告，我還在懷疑。」汪先生這樣不大經意的答。

「我剛才打電話到這裡，連電話也不通了。」我追究電話不通的原因。

「那是璧君因我病，怕電話嘈鬧，故意把聽筒攔起的。」汪先生在解釋。

我正在詳述東山戒嚴的狀況，譚組安和朱益之都到了。據他們的報告，說蔣介石找他們，託他們轉呈一信給汪先生，我們看那封信，是蔣先生的親筆，大意說共產黨意圖謀亂，所以不得不緊急處置，請求主席原諒等語。譚組安先生並說蔣先生已佔了東門外造幣廠的舊址做司令部，海軍局長兼中山艦長李之龍已扣起來，⑤至於第一軍的黨代表無論是否共產黨已於昨日下午全體免職，概行看管。

「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汪先生很憤慨的坐起來，禁不住一陣頭暈又倒在床上。

「我看介石是有點神經病，這人在我們看來，平常就有神經病的，我看我們還得再走一趟，問問他想什麼和要什麼再說。」組安和益之兩人同時這樣獻議。

到底蔣先生當時怎樣企圖，實在大家都不懂，說反對汪先生嗎？當日汪蔣的交誼特別厚，誰也知道。

說反對共產黨嗎？蔣先生最近的演講還企圖消滅黃埔校內共產和反共產的鬥爭。這件事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除了接受譚朱兩人的提議以外，實無其他辦法。

「我也和你們一齊去造幣廠。」汪先生立起來，抓着一件長褂穿上，可是穿上一半又暈倒在牀上。

「你身體這樣是不能去的。」汪夫人很焦急的勸阻。

「好！等你們回來再說罷，我在黨有我的地位和歷史，並不是蔣介石能反對掉的！」汪先生重復睡下。汪先生從來不肯說這種自負的話，大約當日真是氣極。

「我們是去了，但會不會給介石扣留，實不可必。現在更沒有別人，我們想託公博先生通知魯詠齋和黃衢秋，吩咐軍隊準備，以備萬一之變。」譚朱兩先生也露了憂慮，對我這樣囑託。

「兩位只管放心去，通知兩方軍隊的責任都在我的身上。」我義不容辭的答應。

組安和益之剛離汪公館，宋子文和李任潮兩先生又接踵而來。那時汪先生已不能多說話，祇由我草草告訴他們的經過。

「我也想到造幣廠看看。」子文先生說。

「你去不得，過去對於財政，介石對你很不滿意的。」汪先生勸止了宋子文。

「任潮先生，你們能立刻到軍隊去嗎？」汪先生向着任潮徵詢意見。

「今日那裡有辦法？不只電話電報給介石派人守住了，連鐵路和輪渡的碼頭他也派人守住了。現在誰也不能離開廣州半步，離開是有危險而於事無補的。」李任潮還是很安詳，露出素來慢吞吞的神氣。

我因為要通知第二第三軍的軍部，不等兩人談畢，便馬上動身。那時魯詠齋是第二軍的副軍長，黃衢

秋是第三軍的參謀長。我到高第街第二軍部通知了魯詠齋，到大沙頭第三軍部通知了黃衡秋。據他們說，命令是不能由電報發出的，只有派人送去，不過他們的軍隊都遠在北江，第三軍最近的駐紮地也在新街。我們商量了半天，如果譚朱被扣便立刻動員，如果他們能夠回來，便勒兵以俟後命。我通知了兩人之後，便又回到汪公館，報告了汪先生，更自告奮勇，看守國府的大本營，遇有政治的緊急處置，我打算便宜行事。

到了國府之後，陳樹人先生已來，我畧述早上的經過，又打個電話到家裡把我的鋪蓋送到國府，預備在那裡住宿。陳先生倒若行所無事，不大感覺重要，他是一位畫家而兼詩人，他看事的輕鬆就等於慵逸的詩畫。他以為局面是不要緊的，介石是不會反汪的，他看政治的內容，跳不出他繪畫素描的簡括。

下午的形勢已和緩多了，我再到汪公館，已知譚朱兩人經已回來，祇說介石要限制共產黨，其餘則得不到什麼要領。只是反對共產黨和限制他們的活動那就容易辦了，那時國民黨人心目之中，不論其為左派或右派，無不想限制共產黨的活動。但立刻分共，抑或給予他們活動上一種限制，種種細目上的商榷，只好偏勞奔走的譚組安和朱益之去辦，我既無事可幹，只牢守着國民政府。

約摸在三點鐘左右，周恩來和鄧擇生都來了國府，周恩來不承認共產黨有謀叛事實，惟對於國共的衝突，也希望得到一個和平調停的辦法。周恩來是露了臉的共產黨人，自然對我談話採取讓步的語調。周恩來去後，鄧擇生便掀開他的理論話匣子了。

「公博，你看國民黨的壽命到底有多久？」他挺起胸脯，像對學生發問的神氣，因為他是一個軍人而又是黃埔軍校現任的教育長。

「你怎樣觀察？」我冷靜的反問他一句。



「我看國民黨只是一個清道夫罷了。國民革命完成之後，必來一個共產革命。我以為國民革命完成之時，就是國民黨壽終正寢之日，我們彷彿是一個清道夫，掃除道路讓共產黨去走。」鄧擇生去了一次德國，似乎已經熟讀柯茨基的國民革命論，和第三國際的世界革命宣傳品。

「算了罷，擇生！我總不以你的理論為然。我看馬克斯的理論僅像英國亞丹斯密的「原富」和亞爾薩斯（按：應作馬爾薩斯，原名是 T. R. Malthus。）的「人口論」，在著書的當時未嘗沒有他的時代價值，但時代一過，理論便暴露了它的錯誤，你怎樣可以奉為聖經？而且就照着共產宣言，要大資本吸收小資本，中等階級消滅之後，才形成有產和無產兩個壁壘鬥爭，這種事實，不獨中國難於實現，就是歐洲各國的中等階級天天還在那裡增長。我只有在理論上見到階級鬥爭，而在事實上難於發現它清楚的分野。」我也以我的理論來反駁。

「你這樣連俄國的共產革命的事實也否認了，是不是？」擇生很像握着勝利之環。

「那麼你以為俄國十月革命是照着共產宣言所說，資產階級自掘墳墓嗎？」我也拿事實來反抗。

「那是俄國的特殊情形。」擇生還分辯。

「這樣中國就沒有特殊情形嗎？如果我們真照着民生主義去幹，我以為終可於國民革命之中，達到完成社會主義的目的。」我抓着鄧擇生所謂特殊情形的弱點。

我們辯論了許久，終歸是兩個人面對面的口頭鬥爭。我們知道兩個人口頭辯難是時常得不到結論的，何況兩人都帶點主觀，結果我們又把理論鬥爭停止下來，而談到三月二十之變怎樣去收拾。

二十一那天整天往返磋商善後的細目。我因為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例如黨代表是歸我管轄的，經這次

事變，這種制度就根本發生問題。我整日都焦心於籌劃維持現有的制度，至於怎樣去限制共產黨，我也懶得去管，而且也不需要我去管。

二十二早上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了，這次會議，因為汪先生不能起牀的緣故，所以開在汪先生家中。開會之時，汪先生依舊睡在牀上，我們環着牀來討論。那時蔣先生也來了，他本來平時就不大說話，那天更少說話，似乎有點囁強，也似乎有點愧作。那次的討論也簡單，第一是通過限制共產黨活動的辦法。第二請俄國召回軍事總顧問基散加。這位基先生是在加倫將軍走後才來的，聽說有點跋扈，而和蔣先生時時意見相左。末後更討論到怎樣停止省港大罷工，指定陳友仁，宋子文，和我三個人作國府的代表，相機和香港政府交涉。⑦此事末後我因參加北伐，始終沒有和香港方面接過頭，其後以「革命的退却」為名，草草結束了罷工，我因那時在漢口，其中經過，我不大明白。

經過這次會議，我們以為三月二十之事可以告一個段落，誰知二十三日我去找汪先生，據說他已不見客，過了幾天，聽說他已不在西華二巷居住了。自此之後，我更不知汪先生的消息，有些人說他已離開廣州，有些人說他還在西關養病。後來許久才知道他離廣州之時，還和胡展堂先生同船，這一段離奇的經過，我也想補敘一下。

為什麼有三月二十之變，我們還矇在鼓裡，而上海各地的所謂右派已盛傳此事專為驅汪。因此胡先生不久遂從莫斯科趕回，希望重新把握着政治。然而那時鮑羅庭也回來了。據說他以前離開廣州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莫斯科控告他太妥洽和不革命，所以莫斯科調他回國而代以基散加，現在基散加碰了釘子，莫斯科又急命鮑羅庭和加倫趕速回粵。我不知基於什麼條件之下，蔣先生又和共產黨妥洽了，據說是俄

國協濟軍械的結果，所以蔣先生又暫時緩和，我因沒有參加其中秘密，只好存疑不述。⑧胡先生初回時候很起勁，不過因為情形很隔膜，態度也有點猶疑，他在莫斯科時候，曾經提議過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回粵時候又在那裡觀望。

有一天黃昏時候，約摸是七點鐘，那是五月底或六月初我已經忘記。甘乃光先生⑨跑至我家裡說鮑羅庭請他約我至白雲山相會。

「他約我什麼事？太夜了，明日再說罷。」我說。

「鮑羅庭說蔣介石和譚組安都已去了，大約有什麼重要問題要商議罷。」甘先生這樣敦促我。

「白雲山上有牀睡嗎？」

「據說蔣先生常在能仁寺住宿的，你怕沒有牀？」

我想真有什麼緊急會議，我既是中政會的列席委員，不能不到，我連夜飯都不及食便和甘乃光同行。那時廣州至白雲山的公路僅通至沙河，上能仁寺還得穿過很長的田野，和上一段很峭的山壁。我們趕上能仁寺已經十點鐘了，身體也乏極了，等到我們摸入寺內，只聽說鮑羅庭已到，他也睡了。他知道我們到達，起床招呼我們，我問他怎麼不見蔣譚兩先生，他說他們明早準趕到。

我們先食夜飯再說罷，可是只有罐頭食品和麵包，我很懊悔不食了夜飯才來，更懊悔為什麼不明早和組安一起到。不過那夜確是清淨極了，天氣是初熱，山風微微的從叢木吹來，我和甘先生跑下山門逛一陣，領畧些清氣，說些笑話，各自歸寢。

早上我們都在山前散步，遠遠見着組安先生穿件短衣從石磴一步步走來，隨從的人們攙着他的長褂跟

着。組安先生身體很胖，並且有點心臟病，走路時微微喘氣，我看他確乏了。大約他把轎攔在山下，高興步行逛逛山，我期待他，更期待他提出重要的議案。午前十一時便食中飯，大家圍着桌子說笑話，聊天。蔣先生是始終不來，等到三點鐘，太陽漸漸移向山西的樹杪，組安先生便提議下山了。我問組安：「今天不是有會議嗎？」「沒有沒有，只是蔣先生約我們遊山。」「呵，原來如此！我打算再過一個清淨的夜才走。」我那時又不願下山。「不要停留了，明天或者更有事呢。」組安催促我。

這一次遊山清興本來很瀟灑自在的，然而已驚動了胡先生。原來我們上山之時，已有人暗中報告胡先生，說鮑羅庭和蔣譚諸人在白雲山密開會議，或者再有政變。胡先生得到這個驚人消息，遂於我們下山之日匆匆附船至香港，恰巧那日汪先生也真個離開廣州赴港，轉輪出洋。兩個人雖是同船，恰未相見。⑩這個消息後來許久我們才知道，大家都引為奇談，三月二十之變據我目擊的僅是如此，然而真相到底怎樣，我還和其他人一樣，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

汪先生是走了，但走往那裡是沒有人知道，各人皆似失了一個重心，同時各人也感覺微微的失望。其時廣西的李德鄰、⑪白健生、黃季寬⑫已把廣西統一而隸屬於國民政府統治之下，湖南的唐孟瀟⑬不但派了劉塵蘇來接頭，而且更派了他的夫人來粵以報國府派去的白健生和陳真如之聘。恰於國民政府平定東江南路之時，湘粵來歸之日，而汪先生離去廣州，各人皆認定是中國革命前途的損失，由是反蔣空氣也潛伏於每一個軍事和政治的單位。

但三月二十之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慢慢的各方面傳聞又得了些不明真相的真相。據說是中山艦長李

之龍謀叛，打算於三月二十日攻擊黃埔，由歐陽格<sup>⑭</sup>告密，於是蔣先生才派歐陽格佔領中山艦，並且捕去李之龍。但李之龍是在三月二十日晨光熹微的時候在他寓所捕去的，如果他是攻黃埔，他爲什麼不在艦上？中山艦的確泊在黃埔軍校面前兩三日，但十九日已奉蔣先生的命令調歸駐泊省河，如果中山艦要攻黃埔，爲什麼又很服從命令而離開黃埔？<sup>⑮</sup>這個真是悶葫蘆，然而歐陽格是三月廿日的禍首，誰都認定了。蔣先生和鮑羅庭妥協之後，首先便囚了歐陽格，再又囚了廣州的公安局長吳鐵城，接連又迫走廣州市長伍梯雲，並且限他即日離粵，而以孫哲生兼任廣州市長。<sup>⑯</sup>蔣先生這樣辦，據說是懲辦三月二十的首要，而囚吳逐伍，據說他們要破壞省港罷工。那時廣州的政治真是撲朔迷離，翻雲覆雨，很像夏天的天氣，忽而迅雷驟雨，忽而苦熱驕陽。

有一天蔣先生更派鄧擇生來見我，說要組織一個左派的核心，因爲一面要防備右派，一面要限制共黨，因此不能不有一個堅強的組織。這個組織包含十二個人，那是蔣先生自己，譚組安、朱益之、何香凝、鄧擇生、陳果夫、<sup>⑰</sup>邵力子、和我，至其他各人我已忘記了。這個組織很短命，只在何香凝家內開過一次會。這次開會，可以算是第一次會，也可以算是最後一次會，以後便無聲無臭的天折了。這次開會也不過隨便談談，沒有章程，沒有綱領，我不知道爲什麼要有這個組織，也不知道爲什麼後來不要這個組織。

不久又有人傳說張靜江<sup>⑱</sup>先生是這次事變的核心，據我所知張靜江是於三月二十之後才到廣州的，但有人說他早於三月二十之前到粵，只是躲着，到三月二十之後才露臉。那時廣州真變了一個神秘的魔窟，很像陰謀詭計都充滿四週，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隱秘。

張先生是不是這次政變的核心是一個神秘之謎，我無由了解，而且我也不希望去了解，但一天鮑羅庭

特別約我談話了。鮑羅庭的爲人，我還找不出適當的批評，我祇畧述他對於政治會議的運用技術。當時反對共產黨的都罵鮑羅庭把持政治委員會，依我平情的論斷，與其說他是把持，不如說他是運用。他的技術是這樣，他對於小事的通過或提議，不大過問，但對於大事，則絕不含糊，尤其對於他自己的建議，他在事前沒有疏通好，絕不會提出。他定好了建議的節目，必找逐一個的政治委員懇談，待大家都贊成了，他方才提出。我們知道中國人是很客氣而且最重感情的，經過面對面的懇談，很少不會同意。而且鮑羅庭更有背景，軍械和經濟的接濟，都要靠他打電贊成，自然所謂軍械和經濟的協助是微乎其微，但以廣州當日的困苦處境，有人雪中送炭，自然茶也當酒。如果你不大同意的話，他必然說某人也贊成了，某人也贊成了，那麼許你是頂倔強的人，也不得不慎重考慮，最低限度減了強硬的反對。他利用這個方法，慢慢變了凡是鮑先生的提議，無不通過，故凡鮑先生一開口，都緣有充足的理由。或者你心裡有了懷疑，可是既然已有某某人事前贊成，那何必再作無謂的反對。那天鮑羅庭特別約我談話，我想又有極大的文章了。

我到鮑公館，在坐只有他的翻譯張春木一人。張春木的名字喚做張太雷，是一個共產黨中央的執委而兼負廣州責任的。<sup>⑨</sup>我和鮑羅庭談話，本來用不着翻譯，今天他特別在座，我知道或者有什麼事而需要他幫腔。

「汪先生走了，國民黨中央執委已失重心，陳先生以爲是不是應當在執行委員會內設一個主席？」鮑羅庭拿着小調羹正攪茶內的糖塊，那時正在下午，我們是在用下午茶的時候。

「汪先生也會歸來的，而且執行委員會設一個主席，總章無此規定。如果要設主席，根本非修改總章不行，難道剛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半年多，我們又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或臨時代表大會嗎？」我很質直提出

了我的疑問。

「這個主席是臨時的，章程可以待汪先生歸來再修改。你知在革命期間，我們只有看革命的需要與不需要，而不應守着呆板的總章。」鮑羅庭竟以革命的需要壓迫我。

「好，就算是革命的需要，但誰來當這個主席呢？胡先生是不願回來的，譚先生恐不肯幹，即幹也恐領導不起。蔣先生罷，他的年齡和資格都有問題，而且新經三月二十的亂子，恐怕不能驚人望。」我耐着性子向他分析。

「我想主席最好是張靜江先生。」鮑羅庭這時笑起來，又似嘲諷，又似嚴肅。

「什麼！你提出張靜江先生。張先生是一個跛子，怎樣能領導？縱使他真能幹，祇是一個監察委員。你想一個監察委員怎麼可以來當一個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我以為鮑羅庭是在開玩笑了。

「我不是和你開玩笑，張先生是孫先生的老友，我記得孫先生在北京病危時，張先生一個四肢癱瘓的人，聞得這個消息，連扒帶跌跑上北京，孫先生一見他便哭了。」鮑羅庭那時不更嘲諷而更嚴肅。

「張先生難道憑這一哭就可以取得中執會主席的資格了嗎？」我那時已懷疑到這種計劃或者已經早已成熟。

「但除張靜江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陳先生你贊成了吧，蔣介石已贊成了，譚延闓也已贊成了。」鮑羅庭似乎已經告訴我那天談話的結論。

「蔣先生不獨贊成，據我所知還是提議的一人呢！」張春木那時插科的加上一句。

「但我依舊反對，然而我畢竟是中政會的列席委員，用不着我贊成，而反對也無效。」我只聽着大眾

意見便了。

過了兩天，張先生的主席算是由鮑羅庭建議，他照例先說一番理論，陳述革命的需要。那事本已接頭好的，開會不過是一個形式，自然大家無話，草草通過。祇不過苦了張先生，因此便成了衆怨之府，種下了後來種種惡因，寧漢分裂之時，也拿着張先生做一個口實。②而張先生自己呢，也有些不善於自處，每次開會，每有問題，都不大討論，他自以爲是的都通過，自以爲不是的總攔起。每一個議案，他老人家坐在主席位上，口內念念有詞的讀了一遍，便說這案通過，旁邊的秘書長葉楚傖③先生便執筆寫「通過」兩字。張先生的眼睛固然不明，聲音又特別低啞，我們連案由都沒有聽清，那案已經通過或不通過了。當時我便打個譬喻，好像廣東人聽梅蘭芳，雖然手上捧着一張劇詞，但他唱到那裡，實在無從追索，只有人家叫好，自己也隨着點頭而已。

.....

這樣三月二十之事，究竟是什麼原因，誰也要問，誰也不明白。一天我和組安先生談到這個問題，組安先生喟然嘆道：「什麼共產黨，這是介石反對汪先生罷了！」我問這話怎講，組安先生說：「你還不知道嗎？大概介石不滿汪夫人，因而連帶反對汪先生。你知道嗎？汪先生和介石還是拜把兄弟呢！」我嚇了一跳，什麼時候他們拜起把來，什麼時候他們又由把兄弟而結成仇怨；我再問組安，他的話匣子開了。

「我看汪先生和介石一定有問題，外面祇管要好，我倒看出他們有些衝突。有一次國民政府宴客，席剛散後，有一個副官來回說介石有電話給汪先生，汪先生忽然露出不大願意的神氣，說：『我不接。』說完這話，他便離開國府了。」



「你知道他們是把兄弟嗎？自東江平定之後，介石便送了一個帖給汪先生。不過陳璧君是頂反對這套的，汪先生拗不過汪夫人，只好唯唯諾諾。一天汪先生寫一封信給介石，開頭寫着『介弟』兩個字，給汪夫人發覺了，她大發雷霆的罵汪先生說：『你願意做他把兄，可是我不願意做他的把嫂。』汪先生不得已撕了那封信重寫，當着璧君面前此後不敢再寫介弟，或者他們兩個人的衝突，就因為璧君罷！」

譚先生更嘆口氣：「本來璧君也太難了，誰也要受她的氣。不過一次我算是報復了。我和汪先生住在上海時候，無事時便飲酒，時常挨她痛罵，說我教壞汪先生。有一次我們出門趁了一隻船遊地方，璧君在船上對我說：『譚先生，你死了太太許久，怎麼多年還不續絃呢？』我說：『我太太在生未干涉我飲酒，好容易才得她死去，沒人干涉，難道我再要娶一個來干涉我飲酒嗎？』」譚先生說完這句話，依然還帶着勝利的神氣，把眼睛張一張又微笑了。

從各方面的零碎消息歸納起來，似乎汪蔣之間真有問題，直至十五年八月圍攻武昌的時候，蔣先生才親口對我告訴三月二十的真相。

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我們從湖南的平江開始攻擊，一路勢如破竹，奪取汀泗橋，賀勝橋，至七月三十日遂直迫武昌城下。關於軍事方面，我另有一段「軍中璣記」敘述，<sup>②</sup>現非本文，不再複記。我們經過八月一日和五日的扒城，沒有奏效，而唐孟瀟部下的何鍵和夏斗寅已由嘉魚渡河攻下了漢口。我奉蔣先生的命令辦理湖北財政，準備偷過武昌城渡江。似乎更沒有什麼事要請示，<sup>③</sup>我不準備見蔣先生，一天下午我已經預備一切，要在夜飯後出發。

「公博，你去見見蔣先生罷。他今夜要起程往江西了。」鄧擇生氣喘喘的跑入南湖學校我的房間，那

時南湖學校是攻城的總司令部，唐孟瀟，李德鄰，鄧擇生和我都住在那裡。

「沒有事，我不去了。因爲去了恐來不及出發過江。」我閑閑地答着。

「蔣先生剛才告訴我，汪先生要殺他，他對陳真如也這樣說過了。你去見見他，或者他還有什麼事對你說，」擇生這樣催促我，帶着半神秘半懷疑的神色。

這樣消息太使我驚訝，我爲好奇之念所驅使，遂立刻起程去李家橋。②那時攻城的總司令部設在鮎魚套的南湖學校，而蔣先生則住在離南湖十多里路的李家橋火車上，以避武昌蛇山上的北軍炮火直接威脅。由南湖至李家橋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旱路，跟着鐵路的路軌，這是很暴露，常受蛇山的炮火攻擊的。一條是水路，可用小船撐去，但很灣曲，所費的時間是比較長的。我爲急於見蔣先生的面，只有選擇旱路。然而鐵軌是那樣暴露，我既不好乘轎，更不好騎馬，只有沿着鐵路步走去。

到李家橋時，太陽已經斜抹在山西，蔣先生所乘的火車，頂上也鋪滿警衛團的士兵，顯然正待出發的模樣。我上車之後，蔣先生招待我坐，招待我喝茶，我照例報告今夜要渡江過漢口，及請示有無其他命令。

「公博先生，後方有許多人要請汪先生回國，你知道嗎？」蔣先生談完公事之後，突然向我發問。

「我沒有聽見。」其實我真沒有聽過後方有這樣消息，我自從六月出發之後，我總沒有和廣東後方通過消息。據我所知的迎汪空氣，前方將領倒有這個醞釀。

「汪先生真要回來，你以爲怎樣？」蔣先生又追一句。

「汪先生回來，如果於革命有益的，自然贊成他回來。倘於革命沒有什麼利益，暫時住在國外也好。」我想只有這樣答他，因爲從鄧擇生告訴我的說話分析，我不便表示我的真意見。

「我以爲黨政軍只能有一個領袖，不能有兩個領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來，我便走開。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來。」蔣先生這時的臉沉下來，態度也有點異樣。

「到底蔣先生和汪先生有什麼過不去呢？我不很明白。」我終於直捷的問。

「汪先生要謀害我，你不知道嗎？汪先生是國民政府主席，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對我不滿意，免我職好了，殺我也好了，不應該用陰謀害我。」蔣先生很憤憤的說。

「他怎樣陰謀害蔣先生呢？」我駭然。

「他要我參觀俄國來廣東的船，打算就在船上扣留我直送海參威。」蔣先生很肯定的判斷。

「這樣大的事，總該有人知道吧，我們都不知道。」

「自然你們不知道，他有俄國顧問和他的老婆便夠了。」

這時我真再忍不住，我說：

「這事真是太駭人聽聞了。在廣州當日，沒有蔣先生，汪先生是不能統一東江和平定南路的。汪先生要殺蔣先生，他無異乎自殺。這事我不敢信，但今日蔣先生親口對我說的，又不能不令我相信。蔣先生叫我在湖北辦財政，又叫我到江西辦政務，我答應蔣先生在湖北三個月，在江西三個月，此後我將天涯海角去找汪先生；假如汪先生要殺蔣先生的話，頭一個反對汪精衛的便是我，假如沒有的話，我勸蔣先生還是和汪先生合作。因黨內的花樣已經太多了，倘若再弄下去，前途真太悲觀了。」我這時大概太激動了，聲音露了凄愴，並且由激越而陡變爲哽咽。

「唔！唔！這樣也好！」蔣先生便結束了他的談話。我覺得無可再說，也辭別下車，當夜便過漢陽。

那夜我在渡江的途上簡直沒有合過眼，知道國民黨的前途伏着無限悲劇和慘劇。後來汪先生自海外回到漢口，第一天我便將此事面質汪先生，汪先生愕然了半天，只能答：「公博，你信不信？」

長江上游既已底定，武漢大可以安枕無憂，不知蔣先生還是因為高興呢，還是再無暇兼顧後方呢？把所有關於三月二十之變被扣的人員都釋放出來了。除了吳鐵城去了上海，謀殺的罪首李之龍，和告密的功魁歐陽格都於釋放後到武漢了。②李之龍是從前軍校的學生，到武漢後就主持了黃埔學生所辦的血花劇社，他有一天來見我，爲要明瞭真相起見，我問了他許多話。

「到底三月二十之變是怎麼一回事？」他從前是海軍局的政治部主任，還是我的部屬，我不客氣的質詢他。

「我一點也莫明其妙。」之龍在訴苦。

「你現在已脫離了共產黨，也不必隱諱的瞞我，共產黨不是命令你去攻黃埔軍校嗎？」我知道他在三月二十之變後，他向蔣先生發誓脫離共產黨。

「實在沒有這回事，陳主任，你知道，那天捉我時，還在我的牀上拖我下來，而且中山艦也泊在省河，我要攻黃埔，那還有工夫回家睡覺呢？」之龍在分辯。

「聽說你所管的中山軍艦十七十八兩日曾至黃埔，是沒有奉蔣先生命令的。」我重複提起當日我所聞。

「怎說沒有命令？中山軍艦十八日到黃埔，十九日又駛回省河，蔣公館都來過電話的。」②之龍以爲電話可以當命令。

「那電話是蔣先生親自打給你的嗎？」我要證實之龍不能無過。

「那電話並非蔣先生親自打給我，而是他公館的秘書打給我的。蔣先生一向都是這樣指揮，這也是習慣，我向來都這樣的遵守，沒有出過岔子。」之龍提起蔣先生的指揮習慣。「唉，總是我倒霉罷了，我也不敢怨蔣先生，只怨命運不好，做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犧牲者。」

李之龍的冤枉，我已明白了大半，一天我偶然到武漢衛戍司令部看陳真如，碰見了黃居素也到了漢口趁熱鬧。居素先生是真如左右一個綸巾羽扇的人物，他從前是和真如一起在南京歐陽竟無底下學過佛的，對於真如是半朋友，半幕僚的地位，恰恰像山中宰相的軍師。北伐時候，他怕路上辛苦沒有回來，武漢既下他又趁熱鬧的至軍門杖策。我和真如談起李之龍訴苦的情況，居素只在旁邊冷笑。

「你笑什麼？」我很奇怪。

「我笑的是李之龍和歐陽格都是傻瓜。」居素彷彿有他的天機不可洩漏。

「李之龍傻瓜猶可說，歐陽格不是當日告密的嗎？」我駭異了。

「你也傻了。我已見過歐陽格，我問他三月二十之變是不是他告密的？他答我的話才有趣，他並不知道什麼原故，只是在三月十九夜接到蔣介石的密令要他二十晨早佔領中山艦。他也並不知道什麼原故，末後不久把他囚起來。他也不知道什麼原故，現在又放出來，叫他到漢口。」居素說了幾個「不知道什麼原故」，還在冷笑，使得我們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冷氣。

「我傻？你也傻了，難道歐陽格幹了這種事，要對你說真話？」我還不相信。

「你知道歐陽格是歐陽竟無的什麼人？我和他的交情，什麼話不說。而且我是反共的，他揭發共產黨

的陰謀，爲什麼要對我秘密？」居素證明歐陽格的無辜。

「歐陽格既然受了這種冤枉，爲什麼不聲辯？」我已替歐陽格抱不平。

「你真是傻了，天下冤枉的事多極了，受點冤枉有什麼要緊。歐陽格目前雖然受些冤枉，後來難道沒有好處麼？」<sup>②</sup>居素似乎揭出一些佛傷的真諦。

我想一想，也不禁笑起來，我真近乎傻了。

至到民國十七年我在上海辦「革命評論」的時候，陳立夫先生有一次在上海市黨部演說，大罵汪先生謀害蔣先生，並說那時蔣先生發覺了這個陰謀，很灰心，要辭職，要出亡，十九那天竟直檢了行李，帶他坐了汽車到天字碼頭，預備乘船走上海。在車上他勸蔣先生幹，有兵在手上爲什麼不幹？汽車到了碼頭，蔣先生幡然下決心，重復回到家中發動三月二十之變。

恰好那時在上海的英國別發書庄出版了一本英文書，那是張作霖在北京圍抄俄國大使館，沒收許多共產黨的秘密文件，翻譯成英文發刊，作爲反對國民革命軍的一種宣傳。<sup>③</sup>裡頭對於三月二十之變以前的陰謀，一點也沒有記載，獨至在三月二十之後，俄國顧問團在東山開秘密會議時，那討論和決議倒清清楚楚的有紀錄。當時黃埔軍校的俄國顧問斯板諾夫在會議上報告三月二十的經過，說事變之前，一點也不知，但他的意見以爲爲求國民革命完成起見，俄國仍應利用蔣介石。就是俄國使館給莫斯科的報告，也有同樣的獻議。

爲了這事，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蔣先生。第一，說明我在武漢時已面質過汪先生，汪先生極力否認此事，而且證以當日汪蔣相依爲命的情形，汪雖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說明別發書庄有這些俄國密件

，如果汪先生和俄國顧問有謀害他的事，何至於一些痕跡也沒有，至三月二十之後俄國顧問還主張要利用他。②第三，我以為在汪蔣合作時期，立夫先生不應在市黨部作這種挑撥離間，和混淆觀聽的演說，致黨又發生破裂。末後我更請他買這一本英文小冊子一看，因為宋美齡夫人是懂英文的。

過了些日子，蔣先生爲着別事由南京至上海，約我和張向華至孔庸之公館會談。我問他接到我的信沒有，並申述這是無稽之言。依我的觀察，蔣先生可以代表革命軍人，而汪先生可以代表革命青年，兩個人如果能竭誠合作，總於中國前途有利。

「陳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我得責罰他，」蔣先生聽完我陳述之後這樣說。

後來有人從南京去上海，告訴我果然蔣先生爲着此事會大罵立夫先生一頓，然而三月二十之變，其真相就在於此嗎？直至民國十九年，我再碰見鄒海濱先生，我才完全明白。

事實是這樣，北平擴大會議算是隨着晉軍的軍事失敗。晉軍既已佔領的濟南，被蔣光鼐和蔡廷鍇的軍隊奪去了，張漢卿以爲此時不取，更待何時，徘徊半年多的態度也於那時轉變，開兵入關，進佔天津了。擴大會議經過懷仁堂一度會議，把會議的委員分作兩批，一批是向外活動連夜往天津，一批是爲着共患難的關係，於翌早附車往石庄，這一批往山西的委員，除汪先生之外，鄒海濱先生和我都在內。③

天沒有明，火車便從西車站開行，大概爲避人耳目關係，或者爲避飛機轟炸的緣故——南京方面的飛機在佔領德州之後，已來北平轟炸過一次——所以趕着天沒有亮時即出發。車才過了長辛店，北平有電話來，說車要等着，因爲石友三的代表蕭仙閣要趕來見汪先生報告機密。也不知誰接的電話，似乎說張漢卿的入關是爲幫着我們的，不是幫着蔣先生的。我對汪先生說：「不必等待了，蕭先生我雖沒有見過，但從

各方面消息傳來，他是一個混人，混人是不可靠的。」但汪先生以爲雖然蕭仙閣不可靠，但既已乘專車趕來，我們也須等他一下。這一等便等了幾個鐘頭，蕭先生來時，說張漢卿之入關，的確是幫助我們，我們不獨不必走，且可立刻回到北平。張漢卿只是要天津，北平也不要的。<sup>②</sup>

蕭先生報告完畢，大家都笑了，這種笑不是高興，而是表示不信任。蕭先生走後，我們遂繼續開車。在車上汪先生是自己住一個房間，鄒先生和我合住一個房間，我爲着鄒先生年齡比我大，讓下舖給他，因爲下舖的上落，比較方便。在車上是沒有事的，整日看書和睡覺，白天睡得太多，夜裡反而沒法合眼。電燈又那麼暗，勢難看書，我們便開始上天下地的聊天了。我們不經意的閒談，一談便談到三月二十之變，鄒先生忽然很興奮，說：「公博，你知道三月二十之變的原因嗎？」我說我不知道，只把蔣先生在李家橋對我說的話覆述一次。鄒先生太興奮，不睡而在牀上坐了起來，我也下了牀在抽煙捲。

「那都不是，只是伍梯雲玩的小把戲。」鄒先生笑着繼續說：「你知道嗎？自從展覽堂出亡莫斯科之後，大家都感覺沒有辦法。怎樣能拆散廣州的局面，只有使共產黨和蔣分家。<sup>③</sup>我們在外邊想辦法，伍梯雲也在廣州裡頭想辦法。」

「有一天梯雲請俄國領事食飯，跟着第二天便請介石的左右食飯，席間梯雲不經意的說：昨夜我請俄國領事食飯，他告訴我蔣先生將於最近期內往莫斯科，你們知道蔣先生打算什麼時候起程呢？這一句話，介石的左右自然報告介石了。介石是最多疑的，但既不能找梯雲去問，更不能找俄國領事去問，於是只好懷疑到極點，以爲共產黨要幹他，或者精衛要趕他。一次介石便向精衛刺探了，說他於統一東江南路之後，極端疲乏，想作短期的休息；但上海不好去，倒不如往莫斯科，一者可以和俄國當局接頭，二者



可以多得些軍事知識。精衛是一個老實人，在第一次刺探時苦苦留他，以為在軍事時期他不好遠去。禁不住第二次的刺探，介石說明在整軍時期，他留與否無關重要，倒不如趁此時機，作短休息，可以恢復精神。②他的言語態度當然很像甚誠，到底是書獃子的精衛終於答應了。

「介石見精衛答應了，遂確信他的判斷不差，他更提出第三步刺探，希望陳璧君和曾仲鳴陪他出國，你知道璧君是一個好事之徒，聽見有莫斯科可去，那裡有不答應之理。以為俄國那時還冷，於是製皮大衣呵，辦行李呵，忙到不可開交。衣服製備之後，便天天催介石走。」

「介石原來是無意去的，所謂到莫斯科完全是刺探的，現在璧君天天催他動身，於是遂確信精衛要幹他。碰巧俄國有一條船來，並且請介石參觀，聽說當日介石要拉精衛同去，而精衛因已參觀過，沒有答應，於是介石更以為這條船是預備在他參觀時候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之故，介石遂決定反共反汪，這是三月二十之變的真相。③其初只是梯雲的小把戲，自己也沒有什麼把握，不料後來倒求一得二，不止反共，而且也趕了汪，這是當時大家所沒有預料到的。」

我聽見之後，倒冷了半截身子，既恍然大悟，又悲涼不堪。現在梯雲先生經已作古，他固然是安安靜靜的長眠在他的寢宮，但爲了他那幾句話，不知犧牲了多少人的性命，寡了多少人的妻子。中國國民黨分裂了至今不能真正復合，連帶而拖累了無數善良的老百姓死傷流離，現在我執筆寫這段經過，還是欲哭無淚。

#### 第四章註釋

- ①到目前爲止，蔣介石的日記仍未出版。關於蔣氏本人對此期間之記載，現可參考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出版地缺，一九三七年。
- ②關於此事，並參攷陳公博：「我與共產黨」，載於「寒風集」，頁甲二三八至二三九；及 Boorman, II, 198.
- ③陳樹人的生平，見「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九八八至九九九。及 Boorman, II, 234—235.
- ④ T'ang Leang-li, pp. 244—246.
- ⑤見毛思誠，前引書，第十四冊，頁八三至八六及第十五冊，頁三八至四七；陳克華：「中國現代革命史實」，上冊，頁一一〇。 Wu Tien-wei, "Chiang Kai-shek's March Twentieth Coup d'état of 192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 3: 591 (1967—68) and T'ang Leang-li, pp. 244—245.
- ⑥參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頁三七七至三八二；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一九七一至七四年，第二冊，頁五一—；雷嘯岑：「二十年動亂中國」，頁三九至四十。
- ⑦參攷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Series 129/493, Vol. II, 1926, Clementi to Amery, "Canton Situation", June 10, 1926; and Chesnearux, p. 301.
- ⑧參看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五二二、頁五二三；雷嘯岑，前引書，頁四十至四六；T'ang Leang-li, p. 246 Wu Tien-wei, p. 592.

⑨甘乃光（一八九七——一九五六），字自明，廣西人。原先亦為孫文主義學會的一分子，甚得廖仲愷垂青，早期支持汪精衛。中日戰爭爆發，甘乃光隨國民政府徙往重慶，歷任要職。一九四八年至五〇年，任駐澳洲大使，遂定居於澳洲。見Boorman, II, 224—225.

⑩據蔣永敬記述，胡漢民自俄返粵後，其原任之外交部部長之職已為陳友仁所代，而胡迫於形勢之下，乃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一日乘船避赴香港。見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二三四。另一方面，汪精衛於中山艦事變後，因不滿蔣介石之所為，乃離開廣州，退居鄉間，而汪氏更認為自己實難與蔣介石共處，遂稱病離粵赴法。見 T'ang Leang-li, pp. 245—246. 而胡、汪兩人恰巧乘坐同船出洋，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頁五二七；毛思誠，前引書，第十五冊，頁六一；陳克華：「中國現代革命史實」，上冊，頁一一四。

⑪李宗仁（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字德鄰，廣西桂林人。與白崇禧、黃紹竑同為桂系領袖。一九四八年被選為國民政府副總統，明年一月，任臨時總統。同年十月，政府遷往重慶，李氏旋飛美國。一九六五年，返中國大陸定居。李氏生平，詳見：「李宗仁回憶錄」，現連載於「明報月刊」，第一三六期至一五二期，一九七七年四月至一九七八年八月，以後各期待續。及Boorman, II, 336—342.

⑫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字健生，廣西臨桂人，桂系領袖。一九四六至四八年任國防部長。一九四九年末，移居台灣。黃紹竑（一八九五——），一作紹雄，字季寬，廣西容縣人，桂系領袖之一。一九三〇年與李宗仁、白崇禧決裂後，歷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第一及第三集團軍副司令長官。一九五〇年間，在北京担任次要職務。白崇禧生平見 Boorman, III,

56. 黃紹竑、生平見 Boorman, II, 205—208. 白崇禧、黃紹竑及李宗仁等之事跡亦散見於 D.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⑬ 唐生智(一八九〇——一九七〇)，字孟瀟，湖南東安人。北伐期間，任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揮。一九二七年，統制湖北、湖南及河南等地，在武漢國民政府權力最大。一九二八年後，時而擁蔣，時而反蔣，立場反覆。四九年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担任要職。唐生智生平見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三冊，頁一三七至一五〇；Boorman, III, 236—239. 而唐生智與李宗仁等的交往，見「李宗仁回憶錄」，載於「明報月刊」，第一四六期，一九七八年二月，頁六四至六八及第一四七期，一九七八年三月，頁六二至六六。

⑭ 歐陽格為中山艦之前任艦長，當時任海軍學校副教育長。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頁五〇二；陳克華：「中國現代革命史實」，上冊，頁一一〇。

⑮ 蔣介石的主要論點謂沒有授命李之龍，見毛思誠，前引書，第十五冊，頁四五至四六；蔣介石：「講述中山艦李之龍事件經過詳情」，載於「革命文獻」，第九輯，頁九一一至九一二；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下冊，頁四八九至四九一。故此蔣氏之論點與陳公博相左。

⑯ 鮑羅廷與胡漢民是於四月二十九日返抵廣州，鮑羅廷抵步後立與蔣介石商議今後國共之關係，見毛思誠，前引書，第十五冊，頁五四、五九、六一至六二；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五二至五二〇。而關於囚吳鐵城，逐伍梯雲，見張國燾，前引書，頁五一、及五二三。惟伍梯雲後來到二中全會時（一九

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返粵與蔣介石協商二中會議事宜。見毛思誠，前引書，第十五冊，頁六三。

⑰陳祖壽（一八九二——一九五一），字果夫，後以字行，浙江省吳興人，致力於國民黨組織與人事管理，一九二六年，代理主持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工作，在「清黨」中担任要角。北伐完成後，創立中央政治學校。一九三二至三七期間，主持疏導淮河工程及江蘇省政。對日抗戰發生，協助蔣介石主管全國人事。陳果夫之生平，見「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〇五六至一〇七一；吳相湘，前引書，第二冊，頁一三七至一五六；Boorman, I, 201—206.

⑱張人傑（一八七七——一九五〇），字靜江，浙江吳興人，擁護孫中山及支助蔣介石。為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曾任浙江省省政府主席。張人傑生平見「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五五三至五五九；吳相湘，前引書，第一冊，頁四二三至四三四；Boorman, I, 73—77.

⑲張太雷（一八九八——一九二七），原名太來，江蘇人。共產黨烈士，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組織廣州蘇維埃，在混亂中被射殺。生平見Boorman, I, 111—112.

⑳張靜江與寧漢分裂之關係，見「苦笑錄」第五章，「寧漢分裂」。

㉑葉楚傖（一八八三——一九四六），字小鳳，江蘇吳江人。文學家，參予反滿革命，曾任民國日報編輯，後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中日抗戰期間，出任新聞部部長及秘書長。葉楚傖的生平見「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〇〇〇至一〇〇三；Boorman, IV, 27—29.

㉒陳公博：「軍中環記」，載於「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社，一九四四年，頁甲三五至一九〇。

㉓同上書，頁甲七六至七八。

②④ 李家橋位於武漢以南十二公里。而蔣介石最早於八月二十日獲知汪精衛欲回國倒蔣，見毛思誠，前引書第十六冊，頁一〇九。

②⑤ 湯良禮對此事有不同的解釋，他說蔣介石聽了張靜江的謠言，以為汪精衛與共產黨聯合對付他。見T'ang Leang-li, p. 243.

②⑥ 李之龍曾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宣佈脫離共產黨；李之龍被釋，時為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四日，見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五一—；P. P. Y. Loh, "The Politics of Chiang Kai-shek.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 3: 436 (1965-66). 吳鐵城則在同年十月被釋放，見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一九六八年，頁一六二。

②⑦ 李之龍對中山艦事變之解釋可參考李之龍：「汪主席被迫離職原因與經過」，武漢，一九二七年。今據Wu Tien-wei, p. 591 引。

②⑧ 正如黃居素所說，歐陽格被囚後不久即被釋放到武漢。

②⑨ 該書名爲：· *The Soviet in China Unmasked: Documents Revealing Bolshevistic Plans and Methods, Seized in the USSR Embassy, Peking, April 6, 1927* (Shanghai: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1927). 至於搜出文件之經過及其內容，詳見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 Y. How (eds.),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③⑩ 參見··· "Stepanov's Report on the March Twentieth Coup d'état", in Wilbur and How, pp. 248—253.

③①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時，西山派及改組派聯合反蔣，並支援馮玉祥、閻錫山等，在北平舉行中央擴大會議，建立另外一個中央黨部，對抗南京。關於擴大會議的記述，參考鄒魯：「回顧錄」，第二冊，頁三七一至三七四；雷嘯岑，前引書，頁一六二至一七八；中國青年軍人社編：「反蔣運動史」，中國青年軍人社，出版地缺，一九三四年，頁一一七至二一四；及陳公博：「苦笑錄」，第十章；及陳公博：「寒風集」，頁二七七至二七八。

③②在此之前，蔣介石與北平擴大會議分別想籠絡張學良，而最後張學良入關，表明擁蔣的立場，因此北平擴大會議隨即瓦解，故蕭仙閣之報導實屬錯誤，見雷嘯岑，前引書，頁一七七；鄒魯：「回顧錄」，頁三七一。

③③參考T'ang Leang-li, pp. 241—243.

③④參考Wu Tien-wei, pp. 590—591.

③⑤雖然如鄒魯所說，中山艦事變是他們的一個小把戲，但他們却沒有獲得任何利益，反之，據張國燾所說：「他（蔣介石）也會表示反對西山會議派，以示他的行動並未受右派的影響。此外，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同時被撤銷，也似乎顯示他並無偏袒任何一方的意思。」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頁五一—。而伍朝樞更要自動離粵，西山會議派的人物也不能插足於廣東。見同上書，第二冊，頁五二—三。而鄒魯亦表示他們非常的失望，見鄒魯：「回顧錄」，第二冊，頁二一八。

## 第五章說明

一九二七年四月發生的寧漢分裂導源於年前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艦事件」。「中山艦事件」不但導致汪精衛遠赴歐洲，造成國民黨高層領導的真空；而且使到黨內右派分子脫離，形成西山派與蔣氏的關係更趨惡化；更標誌了蔣介石邁向政權的最高峯。雖然「中山艦事件」引起親汪分子恐懼蔣介石之野心，但由於最高領袖（即汪精衛）不在，所以在最高決策方面，他們往往是舉棋不定。從表面看來，當時的國民黨內部可以說是爲了籌劃北伐而團結起來。

「中山艦事件」後兩月（一九二六年五月期間），國民黨召開二中全会。蔣介石被委爲軍事委員會主席。同時，爲了消除因「中山艦事件」引起的猜疑氣氛，以促進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於是產生了聯席會議。並於此後數月，積極籌務北伐事宜，先後作出了一連串的決策及委任若干重要職位。唐生智在六月二日被委命爲第八軍軍長；四日，中央執行委員臨時全體會議通過出師北伐，翌日，國民政府委任蔣介石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氏旋兼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由是總攬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軍政大權。

唐生智領導第八軍與蔣介石的第四軍、李宗仁的第七軍並肩前進。七月十日，攻陷長沙，長沙遂成北伐軍的大本營。進攻湖南的行動遂轉迅速，七月三十日，更成立了湖南省政府，以唐生智就任省政府主席，兼軍事廳長。湖南省政府是國民政府在北伐期間成立的第一個省政府，其成立標榜了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成就，更鼓舞了唐生智主持的政局。唐生智出身軍閥，本性難移，因而視湖南（其後湖北）地區爲其私有，並欲與蔣介石的軍事地位相比擬，進而冀望與蔣氏爭奪最高軍權。



八月十二日舉行的長沙會議，可說是唐、蔣二人鬥爭的開始。唐生智建議自己進攻武漢，蔣介石的第二、三、六軍則邁向江西，但必須待武漢方面完成任命，才可攻取江西。唐氏的態度，顯然以自己爲本位，而以蔣爲副角，政治野心表露無遺。雖然，兩人並未在會議後決裂，但彼此已心存芥蒂。

此時，蔣、唐間的衝突不外是野心作祟。唐氏希望鞏固自己在湖南與湖北地區的勢力，務求取代蔣氏爲革命軍總司令。他參加國民黨及北伐的唯一目的只是增加一己利益，而對統一全國及實行三民主義等理想方面漠不關心，甚至不了解當時國民黨內紛爭的奧秘。另一方面，蔣介石極力保持他在軍黨中的高位，絕不容許任何危及其勢位的企圖。唐生智因而成爲他的敵人，而彼此間的衝突一觸即發。蔣氏的策畧是直接統率部隊奪取江西，並派遣忠心的屬下前往湖南，監視唐生智，而另一方面則力圖向東方發展，直取南京、上海，於是委派鄧演達爲湖北政務委員會主席，白崇禧爲副總參謀長。蔣氏認爲這樣的調動足以抑壓唐生智的野心，可是進攻江西却困難重重，結果進佔南昌與九江的計劃比預期遲了個多月；相形之下，唐生智的聲譽日隆，尤其在十月十八日湖北省成立後，蔣氏的戰績更難比擬。蔣氏直至十一月中才能夠把總司令部從長沙移往南昌。

此時，留在廣州的國民黨領袖估計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將會隨着北伐軍的勝利而北遷，於是在十月十五日召開另一次國民黨的聯席會議，譚延闓、張人傑、徐謙、吳玉章、宋慶齡當選爲主席團。在同一時間蔣氏在江西成立大本營後，即委任宋子文爲財政部長、陳友仁爲外交部長、徐謙爲司法部長、孫科爲交通部長。其後在廣州方面，重要官員決定，以武昌爲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根據地，於是分別離開廣州，前往南昌，再往武昌；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張人傑及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則留在南昌，跟

從蔣介石。

其時黨內的分裂日見明顯，鮑羅庭和共產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可從下列三方面分析當時的局勢：

(一) 唐生智的政治野心日漸顯露，當蔣介石的軍隊久攻九江和南昌不下，唐生智較前更有信心取代蔣介石北伐軍總司令的地位。於是唐氏疏通俄國代表鐵羅尼，希望得到援助。爲了增強勢力，唐氏更欲擴充第八軍爲三支軍隊。雖然唐氏欲奪取總司令地位的野心尙未爲人知曉，但後來却掀起反蔣潮流，並迫使蔣氏攤牌。

(二) 鮑羅庭返廣州後，藉著蔣氏不在，企圖左右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聯席會議所作出的決定。後來更率領陳友仁、徐謙、孫科與宋子文等前往南昌及武昌。其後更在武昌聯結反蔣分子，形成一個以武昌爲中心的左傾的聯合陣線。

(三) 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以後，極度憂慮親汪分子與共產黨的活動。雖然統一戰線依然存在，但可靠的消息告訴他，鮑羅庭與共產黨意欲控制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奪其最高主權。因此，蔣氏極憎恨唐生智和共產黨的活動。上述三方面，互相交織，導致五個月後的最後決裂。

十二月十三日，即鮑羅庭等抵達武昌之第三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成立一個臨時聯席委員會，全權管理黨和政府的事務，直至國民政府正式移都武漢，而徐謙即被選爲臨時聯席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可說是最高策劃與行政機構，並修訂北伐前二中全會所作的決定。蔣介石爲了佔上峰，致電鄧演達，以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名義召集武漢聯席會議并建立省政府。徐謙以牙還牙，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中宣佈自臨時聯席委員會成立以來，通過了二百六十個決議，並在大多數的支持下，得到相當成就。徐氏認爲當前急務是把軍事、經濟與外交事務，統歸在黨的統轄下，并消除黨內一小撮封建腐朽分子控制黨的企圖。徐謙所指的封建腐朽分子乃蔣介石、張人傑等。透過徐謙的演說及會中所

通過的六個決議，可反映出武漢的代表決意消除蔣、張等之軍事及政治力量。其次，鮑羅庭的影響力極大，而共產黨與親汪分子在驅逐蔣介石的同一目標下，確實緊密團結。最後，唐生智與鄧演達雖未捲入反蔣漩渦，却很明顯地站在徐謙一邊，給予政治及軍事的支持。

武漢集團的第二個步驟是展開一個反對「昏庸老朽」分子的運動，其中張人傑更被指名攻擊。同時期武漢方面的黨政要員均電邀蔣氏到漢。在蔣氏方面，他則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電召唐生智及鄧演達到南昌，以謀對策。唐氏未遵命前往，而鄧氏到達後却支持武漢方面的決議由武漢直接收取北京，更強烈反對蔣氏攻畧上海、南京之計劃。蔣、鄧二人大抵自此決裂。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漢的聯席委員會決定召開三中全會，並決定以武漢為新國民政府的基地。同日，蔣介石以主席身份，在南昌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六次臨時會議，並通過南昌為政府基址。而武漢方面派出宋子文、鄧演達和陳公博為會議代表。根據陳公博記載，在會議中並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來支持南昌作為政府基地，但在事後一私人會談中，陳氏得悉其理由有二：（一）某些委員恐懼失去政權。（二）恐懼共產黨控制武漢集團；陳公博說蔣介石親自表示憂慮，而不管陳氏怎樣反駁亦無效。不過，我們若參閱臨時聯席會議的委員名單，國民黨內右派分子多在其中，故他們對共產黨的恐懼不是無因的。

中央政治委員會留在南昌的決定使武漢集團有充分理由展開反對留駐的行動。以徐謙和孫科為首的武漢集團要求張人傑辭退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位。張人傑的辭職使到武漢與南昌方面有商量的餘地。因此，蔣介石為陳公博說服，前往武漢商議。雖然蔣氏此行表面上受到歡迎，但實際對他的反對更為明顯。在與鮑羅庭商談的會議中，鮑氏聲明，蔣氏不得鎮壓農民、工人與共產黨。據陳公博記載，鮑羅庭在會議

中甚至把蔣氏比擬作一個只任用走狗的暴君。於是，在蔣氏離開武漢時，已下定決心必須與武漢集團分裂，以維持其最高權位。

從一九二七年二月開始，武漢與南昌方面互相拉攏對方分子。蔣介石派遣陳公博往武漢，尋求可行之策。後來，武漢的謝晉與陳銘樞，隨陳公博返南昌，希望說服那處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官員遷至武漢。但兩方面的立場不容許有折衷的餘地。在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的擴大聯席會議的決案中，雖然蔣介石仍列名於若干委員會，但軍政權已多被削除。

可是蔣介石不單沒有理會武漢集團的決議，反之，更全力籌備進攻南京和上海。但在未攻得該兩地之前，蔣氏仍須和緩局勢，以免過於獨裁。因此，他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會同意過召開三中全會，然實質他已不再理會該會之議決了。而譚延闓、陳果夫及陳公博則獲批准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身份參予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從三月十日至十七日舉行，其中只有十一名代表會出席二中全會，同時他們不是共產黨員即為國民黨左派分子，而大部分新代表都是左傾分子。因此，親蔣代表在會議結束前已紛紛退席，如李宗仁、白崇禧在一月十一日離去，而丁維汾在十六日亦退出。三中全會的決案大致上和年前十二月徐謙所議而經國民黨會議通過者大同小異；他們都顯示反蔣、親汪與傾于共產黨。雖然汪精衛此時尚未回國，却當選為所有重要委員會成員。反之，蔣介石的決策權已被削去，連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亦告取消，而一個包括非現任軍職者六人在內的軍事委員會宣佈成立，蔣氏雖然膺選其中，但已不能運用任何權力。

三中全會的決議意圖集中軍政大權於武漢集團手中，雖然尚未公開反蔣，但武漢領袖全力於鞏固權力

及驅逐親蔣分子離開武漢地區。因此，在三中全會以後，北伐軍第八軍軍長被逐出武漢，而剛在會議結束後才履新中央黨部秘書長的李仲公亦被捕，後來僅因陳公博之請求才獲釋放。至於武漢領袖所以不採取直接反蔣路線大抵因他們雖得唐生智在軍事上全力支持，但武漢以外的軍隊甚難控制，甚至未得到部分軍隊公認爲合法政府。其次，即使在武漢，他們仍未能完全掌握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他們實在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領袖帶領反蔣運動，以增加武漢政府的威信和贏取其他地區軍隊的歸順。汪精衛就是衆望所孚的人物。武漢方面亟待他返國策動計劃。

筆者相信蔣介石接獲陳公博報告武漢集團的立場後，已深知自己在該區盡失政治力量，而經過一月三日的聯席會議及武漢之行，更使他深信不疑。故當他返回南昌後，立即籌備進攻長江下游來鞏固其根據地，而且再不關心武漢的活動了。蔣氏奪得蕪湖、上海、南京後，長江下游盡在掌握中，加上與李宗仁、白崇禧等緊密合作，實有足夠力量與武漢政府爭衡，故蔣氏隨時預備與武漢集團一決雌雄。

就在此時，汪精衛從歐洲取道莫斯科回國。他在四月一日抵達上海後，隨即與國民黨領袖商談數天。蔣介石堅持國民政府必須遷往南昌，他說一方面南昌已極安全，其次，從武漢召開的三中全會的決議看來，共產黨的陰謀已表露無遺，故必須清除這些分子。吳稚暉告訴汪氏中國共產黨目的在消滅國民黨及攻擊三民主義。而白崇禧、李宗仁、黃紹竑、李濟琛亦表示同樣的憂慮。他們且建議若汪氏同意這個行動，他們可以勸告蔣氏下野。面對這個建議，且知悉上海受到共產黨控制，汪精衛於是會見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在會議中陳獨秀極力否認共產黨有推翻國民黨的陰謀。據湯良禮記載，陳獨秀建議與汪氏共同發表宣言澄清此事。這個聯合宣言終在四月四日發表，重申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三中全會所達成的合作，並保證共

產黨決不攻取上海和要求召開四中全會來解決存在的問題。

這個宣言帶來嚴重的後果。雖然汪、陳二人，尤其是汪氏，希望藉此減輕蔣介石和他的親信對共產黨的恐懼，但結果却悉得其反。蔣氏和他的支持者反而認爲此宣言爲汪氏同情及聯結共產黨的明證。再進一步來說，汪氏更成了蔣氏在黨的領導權的競爭者。就目前缺乏足夠歷史資料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深入分析這兩位領袖在上海時的真正目的，但現存資料顯示汪、蔣再沒有進一步商討，而且汪氏在與蔣氏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的情況下，於四月七日離開上海往武漢。另一方面，蔣介石積極預備清除共產黨，並與西山派領袖聯合組織另一國民政府。四月十二日，蔣氏與李宗仁在上海展開反共產黨行動，掃除上海的共產勢力，而南京、南昌、廣州相繼效尤。同時，由蔣氏自立的監察委員會發表宣言，謂武漢已陷落在共產黨手中。四月十八日，新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武漢的國民黨立即除去蔣介石和他的親信之黨籍，並在武漢政府統治範圍展開全面消除右派分子行動。於是，南京與武漢的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互相對峙，史稱「寧漢分裂」。

## 第五章 寧漢分裂

寧漢分裂是國民黨內部第一次的正式分裂，是國民黨一件重大的事，也是國民革命中挫的一件慘痛之事。現在許多史論家以爲共產黨的叛變應當是其中唯一原因，實在構成這次分裂的還有許多理由。許多史論家又以爲三月十二日武漢所開的三中全會是分裂的原因，實在醞釀分裂遠在三月十二之前好幾個月。現在要明瞭其中的複雜內容，只有讓我慢慢的一層一層的寫。

第一是共產黨的叛變。共產黨對於國民革命的理論和過程觀察是很清楚的，但他們的行動恰恰正相反。共產黨爲什麼要加入國民黨呢？在第三國際的觀察，以爲中國要實行共產革命，必得要先完成國民革命。這個理論也許是共產黨的正宗派，因爲共產主義的骨髓是階級鬥爭，中國還是停滯在封建組織，階級一定不分明；先要把中國工業化了，然後才有資產階級，然後才有產業工人，有了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才能正式的鬥爭，才能促成社會革命，因此不得不先實行國民革命。不但如此，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受國際帝國主義的支配，他需要的是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然後才可以談社會革命，否則侷促在帝國

主義之下，一般民衆所感受的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壓迫，如果提倡社會革命，民衆絕不會起很大的反應。大凡革命是廣大民衆的需要，並非主觀理論所可鼓動的，因此蘇俄首先主張中國須先完成國民革命。<sup>①</sup>

第三國際這種主張的改變，是在民國十一年初，因爲民十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它的宣言還是同時痛罵廣州的孫先生和北京的徐世昌，後來因爲內部意見不一致，這個宣言雖然勉強通過，始終不能發出，因此中國的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沒有宣言。民十一的春初，第三國際派了一個代表叫做斯力佛歷駐在上海，這位斯先生是荷蘭人，其初是在荷屬東印度活動，後來站不住腳，才改派來華，他在中國化名叫做西門博士，我曾介紹過他在廣州教育會演說。<sup>②</sup>

他在上海不知何時認識了張溥泉先生，張先生一次和他帶了張春木一起來廣州，鼓吹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我記得我在廣州西堤的西濠酒店會見他們，對於這個問題我極端反對。我當日提出四個反對理由，第一個是國民黨的主義終和共產主義不同，兩個不同主義的黨絕不容易合作到底。與其合而後分，不如還是在黨外對於某一問題或某一個時期合作。第二個理由是我們承認國民黨是一個革命黨，共產黨也是一個革命黨，黨員跨黨，倘若遇到了兩黨不同的命令，叫黨員服從國民黨呢？還是服從共產黨。如果服從國民黨即是對於共產黨叛黨，服從了共產黨也是對於國民黨叛黨，叛黨已經是了了不起，何況兩黨都是被認爲革命黨，叛黨即是反革命，實在叫黨員受不了。第三個理由是國民黨是正在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依着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不許黨員做官，並不要目前奪取政權的，如果參加了國民黨，即是共同奪取政權，非更開一次代表大會不能推翻前案。第四個理由是共產黨的人數還是很少，而且都是青年，要使它成長健



全，最好是保持一般黨員的純潔，國民黨內當時的馮自由和胡毅生之流，與及一般的國會議員實在也太不理於人口了，如果共產黨參加了，實在使黨員容易腐化。張溥泉先生很反對我的主張，以爲共產黨的主義沒有和國民黨不同，列寧正在施行的新經濟政策實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一樣，而且兩黨既然都是革命黨，既具同一目的，那麼斷不會有命令不同的地方，至於共產黨改變決議更是頂容易一件事，說到國民黨腐化，他也承認，但正爲如此，所以要輸入共產黨的新血輪。這一段談話我們自然沒有什麼結論，後來西門畢竟和張先生一起到桂林謁見孫先生。西門此行我聽見也沒甚要領，一直等到陳炯明圍攻總統府，孫先生到了上海時候，國民黨容共才變了當時一種政策。③

我爲什麼要補述上一段歷史呢？因爲我要敘述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原因，然而後來共產黨的活動就違背了他們的理論和政策。譬如他們在廣州時候專作農工運動，處處都表露阻止國民黨的活動而與國民黨爲難。在農民運動的時候，共產黨更密令他們的農民特派員，有重要消息不必報告於國民黨的農民部，雖然名義上他們還由國民黨特派。而且到處宣傳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不徹底，要革命的還是加入共產黨。④

共產黨這一手實在使國民黨太難受了，北伐之後，共產黨的力量也隨着軍隊的力量到處增加了。各地的農會工會可以說由共產黨絕對把持，凡國民革命軍所到的地方，工會是罷工了，農會也武裝了，政府的最大作用是安定秩序的，這麼一來，國民黨竟直沒有力量維持地方，清黨的醞釀差不多也跟着軍事進展而膨脹。而且共產黨以爲力量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時候；以爲社會革命的開始，不必再待國民革命的成功；以爲國民革命軍到了北京可以用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法術，立刻將國民革命一變而爲社會革命。共產黨最初的理論和最後的行動不符，自然國民黨不得不採取最後的自衛手段，這是爲什麼寧漢要分裂？

第二是三月二十之變，使人太莫明其妙了。當時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能夠統一東江，救平南路，自然蔣先生是有大功，但汪先生坐鎮着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無偏無袒的使各軍得其平，必誠必實的厲行廉潔政治，一時人望所集，海內歸心。廣西和湖南的來歸，與其說是因為廣東的軍事進展，毋寧說是受了國民黨主張的影響。汪先生既因三月二十之變出走，雖然大家以為是一個悶葫蘆，但抱不平而希望他回來的企圖倒是很普遍而到處醞釀。因為汪先生的出走，大家遂想到三月二十之變；因為想到三月二十之變，大家遂不滿意於蔣先生。那時雖然說不上反蔣，可是崇拜汪而懼怕蔣倒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心理。

唯其三月二十之變太莫明其妙，所以一般黨人和將領都有點寒心，就是沒有汪先生在國府那一段的成績，大家也有點芒刺在背的恐怖。我在出發之前，曾經和李任潮和譚組安談過一次話，他們的態度可以表示當時一般人的心理。我還在政治訓練部，李任潮有一天用電話來找我好幾次，我回部之後，便到參謀部找他。

「你找我有什麼重要事嗎？」我問。

「沒有要緊事，因為你就要出發了，所以找你一談。」李任潮本來不多言的，至此又沉默下去。

「你看我們真到了長江，介石會怎樣呢？」任潮默然了許久才問這一句話。

「我也難說，我看還是那樣罷。」我找不着任潮的要領，只能那樣答。

我們又起首默然。末後我們又談些不相干的事才散。任潮爲什麼有這一問？自然說話內裡有文章，我那時實在和任潮不熟，而且我當日雖然不滿蔣先生，然而總不願反蔣以拆革命的戰線，所以始終沒有表示意見。

譚組安先生的態度更是鮮明，在北伐誓師的前一天對我說：「到了長江，介石是沒有辦法的，要是在長江攔不久的人到了長江那裡有好辦法！」組安先生雖然老成而渾厚，有時高興起來，也難免露出自負的神氣。⑤或者組安這一句話未必就表示只有他才有辦法，不過對於蔣先生不滿意那也是很顯然的。

北伐已到了長江，各軍都慢慢要擴張，各有擴軍之心，而又懷有自危之念，那麼反蔣迎汪也很順理成章，這又是寧漢分裂原因之一。⑥

第三是唐孟瀟和鄧擇生的構燬。說到此地，今日我還是有點怪鄧擇生。鄧擇生最初是反對唐孟瀟，及後又利用唐孟瀟，使到武昌未下已形成蔣唐交惡，武漢既定更促成寧漢分裂。事實是這樣，鄧擇生時常都以理論家自負而又以革命家自居，見着人無時不挺着胸脯，大談理論。有了這個習慣，總以為聽他話的才是革命黨，不聽他話的就不是革命黨。大概他總以為唐孟瀟還是一個地方軍閥，想訓練他成功一個革命黨吧，於是把許多革命理論硬生生的灌他，碰巧孟瀟也是一個予智自雄的人，不見得便服從他認為小弟弟的鄧擇生領導，於是武昌未下鄧擇生便對孟瀟不滿意了。

擇生既對孟瀟不滿意，自然在蔣先生面前有了批評。而孟瀟當時的確也太躁進了，在武昌未下便希望把他三師擴充為三軍，這種舉動各軍都不滿意，蔣先生自然更不滿意。

「我們到江西去，我們不要兩湖了，最多我們不得了便回廣東。」蔣先生這樣說。有一天我在李家橋火車上會着蔣先生，當時他還露出一種憤慨之色，恰在和鄧擇生見面之後。我知道鄧擇生又對蔣先生批評唐孟瀟，那而時為着革命前途起見，我真替唐孟瀟解釋不少，其實當時我和孟瀟談不上密切的友誼。

不久以後我在漢口和孟瀟閒談，雖然是交淺言深，我也不得不盡量對他忠告。我說：

「孟瀟，你已成了一個神主牌，祇是大家不知道把你安放在大廳或是安放在神樓罷了。不過我替你想，很危險！你是參加了國民革命軍，而湖南又已服從了國民政府，但你想，湖南省政府和國民政府有什麼關係呢？財政是獨立的，省政府委員又是你推荐的，除了一張國府任命狀之外，什麼也沒有關係。而且你的身邊，有國民黨，有共產黨，有軍人，有紳士，有佛教徒，有所謂親信派，各有矛盾，各有利害，很像一團火拿一張薄薄的沙紙包着，終久要燒破的。我勸你多和國府發生關係，而擴充軍隊也必得慢慢的，不要急。」⑦

我這一段書生見地的話，自然或非孟瀟所樂聞，我於十五年十二月離開漢口到江西，整整三個月和他沒有通過消息，迨至鄧擇生和蔣先生破面之後，又轉而利用唐孟瀟。等我十六年三月重到武漢，孟瀟又變了一個樣子。蔣先生那時不敢將國民政府搬至武漢，共產黨的問題自然是一個原因，而唐孟瀟的氣噉咄咄逼人也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

……

說到此地，我可以敘述寧漢分裂的前夕情形了，現在記敘當時情況的，都名之為寧漢分裂，其實分裂的當時，南京還未取得，我固然在江西，而蔣先生也還住在南昌。其時軍事經已穩定，吳佩孚對於武漢顯然的無力反攻，而孫傳芳在江西新敗之後，對於江浙也只圖自保，於是為達到北伐目的而為容易號召天下起見，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遂計劃北遷。我剛由武漢調任江西政務委員會主任的時候（政務委員會是當時草創的制度，等於省政府），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剛由廣州搬來，當日中央為什麼不取道湖南直至武漢，而偏假道南雄和贛州以至南昌，我至今還不明白。或者是中央以為北伐總司令部設在江西，所以先來這個

南昌故郡的洪都新府，或者是蔣先生和張靜江早有成算，決意將中央不設在那個武漢的中心。

不過當日的宣傳，早認定中國可以建都之地只有四個，一個是北京，一個是南京，一個是武漢，一個是廣州。北京和南京沒有取得，自然不發生建都的問題，而廣州偏處南服，是難得號召天下；國府既由廣州遷來，那國府所在地當然只有一個武漢是最適中的地點了。這種宣傳已融成了普遍的心理，而這種心理不止一般人所同具，就是國府的主要人物也以爲理有必至，事有固然。中央到了南昌不久，所有各部長如財政部的宋子文，外交部的陳友仁，交通部的孫哲生，司法部的徐季龍，乃至孫夫人宋慶齡女士都離南昌而至武漢，在那個年頭的南昌城，只賸下一位代理國府主席譚組安。

各部部长之赴武漢，總以爲國府就要搬去的，但遲之又久，終於消息不聞，於是在武漢在南昌就發生一種傳聞，說蔣先生要把中央黨部和國府袋在荷包裡，以達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慢慢各部部长來電催促，而武漢的民衆團體紛紛來電歡迎。蔣先生見這事情已鬧起來，一夜遂在總司令部開一個政治委員會會議，以解決國府留贛或是遷漢。

當夜是蔣先生主席，出席的人們據我記憶所及的有張靜江、譚組安、宋子文、何香凝、朱益之、林祖涵、鄧擇生，和我幾個人，而宋子文和鄧擇生是由武漢趕到，彷彿代表赴漢各中委的意見。當夜會議的秘書長是葉楚傖，而司記錄之事的是今日的候補中委而爲當日的秘書狄君武。

「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是不是應當留南昌，抑或遷武漢，請各位發表意見。」蔣先生照例這樣問。

「我主張留在南昌，因爲南昌地勢很好。」張靜江先生首先發言，理由是很簡單而沒有充足的解釋。

「譚先生的意見怎樣？」蔣先生向着坐在第二位的譚組安問。

「論道理是應該遷武漢，論局勢是應該留南昌，我倒主張中央暫時留贛。」譚先生很囁嚅的說。

「各位意見怎樣？」蔣先生望着各人，似乎希望各人都發表些主張。

「我沒有意見。」鄧擇生簡單說了，沉默下去。

其時朱益之剛坐在我的下手，拿鉛筆就桌上的紙片寫了一張條子遞過來，那條子寫的是：「國民政府不遷武漢，不如還在廣州好。」

「我的意見還請國民政府撥漢口，因為要籌款，國府不能不搬漢口。」宋子文是辦財政的，語不離宗的拿着財政作口實。

「我沒有意見。」林祖涵也那樣表示。

其時已輪到我發言了。我看見譚組安那樣神態，知道國府留贛似已內定，難於挽回，但我這個人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的，我站起來說：

「這個問題是不是還可以討論？」

「當然可以討論。」譚組安趕快給我答覆。

「國民政府應當遷漢，我有幾個重要理由。第一，中國能建都之地只有北京、南京和武漢，今日北京南京沒有克復，所以能建都之地只有武漢，這是就地勢上論的。第二，我們宣傳會師武漢已久，國府當時北遷的宣傳也只有說遷武漢而沒有說遷南昌，今日國府忽然在中途留在江西，中外人士固然有點驚駭，尤其恐怕他們認爲我們無遠大企圖，致失天下之望。第三，國府的功能除軍事以外，就是外交和財政，外交和財政的功効勢不能在江西發揮。所以依着種種理由，我主張仍依原議將國府遷漢。」我見各人都不肯發

表意見，只有本着言無不盡之旨去盡量陳述。

「我沒有意見。」朱益之跟着說，雖然他的條子曾表示真意，主張國府遷漢。

「我是一個女人，不知國府留贛好，還是遷漢好。大家以為怎樣便怎樣。」廖夫人也不表示她的真意。

「多數都表示國府留贛，那麼國府就不遷漢罷！」蔣先生勉強作一個結論。

那時我再忍不住了，我再站起來說：

「我本來不想再說的，但我眼見着無數的危機。我請各位注意，如果國府不搬武漢，恐怕黨便會由此分裂。」<sup>⑧</sup>

「我不相信陳公博同志的說話，國府不遷漢，怎麼黨便會分裂？」靜江先生很自信的下他的駁論。

這個會議雖然說是討論，但實在沒有充分討論的機會，國府留贛算是決定了。我出會場時候，跟着我後邊的有鄧擇生和宋子文。

「你這傢伙，怎麼你不發表意見！」我氣極了，罵起鄧擇生。

「我反對了一天了，今夜我不願意再說。」擇生這樣解釋着。

「不要緊，如果國民政府不搬漢口，我再不給錢，看他們有什麼辦法？」子文像發牢騷的，似乎他握住了整個的命脈。

我當夜回至家中，怎樣也睡不着，我知道那時形勢很險惡，不難漢口方面就借着這個問題發難。我至早上三點鐘再也不能合眼，起來步出院子看繁星。黨立刻要分裂了，怎麼辦？我當時只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是跟武漢跑，但武漢為共黨把持，我不願意。第二條是贊成蔣先生，但經三月二十之變，我實在至今

還抱着不平。第三條是立刻辭職回廣州，但中途拋棄了革命大業，非我素意。而且摸一摸袋裡只有二十四元錢，那是我贖下來的全部財產，不要說要回廣東，連出江西省境的路費也不夠。凜冽的早風從天階上面捲下來，身上慄然有寒意，我想徒然癡想是沒有用的，大清早起來還是看看譚組安再算吧。

那夜我可算沒有合着眼，一早起來連辦公廳也不願上，先去找譚組安。我到譚先生的寓所，看見鄧擇生早在那裡，譚先生正在穿衣服，似乎剛起身，而鄧擇生也似才到的模樣。

「譚先生，你怎麼也贊成國民政府留贛？」我非常急切的，連寒暄語也不及說。

「我的困難，難道你也不知道嗎？我告訴你。」譚先生抹抹眼鏡正要帶上。

「總司令到。」一個副官入來報告，蔣先生跟着進譚先生的房間，我們都一齊截住了話。蔣先生見了我們在譚先生那裡，似乎並不驚異，很自然的坐下。

「公博先生，你看昨夜的決議怎樣？」蔣先生倒先和我說話，或者我昨夜反對特別強烈，所以特意的和我多說兩句，緩和我的情感的。

「我依然不主張國民政府留在這裡，但已經決議，那也沒有辦法，我只好服從決議。」我還是維持我的見地。

「我們決不能去漢口的。」蔣先生加重一句。

「蔣先生是不是怕共產黨？」我不客氣的直捷問蔣先生的真意。

「是！」蔣先生這次也很爽直的答覆。

這時我貢獻我的意見了，我對蔣先生說：



「共產黨實在不必害怕的，他們實在沒有什麼力量。我舉一個例，譬如我在武漢的當時，共產黨只有一個禿頭的總工會，底下沒有一個工人。他們爲要找力量，所以拚命鼓動罷工，以爲工會罷了工，一定找人幫助，一定找到了總工會，他們吸收工人的方法，不過如此，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我爲維持秩序起見，會找到了他們的負責人劉少奇，問他國共還合作不合作。如果還是合作的話，他們應當馬上停止不合理的罷工，如果不合作的話，我另外有適當的辦法。經我那次鎮壓，武漢的罷工風潮馬上低落下來了。我一個人在武漢對共產黨還有辦法，若整個國民政府搬了去，那辦法更多了。所以我以爲要鎮壓共產黨，不止國民政府要搬去，就是總司令部也要搬去。」④

「現在我們既經決議，也不必再反覆了，但國府不遷漢，以後我們怎樣宣傳？」蔣先生沉默一下又問我的意見。

「我們以後的宣傳只有說等取得南京，再搬南京便了。因除此以外，很難再說別話。」我提出一個不得已的提議。

大家對於我的提議算是贊成，我見蔣先生還似有事和譚先生商量，我和鄧擇生就辭了他們先走。

到夜裡九點鐘譚先生來了一個電話，說他要過來我家談天；那時組安先生一星期內倒有兩三次到我家夜談，他是一隻夜鳥，每談必至早上三四點鐘才走。他的談話真是上下八千年，縱橫九萬里；那時的南昌實在太寂寞了，除了夜談，找不出別樣的消遣方法。

「譚先生，你今早對我說你有難處，實在你的難處在什麼地方？」我在閒談中，陡然憶起他早上未盡之意。

組安先生那時有點興奮，引開他的話頭，便滔滔不絕的說：

「你不知道，我也犯了嫌疑了。照理論說國民政府當然要搬武漢，照情勢說我倒不反對留在南昌。你知道嗎？後方許多人都在反對張靜江，靜江很怕去漢口的。如果我主張搬漢口，倒有兩層不便，若他們反對張靜江，我沒有方法替他辯護，結果不是形成擁護反張的惡劣形勢嗎？而且我若堅持主張國民政府搬武漢，介石不難要懷疑到我要和他分庭抗禮，對立起來。」

「難道憑你的本領，說不服一個蔣介石和張靜江？」我以為組安太怕事。

「哈，你還不知道靜江呢！介石是做了錯事不肯認錯的，而靜江就以爲他所做的事根本不會有錯。⑩他的脾氣又倔強，又無理。我告訴你一段笑話罷，不久以前，我們在牯嶺閒談時，談及牯嶺的高度，在座還有黃膺白。本來牯嶺的高度超過海拔五千尺，這是在遊覽書載得很清楚的，但張靜江總以爲靠不住。黃膺白是一個學測量的，他還傻頭傻腦的和他爭執，反覆說着什麼三角，什麼幾何；張先生更是一個不信科學的人，始終以爲什麼都靠不住，我忍不住便和他開玩笑，說：

「我有一個辦法，叫一個人用幾千尺的繩子，從牯嶺脚下拉起，拉到山頂，那一定準確了。」

靜江說：「這是斜的不是直的，還靠不住。」

我說：「既是這樣，頂好由山頂打一個直洞打到山脚，那一定準確。」然而靜江也說辦不到，你想他是這麼一個人，誰能和他講理呢！」

組安先生說完之後，禁不住嘆口氣。因爲談到靜江先生的問題，我們的談鋒便轉到他私生活一方面去，談到他在巴黎的浪漫，談到他在上海的豪奢，我突然發一個奇問：

「靜江先生是跛子，走路也要人抬，他怎樣和他的姨太太睡覺？」

「靜江雖然不能動彈，他的尊夫人就不能移樽就教嗎？」譚先生像發現了一件奇跡，很樂。

「移樽就教」一個名詞太語妙天下了，逗得我大笑起來，那夜緊張的談話，就在輕鬆的空氣中消散。

.....

贛漢對立的空氣一天緊張過一天，在江西方面張靜江先生依然倔強不讓，而在漢口方面則孫哲生和徐季龍儼然掀起反蔣的大旗，這自然是共產黨在其中曲盡了他們挑撥的能事。在蔣先生這邊也知道反蔣的不止共產黨，但他不好正面攻擊，希望打擊共產黨即所以鎮壓反蔣的隊伍；而在武漢方面，却也不直接攻擊，藉口張靜江做了中常會主席的緣故，高呼着請張靜江交還黨權給中央。我們勸蔣先生不妨再至武漢一行，或者藉此免得分裂。蔣先生終於一天到了武漢，那裡自然也照例開了一個歡迎大會，但大會場中少不了有許多蔣先生所不滿意的口號和標語出現。末後蔣先生和鮑羅庭辦過一次直接交涉，任翻譯之責的是宋子文，他們爭論了許久，鮑羅庭最後對蔣先生說：①

「你想衆人都不說話是不可以的。我告訴你一件故事罷，古時西方有一個國王極討厭各大臣說話。有一天他對着各大臣說：『你們說話太多了，我不喜歡。』各大臣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陛下要我們不說話，只有找狗去。』」

鮑羅庭的說話太挖苦盡致了，蔣先生聽了這段故事，遂決意要驅逐鮑羅庭。他回至江西，在路中上了牯嶺，提出驅鮑問題，當時張靜江自然贊成，而戴季陶和鄧擇生都極力反對。戴季陶勸蔣先生不聽，回到寓所大哭說：「完了，完了。」而鄧擇生那夜也大喝其酒，借着酒醉，大哭了一夜，翌早趕回武漢，大約

反蔣的決心也在那夜下了。這一段秘史也是譚組安告訴我，因為我那時正在南昌處理政務，不能分身到牯嶺，雖然鄧擇生有過兩次急電請我去。

那時南昌和武漢儼然是對峙着兩個中央，在南昌有中央黨部，而在武漢則有聯席會議。剛巧照規定，每至三個月中央黨部應該召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因為北伐軍事，第三次全體會議已延了很長的期，於是武漢方面遂請求召集三中全會，間接促成國府遷漢。蔣先生以反蔣空氣濃厚，恐怕開會期中有不利於他的決議，堅持不開，而聯席會議則更振振有詞，說蔣先生挾持中央，違反黨意，竟直不問江西的意思，打算直接在漢口召集。

時局真是緊張萬分，蔣先生叫我一個人先往刺探武漢各人的意見。然而各人的意見那裡刺探起，鄧擇生是迷糊了，徐季龍是給共產黨操縱了，我想還是先見了宋子文，孫哲生，和顧孟餘罷。因為我想宋子文和我有相當交誼，或者這次肯說老實話。孫哲生是上海三民主義學會的後台人，自然不會和共黨站在一條戰線，而顧孟餘呢，比較中立，也與共黨積不相容。<sup>⑫</sup>我的船一到漢口，我便到中央銀行，一入門口，正見宋子文蒙着頭出來坐汽車，他說正在發大熱，要到法國醫院醫病。我和他一起到法國醫院，我問他怎樣意見，是不是國府不遷漢，黨便要分裂。宋子文這位先生素來都難得說實話，只有他探聽你意見，如果你要打聽他的意見，他總含糊其詞。而且這天他正在病中，看他顏色，實在真正發熱。他一到醫院便睡在床上，趁看護士把探熱針擱在他的舌底時，只是把頭搖，連說：「太壞了，太壞了 Too bad, too bad。」怎樣壞法，怎樣補救，他似乎沒有意見，並且也表示不出意見。

我沒有辦法，跑去見孫哲生。

「局面太壞了，我們應該想出一個辦法。我現在急於要知道的，這裡局面是不是給共產黨操縱？」我開門見山的說。

「那裡干到共產黨的事，這是國民黨本身的問題。蔣介石這樣把持着黨，終有一天要做皇帝了。」<sup>⑬</sup>孫哲生跟着滔滔不絕的發揮他的主張，說國民政府必須遷漢，才能表示蔣介石服從中央，才能免去黨的分裂。

反共的大將也這樣，大概真不是共黨把持罷，於是我又找顧孟餘。孟餘的議論竟直和孫哲生相同，說唯有國府遷漢，黨才免得分裂，不過他又提起三月二十之變，說：

「蔣介石天天說要請汪先生回國，都不是誠意的。」<sup>⑭</sup>

「這怎麼說？」其實我在李家樞已知道蔣先生的真意，祇是蔣先生後來對人說，等軍事告一段落，即當迎汪。

「最近李石曾的侄子才告訴我的。介石以前對我說要請汪先生回國，我也信以為真。最近石曾的侄子告訴我，說介石打聽汪先生在歐洲的住址，還託石曾設法阻止汪先生回國。」

我在漢雖然僅僅見過三個人，然而我到武漢的消息却早有人報告各機關了。入夜詹大悲和李漢俊跑來見我，並詢問我的主張。大概這兩個人多少有點偏袒共產黨的，他們的言論又較孫哲生為激烈。我們爭論了半夜，我終懷疑他們受了共產黨的操縱，而據詹李的解釋，則侈言他們的行動與共產黨無關。

「好！就是這樣罷。如果你們不受共黨所左右，縱使國府不遷漢，我也來漢口參加三中全會。」我作一個辯論終結的論斷。

那夜我反覆睡不着，不過我得到一個結論，國府遷漢，他們自然召集三中全會，國府不遷漢，他們也一樣的召集三中全會。<sup>⑮</sup>祇是國府遷漢，召集全會是由中央主持，這樣分裂或者可以稍遲，或者加些人力，可以彌縫罅隙，不至破裂。如果國府不遷漢，他們一集會即是立刻分家，在南京未下而先破壞革命的力，這是我十分不願意的。我當時還有一個癡想，以為蔣先生可以服從多數，不至自立中央，仗着我的誠意，或者可以勸他遷就環境。

回至南昌之時，未向蔣先生報告，我先見譚組安，我把武漢的情形和孫願的談話，以及我的判斷統統告訴他。

「譚先生，我們所慮的危機已到了！這樣怎麼得了呢？」我在判斷之後，忍不住嘆氣，以為他經驗深，或者可以給我一個內心的解救。

「你說怎麼得了，又怎樣才算得了呢？」譚先生雖然有些着急，但或者這是他的一種經驗。

「不是這樣說，不得了，應該想出些辦法。」我真急極。

「得了也就這樣了，不得了也就這樣了，難道得了真就這樣了嗎？不得了真就不能了嗎？」譚先生提出他的經世哲學，末後更嘆說：

「公博，你到底還是年紀輕，中國的事往往到了不得了的時候，終歸會了的，若勉強想去了，反而不能了。」組安像已表示聽天由命，「你的打算怎樣？」

「我的打算麼！」我決心說，「我打算苦勸蔣先生服從多數，免得馬上破裂，或者乃至於不分裂。如果蔣先生不聽，我只有請求他把我扣起來，否則我一定到武漢。」

「我佩服你有這決心和勇氣，我得幫忙你去勸蔣先生。」譚先生這時也鼓起少年時代的勇氣。

夜裡我們兩個人去見蔣先生，那時廖夫人因病住在蔣先生的總司令部，我們都一齊加入討論。其時武漢方面已經對蔣先生公開批評，我力陳國府遷漢可以免得馬上分裂，待過了這個危機然後再想辦法；我更勸蔣先生通電服從中央，免得反對者得以藉口。經過長時期的討論和苦勸！蔣先生叫我代他起草通電的文稿，並決定國府遷漢。

譚組安說蔣先生不肯忍錯是實在的，他於第二天夜裡請我們食飯，說他雖然通電服從中央，但非他的本意。並且在南昌開了一個歡送國府遷漢大會，他出席演說，說國府不怕遷漢的；其實這種意氣的話是沒有多大理由，當時黨的分裂，雖然有種種原因，可是那些不負責任和意氣的說話和行動，也是促成分裂的因素。

自我離漢回贛之後，武漢的中央日報更登載了許多不滿蔣先生的消息和文章，內中並有一段消息說是我的談話，謂蔣先生近來對張靜江已不信任。其實這段話是有的，不過祇是私人的談話，因為那夜詹大悲和李漢俊大罵蔣先生過信張靜江，我為替蔣先生辯護，所以輕輕說這一句，他們便拿來登報。這一句話害得張靜江先生在國府離贛那一天還在過江的船上質問我，弄得我沒法答覆，祇是我專為排解而非為挑撥，到今天我的心裡還泰然，沒有對不起張先生的地方。

蔣先生大概也知道許多人不便到武漢，把中央黨部的秘書長葉楚傖換了李仲公，把代理組織部長陳果夫換了我，至於張靜江先生自然是留贛不行，我之所以改任組織部，其間蔣先生也一半採納了王樂平和路友于兩位的建議。<sup>①</sup>

黨的糾紛氣息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在南昌還不覺得什麼，我們到了九江，街上已遍掛白布標語，請蔣總司令交回黨權。我當時實在有些氣憤，以爲我好好的已調解了一邊，而那邊又那樣的過火。其實我當時確是熱誠，也實在太傻，兩方面都似乎聽我的勸告，其實在內裡大家已在動員。在蔣先生這面，大概還本着「我不要兩湖了」的決心，極力經營着長江下游的軍事，打算另創新局。在武漢那面，則設法拉攏軍隊，開始清除在漢的蔣系親信人。獨有我這個清白無瑕的傻瓜，還極力彌縫，希望黨不破裂。

我們的船剛抵漢口，譚組安已被一羣人在「歡迎譚主席」聲中擁上岸去，我和廖夫人正待登岸，朱紹良先生已鑿上船來。朱先生是當時武漢行營而兼衛戍司令部的參謀長。

「陳真如在昨夜走了。」朱先生低聲對廖夫人和我說。

「怎麼一回事！」我看分裂已在臨頭。

「我也不大清楚。昨夜唐孟瀟把真如請去，要他表示態度，否則立刻請他離武漢。他回家之後，連煮好的鷄粥都來不及食便上了一條船走了。」

「他走到那裡？」我對真如很關心。

「我也不知道。」朱先生說畢也走了。

本來在我們離贛之前，恐趕不及會期，會電請武漢延期開會，但我們到時，開會典禮已在頭一天舉行了。那種分裂的形態已很顯明，武漢方面以爲照他們的辦法，可一舉而使天下大定。譚組安還沉着。大概這種情形早在他意料之中，而廖夫人呢，她既捨不得共產黨，又捨不得蔣先生，一肚子牢騷，無可發洩，



只有把陳其瑗出氣。那位陳其瑗先生被舉爲大會的秘書長，他當日被目爲屬於孫哲生系統而接近共產黨的，廖夫人在大會大哭且罵，說他是帝國主義走狗，不應做大會秘書長，硬生生把他扯下來，另外由大會舉了我。至於我個人已經大不滿意，但到了這個境地，還極力沉住了氣，癡心還以爲且耐着心等候，或者時聞會告訴他們的錯誤，能盡我一分力量補救，終要設法補救。

三中全會在他們預定計劃之下草草完成，<sup>⑯</sup>我由組織部長跳到了工人部長，這又是共產黨的計劃。此外大會又通過一個土地委員會，那算是大會的結晶品。其間最無聊的要算增設了兩部，第一個是實業部，任命了孔庸之，第二個是衛生部，任命了劉瑞恒，我問主席團爲什麼增設這些目前不需要的部。

「這是目前的需要啊！」孫夫人微笑而溫婉的用英語答我。

經這次天翻地覆的風潮，我真有點冷然。在那次大彩排中唱大軸的，自然以孫哲生和鄧擇生是兩顆亮晶晶的明星，他們真是興高彩烈，而我倒是心平氣靜。

那時候兩廣已醞釀着清黨，<sup>⑰</sup>武漢也開始了警戒。正在開會的期間，新任中央黨部的秘書長李仲公突然被捕。李仲公原任總司令部代理秘書長，被認爲蔣先生的親信，我雖然和李先生說不上友誼，但爲打不平起見，向唐孟瀟和鄧擇生提出抗議，如果他們不釋放李仲公，我即立刻離開漢口，經過兩次的抗議，李先生算是開釋了。

「汪先生就快回來了。」這一個消息在各人的耳邊都模糊聽見，然而並非公開的宣傳。我也不知汪先生在於何時真回，及由何地而回，但鮑羅庭和鄧擇生諸人是知道的，因爲汪先生是由法國經莫斯科回國；我那時大概被認爲袒蔣，至少也是中立的，所以一般人對於我，不大通知他們認爲重要的消息。

四月中汪先生真是到漢口了，他是從上海來的，坐了一隻海關的差遣船。那天我們正在武昌的大較場開會，會畢出城到碼頭，汪先生的船剛開抵武昌，及至知道中央黨部不在武昌而在漢口，原船又折回北岸。「汪主席回來了」的歡聲立時傳遍了武漢，而南京的國民政府也在那時正式成立。<sup>19</sup>

在武漢三中全會閉幕之後，在白健生和何敬之指揮之下的軍隊已由浙江襲取了上海，江左軍的李德鄰和江右軍的程頌雲也聯合了襲取了南京，蔣先生經由蕪湖而至南京，而且到上海了。由汪先生帶來的消息，說在上海已見過蔣介石和李白諸人，就是留守廣州的李任潮和廣西的黃季寬也都公開的或秘密的到了上海。蔣先生向汪先生的要求是要把國民政府遷南京，同時分共。而二李和白黃向汪先生的要求，是只要汪先生答應分共，對於蔣介石可以請其下野。汪先生對於那時分共是猶豫，以為國民革命正在進展，不妨緩一步。對於請蔣下野，為表示他的態度，也不贊成。但他以為國民政府遷南京是應當的，這次由上海至漢口，是預備把這問題向中央提議，如果做不到，他準備在二十二日再到上海。

大概汪先生因不肯立刻分共，所以非想出一個調停辦法不可，因此和陳獨秀聯名發表了一篇宣言，這篇宣言據汪先生後來對我說是奉中央的命令發表的，但我那時不是常務委員，事前並不知悉。<sup>20</sup>這篇宣言一出，蔣先生和各將領均認汪先生袒共，如果國府搬至南京，那更麻煩，所以不待汪先生在中央提議和答覆，提前在南京成立別一個新的國民政府。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當日也是有聲有色的。先由監察委員會提出對於共產黨的彈劾，說武漢完全由共黨把持，彈劾文的領銜人自然是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幾位老先生。南京接到這個彈劾文，遂依據以成立政府，胡展堂先生在上海被請出來當國府主席，而江、浙、皖、閩、川、和兩廣，立刻舉行清黨。

南京既有了政府，所謂國府遷寧之說，汪先生已不能向中央提議了。武漢這面被這消息激動，大家都憤怒異常，照例又是孫哲生提議開除蔣介石的黨籍，自李仁潮以下都有嚴重的處分。兩方面都實行清黨，可憐一般青年就這樣有許多死得糊裡糊塗，不明不白。

所謂左傾和右傾的青年自然是橫被屠殺，而中立的也披着莫名其妙的嫌疑。汪先生經過莫斯科之時，第三國際的當局告訴他回國之後，有三個人應該注意。那三個呢？就是顧孟餘、甘乃光、和我三個人。我不知共產黨怎樣作成我的罪狀，但顯然我在漢口是被注意和監視之一。<sup>②</sup>

其時最苦悶的算是一般中立的人們。所謂中立，並不是不作左右袒和置身事外，實在對於兩方的過火都看不過。平情而論，那時分裂，與其說是具有理由，還不如說是激於意氣。蔣先生如果按着原議早把國府遷漢，必不至激起國民黨內的反蔣風潮。及至蔣先生通電服從中央，如果武漢不迫走陳真如，耐心幾天等中央遷漢才開三中全會，也不至使南京方面馬上清黨。<sup>③</sup>再則汪先生不和陳獨秀聯名發表宣言，各方將領還會耐着等候汪先生遷都南京的提議。而南京能夠多等候兩三日不成立政府，俟國府遷寧，那麼分共也不使到黨內自相摧殘。<sup>④</sup>那是歷史的命運吧！我無以解釋，只好那樣感嘆。

寧漢是正式分裂了，以後各人都在苦悶中渡過無聊的時光。不過當時還算好的，兩方都不相對用兵，南京正在取徐州，而武漢也出兵攻河南，後來寧漢能夠復合，大約還靠這一點生機吧！

## 第五章註釋

①有關蘇俄支持中共加入國民黨，並主張中國應首先完成國民革命，這一方面的文獻甚多，可參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頁九四至九八，及一〇四至一〇八；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香港中文圖書供應社，一九七四至七七年，第一編，頁八至十，及九二至一〇七；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頁四九至五一；C. Brandt, et. al.,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59), pp. 51—54 and 67—73; Wilbur and How, *Documents of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p. 61-62; H. C. d'Encausse and S. R. Schram, *Marxism and Asia*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p. 52—53; Leong Sow-theng,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6* (Hawaii and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32—235.

②斯力佛歷 (Sneevliet)，別名馬林 (Maring)，生平可見於陳公博：「我與共產黨」載於「寒風集」，頁甲二一七至二一九。其他有關斯力佛歷的事跡，參看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九二至九六；李雲漢，前引書，頁六六，九四至九六，九九至一〇三，及一〇七至一〇八；鄭學稼：「第三國際興亡史」，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四年，頁一二七至一二八；Leong Sow-theng, pp. 228—236; C.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8—41; Dov Bing,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 of the CCP," *China Quarterly*, 48: 67—97 (1971)

③孫中山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而同月二十五日蘇俄代表越飛（Joffe）亦派人與孫氏接觸，討論蘇俄與中國國民黨合作事宜，至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與越飛簽署「孫中山與蘇俄特命全權大使越飛聯合宣言」（簡稱「孫越宣言」）。此宣言之原文可見於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九七；李雲漢，前引書，頁一四五至一四七；C. Brandt, et. al., pp. 70—71; Wilbur and How, pp. 140—143.

④關於中共自己的宣傳及針對國民黨的反宣傳，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二九五至三〇二。而當時的工農運動概況可見於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天津，知識書店，一九四九年；Chesneau,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Wilbur and How, pp. 375—381; G. W. Berkley, "The Revolutionary Peasant Move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1924—1927"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6).

⑤關於譚延闓，李宗仁有以下的一段回憶：「譚延闓翰林出身，久歷官場，為人極端圓滑。」見「李宗仁回憶錄」，「明報月刊」，第一四七期，一九七八年三月，頁六三。

⑥關於寧漢分裂前之反蔣汪運動的記載，參看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二六六至二六八；李雲漢，前引書，頁五二五至五三〇；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三一，七四至八一及八六；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五年，頁四八至五一；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頁五五三，及五六七至五七三；T'ang L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260—263; Wilbur and How, pp. 371—372 and 388—393; Wu Tien-wei, "A Review of the Wuhan Debacle,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plit of 1927," *Journal of Asian Stu-*

*diess*, 29, 1: 126 (1969—70).

⑦唐生智到達武漢之後，擴充其第八軍為四個軍，李品仙、何健、劉興、葉琪等師長均陞為軍長，實力大增，參看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明報月刊」，第一五〇期，一九七八年六月，頁一三五；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頁八二及八七。

⑧關於國民政府應否遷往武漢的爭論，可參看李雲漢，前引書，頁五三〇至五四一；雷嘯岑，前引書，頁五二至五五；中國青年軍人社編：「反蔣運動史」，頁十六至十八；張國燾，則引書，第二冊，頁五七一，五七七至五七八；蔣永敬，前引書，頁三五；Wilbur and How, pp. 383—384.

⑨單從這裡觀察，陳公博本人實有低估共產黨在武漢一帶工農運動的勢力，但陳公博在「我與共產黨一裡補充說：「……雖然經過我（陳公博）那樣詞嚴色厲，罷工之風稍戢，但共產黨要擴張勢力，依然抓羣衆，抓軍隊，兩湖的鄉區，共產黨更開始沒收土地，共產黨的勢力，真足以傾倒政府。」見陳公博：「寒風集」，頁甲二四九。關於陳公博之主張北伐軍總司令部亦應該遷武漢一事，見陳公博「軍中瑣記」，載於「寒風集」，頁甲一五三。而有關中共在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概況，參看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四一〇至四二〇；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五五三至五五九，六一六至六一八；Chesneau, pp. 187—201, 211—233 and 319—344; H. R.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130 and 221—237.

⑩關於蔣介石的性格，據李宗仁說：「……不過我（李宗仁）知道蔣先生的個性極強，遇事往往知其不可而爲之。……蔣先生總喜歡遇事蠻幹，一味執拗，不顧現實。……蔣先生這種個性可說是他個人成功的

因素，也可說是國事糟亂的種子。」見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明報月刊」，第一五一期，一九七八年七月，頁八七至八八。

⑫ 蔣介石曾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從南昌到武漢一程，逗留至同月十八日才離開，事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五三六至五三八；蔣永敬，前引書，頁三六至三九；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五七七；Wilbur and How, p. 383。

⑬ 有與此處相若的描述，見陳公博：「軍中環記」，載於「寒風集」，頁甲一五二至一五三。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上海出生。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學生，為建立中國現代財政制度的先驅者。曾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財政部長、行政院院長、中央銀行行長及外交部長等職，詳見 Boorman, III, 149—153。孫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字哲生，廣東中山人。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八年任立法院院長，後任行政院院長凡四月。其後旅居法國與美國，一九六四年回台灣。見 Boorman, III, 162—165。顧孟餘（一八八九——一九七一）原名兆熊，河北宛平人。德國留學生，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一九二四年加入國民黨，追隨汪精衛。一九四九年後，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運動。五十年代中期赴美國重新學術生涯。見 Boorman, II, 252—255。

⑭ 當時在共產黨發動反蔣的宣傳中，強調蔣介石是把持着國民黨來實行獨裁，見「反蔣運動史」，頁十八至二十一；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五六一。而在當時孫科正是反蔣最激烈之一人，見 T'ang Tsang-li, p. 143。

⑮ 關於蔣介石是否有誠意請汪精衛回國復職，史家意見不一，認為蔣氏是誠意的，見蔣永敬，前引書，頁

七六至七七；李雲漢，前引書，頁五二七至五二八；而蔣介石自稱自己是誠意的，見雷嘯岑，前引書，頁五四。另一方面，至於以為蔣介石迎汪精衛回國是另有原因的，其論點有（一）：認為蔣介石欲汪歸以制共產黨，見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二六六；（二）：認為蔣介石是受環境所迫，而欲汪氏回國以驅走鮑羅廷，見 *T'ang Leang-li*, pp. 260—262. 另外可供參考者，見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五八九；*Wilbur and How*, p. 387.

⑮在武漢方面，鮑羅廷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用臨時聯席會議名義召集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即三中全會），又於同年二月二十一日之擴大聯席會議中重申於三月一日召集三中全會於武漢的決定，後延至三月七日在漢口舉行三中全會的預備會，而於三月十日三中全會於漢口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樓正式揭幕（陳公博所記三中全會在三月十二日揭幕，實誤。），三月十七閉會。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五四一至五四五；蔣永敬，前引書，頁一二五至一五一；雷嘯岑，前引書，五六；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二五三。

⑯王樂平亦是後來粵方委員之一及改組派成員，見「苦笑錄」第八章，註釋⑥及⑧。而恰巧王樂平和路友于皆是被殺的，前者在一九三〇年被暗殺，見 *T'ang Leang-li*, p. 362. 後者則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張作霖所殺，見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六〇三。

⑰武漢政府的各項議決案內容，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五四一至五五八；蔣永敬，前引書，頁四六至五〇；雷嘯岑，前引書，頁五六至六四；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二五三至二六三。

⑱兩廣的清黨經過，見李雲漢，前引書，頁六五五至六六〇；蔣永敬，前引書，頁一六四至一六五；王健



民，前引書，第一編，頁三〇八至三〇九；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六〇二至六〇三。

①⑨ 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見李雲漢，前引書，頁六三〇至六三四；蔣永敬，前引書，頁一六六至一七二。

②⑩ 該篇宣言全文見蔣永敬，前引書，頁八〇至八一；雷嘯岑，前引書，頁六五至六七；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二六七至二六八。

②⑪ 武漢方面迫走陳銘樞（字真如），事見雷嘯岑，前引書，頁五五；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五九〇至五九一；「反蔣運動史」，頁二三；蔣永敬，前引書，頁十四、四三至四四及六〇；李雲漢，前引書，頁五四一至五四二及五七四；Wilbur and How, p. 531, fn. 131.

②⑫ 汪精衛和陳獨秀所發表的宣言，參考註②⑩。而陳公博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亦說：「實在在那年（一九二七年）三月，如果蔣介石先生肯聽我的勸告，早由南昌移駐武漢，必不至有三中全會的劍拔弩張，寧漢也不至於分立。如果在汪先生回國之後，介石先生不急急先成立南京政府，國共問題早有解決方法，也不至於有寧漢的對立。」見陳公博：「寒風集」，頁甲二五一至二五二。而另一位史家則認為汪氏之與陳獨秀聯名宣言者，是因爲汪精衛欲得共產黨的支持，以增加其本身的政治本錢，見 Thomas C. Kuo, *Chen Tu-hsiu (1879—1942)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outh Orange;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57—158.

## 第六章說明

照陳公博所說，武漢分共的原因有四個：第一是共產黨在兩湖地帶所推行的工農運動過激；例如土地委員會的設立，沒收地主土地，及引動農工的暴動，結果導致軍隊的反對，引起馬日事變。而以陳公博、譚平山和鮑羅廷所組成之調查團，亦因事態嚴重，未能成功的作出對該事件的調查。

第二是軍事的环境。當武漢出兵攻打河南的時候，四川方面的楊森及武漢以東的夏斗寅等却進兵威脅武漢。而更自鄭州及徐州會議後，北面有一個不穩的馮玉祥和東面有蔣介石的威脅；再加上武漢方面軍隊過於龐大，收入不敷支出，遂有往長江下游東征之議，而東征亦先要分共才能成行。

第三、武漢在經濟方面亦極爲衰落。湖南省已爲唐生智的食邑，而江西又給了朱培德，湖北的特稅（鴉片烟稅）又短少，雖然武漢政府曾作出所謂現金集中計劃來挽救它瀕於崩潰的經濟，但最後亦因種種原因以致失敗。

第四、外交方面武漢政府亦受到各外國的排斥。首先是南京事件的發生，蔣介石却將該責任推在駐在南京的程潛軍隊和共產黨上，而以程潛當時是附武漢的，共產黨又集中在漢口，再加上當時武漢工人對於外人所設工廠的態度特別苛刻嚴厲，種種因素都引致各國反對武漢的政府。

除了上述各項原因外，留在武漢的國民黨要人的態度亦開始轉變，首先是孫科和徐謙二人，跟着就是朱培德在江西發動分共行動，以當時武漢政府以朱氏握守江西來監察南京方面的軍隊來說，朱培德的行動委實是一個重大打擊。

再者，在第三國際的代表路易交與汪精衛的一封密件裡，顯示出共產黨欲建立一支三萬人的農工軍隊來反對國民黨。汪氏認爲此行動實是共產黨顛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鐵證，故此，武漢分共之議遂成爲事實。

分共之後，武漢方面即發動東征的計劃，以唐生智爲總司令，何健則領江左軍，程潛和張發奎等則率江右軍開始向南京推進，唯於八月一日南昌發生共產黨的叛變，賀龍、葉挺等帶走了張發奎部份的軍隊，此事遂使武漢東征的計劃遭受莫大的打擊。

正當此時，南京方面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亦受到張宗昌、孫傳芳的脅迫，遂有邀請武漢方面的同志合作之議。當然這一決策給予蔣介石很大的壓力，最後蔣介石惟有宣佈下野，胡漢民亦被迫走上海。寧漢合作後，雙方即揮軍合攻張宗昌等，遂有大敗奉軍於龍潭之役。

在政治方面，寧漢滬三方面之主要負責人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成立特別委員會於南京，汪精衛本人以在特別委員會中沒有確定的領導地位而出走，遂有以後陳公博及粵方委員會等反對特別委員會的行動。

## 第六章 寧漢合作與特別委員會

民國十六年下半年武漢也分共清黨了，這是寧漢合作一個好題目，也是寧漢合作一個好媒介。

武漢爲什麼也分共？綜合起來有好幾個原因，我想也像描述寧漢分裂一樣，按着一段一段的理由寫下去。

第一，共產黨素來自稱專用辯證法來分析事物的，可是對於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始終沒有找到它的真實性。三中全會的所謂土地委員會，就是中國共產黨觀察中國錯誤的一個結晶。①在共產黨以爲中國革命應從土地革命起，成立這個委員會專用以爲解決土地問題。寧漢分裂之後，武漢是以鄧擇生爲中心的，湊巧他去過一次德國，看了德國卑士麥所遺下的社會政策，他便把德國的土地法規和共產黨的理論混爲一談，特別熱心於土地問題，深想先在兩湖來一個土地革命，取得農民的擁護，使南京不攻自倒。這個委員會的主任是譚組安先生，固然他不過是名義上的主任，但他對於各委員也未嘗不發生些有力的影響。你想組

一連的士兵沒有一個贊成沒收土地的主張，或者因爲他的伯伯叔叔的土地被沒收，或者因爲表伯表叔的土地被沒收，甚而怨恨到他的表叔的表叔的土地被沒收。只有一個士兵不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我追問這個士兵的來歷，他告訴我，他自從十四歲便離了鄉村，和家內任何人沒有通過信。

因爲土地的沒收，於是乎有長沙所謂馬日事變了。那是夏天某一個月的二十一早，由長沙一個團長叫許克祥的首先發難，閉城搜捕共產黨。這個消息傳到武漢，當夜便開會研究對付辦法。方法是什麼呢？不過是撫剿兩途，譚組安首先提出撫的方法，討論結果，還派鮑羅庭、譚平山，和我三個人去長沙一次，半說降，半調查。④唐孟瀟更以爲此去須要一個和各將領相熟的人去說項，因此約了從前的湖南教育廳長周鰲山和我們一起去。

事情真是那麼簡單嗎？許先生僅是一個團長如何敢發難，當然背後還有人。如果他背後沒有人，一團人有多大能力，只消一鎮壓便可以平復，何至於要用撫。許團是何芸樵先生的部下，何先生是著名復古的，恐怕何先生和其他將領都有關係，唐孟瀟也難保不同情；祇是我在會議席上不好說，而且既派了我往長沙，倘使我不去時，大家必以爲我胆怯，明知事無結果，只好跑一趟再說罷了。

二十二夜我們一行人由徐家棚上火車，剛抵湖南境，突然有幾聲鎗聲從田野飛來，車便軋然停止。我落車詢問，說是放步哨的兵士要停車問話，我們的車從那裡來？坐車者又是什麼人？我心內明白，湖南全境已在戒嚴，我只告訴他們坐車的是我，不好說鮑羅庭和譚平山在車上。車走得那樣慢，而又爲了戒嚴耽擱，抵岳州時已夜裡一時，看看難得趕長沙了，並且既到岳州，離長沙已近，也應該打聽長沙的情形，才好前進。我向鮑羅庭提議，暫時我們宿岳州一宵，明日再動程，大約鮑先生心內也漸漸明白，不假猶豫的

同意。

岳州情況還安靜，雖然全城佈滿了哨兵。該地警備司令是一個旅長喚做周磐，我是不認識的，而周鰲山倒很相熟。半夜裡找到周旅長，問問長沙情形，當夜便找了一個旅館歇宿。大清早周旅長便來旅館，說長沙連日開會，並且已成立一個清共委員會，看來這種情形，鮑羅庭是不好去的。但同時我們又得到一個報告，說就是周旅長也不時和長沙通電話，不要他們清共清到了我們。我是不要緊的，但鮑羅庭和譚平山兩個人怎樣處置？倘若發生了不測，我實在難對汪先生，雖然我對鮑羅庭也不滿意，但既然回來，我也應負起他們安全之責。我想鮑羅庭還是回武漢爲妙，一面不等他們同意，吩咐機師先將機頭調北方，一面把我的意思告訴鮑羅庭，誰知他倒慨然允諾，並且立刻要走。我說那用不着，因爲周旅長還要請夜飯，如果立刻離岳，太表示狼狽了。

食過了夜飯，鮑羅庭便和譚平山就由飯館直接上車回武昌，我和周鰲山依舊留宿岳州，希望明日得到長沙的實況，再往前進。夜裡周旅長又來，說長沙知道我們在此，曾打過幾次軍用電話來問，他的意思最好我們不要住旅館，萬一長沙方面真派兵來要人，他實在不好對付。我心內知道這位周先生不願得罪任何一方，而且更替長沙一班先生對我們擋駕。周鰲山先生平素本來是志大言大的人，到了這時也有點張惶，周旅長走後，他對我說：

「公博先生，我們避開罷。」

「鰲山，請你不用着急，若周磐要拿我們，隨時都可以拿，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只要我們不去長沙罷了。」

「不是這麼說，我是湖南人，你是一個客。如果發生岔子，我實在對你不起。」鰲山像懇求的說。

我知道鰲山担代不起了，我只有聽他的意見去住他的親戚家中，鰲山是一個道地的岳州人，恐怕他的親戚在岳州的就不少。岳州我是到過的，但我沒有遊過，更沒有住過。那夜我倒嘗嘗湖南楠木大床的滋味，湖色的羅帳，垂穗的流蘇，睡在那裡，倒舒服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們更逛岳陽樓，那次北伐，僅是路經此地，站不住腳便走，到了此時，才有工夫一覽洞庭君山之勝，更在岳陽樓上泡了一壺君山茶，我無聊起來，作了一首小詩：

「蕩漾湖光映早暉，君山輕似片帆微，危樓縉盡烟波意，欲破浮雲天外飛。」

下樓時周旅長又追踪而至，他說長沙的情形很混亂，似乎不可再去，勸我當日回漢口，如果我們同意的話，下午將有一班火車從長沙開來，那麼夜裡可以回到武昌了。他的來意，我們早已明瞭，我們除了答應，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到了下午周旅長還誠懇懇的來送車，自此一別，我們直至二十四年才再在南京見面。這次調查長沙馬日事變，就這樣空手回武漢了。

憑那各地的農民暴動，已夠使國共分家了，但共產黨除了煽動農民之外，還正在用全力煽動工人。武漢的總工會照例不讓國民黨參加，而且奉命擁有自衛的槍械、步槍、駁殼鎗、手鎗，色色俱備；罷工不能解決，工人拿武器威脅僱主和監禁僱主更是常事。武漢固然是中國一個工業中心，但所謂中心者，不是工業集中於武漢的意思，而是地勢上佔在長江流域中心的意思。它的工業發展，自然比之上海和天津相差甚遠，因此資本家的力量又連帶的比之上海和天津相差甚遠。工資加到工業不夠成本，工廠慢慢都關門，更有強項而狡猾的資本家，把餘資捲逃到上海各地，讓工人佔據了工廠自生自滅。

經濟衰落的影响不止及於工廠，一直捲入中等商的店內，店員工會天天煽動店員和店東作對，所有店東寧願停業也不願開門；那時學徒也反起來，有一些不滿意事情，便乘機對師傅和雇主報復。本來中國的店東對於學徒是苛刻慣的，但目前時代已倒轉過來，學徒到工會控告店東和扭解店東之事，更是一件平凡而最普遍的事，這也使店東懷着人人自危的觀念。

加以每一個星期都有遊行和集會，而遊行和集會每星期也不止一次。每逢開會全體店員都得參加，那一家商店不派出店員的，便算是反革命。不但店員要出動，洋車夫也要停止拉車去遊行。洋車夫是沒有店東給工資的，停了一天工，就是停了一天飯，縱使車主不要車租，而他的兩頓飯就沒有着落。每逢集會和遊行，武漢大街上商店全關門，很像新年大家在休息。工人們慢慢對於這些革命行動有些疲倦了，甚至由疲倦而討厭了，工資兩方都呻吟於遊行集會的革命行動，只是不敢嗑一嗑牙齒。

工會的童子軍更是不知天高地厚，兇暴非凡，有一次五一示威，他們把守着路口，每逢穿長衣的人經過，都要攔住剪長衣。這班穿長衣的先生們，在大路上遠遠望見那些虎虎的童子軍，便鷄飛狗走的往小巷亂鑽，秩序那樣的凌亂，武漢真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國民黨怎樣辦呢？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和共產黨一起朝着失敗的路走，第二條路只有分家了。

第二是軍事。寧漢兩方面起初都似乎有會心的諒解，雖然分裂，却不相互用兵。南京出兵攻徐州，而武漢則出兵攻河南，恰像兄弟分家，各奔前程的樣子。但這個想法只是第一期的軍事，說到第二期，那便大大不同。在武漢這面，自從汪先生歸後，已籌劃着北攻的軍事，命唐孟藩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一



方面軍總指揮，張向華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唐部担任正面和左翼的攻擊，張部担任右翼的攻擊。在河南的北方隊伍，靳雲鶚和國民革命軍早有接洽，其餘都是零星破碎，不堪一擊，所贖下來，僅是張學良統率下的奉軍。這次戰事說烈不烈，說容易倒也不容易，經一番苦戰，才把奉軍解決，取得了鄭州和開封，黃河以南已沒有奉軍的足跡。④張學良在鄭州退走之時，留下一封信交商會轉我們，說他自己是打敗了，他對於我們的俘虜很是優待，也希望我們對於他的俘虜也同樣的優待，中國的事正是難說，我們將來都會見面的。我們見了張漢卿這封信，大家都禁不住叫一聲「漂亮」，軍事告了一個段落，便停止進攻。

自然我們的不進攻，不是爲了張漢卿一封信，而是爲了後方太空虛。那次會師鄭州，馮煥章先生也早從俄國回來，帶兵從陝甘越潼關到了河南了。中國的軍隊還脫不了個人的封建關係，誰的傷亡多少都要打算的，河南一役，張向華的損失是八千，唐孟瀟的損失據說是八百，而馮煥章的損失是八十，這個計算自然是不實不盡，但因此惹起張向華對孟瀟不滿，而孟瀟又對煥章不滿。張向華的部隊大部是廣東人，河南既沒有許多水給他們洗澡，天氣又是每日沙塵蔽天，開鄭既下，將士思歸，唐孟瀟自然不能獨力佔有隴海的長線，也只有撤兵南返。

爲什麼不繼續北伐呢？實在爲軍事形勢所不許。因爲黃河以北還有直隸和山東，如果要繼續北伐，須要徐州和鄭州兩面同時進兵，如果南京不向北攻，我們只由河南北進，不止犯孤軍深入的危險，萬一山東方面有一枝敵軍側擊，非大敗不可。況且南京方面從前會心的諒解也靠不住了，在我們北伐河南的時候，四川楊森的軍隊會從上游攻武漢，而夏斗寅的軍隊竟進襲到離武昌十多里的紙坊，沒有葉挺帶着軍官學生擋住，我們已失了武昌城，這樣進不可攻，那麼不能不打算退可以守。這是爲什麼河南既得，不乘勢進兵

，而急求後撤的緣故。

我們把河南給馮煥章吧，在汪先生和譚組安一行人到了鄭州勞軍時已決定。我們一面陸續後撤，一面請馮先生派人填防，這次汪先生往鄭州一行，使武漢和馮煥章兩面都得不到好印象。武漢這班人比較摩登的，眼見着馮先生大布之衣，雜在士兵當中，有專車不坐而偏要坐貨車，有好飯不食而偏要嗜粗糲，以爲這是大矯乎常情。並且他治軍也太奇怪了，對於下級軍官常打軍棍不用說，就是高級將領和僚屬如張之江、薛篤弼等，除當面斥責不必論，往往在通電話時，一不合意，即在電話說「跪」，那接電話的人雖然沒有見馮先生的影子，也不敢不立刻朝着電話跪下去。馮先生太不把人當人了，他遲早要失敗的，這是武漢方面由鄭州回來的人這樣觀察。至於馮先生呢，眼見着武漢這班先生，早上開會，晚上也開會，桌上茶哪，餅哪，也實在不配他老人家的胃口；這班都是傻子吧，馮先生也在那裡想。因此河南既下，武漢以爲馮先生垂手而得中央的大平原，一定會對武漢表示同情，而馮先生則以爲武漢這班先生不一定能會成功，北伐無期，不能不另闢途徑，由是不久便和蔣先生在徐州會見。蔣馮見面倒不是一件小事，無疑的要圖武漢，這個謠言在漢口便流行了起來。而且馮先生當日或者因處境困難罷，就是他用的名義也有些矛盾和滑稽。南京方面原來任他是西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武漢方面任他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他原先是國民軍總司令，他終於想出一個圓通辦法，打電到南京時，用西北國民革命軍的名義；打電到武漢時，用第二集團軍的名義，而自己在河南呢，還用國民軍的名義。因爲這個圓通辦法，武漢對於馮先生更懷疑。⑤這樣北邊有不穩的馮煥章，而東邊有日夕俟機的蔣介石，武漢除了東征，實在無自存之法。

武漢的軍隊也太龐大了，唐孟瀟有三軍，張向華有兩軍，譚組安有兩軍，朱益之有兩軍，程頌雲有一

軍，這些所謂軍，每軍名義上都包含三個師，而實際上各人還有若干的獨立師和獨立旅。至於各軍之外，湖北和湖南還有若干不稱爲軍的隊伍，單就軍費而論，並非兩湖收入所能支持，這樣還是往下游發展罷，於是東征之論，遍佈於武漢。

打南京是既定政策，但就是這樣打麼？如果政治沒有主張，軍事未必可以操勝算。什麼是政治主張呢？倘使不能高調過於南京，也不能低調過於南京。武漢是共產政府，這是南京所宣傳的，如果要南京不戰解體，那麼莫過於分共，於是分共遂成爲東征的先決條件。

第三是經濟。武漢的經濟那時算是衰落極了。武漢政府表面擁有三省的地盤，除湖北之外，祇有湖南和江西。湖南彷彿是唐孟瀟的采邑，一切收入是不會解到中央的，江西也只能供給朱益之的軍費，中央爲着不能兼顧起見，似乎把江西給了朱益之，不夠不管，有餘也不要。那麼這樣龐大的軍費那裡來呢？祇有一個辦法是拿中央銀行變戲法。

以前就是北洋軍閥拿了湖北，也括不上甚麼地皮，所用以爲無盡之藏，只靠一個特稅，特稅也者，即鴉片煙稅之謂。我沒到湖北之前，有人說湖北的特稅每月可收一千萬，也有人說祇可收到五百萬，但確實的數目祇是在二百萬以上，三百萬以下。然而這還是靠上游川黔的來源，倘若上游鴉片來源缺乏，既無特貨，自無特稅。自寧漢分裂之後，南京對於漢口絕對採用經濟封鎖辦法，特貨既難於東下，因此大減稅收。

財政是什麼呢？實質言之就是生產和消費兩稅，有生產而無消費，稅不出來，有消費而無生產，也稅

不出來。湖北的糧食究竟是有限的，平日農產品的輸出，多數還來自河南，所謂土地稅的錢糧田賦，供給省政府還慮不足，中央自然沒有希望可供利用。漢口地方又那樣蕭索，工廠多數停了工，商店又更願自動關門，不要說生產，連消費也減少了。這樣的情形，不要說辦財政，祇是財而不政，也是司農仰屋，束手無術。

宋子文先生經過幾次向銀行強借，銀行也漸漸空虛，他和鮑羅庭商量之後，想出一個現金集中的計劃。鮑羅庭那時也覺得無計可施，於是在俄國借出一筆款項，寄存於上海的俄國遠東銀行，在外揚言這是俄國工人同情中國革命，捐助中國的款項。這個計劃是怎樣呢？先把漢口的各銀行存款封存起來，一切匯兌都由中央銀行經理。各商店如果要向上海買貨，先須將所買的品類，經中央銀行認可，然後把款項交給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發了一張支款單據，即由上海的遠東銀行劃付。這個第一次法幣政策就這樣在武漢實行，那是中國第一次的集中現金，可惜不久便失敗了。

失敗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第一，中國各銀行屈於勢力之下，只好服從把現金封存起來，但在漢口租界的外國銀行，便一律不聽政府的命令。中央銀行儘管辦你匯兌，而外國銀行也盡量辦他們的匯兌。商人有些貨物無法得中央銀行許可，只有走外國銀行的偏門，這麼一來，在漢口便有兩種不同的匯兌率。當日中央銀行的許可，也太沒有限制，既沒有數目的規定，也沒有品類的規定，於是許多商民便請託所謂要人，以購買軍需品爲名，滙款至上海。紙幣已貶值，而將紙幣交到中央銀行可以在上海掉現金，固然有些人是真買貨物的，但有些人竟直是輾轉代人滙款，一轉手間，便獲幾倍的利潤。可憐中央的政治委員會還鄭重其事，派孫哲生和我兩人在中央銀行監督，更可憐的是孫哲生和我每隔一日花了半天時間去檢視貨單。

⑥這種政策在當日未嘗不合理，但事實上有許多罅漏不可通，不久南京政府得了上海租界工務局的幫助，把遠東銀行封閉，連這不可通的政策也壽終正寢。

宋子文先生是絕頂聰明的，上海取得之後，便東下籌備上海的中央銀行，及至寧漢分裂，他定了法幣政策再去上海時，更索性像黃鶴一去不復返了。後來民國十七年他重任財政部長，<sup>⑦</sup>就職之時還在南京發表演說，說漢口集中現金是共產政府計劃，他極反對，所以辭職，他大約已忘記了這種政策還是他老先生手定的呢！

經濟的衰落，和財政的支絀，使物價飛也似的騰貴。軍費固無法支持，人民也苦於無路生活。中央銀行和各銀行的紙幣都用光了，就在漢口印刷罷，紙幣沒有了，就用金庫券代替罷。漢口的金融混亂到無法收拾和整理，紙幣的價格既和現金不同，而中國交通兩行的紙幣也和中央銀行的紙幣價格不同，即中央銀行金庫券的價格也和中央銀行紙幣的價格不同，甚至中央銀行新幣的價格和中央銀行舊幣的價格也不同，物價的騰貴和紙幣的膨脹，彷彿長途競走着，絕無止境；各種貨物的指數，我已記憶不清，我好抽紙烟的，本來一角錢一包的十枝烟，最後已漲至一元兩角。財政這樣奇困，如何得了，只有一條出路是東征了，而東征又須必先分共。

第四是外交。外交的形勢，自從南京政府成立之後，特別惡劣。其初國民政府在廣州之時，外交政策是依據莫斯科的外交策畧。當時莫斯科有一個幻想，以為英國是老大帝國主義，如果把英國的帝國主義打倒，其他帝國主義必定跟着一起瓦解。但單獨對英，在國際上也當有一個聯系，那個聯系是什麼？那是中

、蘇、德、日，四角同盟。蘇俄爲什麼選中了德日兩國？因爲德國當口的共產黨極有力量，在蘇俄眼中，德國的十月革命爆發祇是遲早問題。至於日本則迫近中蘇，大戰之後，英日同盟已爲九國公約所消滅，若要反英，應該和日本聯盟；它更有一個經濟計劃，即是以中蘇的原料，換取德日的機器。所以自從北伐以後，中國對外的革命對象還是英國，而各國對於革命軍的情感，也以日本爲比較和緩。<sup>⑤</sup>

在太平洋有關各國，美國是素來中立的，法國的遠東政策是和英國表裡的，在革命軍攻取南京時，誤殺幾個外人，美國對於革命軍有惡感了，日本領事館被掠，因之日本也感覺不快了。蔣先生很是眼明手快，分共之後，首先和英國妥協，<sup>⑥</sup>南京的事變也一乾二淨推在程頌雲的軍隊和共產黨徒。程頌雲那時是附漢口的，而共產黨又集中在漢口，不期然而然，各國的憎恨與仇怨都把焦點集中武漢的國民政府。

國民革命的口號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和對內打倒軍閥的，幼稚的共產黨和愚直的工人，總不肯修正他們的主張，和轉變他們的策畧，對於外國人在漢口所開的工廠，要求特別苛刻，而罷工也特別兇，佔據外國人的工廠還不算，有時還包圍外國人，甚至於施行封鎖。各國藉口保護他們的僑民生命和財產，紛紛調派兵艦駐在武漢的江邊，由舊日的英租界起至日本租界止，最多兵艦時期試過集中有三十六艘。鮑羅庭也知有一觸即發之勢，於是提出「革命退却」的方案，對外國人讓步了，對資本家也讓步了，因此發生不少共黨中央的批評，當時竟有共產黨說鮑羅庭反革命。

雖經許多解釋，而工人還是不懂什麼叫做策畧的，對於外國工廠還是不斷的罷工，於是鮑羅庭又提議在外交部組織一個委員會，專司調解外國工廠罷工糾紛的工作。這種風潮豈能只憑口舌調解的？案不止一宗，而一宗又不能即了，我們的外交部長陳友仁先生憤怒了，一次說：「工人太胡鬧，政府爲什麼不斫了

他們的頭。」陳友仁先生是世上目爲左傾的，而且武漢分共之後，曾隨孫夫人住居莫斯科幾年，他當時還憤怒到那樣，我們閉目一想，可以了解武漢是怎樣的情況。外交那樣惡劣，不分共政治沒有出路。

爲着種種的理由和事勢壓迫着，武漢的分共已有「引滿待發」之勢。國民黨的主要人物漸漸改變了作風，孫哲生先生本來是武漢初期的台柱，言必稱共黨的，至是無口不對共黨下酷烈的批評。徐季龍先生也同是武漢舞台上一顆明星，到了河南兩次，受了馮先生的影響，最後一次索性不再回武漢，高臥鷄公山稱病不下。當時孫夫人也着實不滿意共黨，是時在上海一個共黨機關剛被破獲，搜出通訊的密碼，用「上等貨」代表共產黨，用「次等貨」代表國民黨，在一次會議席上，孫夫人坐在我的旁邊，用英文寫了一張條子給我，說：「共產黨真可惡，他們竟當國民黨是次等貨。」我們相互笑了，笑也就罷了。

國共馬上要分裂了，這是一般人所揣測的，但可不可以到了北京才分家，又是國共兩方比較緩和的人們所期望。鮑羅庭那時住在漢口租界裡，輕易也不願到中政會，他也感覺到國共即將分離，或者正在想設法來彌縫和退却。武漢還正醞釀，江西的朱益之已先動手了。第三軍遍貼標語「請共產黨同志回武漢」，軍隊把政治部的共產分子強迫着護送出境，許多共產同志們如朱克靖等都離開南昌。但朱益之只在軍隊清共，其餘如農民協會，工會等，因武漢沒有分共的明文，益之還是不敢輕舉。⑩他的處境似乎非常困難，打了一個電報給中政會，指明請我至南昌辦善後。

中政會指派我往江西會朱益之，我到南昌之時，四面貼着標語，已由「請共黨同志回至武漢」而進一步改爲「驅逐共產黨」，和「打倒共產黨」。那時省黨部還沒有一個委員是共產黨，可是農民協會和工會

皆爲共產黨所盤據。他們會不會暴動？這是益之所最耽心的。我到南昌，實在沒有善後可言，不過朱益之請我來，說明他清共出境的苦衷，要我代達中央，希求諒解。我住南昌一星期多，接到孫夫人的來信，說武漢形勢險惡，望我急回漢口。

我知武漢分共的時機已迫在眉睫了。江西情形自然是絕不安定，但我無法再留。焉知我回漢口之時，鄧擇生已於前一夜出走了。據一般報告，說擇生改了裝和政治部的俄國顧問鐵羅尼北行，大概他們取道京漢路直往陝西而出蘭州，越新疆以至俄國。<sup>①</sup>武漢情形真是急轉直下了，我想。

下午我到汪公館，他們正在開會議，自譚組安以下諸人，孫哲生、唐孟藩、程頌雲、陳友仁，都在座。汪先生報告和第三國際代表路易交涉的經過。<sup>②</sup>路易是一個印度人，是第三國際的委員而爲駐華的代表，這次奉莫斯科命令，向國民黨提出國共合作的新辦法，內裡最重要的是加練農工軍三萬人，什麼是農工軍？當然就是正式的共產軍。汪先生認這個條件是顛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陰謀，到了此時，分共應該刻不容緩。雖然路易的提議爲汪先生所駁回，並向鮑羅庭抗議，因此路易也被第三國際召回，<sup>③</sup>然而共產黨步步迫緊，也非立時分共不可。不過我們雖然分共，並不想像南京殘酷的清黨，汪先生於報告之後，又加上這個溫和的結論。

在座諸人除陳友仁先生表示懷疑之外，全體贊成了。夜裡譚平山知道我回來，特派人約我至他的秘密寓所談話。平山是我北京大學的老同學，並且同事很多年，深信我們有一度交換意見的必要。是時共產黨本身自然另有圖謀，而同時也感覺到危險，重要的人們已都遷了秘密的寓所。

「國共分裂，對於革命前途更有危險。公博你以爲是不是？」平山試探我。



「不過目前除了這條路外，恐怕已沒有其他辦法。」我直爽的回答。

「我以為我們可以走第三條路，即是把國共都解散了，而組織第三黨，這樣或者免去分裂的危險。」平山提議着。

「這樣，共產黨本身還有沒有組織？」我問。

「自然共產黨本身還不免有它的本身組織。」平山不假思索的解釋。

「這樣還不是和現在一樣嗎？那就是扯下國民黨的招牌而換上第三黨的招牌罷了。共產黨一樣有它的組織，一樣有它的主張，而黨員也一樣的跨黨，這個第三黨又有什麼好處？」我想不出平山為什麼有這樣獸的思想。

我們討論了半夜，終找不出一個結論，在平山當時未嘗不是一個好意，以為兩黨都解散，而溶合為另一個黨，既可以振奮下既頹的局面，又可免去國共分裂的痕迹。然而共產黨是受第三國際指揮，不能解散，這是平山不去想的，中國的國民革命，捨國民黨外，更不能讓第二個黨去領導，平山也不去觀察事實的。平山只為想敷衍目前，自然他的理論無法成立。

第二天發覺重要中央委員中有三個人不贊成分共，第一個是孫夫人，她的理論很簡單，她說容共是總理一種政策，現在要變更總理的政策，她不能贊成。孫夫人在平日和我談話，極不滿意於共產黨，但到了真要分共時候，非常猶豫。第二個是陳友仁，他為解決罷工困難要斫去共產黨的頭的，但要分共，他終不同意。當時也有人批評陳先生，說他的外交，完全靠鮑羅庭供給情報，靠鮑羅庭發縱指示，鮑羅庭一走，外交遂失了指南針。其實那時縱使沒有鮑羅庭的問題，友仁先生也難免一走，因為外交部長都有自己的方

針，既然分共，那是變更政策，外交部長當然要讓位。第三個是廖夫人，她的理由也和孫夫人一樣，以為仲愷先生也是主張容共的，並且仲愷先生也因此而殉黨國的，所以她也不贊成分共。夜裡她去找我談話，我給她解釋種種情勢，恐怕分共已是既成事實，無法避免。

「我總不贊成，雖然共產黨也可惡，我對他們也極不滿意。」廖夫人堅決地說。

「目前若再不分共，恐怕大家都跟着共產黨跳水。」我只客觀的補述我的結論。

「跟共產黨跳水我也願意。」廖夫人情感的不附任何理由。

雖然三個人不贊成，而大多數通過了。中央於是頒布明令分共，<sup>⑭</sup>但為完成汪先生溫和的結論起見，於分共之後再補一條明令保護共產黨。武漢的分共，最初確是溫和，既不嚴厲清黨，也不捕拿首要，這或者是汪先生民主主張的一貫政策罷。分共的時候，鮑羅庭已準備離武漢，政府還替他預備許多汽車，使他得以從容回西北回蘇俄，至於加倫將軍則留在漢口，直等寧漢復合之後，才慢慢的由上海假海道歸國，雖然有南昌賀葉之變，我們還是紀念他參加國民革命戰役之功，還是對他一樣優禮。

分共之後，武漢立刻準備東征。以唐孟瀟為總司令，令何芸樵從江左岸進兵，令程頌雲和張向華從江右岸進兵。在江左岸何芸樵不久佔了安慶，而江右岸則張向華軍隊發生了南昌賀葉之變了。張向華先生是我老友，而北伐時期他的戰功也最多，但他許多弱點之中，有一個弱點是最愛人恭維，於是共產黨認定他是一個目標，在武漢時候整日對他恭維和稱頌。鄧擇生是最長於理論講演的，而且也最長於拉攏的，在武漢之時，無日不見向華，也無一次會議不拉向華，由是向華自己以為他並不是被共黨包圍，倒以為他可以絕對指揮共產黨。他的第二方面軍是合原來他的第四軍和陳真如的第十一軍而成，他命黃琪翔為第四軍長

，朱暉日爲第十一軍長。他底下的六個師，一個是繆培南，一個是許志銳，一個是李漢魂，一個是蔡廷鍇，一個是葉挺，一個是富雙英。繆許李這三個師他是把握得住的，蔡廷鍇原是陳真如的舊部，葉挺是人所共知的共產黨，富雙英是在河南臨潁之役才由張學良那邊投降過來；但張向華以爲這三個師也絕無問題，因爲蔡廷鍇曾向向華表示過忠誠，有一次陳真如派人至武昌運動蔡部，給蔡廷鍇槍斃了，所以贏得向華深信。葉挺雖然是共產黨，然而向華以爲葉挺忠於他的程度，較忠於共產黨的程度爲尤深。富雙英更是降將，<sup>⑮</sup>向華是南方稱爲鐵軍，富雙英在奉軍也有鐵軍之名，北方的好漢是不會改變的。

向華對於分共的確是煩悶。他素來對於他的軍中共黨分子作戰都異常稱詡的，如果不遵令分共，他到底是國民黨的一員，如果遵令分共，對於他每天所聽的理論的確有些矛盾，而且許多共黨還是多年的袍澤。向華於是便有點妙想天開了，他想以共黨護法自居，把一切共黨都搜羅在軍中，企圖帶至安全地帶，而同時更希望一班共黨都翕然的聽他命令，對他擁護到底。因此他對於東征是不大贊成，爲的是就佔了南京，還不是他們的出路；碰巧李任潮先生也不願鷓蚌相爭，暗地裡派人至武昌和九江，勸張向華帶兵回廣東休養。

從各方面的醞釀，回粵又正中向華的下懷，他的部隊剛到了九江，向華遂正式要求帶兵回粵。在當時這種舉動自然是拆台，但武漢的國民政府豈能不倒過來服從張向華的意旨？

不止如此，張向華要求留在南湖學校的軍官學生都編作他的教導團，以備帶回廣東，汪先生也答應了。我派余愷湛做他第二方面軍的政治部主任，向華也拒絕接受了。雖然向華中途脫離武漢回至廣東，而東征則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江右岸的軍事，只好找程頌雲擔任了，我正在要在漢口率領政治部人員東下，南

昌的賀葉叛變，突然發生。

事實是這樣，在向華以爲率領他的軍隊回廣東，可以在南方休養，或者另創一個新局，而在共產黨的朋友，則以爲跟着向華還不是出路，大有急不及待之勢，等到葉挺和賀龍的軍隊到達南昌之後，即發動「賀葉叛變」。南昌突然成立一個號稱國民黨的特別行動委員會，中間夾着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一夜之間搶掠了省政府各機關，朱益之的教導團長朱德還帶了一些滇軍和賀葉會合。<sup>⑭</sup>但南昌只能作一個發動地方，而不能作一個革命根據地，於是賀葉便率兵向着他們所認爲革命策源地的廣東海豐縣和陸豐縣進發了。<sup>⑮</sup>賀葉臨走，不止挾持了這班行動委員會的首要，而且把江西建設廳長好好先生的姜濟寰，和省政府委員好發議論的蕭炳章也拖着走了。

向華對於共產黨庇護是願意的，但離開他的軍隊再非他所能容忍，他聞得消息之後，由九江乘火車奔往南昌，希望以郭令公單騎見回紇的姿勢，把他們鎮壓住。<sup>⑯</sup>但火車至到德安不能前進了，前面有他自己的軍隊堵住，不肯讓火車通過。向華氣極了，親自下車，喝道：「我是張總指揮。」堵住火車的兵士說：「我不認識張總指揮，只認識我們同志。」向華再想說話，那邊要開機關鎗。到了這時向華才知道自己也掌握不住軍隊，只有往後退。葉挺全師叛變了，蔡廷鍇乘着亂烘烘的機會，拖了他一師人——還兼併了其他師的兩團——回着福建走，等陳真如的後命了。富雙英據說也受了唐孟瀟的運動，不肯隨行，朱暉日先生見了兩次富雙英，均無效果，他索性連第十一軍長也不做，在九江乘船至上海，遣自先返香港了。餘下了殘破的三師，由黃琪翔用代理總指揮的名義帶着，還浩浩蕩蕩的朝着廣東的南雄前進，而向華也意態索然的離了軍隊一個人乘船回廣東。

向華這樣自由進退，實使武漢的東征計劃受一個嚴重的打擊。憑唐孟瀟、程頌雲、魯滌平的軍隊，未必就能打下南京的，縱能打下南京，以後黨的善後又怎樣？兩廣的問題又怎樣？不過不東征就是死路，斷不能困守兩湖聽天由命，束手待斃。天下事不得了的時候就了，這是譚組安先生的哲學，那時真是靈驗了。孫傳芳和張宗昌的軍隊從北方反攻過來，徐州失陷，埔口也受了壓迫，李德鄰和白健生在南京提議，武漢既已分共，南京應當歡迎，這個提議不啻壓迫蔣先生，於是蔣先生通電下野，而南京的國府主席胡展堂也發了一個「一了百了」的通電，翩然回居上海。

我們一行人那時都齊集在九江，汪先生以下諸人皆在牯嶺，李德鄰乘着軍艦往上游來，一半是歡迎武漢同志東下，而一半是班取救兵以禦孫傳芳南侵之師。<sup>⑭</sup>我們歡迎着李德鄰住在宋子文岳父的張宅，我們一行人由牯嶺下來和德鄰開善後會議。德鄰先生表示來意之後，歡迎一節自然是客套，我們沒有多大討論，而最要緊則爲怎樣出兵援助南京同志堵住孫傳芳。這個問題不討論倒還罷了，一討論李德鄰便和唐孟瀟起了爭執。<sup>⑮</sup>在德鄰之意希望武漢的軍隊不要到蕪湖，即由安慶斜出合肥腰擊北來的隊伍。而在孟瀟之意，以爲軍隊不到蕪湖是集中不來，在戰畧上實沒有這種打法。兩個人堅持不下，程頌雲便插科了：

「孟瀟是對的，軍隊非到蕪湖，不能集中。而且軍隊可以食泥沙的話，也可以不到蕪湖。但軍隊是要食飯的，不到蕪湖，那裡找給養？」頌雲先生又肯定的而且從給養打算。

我雖然參加了軍隊工作許多年，但到底不是一個軍事家，不能插嘴，汪譚兩先生也對軍事不了了，我們只好休息一天，明天再談。當夜我們都宿在張家，汪先生、組安、哲生、德鄰，睡在樓上，我因沒有地方，只好睡在客廳的梳化。德鄰在北伐時候也是和我常在一起的，寧漢分裂時候也都是不願意而爲事實壓

迫才分開的，久別之後，都願作一長談，大家上了樓睡覺，我們還在客廳抽煙捲，講別後的故事。

「孟瀟的軍隊不下去，你們到底擋得住擋不得住孫傳芳？」我誠懇問。

「那倒很難，因為我們軍隊力量太薄。」德鄰也不隱諱。

「你們既要孟瀟軍隊下去，而又不讓他到蕪湖怎可以？剛才頌雲不說軍隊如果可以食泥沙的話，才可以不到蕪湖嗎？」我鄭重的覆述程頌雲的話。

「那裡有這事？剛才散會之後，我去找頌雲，頌雲也不主張孟瀟的軍隊到蕪湖。」德鄰有點憤懣。

「那麼他為什麼那樣說？」我很驚訝。

「他說因為他在孟瀟之前，只好這樣主張。」德鄰又沉默下去。

那不是挑撥離間嗎？程頌雲真可恨，剛在寧漢合作之時，又要這套把戲，我心裡真不自然。我們又抽一陣煙捲，我陡然想起了一個辦法，我跳起身：

「德鄰，你不過不相信孟瀟，怕他佔安徽，威脅南京罷了。但你不相信孟瀟，難道也不相信我們？我提議一個折衷方法，你儘管讓他到蕪湖，而我們明日都和你去南京，我真不相信孟瀟連我們都打。如果他不怕公意，我也和你們合起來打他。這樣你總可以相信了吧？我們都到南京是先相信你，如果孟瀟打南京的話，那麼你可以把我們宰，把我們殺！」

「好，就這麼辦！明日請你對汪先生說，但我坐來的船太小，恐怕大家全去坐不下。」德鄰很高興的  
下決心。

孟瀟第二天大清早又來，談到軍事又和德鄰爭執。

「德鄰，我們將來不在桌子上見面，就在戰場上見面。」孟瀟很盛氣而驕矜的說，德鄰面上顯出自然。

我向汪先生提出我昨夜所想的計劃，大家都贊成。因為德鄰所乘的船太小，我們公推譚組安和孫哲生同李德鄰先去，而德鄰電南京改派一艘較大的運輸艦來迎汪先生及我們到南京。我們一面打電漢口，請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準備，我個人則乘商船先回武漢，向留漢各中委報告。

牯嶺在那時真是冠蓋雲集了，宋子文、伍梯雲，都及時趕來了。那時已有人提議汪蔣合作，因為我既趕回武漢準備遷寧，所以事後才知。沒有幾天南京的軍艦已駛了上來，我們分別在漢口和九江登船下駛。經過蕪湖，陳調元上來謁見汪先生，那時已知孫傳芳軍隊竟偷渡長江來襲，已被白健生指揮着他的第七軍把孫軍殲滅，這所謂有名的「龍潭之役」。②孫傳芳經過這次大敗之後，潰不成軍，軍事既告一個段落，我們到了南京，遂不再談軍事，而談黨務和政治了。

我們到南京約比組安遲了一星期，那時龍潭之役算已完了，組安和哲生且已去過上海一次了，據說他們是到上海和居滬的中委接洽，至於什麼來由和結果，我也沒有深問。南京算是一座空城，蔣先生下野而胡先生又走，政治和軍事都由德鄰和健生主持，③而何敬之因為牙痛住在醫院裡。他們預備了財政部的地址丁家花園給我們住居，入夜陶冶公奉健生之命來見我，問我幾時接收政治部。那時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還沒有搬來，我也不知到是否還主持政治部，只好囑他預備，等過幾天再說。

一宿無話，第二天中午汪先生一班人還去湯山遊玩，順便討論些政治，夜裡無事，我又找組安夜談。

「你們到上海見過什麼人？」我問。

「人倒見了不少，連西山會議各人也見過了。」組安答。

「這班人有什麼意見？」

「他們意見很多了，我主張汪先生應該到上海一次和他們見見面，就是胡展堂也應該見見。」組安似乎有了主張。

「恐怕談不攏罷！」我不經意的提出疑問。

「我們都分共了，說到反共，他們還是老前輩呢。我以為趁此機會大家就團結起來罷。」組安笑着，似乎很正經的，又似乎帶點玩笑。

我這人根本就不會懷疑組安已另有計劃，我也不願表示特殊的意見：

「上海還有什麼好聽的新聞嗎？」我自從十一年赴美經過上海以後，再沒有去過，忍不住好奇的刺探，自然我所謂好聽的新聞是指社會一般的。

「唉，有一個新聞。」組安這時笑了：「我到上海時候，去拜訪宋老太。我正在客廳看報紙，等候她老人家，突然見面前站着一個人，我以為是宋老太，急得站起來，誰知是宋美齡。美齡說：『三哥，我愛介石是你知道的，我要嫁他而子文不贊成。子文定婚何嘗得我們的同意，今天我要嫁人，他倒要干涉我，你說是不是豈有此理？』美齡向我訴苦，真使我難以答覆，幸而宋老太太這時已下樓，這才把我救了！」

「這件事本來傳開了許久，這樣恐怕快要成事實了。」

「可不是嗎？」



我和組安的談鋒又轉到別的問題，第二天早上，我們在丁家花園開了一個會議，決定推汪先生、組安、哲生，和益之往上海和一班中委接洽，李德鄰也同行，汪先生等算是代表武漢的，李德鄰算是代表南京的。本來這種辦法有點滑稽，既同是中委，又已合作，何必按着地方作代表？但我不好說話，因為剛剛在合作，未便發表許多意見。我和璧君、孟餘，也同去，那是私人的行動，算不得代表。第二天同車的人很多，于右任、孔庸之、宋子文等都赴上海，一半是趁熱鬧，一半是找休息，至於我個人則有些觀光的意思，也不想參加他們的會議。

到了上海翌日，他們代表開了一天會，夜裡孔庸之在他福開森路的家裡請我們食飯，在座的人們多數是所謂漢方。我還記得除了主人以外，有汪先生、譚組安、朱益之、顧孟餘、宋子文、孫哲生和我幾個人。席間汪先生報告會議的經過，說本日會議，他們提出寧漢滬三方面合作，<sup>②</sup>每方將來舉出六個人組織特別委員會以代替中央黨部。我問汪先生答應了沒有，汪先生說他還沒有答應，我立刻覺得這個辦法不但是大不妥，而且是違法，我也不和汪先生商議，即席提出反對的理由，說：

「今日談到合作，不止寧漢，即更加幾方面，我也贊同。不過無論如何合作，均不能違背法統。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由全國代表大會舉出來的，現在成立特別委員會，即是自己取消了執行委員會。我以為取消執行委員會，只有代表大會才有此種權力，中執會沒有這種權力，何況又是在滬幾個代表，那當然更沒有這種權力。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三十六人，這都是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根據這個辦法，漢方選出六人，寧方選出六人，合計也只十二個人，除此尚餘二十四人對於黨務不能過問，即無異乎把他們資格取消，試問我們憑何種權力可以取消他們中央執行委員的資格？不止如此，除了中執委員會，還有中央監察委員

會，我們只取消中執會而不取消中監會，那是非驢非馬，若取消了中監會，我們更沒有這種權力。倘使中執委員或是中監委員提出質問或彈劾我們違法，我們將何詞以對？又倘使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提出質問或彈劾我們違法，我們又將何詞以對？蔣先生雖然下野，他若起而以此爲號召，那麼我們必定立刻塌台了。」

汪先生恍然大悟，在座幾個人都默不作聲。是夜的宴會雖然是照常載笑載言，各人都各有各的心事。席散之後，組安說：「公博先生，我們須要承認事實，不必再談法統了。」我說：「組安先生，剛才我所說的，都是事實，還不完全站在法統立場，無論任何中央執監委員及代表向我們質問，我們均無法應付。」汪先生離席之後，拉我至人散盡後的飯廳，閉了門說：「你所說的都對，我今天實在沒有答應，但譚孫似乎和他們早有成約，這怎麼辦呢？我們到你家再談吧。」

汪先生夫婦和顧孟餘到了東西華德路我的寓所商量，討論的結果，以爲贊成這個特別委員會是不可以的，而反對又反對不來，似此只好置身事外再說。但我們終不能住在上海讓他們胡鬧下去，這樣只好回武漢了。汪先生打算到牯嶺暫居，而我呢則願意回廣東看看，或者李任潮比較明白些，我們能夠設法維持第二屆的法統，或者不至于惹起天下的大亂。

第二天早上我還想盡最後一分力量，跑往戈登路伍梯雲家中看李德鄰，入門之後，見那圓廳上已坐滿了人，張靜江、李石曾，一羣老先生都在內。我和德鄰在旁邊一個小書房談話，我反覆譬陳利害，德鄰似乎成見甚深，絕不爲動，只有說：「算了吧！一班老先生都贊成，而且汪先生也贊成了。」我說汪先生不會贊成的，而德鄰總不相信，我知道此事已經無望，那天汪先生還和他們鬼混，夜裡宿在我的臨時家中，

我讓汪先生夫婦睡在我的臥床，我睡在廳上的地板，第二天絕早汪先生夫婦坐了一隻商船到牯嶺，我則悄然離滬回香港。我們走後，特別委員會遂不顧一切的成立，搬至南京，代行中央黨部的職權。<sup>②</sup>末後爲了此事，不知打了多少筆墨官司，汪先生說始終沒有贊成這種組織，而吳稚暉先生他們則一口咬定汪先生實在當日已經同意，不過同意之後才反悔的。<sup>③</sup>這是一宗歷史上的爭論，這是寧漢合作後特別委員會成立的經過，我回廣東之後，便首先舉起大旗反對這個非法的組織。

## 第六章註釋

①三中全会的土地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該會有委員五人，即徐謙、顧孟餘、鄧演達、譚平山及毛澤東。此土地委員會最特別的地方，在於該會所推行之土地政策較同時期共產黨所推行的爲激烈，見 Wu Tien-wei, "A Review of the Wuban Debacle: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plit of 192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1: 130—131 (1969—1970) 其他有關土地委員會的資料，參考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頁十九，二七八至三〇八；R. C. North and X. J. Eudin,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pp. 81 and 338; H. R.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214—216 and 219.

②兩湖的軍官反對沒收土地，見蔣永敬，前引書，頁三一；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頁七六；Wu Tien-wei, p. 132; North and Eudin, pp. 97—98 and 118; Issacs, p. 214; Thomas C. Kuo, *Chen Tu-hsiu (1879—1942)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p. 153.

③許克祥原是駐守長沙何健部的團長，而何健則是唐生智屬下之第三十五軍軍長，許克祥所發動之馬日事變（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顯示出湖南軍隊方面有着反共之傾向，再者此事件更指出唐生智所統領之軍隊開始內部分裂，而武漢政府的武裝力量支持開始動搖。據張國燾之分析，馬日事變與夏斗寅之叛變行爲，實是蔣介石瓦解武漢內部的傑作，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頁六四三至六五一。其他資料參考蔣永敬，前引書，頁二〇至二一，三二五至三五二；雷嘯岑，前引書，頁七六；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一編，頁四四四至四四九；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下冊，頁六九九至七〇八。

North and Eudin, p. 101; Issacs, pp. 216 and 234—236.

④唐生智、張發奎等攻打河南奉軍，並邀請馮玉祥之國民軍合攻之，惟是次河南戰役，武漢方面之軍隊損失甚鉅。見J.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sh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220—224. 而當時夏斗寅之軍隊亦漸漸進迫，威脅武漢，見T'ang I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277—278. 其他參考蔣永敬，前引書，頁一九六；李雲漢，前引書，頁六八八；第四軍紀實編纂委員會編：「第四軍紀實」，頁一三五至一七〇；Issacs, p. 203; D.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p. 78.

⑤馮玉祥在當時的位置甚為重要，因為蔣介石與武漢兩方面皆欲得馮氏之支持，惟馮玉祥的態度却是甚為曖昧，馮氏先與汪精衛等人晤於鄭州（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繼而與蔣介石晤於徐州（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最後馮氏以調人身份通電武漢政要，要求他們立刻分共，並與寧方合作調和。故此，武漢方面失了馮玉祥之支持，所計劃之東征蔣介石之行動，甚受打擊。參考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六五六至六六三；蔣永敬，前引書，頁三八〇至三八二；雷嘯岑，前引書，頁七四至七五，七九及九五；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四五四至四五七；Sheridan, pp. 203 and 224—226; Wu Tien-wei, pp. 135 and 137; Kuo, p. 167; North and Eudin, pp. 114—115; Lary, p. 78.

⑥當時武漢的金融危機，可參考蔣永敬，前引書，頁一七七，二二八至二二九；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四五—；Wu Tien-wei, p. 128.

⑦關於宋子文在當時之位置，張國燾有下面一段的記載：「（時約為三月二十四日後）武漢當局深信蔣氏

以南京上海為據點，展開反武漢的行動，因而決定不讓蔣氏有完全支配上海南京的機會。具體辦法是派宋子文為中央財政特派員，趕往上海，直接掌握上海這個經濟中的心財權……。」見「我的回憶」，第二冊頁五九三。

③ 武漢方面對於英國、日本之外交政策，可參考蔣永敬，前引書，頁一九八；Issacs, pp. 205—206；P. Cavendish, "Anti-imperialism in the Kuomintang, 1923—8" in J. Chen and N. Tarrow (eds.),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4—35 and 38—41.

④ 蔣介石與英國妥協的情形，見蔣永敬，前引書，頁一六七至一六八；Issacs, p. 206; Cavendish, p. 38.

⑤ 朱培德原是承武漢政府之命，駐守江西，以監視蔣介石之軍隊動向，現朱培德之分共，無異是嚴重打擊了武漢政府之基礎。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七〇八至七一一；蔣永敬，前引書，頁二一、三五四至三六八；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四四九；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六五七；Wu Tien-wei, p. 133.

⑥ 鄧演達與鐵羅尼(Teruni)之離漢北行，見陳公博：「我與共產黨」，載於「寒風集」，頁甲三五七至三五八；Wu Tien-wei, p. 141, fn. 67。

⑦ 關於汪精衛與路易(M. N. Roy)之交涉，見蔣永敬，前引書，頁四〇二至四〇六；李雲漢，前引書，頁七三六至七三九；雷嘯岑前引書，頁八五至八七；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四六一，頁四六九至四七〇及四七九；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六五四；North and Eudin, pp. 111—113; Tang Leang-li,

pp. 280—281; Sheridan, p. 226; Wu Tien-wei, p. 134; Kuo, p. 170.

⑬ 路易被第三國際召回，見陳公博：「我與共產黨」，頁甲二五八；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四八〇；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六五五；North and Eudin, p. 126.

⑭ 武漢政府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正式宣佈分共，起初分共的過程算是和平，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七月十六日發出一項「保護共產黨人身體令」，全文見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四七〇至四七一，但後來共產黨人策動南昌暴動，武漢方面之分共行動才變成激烈，見Wu Tien-wei, p. 141，而汪精衛本人亦指出：「武漢分共的經過，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三個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制裁共產黨徒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階段是和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見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載於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一編，頁四七八。其他參考蔣永敬，前引書，頁三九一至四一二；李雲漢，前引書，頁七四〇至七四一；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六六六至六七三；雷驥岑，前引書，頁八八及九五；T'ang Leang-li, pp. 282—286; Lary, p. 78; Issacs, p. 269; Kuo, p. 73.

⑮ 關於富雙英，李品仙有下一段之回憶：「（一九二七年）九月十目左右，第七軍奉命轉用於江西方面進攻九江，圍攻武昌之任務又由我第八軍派遣一部與原來之第四軍共同担任。嗣於十月初該敵知援軍解圍無望，曾一度突圍亦為我軍擊敗，加之彈盡糧絕，城內敵軍將領富雙英乃秘密向我軍投降，開城迎納我軍。於是遂克復武昌，生俘陳嘉謨、劉玉春以下官兵九千餘人。時正十月十日，回想辛亥武昌起義，時間上何其巧合若是。為獎勵敵軍來歸，富雙英仍以獨立師師長任用。」見「李品仙回憶錄」，頁八一。

⑭關於南昌暴動之紀實，見陳公博：「我與共產黨」，頁甲二五八至二五九；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六七五、六八五，六九五至七三三；「第四軍紀實」，頁一七七；王健民，前引書，第一編，頁四八〇；蔣永敬，前引書，頁四二〇至四二四；李雲漢，前引書，頁七四四至七四六；T'ang Leang-li, p. 288; Wu Tien-wei, p. 141; Li Tien-min, *Chou En-lai*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1970), pp. 99—110.

⑮賀龍、葉挺等人逃往海陸豐一事，見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七〇八；「第四軍紀實」，頁一七八；Issacs, pp. 283—284；關於在一九二七年間海陸豐作為革命根據地之描述，見 R.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34—262.

⑯張發奎由九江奔往南昌，欲鎮壓南昌暴動，見陳公博：「我與共產黨」，頁甲二五九至二六〇；張國燾，前引書，第二冊，頁七〇六；「第四軍紀實」，頁一七八。

⑰漢方汪精衛等人與寧方李宗仁等晤於九江，時爲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然早於八月八日汪氏已與李宗仁商討合作事宜。但在此期間，汪李二方面亦不無衝突，蔣永敬書中有一項重要描述：「……但汪精衛與唐生智却承繼共黨未竟之功，乘孫傳芳與張宗昌的重兵壓向南京的對岸浦口之際，唐生智則分兵兩路進窺南京，張發奎在江西的軍隊亦開回廣東。形成對桂系的壓迫。桂系軍人李宗仁、胡宗鐸、夏威等紛電武漢當局，一面報告蔣總司令『已離寧赴滬休養』，一面希望武漢『東征的軍隊不要東下，讓他們好對付津浦路的敵人。』」見「鮑羅廷與武漢政權」，頁四二八。而蔣介石的下野亦可說是被桂系所迫。



而致，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七六一至七六三；雷嘯岑，前引書，頁八九；T'ang Leang-li, pp. 290—291; Lary, p. 80.

⑳唐生智與桂系衝突源於寧漢分裂之時，時以唐生智為首之武漢軍隊曾作東征，威脅桂系與蔣介石，後至一九二七年十、十一月間即有桂系聯同譚延闓、程潛等軍共討唐生智之役，參考「苦笑錄」第七章註⑤。及至一九二九年三月唐生智聯蔣策反白崇禧之部隊，參考「苦笑錄」第八章註⑤。

㉑龍潭之役，參考國防部史政局編：「北伐戰史」，台北，國防部史政局，一九六七年，第三冊，頁八五一至九一六；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二年，下冊，頁三三三至三四〇。

㉒蔣介石是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正式發表辭職宣言，全文見雷嘯岑，前引書，頁九〇至九四。蔣氏之辭職顯然受到桂系軍事將領所迫而致，認為蔣氏是阻碍寧漢合作之人，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七六三；雷嘯岑，前引書，頁九五；Lary, pp. 77—80; T'ang Leang-li, p. 292; Sheridan, p. 233.

㉓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寧漢滬三方主要通責中委開談話會於上海戈登路伍朝樞寓所。出席者汪兆銘、孫科、譚延闓、伍朝樞、李烈鈞、葉楚傖、程潛、褚民誼、鄒魯、王伯羣、謝持、楊樹莊、許崇智、張繼、覃振、于右任、居正、李宗仁、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等二十一人，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七六七。又參考鄒魯：「回顧錄」，第二冊，頁二二九；雷嘯岑，前引書，頁九七。

㉔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特別委員會成立於南京，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七六九；鄒魯，前引書，第二冊，頁二三二；雷嘯岑，前引書，頁九七；「反蔣運動史」，頁三二；Lary, p. 81; T'ang Leang-li, p. 302.

特別委員會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宣告結束，見「反蔣運動史」，頁三六。

⑤汪精衛有否贊成特別委員會一事尙待考證，據鄒魯所說，汪精衛曾經爲特別委員會的宣言作了初步之起草，見「回顧錄」，第二冊，頁二三一；又見雷嘯岑，前引書，頁九九。但汪精衛却於九月十三日，特別委員會成立之前兩日，已離開南京到九江去，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七六九。

## 第七章說明

「廣州驅李之役」一章的內容可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特別委員會中人討伐唐生智的因由。據陳公博所說，遠在北伐之初，唐生智不欲譚延闓、程潛等湘軍入湘作戰，因爲唐氏恐怕他們會搶走湖南的地盤，故譚、程二人早已對唐生智不滿。而在寧漢合作期間，李宗仁亦不滿唐生智派兵下蕪湖，李氏遂與唐生智發生衝突。

第二部份即是廣州驅李之役的本部。首先是李濟琛與張發奎互相爭取粵省的控制權，李氏原先欲迫張發奎出洋，但張發奎部下黃琪翔却率領第四軍回粵駐守。李濟琛遂遣派蔡廷鍇及陳銘樞等軍回粵應付，此時張發奎又再受到軍事壓迫，於是張氏遂開始籌劃反李的事宜，而正當此時陳公博等人則以反對特別委員會作爲號召，在粵組織粵方委員會，最後汪精衛回到廣東即統一了驅李與反特別委員會二事爲一體。

在這一章裡，陳公博更明確指出蔣介石與驅李的關係。蔣氏因被李宗仁等桂系迫走，遂設法與汪精衛合作，蔣氏並以爲自己不能回返南京，乃打算來廣州，而在回粵之前他要求張發奎、陳公博驅走李濟琛，作爲蔣汪合作之基礎，故此，如果在驅李之後沒有廣州共變之事，蔣介石便會南來廣州，歷史亦要改寫了。

廣州驅李的行動是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發生，李濟琛、黃紹竑等桂系人物被驅走，而廣州共變則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至十三日發生，後來共變爲張發奎等平定，而李濟琛等人却以廣州共變與張發奎等有關爲名討伐之。張氏敗陣，陳公博亦被迫逃往香港，後再折回上海，廣州被李濟琛部下陳銘樞、陳濟

棠等平定後，建立了一座「共禍紀念碑」以指斥張發奎、陳公博等同粵與共產黨「勾結」亂事。

而最重要的，却是蔣介石於李濟琛等同粵反擊張發奎一事所扮演的角色。誠如陳公博所說，既然廣州驅李之役，蔣介石是一個有力的主動人物，但當李濟琛回粵反擊陳公博、張發奎時，蔣氏又以鉅款支助李濟琛，故蔣介石可說太聰明、太現實了。

## 第七章 廣州驅李之役

十六年年底廣州驅李之役，是「陳公博應當完全負責的」，南京特別委員會一般人這樣說，蔣先生也是這樣說。當我十七年在上海辦「革命評論」的時候，爲着出席和不出席五中全會問題，和吳老先生雅暉打了一場大而且長的筆墨官司（全文載在「革命評論」和上海各日報），①打到難解難分之時，吳老先生看看輸了，蔣先生爲着排難解紛起見，在報紙上發表一篇談話，贊揚吳老先生是「國之瑰寶」，而說最限度引起廣州共黨之亂，應由我負責。所謂引起共黨之亂自然由於驅李之役而起，蔣先生爲使吳老先生氣平，非把我抑住不可。敬老慈幼的大道理我是懂得的，我想就是我負責罷，又有什麼了不起？因此我在報紙也來一段談話，說當時驅李，中央委員通通不在廣州，張向華和黃琪翔都不是中委，以中委資格而担負驅李之役，祇有我一人，所以我應該完全負責。

這段談話發布之後，倒惹起不少看熱鬧的人鼓掌，說我有擔當，有勇氣，是英雄的本色。其實那是我少年的豪氣，只求自諒，不求人諒的老脾氣，廣州驅李之役，應該負全責的還是責我應負全責的蔣先生。

我這些說話是不是洗刷呢？當然不是。大凡官司打得正急的時候，要洗刷應該在那時洗刷，斷沒有打官司的時候不洗刷，而在官司打贏之後才來洗刷的。那時在我們掀動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的大旗，李任潮先生是被驅逐了，過了些時桂系也倒了，我想起來，今日敘述這一段內幕，我還深深的對桂系一班老朋友抱歉。

「新桂系」一個奇異的名詞，也是當時馳名的時候張向華他們發明的。實在桂系當時並沒有成系，在廣州主持政治分會的是李任潮，在廣西主持省政的是黃季寬，在南京主持大計的是李德鄰和白健生。他們都是廣西人，互通聲氣自然是有的，不過都是帶兵的將領，對於黨務和政治在其時還沒有很大的慾望。「桂系」兩個字太討人厭了，廣東人對於桂系一個名詞尤其有深刻的惡印象。在民國五年陸榮廷帶兵東下之時，兼併了廣東，與政學系互相表裡，壓抑到國民黨不能喘氣，其初廣東督軍任了陳炳琨，再而任了譚浩明，終而任了莫榮新，這三個都是廣西將領，直至民九粵軍回粵之時，才算把桂系驅走，民十陳炯明帶兵佔了廣西，才把桂系消滅。②這個桂系名詞真太討厭，故而張向華他們發明這個舊名新用的宣傳，加上李任潮等頭上。

我對李黃白他們都有相當好感的，我很贊美李任潮的沉着，李德鄰的寬厚，白健生的謀畧，黃季寬的機智，而且在北伐的戰役中，我和德鄰、健生共同相處也很久，他們或者還不了解我，而我倒很了解他們，不過在寧漢合作之時，李德鄰已沒有從前的謙虛，白健生也有些自大。③譬如我苦勸德鄰對於特別委員會應當考慮，他毫不思索，以為總沒有問題。而白健生呢，更予智自雄，以為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在寧漢合作時期，我在南京停留兩天，曾有一次和他討論今後軍隊的政治工作。

「我看今後政治部少做民衆運動的工作罷。無論民衆怎樣兇，有一連機關鎗便什麼都完了。」白健生

很自負的說。

「這樣何不就撤消了政治部？」我提出抗議。

「貼標語，叫口號，總該有人罷！」健生大約以為貼標語和叫口號就是政治部的唯一能事了。

經過這一度談話，我自然對李白有些失望，但我依然維持原有的友誼，換一句話，我對李黃白感情都不錯，想不到後來兇終隙末，分而復合，合而復分，又有幾次。

我於九月二十後回至香港，住了幾天，至廣州會見了李任潮一次。任潮見我南歸，倒很歡迎，立即派人至香港，徵求我的同意任廣東的民政廳長。但當我住在香港的幾天，寧漢的軍事終於爆發了。

在香港小住的時期，只知道汪先生夫婦和顧孟餘到了牯嶺，但報紙傳來的消息，說汪先生曾有一度至漢口，並且在武漢成立了武漢政治分會。我很替汪先生耽心，因為寧漢軍事爆發，我判斷唐孟瀟是不能支持的。

唐孟瀟的爲人，我不願意加許多批評，當時一般人們的心中，都以為這個人是極可怕而難於做朋友。大概這種心理由唐孟瀟在湖南時合併劉劍一師所釀成。孟瀟在未加入國民革命軍以前，在湖南是趙恒惕底下的第四師師長，除了他一師以外，還有三個師，那是葉開鑫、賀耀祖、和劉劍。他一次要火併劉師，在宴會上便把劉劍扣留了，後來劉劍死了。他的死因，至今不明，有說他是自縊的，有說他是被殺的，但無論如何，劉劍是死實了，而且死在被唐孟瀟扣留的期間。這一種傳說，遂使保定的軍官同學們都懷有唐孟瀟靠不住的心理。

在武漢將下之時，唐孟瀟擴軍心太切，想把三師擴爲三軍。鄧擇生對這種舉動十分不贊成，因擇生是

一個廣東人，心想先擴充廣東的有功軍隊再議其他，而孟瀟的擴軍慾倒想先陳真如和張向華而成三軍，這也使擇生不斷對蔣先生說話的緣故。我在李家橋一次見到蔣先生，他很憤慨的說：「我們不要兩湖了。」這無疑的是擇生多說孟瀟壞話的結果。④擇生當時不止對蔣先生如此說，對各將領也如此說，後來雖然擇生利用孟瀟支持武漢的局面，宣傳他是如何如何的革命，但那些先入爲主的成見，沒有一個人能忘。

「孟瀟恐怕靠不住吧！」這句話差不多深深透入各人的心坎。因此他的舉動是有可疑的，固然使人感覺不安，就是絕無可疑的，人家也會有不情的推測。我還記得在東征時候，我們都在九江。朱益之那時的軍隊沒有參加，對於唐孟瀟軍隊也有相當的警戒。

「公博先生，你看孟瀟會不會假東征爲名來搶江西？」益之終於忍不住問我。寧漢分裂以後，我和益之比其他將領都熟，他坦白的陳述他的恐怖。

「我雖然不能保證，但我相信孟瀟沒有那樣蠢。我看他無論怎樣梟雄，政治上終要找一個領導者。現在北方已崩潰了，他絕不會投北的。南京正在對峙，他也不會附寧方。這樣他如果要奪江西，最少也要得中央的同意，你看我們能讓他這樣胡幹嗎？他一個人敢這樣胡幹嗎？」我把客觀形勢分析給益之。

到了今天，我還敢保證孟瀟沒有這樣心思，但一個老實的朱益之，竟會疑心到孟瀟搶江西，孟瀟之不爲人信任，我們已大畧可以想見了。

在北伐之時，孟瀟也種下許多禍胎。北伐出發之師，在廣東原本編有幾軍，第四軍兩師和一獨立團，由陳可鈺領之。第一軍兩師由王柏齡領之。第二軍三師由魯滌平領之。第六軍兩師由程頌雲領之。照道理說魯程兩軍都是湖南人，應該入湖作戰，但孟瀟恐怕譚組安和程頌雲搶湖南的地盤，極力拒絕而使他們踰



梅嶺入江西，這也是譚程不滿於孟瀟的原因。

東征的前夕，孟瀟也太開玩笑了。當時定東征總司令之時，他的參謀長龔孟希把系統表向軍事委員會呈核，把譚組安列在孟瀟指揮之下。「哈，哈，這使不得。」孟瀟笑起來把筆勾了譚組安的大名，那時大量和圓通的組安，一時也面紅過耳，大家都見到而替他難受。後來組安還對人說：「今天會議沒有什麼，只是我們又得一個新上司罷了。」

根據種種的原因，孟瀟真是專走自取其禍之路。他更在寧漢合作期中，一定堅持要派兵下蕪湖，在九江一夕辯論之中，譚程兩位老先生已看出德鄰不滿的心事。他們在駛南京的船上，早定了討唐計劃，只是汪先生和我們還蒙在鼓裡罷了。至到汪先生到京之時，程頌雲才把這事通知汪先生，要求汪先生同意；你想當時北京未下，張宗昌和孫傳芳的軍隊還虎踞徐州，汪先生怎樣能答應這個操刀自割的計劃呢？⑥這又是我們和李白反臉，甚至和譚組安反臉的來由了。

李白討唐之役很快便結束，譚組安和程頌雲都會任過湖南的都督，許多舊部的將領任職於孟瀟軍中，還有廣西籍的將領李品仙和葉琪早已和李白有默契。譚程一掀反唐的大波，新興的唐孟瀟自然像冰山般瓦解。孟瀟見大事已去，臨走之時還把一個通敵的師長張國威勒死在他的浴室中，才踏上一艘日本兵艦逃日本。我於民國十七年在上海重見孟瀟，問他爲什麼失敗那樣快。他說：「何芸樵是久懷異志，李鶴齡好貨太甚，所能靠的軍長只有劉鐵夫一人，怎麼會不快失敗！」孟瀟果然有事後先見之明，然而可惜太明白於事後罷了。

無論怎樣，孟瀟到底對於北伐有功，在大敵未滅之前，國民革命軍自相火併，實爲北伐以來的第一次，這實在使我們不能同意。因着孟瀟的失敗，武漢的政治分會自然也隨着冰消瓦解，南京的特別委員會似乎更穩固了。

李任潮的態度怎樣呢？他對於特別委員會，爲着李白支持的關係，早已表示贊成，我到廣東第一次見他之時，廣州已四面搭起牌樓，預備於十月十日慶祝特別委員會成立。⑥我歷陳我反對特別委員會的理由，任潮也以爲我很有法理和事實的根據，但沉着的李任潮，似乎依然不很大方。

「武漢不是開除過我的黨籍嗎？」任潮表示着不滿意。

「這些舊帳，我以爲可以不必再算了。武漢許多人何嘗不給南京開除黨籍？何況在寧漢復合時候，武漢把一切被開除黨籍的人們都恢復黨籍了。」我只好安慰他。

任潮的態度變了模樣，他要黃季寬來粵才確立他的主意。這時張向華早已到香港，起初躲在鄒敏初家裡，不願意見客，甚至乎連我也不願見面。有一天他急了，叫余愷湛來找我。爲什麼呢？因爲任潮給了他五萬元港幣，要迫他出洋。軍人離開了軍隊就等於喪失生命，他這時只好設法找到我商議。

黃琪翔那時正率領第四軍部隊渡梅嶺南歸，李任潮一面派人歡迎，而一面又感覺臥榻之側有人鼾睡的威脅。四軍初抵廣東，提出無數的要求，財政廳長要任鄒敏初，軍事廳長要任朱暉日。朱步雲是我認識的，鄒先生是什麼人，倒似不見經傳。一天財政廳長馮祝萬先生來見我了。

「我以爲公博先生應該做財政廳，怎麼找起鄒敏初來？」馮先生很憤慨的提出異議。

「我做過武漢的財政委員會主任，我發誓再不幹財政的事情。鄒敏初先生到底誰荐的，而又是什麼人

？」我笑起來璧謝馮先生的建議。

「鄒敏初呵！他只是一個捐棍。他是向華要求的，因為他和四軍中人都有捐務的關係。他爲什麼和四軍熟呢？他每逢承包了一個地方的捐稅，便邀駐防的軍官們入股。但這是不過一句話，你入股與否倒無關係，每逢節日，他照例按着股份送上利錢，聽說向華當團長時就有經濟的關係。」馮先生又憤慨的敘述鄒先生的歷史。

向華對於任潮怎樣要求，我是不管的，我所管的只是要反對南京違法的特別委員會。任潮當日雖然很委屈的接受向華的要求，但卸任的財政廳長馮祝萬和卸任的軍事廳長徐景唐全是他最親信的左右，這時任潮已感覺極端威脅了。任潮先生雖然鎮靜而沉着，但威脅是必須排除的，他於是恃着老長官的資格，迫着向華出國遊歷。他又恐四軍恃着新勝凱旋之勢，難於駕馭，又請駐在福建蔡廷鍇的軍隊回粵休養，並指定潮汕爲蔡部駐防之地。蔡部自從在南昌脫離張向華之後，已請陳真如重回軍中，並且把軍隊拖至福州之後，又繳了第四師譚曙卿全師的槍械，立刻恢復十一軍的番號，而由真如重任軍長。①這個十一軍經過向華兼併之後，積不相容，任潮就用這種手法，來壓抑向華的氣燄。

這種手法一來，輪到向華受威脅了，任潮迫他出洋，他已經十分不願意，何況陳真如同粵，那更激起第四軍全軍的反感。要不出洋，更要防止陳真如同粵，張向華只有反對李任潮。用什麼名義反對李任潮呢？惟有煽起反對特委會的口號，才能得天下的同情，這時向華的主張漸漸和我的主張接近了。但我們當中有不同之點，我是主張拉着任潮反對特委會的，向華和他的將領是主張驅逐任潮反對特委會的，這個不同的論點，直至汪先生回粵之後才統一。

武漢差不多被李白攻陷時候，汪先生實在不能再住居牯嶺了。我和任潮、向華商量，請汪先生回粵再商大計。這個提議黃季寬首先贊成，於是我們打了一個電報給汪先生，而汪先生也就回至廣州，並且請了顧孟餘、何香凝、王法勤、陳樹人、甘乃光、王樂平、潘雲超、朱霽青等至粵，這是後來所謂粵方委員，這是南京一班特委會的先生們替我們上的尊號。

汪先生告訴我汪蔣合作已成熟了，那時蔣先生已到了日本，屢次派人謁汪，表示竭誠合作，但合作的辦法怎樣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來廣州。廣州可不是還有問題麼？他於是要求我們驅李，如果驅逐李任潮之後，他願意來粵，再辦黃埔，再練兵。張向華既想驅李，而蔣先生又要求驅李，那麼我的和平論自然失了支持，於是驅逐李遂爲既定的政策。我當時實是不願意，但我素來是服從多數的，也就那樣辦罷！⑤

汪先生最初主張在粵掛起中央黨部的招牌，李任潮和黃季寬都不贊成，只同意和李白磋商，把特委會撤廢而重開第二屆中央的第四次全體會議。這個提議算被李白所贊成，汪先生遂和任潮一同至上海開預備會，而我們待任潮起身的第二日也動手驅李。

我們爲什麼不在任潮在粵時候動手呢？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實在當時的友誼，各人還願意保存着，雖然政治意見不合，友誼還應好好的顧全；這或者是東方一種道德，而爲主張澈底的人們所不了解。

汪先生未離粵之前，宋子文先生先到過日本，並且由日本趕來了廣州。他並說蔣先生來粵，他也來粵，不過他宣稱不任財政，託我先向四軍聲明。所以當日如果驅李之後，沒有共黨暴動的話，蔣宋都會南來，如果廣州另行規立一個新的局勢，恐怕今日的歷史已又需要另一種寫法。

驅李之役很簡單，本來任潮已不在廣州，實在不驅也早已離粵。所謂驅李，只是出了一張佈告，由黃琪翔用第二方面軍的名義，李福林用第五軍的名義，我用政治部的名義，會同署個名，再則派了些軍隊搜查李任潮的公館，戒了一夜的嚴，算是了事。④當時所苦的祇是黃季寬，他那時到粵送汪先生和李任潮的行，任潮留他主持軍政。驅李之役，倒是一人不傷，不止黃季寬及時而逃，連馮祝萬等都聞風先走，大概四軍中人都是舊日袍澤，沒有發動，就通知他們預早避開了。

加入驅李之役的，還有新編第二師薛岳，和獨立團黃鎮球。薛伯陵因不滿於清黨，剛剛佔領上海，便向汪先生辭職，回粵之後，任潮命他爲新編第二師。至黃劍陵則爲朱步雲的連襟，這也是爲向義而來，加入了這個新團體。

不幸得很，驅李之後，共產黨便暴動了。本來向華在武漢分共時候，以共黨護法自居，雖然爲着南昌賀葉之變，向華才被這一激轉而分共，然而共產黨潛伏於四軍之中的還不少，他的參謀長葉劍英先生就是一個共黨的要人。葉劍英不止是參謀長，還兼領了一個教導團，就是四軍的警衛團團長也是一個共產黨。碰着代理總指揮的黃琪翔先生又是一個刻意要做左派的一個人，四軍回粵之時，沿途張貼標語，就有一清黨就是「亡黨」的口號。我最初之不贊成驅李，這也是一個極大的原因。

朱步雲先生當時是軍事廳長而兼公安局，他倒對於搜捕共黨不遺餘力。他對於黃琪翔是不滿意的，一個對於共黨是嚴厲，一個對於共黨是縱容，這不獨四軍中人知道這些衝突，連一般社會也知道這些衝突。一次朱步雲捉了幾個共黨，把他們關起來，後來因爲他們病了，送到市立醫院療治，竟直被幾個武裝兵士

乘一駕汽車從醫院裡搶出放走。這些消息，不只已傳遍了廣州，大家已像大禍臨頭，知道共黨終有爆發的一日。

果然十一月十三日共產黨在廣州暴動了，主持暴動的就是葉劍英，而參加暴動的也就是四軍的教導團和警衛團，關於這事我已在一「軍中環記」描寫過，<sup>⑩</sup>不再贅述。自從共產黨暴動之後，四軍大失人望，連帶軍心也動搖起來，在會議席中竟直有人主張歡迎任潮回粵，向華看看已有點掌握不住自己的軍隊。奇怪得很，向華自回粵之後，自己早失了信心；驅李時候，他住在香港，不肯露臉，而驅李之後，許久都不見回省。我忍不住命余愷湛到港找他，據余愷湛的報告，說向華怕黃琪翔不歡迎，故不敢上省。真奇怪，我只有親自至港見向華了。

「爲什麼你怕黃琪翔拒絕你？」我表示驚訝。

「琪翔會派人來，說總指揮不必上省，等事情平定之後再請你回來主持。顯然琪翔要抵制我了。」向華很苦悶的訴說。

「豈有此理？我終不信你的推測。你四軍裡難道都不服從你，而服從黃琪翔。回去罷，有岔子，我替你担保。」其實四軍的事，向華比我知得詳細，但我不能不大胆的空口保證。

向華當時已缺乏了信心，回粵之後，也只當了一個軍事委員會分會的常務委員，不肯直接指揮軍隊，到了共黨暴動之後，連他自己也搖動了。那時上海正在開四中全會的預備會議，汪先生直接提出蔣先生復職總司令。蔣先生復職，固然李白大反對，組安也不大贊成。他們無法否決這個提案，遂把驅李和共黨暴動混爲一談，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我們的身上。李任潮和德鄰、健生，因爲我們驅李，自然恨極我們，而孫

哲生則因為我們反對特別委員會，也不顧事實的對我們深文周納。我們在廣州費了三天之力才把暴動的共黨肅清，<sup>①</sup>而京滬的宣傳都說我們實在就是共產黨，而我們也實在是暴動的主力，京滬的廣東同鄉會在李任潮和孫哲生指揮之下，大開會議，向國府請願討伐我們了，並且請李任潮回粵平亂了。<sup>②</sup>

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認為暴動的主要人，白健生竟直找杜月笙要用綁票的方式派人直衝汪先生的寓所，企圖加害。杜月笙說：「這事我做不來主意，你問法國領事罷。」及至白健生找法國領事，法國領事也說：「這事我們不能幹的，你找杜月笙罷。」這樣互相推諉，事情才平淡下去；法國當局於是勸汪先生離滬，蔣先生也勸汪先生出洋，汪先生終於離滬出國往歐洲了。<sup>③</sup>

廣州自經共黨一度焚燒之後，雖然損失不大，我們確實難以支持。軍心那樣的動搖，而民情又那樣的責難，陳真如和陳伯南由東江向廣州進攻，黃季寬又帶兵從梧州西下，看看我們只有放棄廣州了。蔣先生有電來叫我們退守韶關，宋子文更派林子峯持手函來，叫我們把中央銀行遷北江，但經我們一度討論之後，認為過於危險，因為那時的滇軍范石生一師是駐防北江馬壩一帶的，范石生本來已不甚可靠，而那時他又容納了從南昌暴動失敗下來的朱德一團人，萬一范部來一腰擊，豈不是四軍要全部覆沒？

四軍還很勇敢，也太樂觀，經過幾次會議之後，決意不守廣州，決定不受東西的夾攻，打算全軍向東江出擊，等到打勝了陳真如和陳伯南之後，再回師打黃季寬。經過共黨的事變，黃琪翔已不為四軍所信任，把各軍隊重編之後，分作四個師，吳奇偉、李漢魂、鄧龍光、許志銳，任了師長，而以繆培南為四軍的軍長，薛伯陵任副軍長。當時計劃是請李福林的第五軍守廣州，前哨放至三水，希望他把廣西軍隊擋住一個或兩個星期，東江之師自然可以從容滅敵，而且可以從容回師救援。

中央銀行怎麼辦呢？無論如何不可留以資敵。第四軍發了兩個月餉，第五軍也發了兩個月餉，還剩下五十萬元的現銀，拿到沙面滙豐銀行滙給蔣先生，作總司令復職的軍費，以表示汪蔣合作之意。這樣廣州還不是在唱空城計，因為還有第五軍留守後方，他們既有一軍的實力，大可以抵抗黃季寬的軍隊。

但計劃都不能當如意算盤的，第五軍的戰鬥力本就很差，而且李福林先生是一個老實人，心想保存他辛苦經營的第五軍，遂自動辭職，而找鄧彥華先生繼任。鄧先生原本和任潮有相當深切關係的，拿了這個第五軍，他那裡肯抵抗黃孝寬，就是李福林先生的本人，也不見得要抵抗廣西軍隊。

四軍最後部隊剛離廣州第四天，廣西部隊已到三水，第五軍見廣西軍隊到達，一撤便直撤到西南。<sup>⑭</sup>廣州是不可以再留的，向華和我僅在廣西部隊到達廣州的頭一天，乘了譚禮庭先生的煤炭船，連夜往香港。我和向華是在十二月二十二夜到香港的，在那裡足足住了一個多月，爲的是等第四軍在東江的捷報。但廣西的部隊也很迅速，到了廣州之後，一刻不停便往東追。四軍在東江打了兩次勝仗，一次幾乎捉獲了蔡廷鍇，但在前的大敵未除，廣西部隊已從後追到。這樣前有強敵，後有追兵，四軍支持了幾天，迫得依照蔣先生的原議，往江西撤退，還幸朱益之和我們有交誼的，對於四軍糧秣給養，還盡力維持，在江西休養些時，便調往江北，參加第二度北伐戰役，進攻山東了。

回廣州是沒有希望了，我們往上海罷。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先向華往上海，而廣州則大吹大擂，還替我們立一個共禍紀念碑，說這次共禍是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勾結共黨，焚殺廣州，這一座豐碑直至廣州非常會議之時，<sup>⑮</sup>爲着歡迎汪先生上省，才連夜自己拔去。

至上海以後，知道我們滙蔣先生的五十萬元，滙豐銀行並沒有滙去，大約李任潮回粵已和滙豐銀行商



好。把這筆款扣留。英國人這樣做法，當然示好於粵，是爲後來港粵交歡的張本。但最使我吃驚的，廣州驅李之役，蔣先生是一個有力的主動人，我到了上海，才知道李任潮回粵打我們時，蔣先生又給了他三十萬元作打倒我們的軍費。唉！蔣先生太聰明，太現實了，<sup>⑥</sup>你爲着洗刷，我自然不好加以批評，但政治道德畢竟是這樣的嗎？

驅李之役還有點尾聲，就是事後薛伯陵對於張向華異常不滿。四軍參加第二度北伐成功之後，許多將領都由前方請假回至上海玩，我一夜在東亞酒店碰見了他們，室內烟霧薰騰，人聲喧雜，我跑到陽台，倚着鐵欄看看馬路上的人海，望着天空的星河，吸些新空氣。

「我和你都上當了。」背後忽然有人對我說。

「怎麼說？」我回首見薛伯陵站在我的身後，他不知何時踱出了陽台。

「向華回粵時對我說，他有三個師的實力，我出發東江時，才發現他的三個師非常殘破，合起他的三個師還沒有我新二師那麼多槍枝。倘我早知如此，也不跟着他們癩幹。」伯陵表示他的懊悔，很怨恨向華。

「那也不必再提了，向華一生就不肯說老實話！」我微微嘆了一口氣。

其實，我對於此事絕不後悔的，要不幹早就不幹，既幹了那又何苦去追悔。末後在民十七我和向華同住上海時，中間經鄒敏初的介紹，朱步雲先和李任潮見面，張向華繼之，他們是否言歸於好，我不得而知，但我有我的立場，始終不肯和任潮見面，等到他自湯山釋放出來之時，才在南京的會場上相見。

呵！鄒敏初先生可以作他們晤面的介紹人，我又明白了鄒敏初不止和向華他們有經濟的關係，他和任潮也有經濟的關係，當日馮祝萬先生對我批評鄒敏初，實在只告訴我一半的事實。

### 第七章註釋

①見「苦笑錄」第八章註釋③。

②陳炯明打倒陸榮廷，然後攻桂，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畧」，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一年，頁一〇二至一〇四。而關於桂系這個名詞之淵源見 D.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p. 75。

③在另一方面，李宗仁對陳公博則有以下之印象：「陳公博此時（一九二六年五月）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部長，和我亦常有往還。陳氏生得一表人才，能說會講，在廣州風頭甚健。」見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明報月刊」第一四八期，一九七八年四月，頁八一。

④唐生智與蔣介石在北伐期間之紛爭，可說是從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長沙會議起開始，據李宗仁所記，在長沙會議席上，有人曾主張對鄂暫取守勢，而將主力移向江西取攻勢，此項建議，一是受地域環境所影響，「同時，中央亦可能在暗防唐生智之反側。恐其得志于武漢之後，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今番如對武漢取守勢，全師東移，則吳佩孚主力南下，與之作消耗戰者，將為唐氏。迨其兩敗俱傷，我主力肅清江西後，再北取武漢，則無虞唐生智之割據稱王矣。」見「李宗仁回憶錄」，「明報月刊」第一四九期，一九七八年五月，頁九一。及至九月十五日，蔣介石「與鄧演達及嘉倫將軍談，決調第二師入贛作戰……歎曰：「革命環境乃至於此乎，壓迫牽制監視之難堪，迴腸盪氣，忍痛而已。」」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十七冊，頁四二至四三；又於九月十七日蔣氏於李家橋「通電各將領

鄂事暫交唐總指揮負責」，同上書，第十七冊，頁五十；但蔣介石又說：「……武昌未下，江西激戰，內部複雜，患生肘腋……。」同上書，第十七冊，頁五四；九月十八日又有記錄說：「湖北軍事交孟瀟負責辦理，民政以鄧演達為政務委員會主席，財政以陳公博為財政委員會主席……惟中（蔣介石）離鄂以後，武漢政治恐不易辦……。」同上書，第十七冊，頁五五。

⑤李宗仁、白崇禧、譚延闓和程潛等人主動討唐，據湯良禮所說其原因有二：（一）李宗仁等欲滅唐生智之勢力而自固；（二）以汪精衛為首之武漢政治分會素以反對特別委員會為最激烈，故有意討伐之。見T'ang Leang-li, p. 307。而湘籍將領譚延闓及程潛，又早對唐生智懷有宿怨，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七七九。而李品仙更清楚地指出討唐之役的內幕，謂「對唐生智之討伐，係根據（特別委員會轄下之）軍事委員會的建議，當時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先生大都是軍隊的高級將領，其中有湘籍委員數人（即譚延闓、程潛等），在北伐之前與唐有私人恩怨在內，也許是公報私仇，主張西征根本解決武漢的武力，或者因唐據有武漢及兩湖地盤，或未經政府許可擴張軍隊，凡此均足以令人不快，因此必要予以打擊並將其軍隊解體亦未可知。」見「李品仙回憶錄」，頁九七。又參考「李宗仁回憶錄」，「明報月刊」第一四七期，一九七八年三月，頁六三。

⑥桂系將領如李濟、黃紹竑在原則上是支持特別委員會的，見黃紹竑：「五十回憶」，頁一八一至一八二。

⑦陳銘樞回粵重掌第十一軍軍長，其意是聯合李濟、陳銘樞之軍而驅走張發奎在廣東之勢力，故此張發奎與李濟、陳銘樞等必生衝突，據蔡廷鍇所回憶：「我（蔡廷鍇）復商請……陳軍長銘樞回閩復職……陳軍長回部復職後，與廣東分會李主席濟、陳聯絡甚密切。」第十一軍於福建編整之後，「即籌備動員旋粵，

正當此時，忽接第四軍軍長（張發奎）由粵來電，云彼軍已返抵粵休養，情形如此，我軍返粵，不免畧成問題，我即向陳軍長報告，畧謂「第四軍現已先行返粵，倘雙方不諒解，雖免又生內爭，那時粵局更不可收拾了。」見蔡廷鍇：「蔡廷鍇自傳」，出版地缺，自由旬刊社，一九四六年，上冊，頁二二五。並參考 T'ang Leang-li, pp. 308—309; Lary, p. 83。

⑧ 蔣介石聯合汪精衛、張發奎驅逐李濟琛，見 T'ang Leang-li, pp. 308—311; Lary, pp. 83—85。而蔣、汪、張等人皆以反對特別委員會為根據。蔣介石此舉可說是報復桂系迫他辭職離國之怨。而造成汪、蔣之合作，宋子文是其中重要人物，據「反蔣運動史」記載：「此時宋子文則已為蔣任聯汪之役，蓋自蔣於上月（十一月）十五日返滬後，即已開始與汪合作之醞釀，以冀對付共同目標之南京特別委員會。」見「反蔣運動史」，頁三三至三四。並參考 T'ang Leang-li, p. 309。

⑨ 廣州驅李之實際行動，見雷嘯岑，前引書，頁一〇七至一一一；李雲漢，前引書，頁七九五；「反蔣運動史」，頁三四；黃紹竑，前引書，頁一九二至一九七；T'ang Leang-li, p. 311; Lary, p. 84。

⑩ 廣州共變之始末詳情，陳公博在「軍中稟記」一文中頗有詳細描述，唯陳氏所記共產黨暴動日期為十一月十三日者，實誤，正確日期應為十二月十一日見陳公博：「寒風集」，頁甲一五五至一八五；並參考陳公博：「我與共產黨」，載於「寒風集」，頁甲二六〇；李雲漢，前引書，頁七九四至七九七；雷嘯岑，前引書，頁一一三；T'ang Leang-li, p. 317; Lary, p. 85; H. R.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285—289。

⑪ 蔣介石之復職提案是由汪精衛在四中全會預備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提出，而蔣介石則於一九二

八年一月九日在南京正式通電宣佈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此可說是汪、蔣合作之第一步。而李雲漢還有一段重要記載：「所謂『汪蔣合作』，原是李濟琛所喊出之口號。他於（一九二七年）九月間發表對時局的宣言，大談『汪蔣合作』之論。後來由於擁汪之張發奎發動第一次廣州事變（即驅李濟琛之役），驅逐桂系勢力，李濟琛才轉而反汪。」見：「從容共到清黨」，頁八〇〇至八〇一。陳公博與張發奎等合力肅清廣州共變之經過，見雷嘯岑，前引書，頁一二三；「第四軍紀實」，頁一八七至一九〇；「反蔣運動史」，頁三五、T'ang Leang-li, p. 318; Lary; p. 86; Isaacs, pp. 289—290。

⑫李濟琛、黃紹竑被驅出廣東後，已經開始策劃討伐張發奎、黃琪翔之軍事計劃，現更由於廣州發生共變，李濟琛等桂軍更是出師有名，遂電粵東陳濟棠、徐景唐所部粵南第四軍後方各師，向廣州進發，黃紹竑自粵邊率領桂軍第十五軍，陳銘樞由福建方面指揮蔣光鼎、蔡廷鍇所部第十一軍，皆兼程入粵討伐張發奎等。見雷嘯岑，前引書，頁一二四。此次所謂「新粵桂戰爭」（黃紹竑語），是國民革命軍中素以善戰著名的四七兩軍（張發奎軍及桂軍）的互相火併，傷亡甚大，最後張發奎軍以寡不敵衆敗陣而逃。見黃紹竑，前引書，頁一九六；蔡廷鍇，前引書，頁二二六至二二九；「第四軍紀實」，頁一九四至二一九；「反蔣運動史」，頁三四至三五。Lary, p. 86。

⑬汪精衛是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離開上海，乘輪到法國，見李雲漢，前引書，頁七九九；T'ang Leang-li, p. 319。汪精衛的出洋原因，可說在連串事件發生後（尤以廣州共變一事），已不能見容於桂系，特別委員會等人，而汪蔣合作之議亦因此而導致失敗，汪精衛於臨行前曾發表一些重要文字，其一一指出「當你們（特別委員會中人）討伐唐生智的時候，我們由漢口跳到上海，又由上海跳到廣州，……

你們籍着幾個總指揮勢力作背景，使我不能安居，想迫其走入共產黨隊伍內，實爲我最悲慘的境遇。」見雷嘯岑，前引書，頁一二六；其二說明：「數月以來，兆銘以參加反特委運動之故，備受特委方面之仇視，始則惴惴然惟恐兆銘無共產嫌疑，不惜百方以圖污蔑；今則又惴惴然惟恐無所藉口，不惜別立名目，甚至不惜毛舉率漢分裂時代之議論文字，以圖挾已合之創痕。……願個人引去，以息糾紛矣。」見「汪精衛宣佈引退並主張召開四中全會取消中央特別委員會電」（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載於「革命文獻」，第十七輯，頁一七六至一七七。

⑭張發奎之第四軍與李福林之第五軍被迫離粵，參考註⑫，而張發奎在敗陣後，即通電下野，其餘下之部隊轉由繆培南指揮，自己離開廣州，並通電服從蔣介石總司令，候命北伐。見李雲漢，前引書，頁八〇四。

⑮那座共禍紀念碑，碑文寫着：「去歲（一九二七年）之秋，汪精衛、陳公博等回粵竊政。其黨張發奎、黃琪翔所部，教導團、警衛團、三千餘人，於十二月十一日結同共產黨與近郊土匪，公然暴動，組織蘇維埃政府於廣州。星火燎原，幾爲東亞禍，政府合兩粵之兵力，始克定之。當時俄領指揮其間，大肆荼毒。雖前後僅三日，焚燬南關等處鋪戶數千間。死亡枕藉於途，光華璀璨之廣州，一變而爲瓦礫腥臭之場。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弗是過也。愴懷往事，痛何可已。居安慮危，時宜在念，爰豎此碑，以誌警惕云爾。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各界民衆團體立。」見陳公博：「軍中環記」，載於「寒風集」，頁甲一五五至一五六。

⑯蔣介石在廣州驅李之役的一個主要幕後人，參看註⑧，陳公博在「改組派的史實」一文中亦指出張發奎

軍的崛起反李濟琛是蔣介石所預知的，見「寒風集」，頁甲二七〇。而當李濟琛等以平共靖亂爲名率軍攻打張發奎等，蔣介石本人亦是贊成的，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時亦指出：「共產黨出來擾亂，我一定負責任討伐他，我已經和李任潮同志商量，決定三個步驟：第一、責成張發奎撲滅共產黨。（十一月）十七日的事變，張發奎雖不在廣州，但事後他即到廣州去，後來一直在廣州，他對於這次事變是應負責任的，所以要責成他去戡平粵亂。第二、是要同時進行的，我們一面責成張發奎，一面還要命令廣東附近各軍一致討共，務達消滅目的。第三、各軍如有設一總指揮的必要，或者我親自到前方去，李任潮同志留駐南京；或請李同志去廣州。」見蔣中正：「對於時局的談話」，載於「革命文獻」，第十六輯，頁一〇九至一一〇。

## 第八章說明

陳公博主編的「革命評論」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創刊，每周一期，直至同年九月三日被封禁爲止，一共出版了十八期，而每期出版數量據說是在三萬五千冊左右。除陳公博外，「革命評論」的主要撰稿人還有許德珩、施傳統、劉侃元、蕭淑宇及馬濤等，這班人的政治思想可說是站在國民黨的左派（激進派）的一方，而「革命評論」停刊原因，和這一點不無關係。除此之外，陳公博更指出停刊的三個重要因素：

（一）在召開五中全會前的時候，陳公博與蔣介石手下親信吳稚暉曾經激烈辯論自己和粵方委員之出席問題，以致吳稚暉大爲憤怒。

（二）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初所發生的濟南事件中，陳公博等人曾在「革命評論」裡大肆評擊黃郛及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其軟弱和妥協性有辱國體。

（三）五中全會以後，胡漢民返國與蔣介石合作，並因胡氏曾出力拉攏陳濟棠，蔣介石之打倒桂系之軍事行動乃得成功；而汪精衛與胡漢民既不能合作，蔣汪合作之基礎遂破裂，「革命評論」之出版便壽終正寢了。

「革命評論」所發表的議論文章，可說是代表了國民黨左派和後來成立（一九二八年冬）的改組派的立場。就陳公博而言，在「革命評論」未刊行之前，他在「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一九二七年）一書中表明自己思想的系統，簡單來說是：

（一）承認事實上的階級，



- (二) 否認中國內的階級鬥爭，
- (三) 以黨專政消滅不平的階級，
- (四) 建築民生主義的國家，
- (五) 創立三民主義的國際。

在同書中，陳公博亦指出中國國民革命的部隊是以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為基礎，主幹部隊尤在農、工、

陳公博更建議國民黨的成分應當保持下面的比例：

黨員百分比

農民	百分之五十
工人	百分之三十
小資產階級	百分之二十

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九二八年）一書中再次清楚地顯示國民黨的錯誤發源於黨的運用，羣衆運動及政治訓練等地方。

自從上述兩書出版後，國內已產生了很激烈的理論鬥爭，而「革命評論」的刊行便使國民黨內的思想鬥爭更爲熾烈，陳公博在「革命評論」的創刊號裡發表一篇名爲「今後的國民黨」，開宗明義的指出：今日的中國國民革命，因着革命中間的種種矛盾，已經到了一個最危險時期，更由危險而入於幾乎中斷以致潰散的境地，形成此危機的原因，外在的是由於中國國民黨受到帝國主義、第三國際及封建勢力的攻擊；而更加重要的是國民黨內部起了左傾、右傾、腐傾及惡傾等四種不良傾向。左傾的同志們慨嘆目前處境可

悲，更而憂慮、消極迫而被排於奮鬥的戰線外；右傾的同志們却將一切責任諉之於他們所謂的「準共產黨」，極力排擠他們；腐傾的同志實行其個人的「混混主義」站於幾個軍事均勢之上，兀臬求保目前的苟安；而惡傾的同志們只有割據一個地方，希冀各展其私人勢力，逐漸火併其他的割據者。

在這個惡劣的景况下，國民黨的專政是無法實行的，這裡我們要說明陳公博所說「黨的專政」的意義。陳公博認為國民黨是超越階級的，而國民黨的使命在乎協調及團結農民、工人、小資產三個階級的革命力量，進而最後泯除這三個階級的特性而使之都成社會生產的一員。欲要國民黨能夠實行專政，陳公博提出四項要求：

- (一) 黨的要求——以為國民黨必須再次統一起來；而欲黨的統一，黨必須首先重行改組。
- (二) 民衆運動的要求——陳氏認為國民黨有恢復民衆運動的必要，而民衆運動的綱領亦該重新檢定。
- (三) 政治的要求——國民黨的外交綱領、財政、建設計劃及自治方案等皆應切實檢定執行。
- (四) 軍事的要求——陳氏認為現時的危機「以軍治黨」進而「以軍分黨」，故此軍事的統一，軍隊要接受政治訓練、和裁減軍備等為最急的要務。

最終的結論是國民黨必須改組以挽救國民黨本身的生命，而陳公博在「革命評論」第十期裡再發表了「黨的改組原則」，清楚的指出改組的信條是：

- (一) 相信總理的全部遺教是我們一切思想行動的標準。
- (二) 相信以民生史觀解釋三民主義是最正確的解釋，反對唯心派及其他似是而非的解釋。
- (三) 相信三民主義是指導革命之最高原則。

(四) 相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須與經濟革命相輔而行。

(五) 相信實現民生主義是國民革命的最後目的。

而改組派對於各派的態度是：

(一) 對於第三國際之態度——甲、暴露其指使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國民革命之罪惡。乙、指摘其東方政策之錯誤：①不當聯日，②不當阻碍朝鮮革命。丙、不當援助日本有滿蒙之侵畧。

(二) 對於中國共產黨之態度——甲、對其團體盡量反對，並嚴厲制止其活動。乙、對其主義與政策盡量指摘與批評。丙、對其份子，在可能範圍內，予以自新，使其脫離共產黨組織。

(三) 對於第三黨之態度——甲、根本反對第三黨之存在。乙、批評其與本黨不相容之主張。丙、誘善其覺悟的分子。

(四) 對於西山會議派之態度——甲、堅決反對其整個派系。乙、掖進其有革命性的分子。丙、糾正其思想和行動的錯誤。

(五) 對於無政府主義派之態度——甲、防止其混淆本黨的理論。乙、制止其混入本黨活動。

(六) 對於國家主義派、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政學會等反革命組織之態度——甲、暴露其反革命的罪惡。乙、糾正其理論的錯誤。丙、嚴厲防止其混入本黨之活動。

「革命評論」是於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停刊，嗣後陳公博與王樂平等人籌辦大陸大學，於一九二八年冬又組織改組同志會，標榜恢復民國十三年改組精神，和重新改組國民黨，但由於種種理由和內部組織鬆散以致於失敗。陳公博亦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離開上海往法國，直至一九二九年五月八日始從法國馬賽回國。

## 第八章 「革命評論」時代

「革命評論」的確是一個革命低潮時湧起巨浪的一個刊物，但我初到上海之時，我始終沒有這個大計劃，今日事後回想，那也不過是偶然的一回事罷。

我爲什麼要到上海？我有幾個原因。第一，我最不喜歡汪先生遇事便出亡，三月二十之變，本來不必走的，汪先生走了。五中全會的時候，實在汪先生也不必走的，他也走了。我既然不喜歡汪先生走，我自己爲什麼要走？第二，人家以爲一個留學生，一定歡喜往外國跑，然而我這一個留學生是特殊的，因爲我總覺得我是一個勇敢的鬥士，要做鬥士，當然要有好的鬥場，放在中國現成一個最好的鬥場，四方八面任我鬥，爲什麼要畏畏縮縮的跑到外國？第三，我的人生哲學和汪先生夫婦不同，汪先生夫婦常說：「合則留，不合則去。」但我呢！以爲汪先生這種見解，只能說是「有古大臣風」，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負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所以一次我和汪夫人辯論；我說：「我的哲學是合則留，不合則打，打不過才去。」現在我往上海，明知也有危險的，可是我要實行「不合則打」的原則，

擇定上海爲一個鬥爭的場所。第四，我從十四年回國之後，始終在軍隊生活，當代的人物，無法接觸，上海是一個人文薈萃之地，就爲訪求名師益友起見，也應往上海一行。何況汪先生提出汪蔣合作的口號，我倒看看蔣先生有沒有誠意。

上海是一個什麼地方？我心裡很模糊。民六、民七、民九、和民十，我都曾路經該地，但逗留最短是五六天，最長也不過兩星期，我所得上海的印象，僅是九尾龜和上海繁華夢的描寫。祇是上海報紙總比廣東辦得好，因此人才必會比較的集中，這是我個人對於上海僅有的好幻想而已。

我初到上海之時，絕不希望辦什麼刊物，只想借人家酒杯，澆自己塊磊。恰好在武漢編輯中央日報副刊的孫伏園先生辦了一個文藝刊物，喚做「貢獻」，我無聊之極，遂在「貢獻」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喚做「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同時在武漢分共時候，寫過一本沒有出版的小冊子，喚做「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頭一篇登在「貢獻」，而第二篇却出了單行本。我萬想不到，這兩篇文章一出，倒哄動一時，雖然說不上洛陽紙貴那套肉麻話，然而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手捧一冊。

清黨以後，最苦悶的是一般青年。這一般先生決意不肯做共產黨，而又苦於中國沒有出路，戴季陶先生所著的「青年之路」是不能滿足他們的知識荒的，南京中央黨部把孫先生拾起來要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他們也是懷疑的。尤其國民黨的青年，分共本來是他們的希望，但分共之後而致開倒車，則爲他們所恐怖。我這兩篇文章一出，差不多京滬和各省都震動了。①事後我翻開我的舊著，實在沒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地方，祇是肯就客觀批評和建議，肯說老實話，除此之外，別無長處；然而就因爲當時沒有一個人肯說話而我胆敢說出來，所以這兩本小東西就鬧動了全國。

爲什麼不辦一個刊物？這是一般青年們向我質問的說話，也是當時所謂粵方委員商量的說話。但辦刊物豈是一件容易事？頭一件事便需要錢，而且說到辦刊物，我真酸鹹苦辣備嘗之矣。中國開書店的老闆照例是賣出刊物而不給你錢，就是給錢罷，一定要一年兩節計算，在這一年兩節中間，你就難得支撐，張羅補綴，也不容易。外國辦雜誌，所靠的是廣告，中國商業還是停滯，而教育程度又那樣低，發行不廣，自然廣告不值錢，這樣虧本生意，又那能繼續。

「現在不是汪蔣合作嗎？爲什麼不找宋子文商量？」這是粵方委員替我出的主意，而且他們也正在要辦刊物。我們既同是粵方委員，爲什麼要分開辦刊物？當中有一個極大的原因，我和顧孟餘商量之時，他主張作文章不署名，而我則以爲不署名等於不負責。末後我們提出一個折衷辦法，我辦「革命評論」，所有文章都署名，他們辦「前進」，文章署名與不署名隨各人的自便。這個辦法決定之後，我便找宋子文，他是爲着汪蔣合作的緣故呢？還是爲着鬼有所歸則不爲厲的宗旨呢？我不知道，但他是終於答應了。他答應每月補助我們三千五百元，二千元是辦「革命評論」，而一千五百元是辦「前進」，其實他當時不允補助，我們也是一樣辦的，不過經費沒有那樣寬裕罷了。

辦雜誌也是要班底的，否則文章不容易繼續，恰巧那時許德珩、施傳統、劉侃元、蕭淑宇，都聚在上海。許德珩是我北大的同學，施傳統也是我的舊朋友，蕭淑宇初從江西卸去第三軍的政治部主任東來，算是我一個舊屬，而劉侃元則雖然新識不久，却也談得來。這樣有班底，有經濟，於是大吹大擂起來，頭一期祇印三千份，末後爲着要求，更不斷的翻版。②

「革命評論」僅出了十八期便夭折了，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時間計算，只出了四個半月，爲什麼停版

呢？容後再說。「革命評論」雖然說是風行一時，但實在最多每期只出一萬五千冊。不過確是震撼一時，不止中國各地受了影響，連在中國的外國人也有了深刻的印象。英國的在華機關報「字林西報」還特地爲着「革命評論」做了一篇頭版的記載，說「革命評論」每期出版三萬五千冊，中國人看雜誌，大概平均五個人看一份，這樣看「革命評論」的青年總在十八萬人左右。路透社更根據這個記載，打了一封長電到倫敦，倫敦的泰晤士報更鄭重其事的登載，這樣的風起雲湧，南京感受極端的威脅了。

「革命評論」掀起了思想的巨潮，各地的刊物遂應運而起，只在上海就有響應氣求的刊物十幾二十種，真是洛山東崩，銅鐘西應，慢慢各地因着思想的相同，遂發生自動的組織了。所以當時縱使沒有別的外，「革命評論」之壽也不會長，何況不久便發生三件大事。

那三件大事呢？第一件是五中全會要開會，我本來沒有打算出席，因爲有新聞記者來問，我隨便答說要去南京。這種談話本來不關宏旨，但惹起吳稚暉老先生大動肝火。吳老先生當時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一定要單獨找我對壘，以他老人家的地位，就要對付我，也大可以不必親自出馬。大約吳老先生以爲他一發表文章，我必定要本敬老之旨，不會還拳，不過我當時實在還是少年氣盛，正在沒有好氣時候，剛剛吳老先生找上門，我不禁搔着癢處，樂得下身手。這樣「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文章往來了好幾個回合，畢竟吳老先生能忍耐，就此鴉雀無聲，而讓蔣先生出頭。③蔣先生也捉不住我的痛腳，只在報紙來一段談話，說廣州事變，我應該負責。這一段談話自然意在排難解紛，但以我一個不知名之士而居然「搖筆國中」，到底非老先生們所能忍受，因此「革命評論」不得不短命。

第二件大事就是濟南的事變，當「革命評論」出版至第二期，日本軍隊即攻濟南，蔣先生連夜混出了

城，我們軍隊直撤到韓莊的南面。本來這件事是無可批評的，但我當時實在痛恨黃郛。因為黃膺白表示，南京北伐，必要攻濟南，日本田中或者要出兵山東，以阻北伐之路。所以北伐必須先要打通日本一條路，而打通日本又非他出馬不可，這是他攬取外交部長的終南捷徑。但黃膺白雖然做了外交部長，田中還要出兵，黃膺白說了大話不算數，在濟南日軍攻打城門之時，還在威脅之下，簽字承認是由我方啓鑿。這種外交實在太丟臉了。「革命評論」焉可以不攻擊？④膺白先生是蔣先生的把兄，而又是蔣先生的親信，我們的言論攻擊政府已經是了不起，若攻擊黃膺白更是了不起；這更使「革命評論」早日夭折了。

第三件大事不止使「革命評論」無疾而終，尤其促成汪蔣合作的破裂。五中全會開會不久，胡先生已動程由海外歸來。胡先生之出國是在四中全會開會之後，同行的還有孫哲生多人，胡先生這次歸來，蔣先生感覺十二分的恐怖。有一天宋子文先生打一個電話來：

「蔣先生今早由南京到上海，說立刻來看你，請你不要出門。」子文先生的聲音很迫急。

「我去見蔣先生罷，我的地方太小。」我推辭着，因為蔣先生那時每次來上海都約我在孔庸之家會面，而我的地方太隘，確不敢屈尊。

「蔣先生是必要來，就讓他來好了。」子文已經掛起電話。

不一刻蔣先生果然和子文同來了，蔣先生照例問「你還好嗎」之後，說：

「胡展堂就要回來了，你知道嗎？」

「我不過從報紙得些消息，還不知詳細情形。」我莫名其妙。

「你覺得他回來會怎樣？」蔣先生詢問我的意見。



「我看也沒有什麼罷。」的確我看不出什麼。

「唔！他回來一定要動兵的，我們應該要準備。」蔣先生突然的說。

「胡先生回來也不見得有辦法，我看不用兵還是不用兵好……」我還摸不着頭腦。

「你認識劉鐵夫嗎？」蔣先生又轉過別一個題目。

「我認識他的。」我知道這和軍事有關。

「那很好，請你下午三點鐘到西摩路子文家裡再談。」蔣先生再閑談了一陣便走了。

下午三點鐘到西摩路，蔣先生讓我坐在飯廳，那時劉峙也到了，我們只是四個人談話。

「你立刻回去，把你的軍隊預備好，等命令。」蔣先生對劉經符說。

「是。」劉經符便起身辭退，大約他們已經在早上談過話了。

「請你把劉鐵夫找到，叫他秘密到天津塘沽把白健生的軍隊搶過來。」蔣先生向我說，他知道塘沽的軍隊是唐孟瀟的舊部。<sup>⑤</sup>

「這樣，我要通知唐孟瀟不要？」我問，因為劉鐵夫是孟瀟的部將，似乎非通知孟瀟不行。

「暫時不要告訴孟瀟，你告訴鐵夫，如果可以把健生捉住，便殺了他。」蔣先生有點緊張神氣；「你們要趕快作宣傳工作，所需經費多少，找子文商量罷了。」

我們又談了一陣便散去，蔣先生當夜回南京，我回家打了一個電報給巴黎的汪先生，并且把上項消息告訴了孟餘和勵齋各位。然而聰明的胡先生這次回來倒不是爲用兵而是上尊號的；他知道不能和蔣爭，祇想在南京分嘗一盞的滋味。他在歐洲已起草了一個改革國府的方案，上設主席，而下設五院，藉名是實行

建國大綱，而對於大綱所規定的條件，倒不注意它是否已成立。胡先生所要的僅是立法院，而把國府主席讓之蔣先生。這個方案是蔣先生所需要的，蔣胡既已合作，所謂動兵固然不成問題，蔣先生要表示好於胡，自然對於「革命評論」要它立刻停版了。

「革命評論」和「前進」的補助費於無緣無故中突然中止，在蔣先生或宋先生的意思，以為兩個刊物沒有資源，一定要自動停版，然而這兩個刊物決不會因為中止補助費就會停刊的。即以「革命評論」而言，每期銷售一萬五千本，每本賣價是一角，而批發是五分，如果能收足的話，每月也有三千多元，我們的基本執筆者祇是每月支生活費一百五十元，似這樣努力維持下去，實在毋須乎停版。

「革命評論」停止了補助費還在出版麼？蔣先生有些氣了。於是軍警機關警告承印的印刷館，如果再代我們印「革命評論」的話，一律封閉。更恐有人貪利秘密印刷，於是再來警告承銷「革命評論」的書坊，見有賣「革命評論」的，便指揮流氓拿石塊擊壞書店的玻璃窗。你想書店的大玻璃窗每塊都值十幾二十元，而賣「革命評論」的利益，每本僅賺五分的微利，會打算和胆小的書店老闆們，自然見着「革命評論」，都敬鬼神而遠之，一律婉詞謝絕了。我們見書店不肯代賣，又散發給馬路的書攤，在南京指揮下的流氓，見擺有「革命評論」的書攤，逐一搗亂，把報販和書販大打一頓，這班可憐的書販報販，所得「革命評論」的餘利，實在不夠醫藥和養傷，於是對於我們也只好抱歉，避之則吉了。南京的手段還不止此，以政府的命令通告上海郵政局，扣留「革命評論」，這樣我們風行一時的週刊半本也寄不出上海以外。在這次雷厲風行的命令之下，只有一個人得到最大的利益，那就是上海市黨部的廚子。因為那位廚子先生是管包飯的，他的消耗自然以煤柴為大宗，郵局把扣留的「革命評論」都抬到市黨部，除極少數給黨老爺無

償的過癮之外，都由厨子拿去作煮飯之用，省却了一筆煤柴費。那位厨子先生是否對我私衷感激，不得而知，但在這次風潮動盪之中，他確實受其益的。

「革命評論」不能印，不能寄，不能賣，南京更來了一個利誘方法。一天宋子文先生找我談話，說蔣先生希望我出洋。那時上海大概我已不能安居，而汪先生又來電叫我到巴黎跑一趟，商議今後的計劃，我順風扯帆答應宋子文，但我聲明決不受蔣先生一個爛錢，如果宋先生以朋友資格助我旅費，我還接受。我遷延了兩三個月，才於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乘一艘德國貨船離上海，宋子文送來旅費二萬元，他聲明是他的錢而不是蔣的錢，他怎樣開帳，我不得而知，我寫至此地，還禁不住向宋先生表示我的謝意。

.....

不過我似乎應該補一筆說說大陸大學。我自辦「革命評論」之後，有許多青年都寫信要求我辦大學，這事使我很躊躇，辦學我固然很願意，但徒然開一所野鷄大學則與本懷大悖。末後禁不起大家的要求，又承李福林先生捐了一萬五千元的開辦費，才在戈登路租了一所房屋作校址。

當日在一般稱頌大陸大學的，都叫它做革命大學，但我今日於此聲明，那個大學並不是一個革命機關，而是一個學術團體。入學試驗是非常嚴格的，入學之後的學科教授也非常認真的。我自信倘若能廣續辦理下去，未嘗不可以養育些人才，但大陸大學那時處境，真是在夾攻奮鬥之中，在南京以為這個大學是一所反政府的機關，而共產黨又想出全力破壞，不斷對這個大學入寇。大學是要在教育部立案的，你想那時南京的教育部怎樣肯承認大陸大學成立？然而奇怪得很，一般學生都不以大學不能立案為憂，倒為日莖莖，埋頭研究學問。共產黨也在我們大學裡成立一個小組，意圖破壞，有一次竟想放火焚燒大學，幸而事先

防備得法，才防患於未然。在雙十節的那天，大陸的學生很高興的要成立一個慶祝會，借上海總商會地址的天后宫演戲。那天市政府和共產黨一起像不謀而合的向我們進攻，公安局派了一個警官和許多暗探來，監視我們的行動，發現了一張「改組國民黨」的標語，強迫學生們撤除，并說不服命令，即停止集會。入夜共產黨更派人散布反對我們的傳單，我知道那夜一定有事，事前分派忠實的學生，分佈要道，共產黨正待動手暴動，我們立刻捉住了兩個人，其餘的因監視過嚴，也只好縮手知難而退。最奇怪的，我們捉了共產黨，并且沒收了許多傳單，而看戲的來賓，倒一點不知，還興高彩烈的看戲，這真是辦理得宜，我們教職員和學生們倒真「處置大事，一如平時」，其沉着迅速，的確似乎訓練有素的。

我赴歐的途中，大陸大學便被封閉了。南京以大陸大學未會立案為理由，照會租界當局封閉。我們大學的後任者王樂平先生是一個篤實人，他還請了一位外國律師打官司。但這位律師是什麼人呢？是上海有名的費信惇先生，他就是工務局的主席，而最痛惡左派的。那時我已到巴黎，接到上海的電報，心內想：「這次真完了，請了費先生做律師，不是剛剛與虎謀皮嗎？」果然費先生也認定這個大學是共產黨機關，他也是律師，他也就是租界當局，這樣大陸大學遂在無抵抗之下，關門大吉，而大陸大學為着打官司，還花了訟費三千餘元。

說到此地，我還應該敘述幾個患難的朋友。辦「革命評論」和辦大陸大學的同志們，真可以算是患難之交。許德珩、施傳統、劉侃元，和蕭淑宇，都是我當時有聲有色的班底。許施兩個人的思想行動都相同，他們兩位使我今天還不明白，他們都不肯做共產黨（施傳統加入了，後來也退出），也同時死也不敢反對共產黨。在共產黨搗亂大學未成的時候，我召集學生訓話，批評共產黨一頓，施先生死也不肯上台演講，及

至我大罵共產黨，他倒變色先跑了。他們還有一種古怪的脾氣，每天都要找我長談，很像革命之成功在於「談」，如果我沒有工夫和他談，或談得很短，他們便佛然社門不出，非行那三顧草廬，不肯輕出隆中的樣子。大概他們一定熟讀三國演義，無形中以諸葛孔明自期，但我有何才何德，敢以劉備自況，唉，難道革命也要人時時請駕的嗎？所以在我未離上海之時，倒有些意合而情不投了。侃元先生則我至今還惦着他，劉先生自然也是一個心志高傲，而且目空一切的人，但他的脾氣倒很爽直，沒有許先生他們那樣難於招待。蕭先生後來也離我而去，其中原因也有我對不起他的地方，也有他對我不起的地方。汪先生於十八年回國之時，曾說蕭先生有些招搖而且太不守秘密，所以我不敢向汪先生極力推荐；而蕭先生呢，在擴大會議之時，已有人告訴我，他時常在北平和南京孫哲生通訊，當中自然也有許多消息漏給南京的人們，果然擴大會議失敗之後，蕭先生得了孫哲生的資助赴德留學去了。及二十一年回國，蕭先生來見我，初則要求實業部的司長，繼則要我介紹他當立法委員。他當日委實來得太遲，實業部的司長沒有空缺，而立法委員呢，我確實向覃代院長理鳴先生推荐過，而覃先生未允。末後我送他幾百元作生活費，請他等等，他終於一氣而走上海，恰當其時孫哲生卸任行政院長，沒有好氣，遂請蕭先生替他辦雜誌，蕭先生鼓其憤激之氣，在第一二三期大罵我和汪先生，直至孫先生再回南京做了立法院長，蕭先生也償其所願的做了立法委員，這才靜默下去不再謾罵。這幾位朋友，除了施傳統以外，後來我都見過，我們還保持着友誼；後來許先生，劉先生，在北平教書之時，大約因為人民陣線關係，給宋哲元逮捕，我還盡了做朋友應盡之力，四面直接和間接去出力營救。這幾位先生都是從「革命評論」戰陣中打出來的，而末後不能共同做一番事業，這真使我慚愧而引以為憾的。

十六年底，我離上海之前，改組同志會已宣告成立。⑥改組同志會爲什麼會組織呢？這也是在我計劃以外的。我在前文不是說各地因着思想相同，遂發生自動的組織嗎？其原因是在清黨以後，中央慢慢開倒車，政府爲着穩定政局起見，一面和帝國主義妥協，一面更和軍閥妥協。國民黨的政綱不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嗎？因此黨內的青年感覺無限的右傾，國民革命恐怕就要崩潰。而且在反共之時，各地國民黨的青年已成立不少組織，例如丁維汾先生領導下的反共大同盟，蕭忠貞領導下的實踐社，童冠賢領導下的新中會，他們一方面要反共，而一方面要防止右傾。不過他們僅有行動，而沒有理論，各地的青年都在徘徊瞻顧罷了。

「革命評論」指出中國最終革命的鵠的在民生，并主張國民革命應該以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爲基礎。⑦這恐怕也帶點時代性罷，在今日看來，實在卑之無甚高論，而在當日已惹起天下騷然。國民革命已中墜了，國民黨快腐化了，我們要拯救國民革命，必得要改組國民黨，這是當時全國有志青年的呼聲。我們爲應着這個要求，於是發起了組織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

改組同志會實在沒有什麼，在當日發起之時，理論既不統一，組織又不健全。爲什麼理論不統一呢？「革命評論」和「前進」之分辨，其起因本來很微，只是爲着文章署名和不署名的關係。可是到了後來，理論真顯然不同，在「革命評論」的主張着重於民生革命，而在「前進」的主張則着重於民主政治。在改組同志會成立前夕，我和孟餘辯論了一大場，我主張社會是有階級的，不過我想以黨的力量調和而至消滅階級的鬥爭，而孟餘則爲避免階級鬥爭起見，根本否認階級的存在。因爲這樣，他最不贊成我農工小資產

階級之說。此事又經過王法勤，王樂平，和潘雲超的調停，才電巴黎汪先生請示，把小資產階級的名詞改了一個「小市民」。汪先生在他的心中也反對小資產階級一個名詞的，一次他對我引用吳稚暉先生的批評，說「小資產階級的小，不知是卵子小，還是腎囊小」，所以改組同志會的理论，自始就沒有統一。至說到組織不健全，則在同志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時已沒有方法選舉執行委員，經過幾次討論，到底還是以粵方委員爲中央，<sup>⑥</sup>竟直沒有選出一個青年之士。這個辦法算是一個不得已的調停，但粵方委員到底沒有幾個人！王勵齋先生老了，滿腔熱誠而少方法。朱霽青先生人是勇敢，祇是不善於遠慮深思；潘雲超先生是長於批評，同時也短於建設。這樣剩下來只有一個王樂平，王先生畢竟是一個行動人，辦法有時過於粗率，而措施又往往近乎矛盾。我是要去歐洲了，孟餘先生說明他身弱多病，是一個很好的參謀，而不是一個司令官。改組同志會之組織如此，別人當時或者還很樂觀，而我則自知甚明，預料前途黯淡。祇是事已如此，也只好拚命幹去，徐圖改善而已。

改組同志會剛在成立，南京早得報告了。平津既爲國民革命軍所佔領，蔣先生立刻到北平。大概當時國民黨的青年都以爲蔣先生是開倒車的領袖罷，蔣先生初到平津之時，沒有一個歡迎的口號，也沒有一張歡迎的標語，并且平津黨部也沒有人整隊到車站恭迎如儀。蔣先生實在氣極了，以爲改組同志會在幹他了，於是在一次北平大學演講中大罵改組派，爲避免罵汪先生起見，說改組派是汪先生不知道的，通是顧孟餘和陳公博幹的。蔣先生這一罵不要緊，倒把改組派罵得抬起頭來。從前人們都不知有改組派，現在天下全知了，不滿意於南京的人們通集中於改組派的旗下了，改組派的名詞便由此而生，以後掀起幾年來中國的戰禍，皆基於蔣先生的一罵。

在我離開上海之前兩日，蕭淑宇先生趕來見我，勸我暫時再觀變，因為他的同鄉熊天翼先生知道蔣先生將於三全大會前後打桂系。熊天翼先生是上海的警備司令，又是蔣先生的親信人，他的消息是不會假的，而且熊先生正在獻議蔣先生勸他挽留我不必出國。

蕭先生固然傻，熊先生也是傻，蔣先生除非不打桂系則已，要打桂系，反要排除汪先生。因為桂系的大本營還在兩廣，而兩廣的主力又在廣東。廣東的省政府主席陳貞如是蔣先生拿得穩的，而總指揮的陳伯南則非靠胡先生和古勤勤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蔣先生賣力。因此倒桂必須要拉胡，而拉胡又必須要排汪，<sup>◎</sup>其中微妙的消息，并非熊蕭兩先生所能體會的。我對於蕭先生的報告，一點也不動搖，只按着原來步驟，於十八年一月廿四日離滬。這是「革命評論」時代一個劃一的段落，也是我第二次流浪生活的開始。



## 第八章註釋

- ①關於國民黨高捧孫文主義及於國民黨思想意識方面的保守，可參考戴季陶於一九二五年著作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出版地缺，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一九五一年。戴季陶以爲孫文主義是繼承中國正統思想，復興中國故有道德，爲中個二千來文化創造的光輝，同時孫中山的思想亦已包括了近代最新的科學方法。戴季陶其他的重要著作有「戴季陶先生最近言論」，上海，商務，一九二八年；「青年之路」，載於「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第三冊，頁一八八六至一九九四。其他資料可參考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北，商務，一九六八年，頁一九七至一九八及二九五；H. Mast, III and W. G. Saywell, "The Culturalism of Political Despair: Tai Chi-tao and Chiang Kai-Shek," *Asia Quarterly*, 3: 227—244 (1972) 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85—188; A. Dirlik, "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 *Modern China*, 1. 1: 61 (January, 1975)。而在另一方面，陳公博在著作中指出：「今日這本書已成爲黨內黨外理論鬥爭的焦點，不但西山會議派要罵，無政府主義者也要罵，不但代表資產階級的學者要批評，就是同情於左派的同志們也有些批評。可是國民黨自有黨史以來，從沒有過這幾個月來的理論鬥爭，所以我總覺得不管我這理論對不對，能夠引起黨內黨外的劇烈辯場，就是身爲衆矢之的，也還是值得。」見陳公博：「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上海，復旦書店，一九二八年，頁一。
- ②「革命評論」是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創刊，每周一期，直至同年九月三日被封刊，共出版了十八期。

見陳公博：「陳公博先生最近論文集」，出版地缺，復旦書店，一九二八年，頁一。除陳公博為主編外，重要的撰稿人有馬濬、劉侃元、施存統、許德珩及蕭淑宇。陳公博於創刊號發表之「今後的國民黨」一文，實為整套「革命評論」批評國民黨對外對內政策的概要，陳公博認為現今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皆處於嚴重危機中，此種危機的構成原因甚多，外在因素有三：即帝國主義、第三國際及封建勢力；至於內在因素，則有左傾、右傾、腐傾、惡傾等四項。故此陳公博提出四項要求：第一、黨的要求，以為國民黨必須再次統一起來，而欲黨的統一，黨必須首先改組；第二、民衆運動的要求，陳氏認為國民黨有恢復民衆運動的必要，而民衆運動的綱領亦該重新檢定；第三、政治的要求，謂國民黨的外交綱領，財政、建設計劃及自治方案等皆應切實檢定執行；第四、軍事的要求，其中以軍事的統一、軍隊要接受政治訓練、及裁減軍備等為最急的要務。見「革命評論」第一期，頁一至十。並參考T'ang Ts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340. 至於「革命評論」全套十八期的重要論文內容，分類如左：

類別	篇數
(一) 關於國民黨的基礎 (包括農工羣衆、青年、小資產階級、學生及婦女)	二十六
(二) 關於國民黨的現況、組織、危機與前途的討論	十七
(三) 改組國民黨的理論	十二
(四) 關於濟南事件的報導與評論	九
(五) 關於北伐	八

(六) 外國消息

(七) 關於社會建設（包括土地問題及縣自治問題）

(八) 關於日本政黨及現況之報導

(九) 關於五中全會的召開問題

(十) 關於第三黨的評論

(十一) 關於共產黨的報導與評論

(十二) 其他

七  
五  
五  
四  
四  
二  
十九

③關於陳公博與吳稚暉的筆墨官司，最先見於「革命評論」中一篇名為「吳稚暉和陳公博一件小交涉」之報導，其中吳稚暉指出陳公博、汪精衛、甘乃光及顧孟餘等四人皆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廣州共變有關，而四中全會已決定了他們四人須等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表決他們的資格。見「革命評論」第十五期，頁五一至五二；該文亦載於吳稚暉著，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出版，一九六九年，卷十，頁一六九九。陳公博則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致電五中全會預備會，謂其查究四中全會檔案，并無不准陳、汪、甘、顧等人出席五中全會之議決，故陳公博為文駁斥吳稚暉。見「革命評論」第十五期，頁五二。此後吳稚暉與陳公博續有論戰，臚列如左：

(一) 八月十七日——吳稚暉：「勸黨員不可逞臆搗亂自墮黨的地位」，「革命評論」第十七期，頁四四至四六；又見「全集」，卷八，頁六五二至六五四；

(二) 八月十八日——陳公博：「勸黨員不可逞臆搗亂自墮黨的地位」，「革命評論」第十七期，頁四六至四八；

(三) 八月二十日——吳稚暉：「答陳公博書」，「革命評論」第十八期，頁五九至六三；又見「全集」，卷九，頁九六五至九七〇；

(四) 八月二十日——陳公博：「陳公博答吳先生」，「革命評論」第十八期，頁六三至六六；又刊於「全集」，卷九，頁九七二至九七六；

(五) 八月二十五日——吳稚暉：「再答陳公博——昏庸老朽與毛頭小子」，「革命評論」第十八期，頁六六至六七；又刊於「全集」，卷九，頁九七〇至九七一；

(六) 八月二十六日——陳公博：「陳公博再答吳先生」，「革命評論」第十八期，頁六八至六九；又刊於「全集」，卷九，頁九七六至九七七。

④ 陳公博曾爲文指出國民黨外交當局的軟弱，謂「時至今日，我實不忍對於外交當局下一個什麼批評，不過我看上海各報近載，外交部長（即黃郛）在濟被日兵脅迫簽字承認我國兵士的暴行，如果是事實，不能不痛恨外交當局的確不能負外交上的重大責任。」見陳公博：「我們對於田中暴行的主張」，「革命評論」第二期，頁三。其他有關於批評黃郛及南京當局的文章計有：

(一) 許德珩：「目前最低限度的幾個注意與要求」，「革命評論」第二期，頁五至九；

(二) 陳公博：「中國國民革命和田中的背景」，「革命評論」第三期，頁一至七；

(三) 劉侃元：「日本資本主義與田中內閣」，「革命評論」第三期，頁七至三十；

(四) 蕭淑宇：「從濟南事件回顧到本黨一年來的內政外交」，「革命評論」第三期，頁三〇至三六；

(五) 施存統：「反日運動與民衆組織」，「革命評論」第三期，頁三六至四一；

(六) 撲攻：「謝持口中之媚日的黃郛和共產黨的陳公博」，「革命評論」第七期，頁三八至三九。

而關於國民黨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可參考 P. Cavendish, "Anti-Imperialism in the Kuomintang 1923—8", in J. Chen and N. Tarrow (eds.),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p. 45—49。

⑥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開始，桂系之勢力日漸膨脹，李濟琛以桂人而統率粵軍入主兩廣，其間雖有驅李之役，亦爲桂軍平定收復，見「苦笑錄」，第七章，註⑫。而李宗仁則以特別委員會之名義發動討唐生智之役，並以白崇禧入湖南收編唐生智之降軍，見「苦笑錄」，第七章，註⑥。李宗仁稍後更親自坐鎮兩湖。一九二八年六月，奉軍領袖張作霖被日人炸死，奉軍被迫退出關外，而張宗昌、褚玉璞等直魯軍約五、六萬却仍盤據於北平以東塘沽、唐山、灤州一帶，七月白崇禧乃率領在湖南收編唐生智舊部李品仙、廖磊、葉琪等軍攻之，九月奏捷，於是白崇禧的部隊即駐紮於冀東至山海關一帶。見李品仙，前引書，頁一〇〇至一〇六。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南京舉行編遣會議，但結果未爲與會軍事領袖所滿意，及三月發生兩湖事件魯滌平去職一事，蔣介石乃起用唐生智前往華北離間白崇禧的部隊，唐生智並說他「已奉蔣總司令的命令前來接收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爲首）駐平各部隊。」見李品仙，前引書，頁一〇七。於是李品仙等唐生智舊部皆反白崇禧。同時李濟琛亦被軟禁於南京湯山，於是疏解了南京政府被李濟琛（兩廣），李宗仁（兩湖）和白崇禧（華北）之三面包圍。其間過程，參看陳克華：「中國現代革命史」，中冊，頁八二至八八；D.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pp. 11

6—119 and 126。

⑥ 據陳公博指出，改組同志會在一九二八年冬成立，而於一九三一年春解散，爲期整整兩年，此會以粵方委員爲中堅份子，計有顧孟餘、王法勤、何香凝、王樂平、朱霽青、陳樹人、甘乃光等；唯何香凝、陳樹人及甘乃光等三人雖有支持改組同志會，但沒有積極參與。而關於改組同志會的綱領，陳公博所著「今後的國民黨」及「黨的改組原則」二文可供參考，見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載於「寒風集」，頁甲二六八至二八三。至於陳公博等對改組國民黨的意見實早於一九二七年開始發表，見陳公博：「黨的改組方法和時期」，「革命評論」第十八期，頁一。而由於改組派的理論屢見於「革命評論」內，故「革命評論」可說是改組派理論之刊物，見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I, 199. 例如在「革命評論」第十八期中關於改組理論的文章，共有六篇，列如左：

- (一) 陳公博：「黨的改組方法和時期」，「革命評論」第十八期，頁一至四；
- (二) 阮紹元：「和公博先生討論『黨的改組問題』一封公開的信」，同上，頁二〇至二七；
- (三) 澄清：「從黨的改組意義說到過去的改組及現在」，同上，頁二七至四一；
- (四) 吳保鼎：「改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之前途」，同上，頁四一至四五；
- (五) 吳挹芬：「黨的改組的方案」，同上，頁四六至五三；
- (六) 林篤信：「國民黨的改組與民衆組織的恢復」，同上，頁五三至五九。

其他有關改組派之資料，參閱江上清：「政海秘聞」，香港，致誠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頁六八至八三

Ch'ien Tuan-she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97—98; A. Dirlik, p. 52.

⑦陳公博曾經指出：「在今日中國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我們（國民黨）的同盟者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見：「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上海，復旦書店，一九二七年，頁一；又謂：「如果承認國民革命的部隊是農工和小資產階級，而主幹部隊尤在農工，則國民黨的成分應當保持如左的比例：

黨員百分

農民

百分之五十

工人

百分之三十

小資產階級

百分之二十」，同上書，頁九七。

陳公博亦於「革命評論」內明確指出國民黨及國民革命的基礎是農工和小資產階級，而國民黨的使命在乎「第一步是謀三個階級的協調，第二步是團結三個階級的革命力，第三步是泯除三個階級的特性而使之都成社會生產的一員。」見「今後的國民黨」，「革命評論」第一期，頁十至十一。並參考 Dirlik, pp. 48—49 and 54—55.

⑧廣州粵方政治分會成立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參看 Latty, pp. 84—86. 粵方政治委員計有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王樂平、王法勤、潘雲超、何香凝、甘乃光及陳樹人等，而汪精衛等則與駐粵的實力派張發奎、李濟琛等有着密切的關係，粵方委員會成立後即行攻擊以西山派及桂系為首的特別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汪精衛及李濟琛同離廣州赴滬，張發奎即發動驅逐李濟琛、黃紹竑等桂系軍人，事成之後，乃以顧孟餘為粵方政治分會主席，而張發奎則為委員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且以陳公博為廣東省

主席。參看陳克華，前引書，中冊，頁五七至六一；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頁一〇四至一一八及一二五至一二七。自廣州發生驅李之役後，李濟琛等桂系將領遂調兵圍攻張發奎等，由於張氏遣兵出戰桂系，以致廣州市防衛空虛，於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及十三日發生所謂「廣州共變」，張發奎回師平定共變後，遂為李濟琛、陳銘樞等逐走，事後南京特別委員會方面下令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朱暉日等免職查辦，又於十二月十六日派鄧澤如、古應芬澈查汪精衛；又以粵方委員與廣州共變有關，故不邀請汪、陳、顧等出席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召開之四中全會，而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召開的五中全會亦未見粵方委員陳公博等參加。

⑨自廣州共變後，陳銘樞所率之第十一軍回粵，先後平定張發奎及共產黨之亂，兩粵在名義上歸回李濟琛管轄，但實際上為陳銘樞及陳濟棠（本為陳銘樞部下）所控制。至一九二九年桂系與蔣介石發生衝突，參考註⑥及 D. Lary, pp. 156—157. 蔣介石先扣留李濟琛於湯山，時粵省軍政人員，多為李濟琛之多年親信，對李氏之被囚深表不安，紛電中央質問，頗有助桂系之聲勢；參看蔣永敬：「胡漢民先生譜稿」，載於吳相湘：「中國現代史叢刊」，台北，正中書局，一九六一年，第三冊，頁二六九。唯蔣介石早以胡漢民、古應芬等暗中疏通陳濟棠，故陳濟棠通電中央，謂粵省軍隊為黨國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揮驅策，陳濟棠之表示獨立態度，頗使桂系失去憑藉，且導致桂系反蔣之軍事行動崩潰。陳銘樞（一八九〇—一九六六），字真如，廣東合浦人。廣東軍事要員，統領第十一軍，一九二九至三一年，出任廣東省主席。一九三一年執掌第十九路軍，三三年十一月發動閩變。一九四九年參與北京政府，但在五七年被指控為右派分子。詳見 Boorman I, 213—217.



## 第九、十、十一章說明

「苦笑錄」卷二的第一個重心是記載自一九二八至三一年國民黨左派在黨內所遭遇到的各種政治及軍事問題。陳公博當時在黨中之政論，已登載在以「革命評論」為代表的左派刊物中。這些左派政論，在本書第八章，已有交代。在卷二這三章裡面，陳氏再三重申他的政治立場，並解釋他被冠為改組派領袖時的心境及汪精衛和他的關係。陳氏更道出了改組派對汪精衛領導下的國民黨左派的整體看法。這三章給歷史家一些重要資料去了解國民黨左派的內幕使他們清楚知道國民黨左派並不如局外人眼中那麼簡單。

### 國民黨的主要派系與當時政治軍事環境（一九二八——三〇年）

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國民黨為容共問題已分裂成不同派系。黨中重要領袖如蔣介石、汪精衛及胡漢民等，均在黨內樹立一定的影響力。重要右翼組織如西山派，亦於此時成立。一九二七年末，寧漢雙方清共後，國民黨內雖一致反共，又有寧、漢、滬三方合作之議，然而各派系間在容共時期之恩怨仍然存在，派系間的互相不滿仍然持續。不過，其間之派系鬥爭，已不再環繞著對付共產黨這一個問題。在北伐完成後，國民黨奠都南京後，各派系之理論鬥爭，便集中在討論國民黨之性質，國民革命完成後中國所應走之方向，及在訓政期間國內黨內的民主問題。其中尤以民主問題，為一九二九至三一年期間黨內鬥爭爭執之焦點。

民主問題之成為黨內鬥爭之導火線，起源於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之政局。首先是蔣介石於一九二九年三月間召開國民黨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當時，蔣氏親信完全控制議席。西山派重要領袖受到排斥，而汪

精衛之左派，在大會中之力量亦被削弱，遂引起黨內重要派系之不滿。大會中大部份的代表，均為南京中央指派及圈定。蔣氏這種行動，導致黨內的反蔣運動，這運動是以樹立民主，反蔣獨裁為共同目標。汪精衛之左派與右翼之西山派便是在這種環境下漸漸有形成聯盟之趨勢。

同時，南京中央所召開的編遣會議，更引起地方軍事集團對中央之不滿，而中央及地方各自爲了保持力量以打擊對方，也產生了軍事衝突。地方軍事集團便和黨內反蔣派系連成一氣，在民主口號下，對抗南京中央。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之內戰因而爆發。

在軍事方面，國民黨左派及西山派支持下的「護黨救國軍」，在反蔣獨裁，樹立民主口號下，一度嚴重威脅蔣介石領導下的南京政府。從一九二九到三〇年，蔣介石率領他的嫡系如何應欽、陳誠、劉崎、顧祝同等，聯同其他支持蔣氏之部隊，與在華南之李宗仁與張發奎、河南之唐生智及華北之閻錫山及馮玉祥對抗。在同一時期，共產黨在李立三路線領導下，進攻長沙、南昌等重鎮，務求直達長江流域，而國民黨內之軍事衝突，無異助長共產黨勢力的膨脹。在這種形勢下，蔣氏仍能力挽狂瀾，實屬奇蹟。反蔣軍事之高潮，出現在一九三〇年六月間。當時張桂軍入湘，並一度攻陷長沙。是年六月末，閻錫山攻入濟南，馮玉祥此時又威脅徐州、蚌埠，使南京一度陷於困境。陳公博在第九、十兩章中所提供的資料道出蔣氏能擊敗「反蔣」軍之原因：當時最重要的關鍵是各「反蔣」軍在團結及聯絡兩方面均未完善，使蔣氏能逐個擊破。另一方面，蔣氏能夠得到粵方陳銘樞、陳濟棠等的支持，牽制張發奎及李宗仁部隊，使華南及華北反蔣各軍不能連成一氣，爲蔣氏致勝的又一原因。在華北方面，經數次磋商後，蔣氏又說服了張學良率兵入關幫助，致閻軍在平津一帶敗退，而馮軍亦被孤立，蔣軍遂以破竹之勢在十月間連下開封、鄭州、洛陽，

奠定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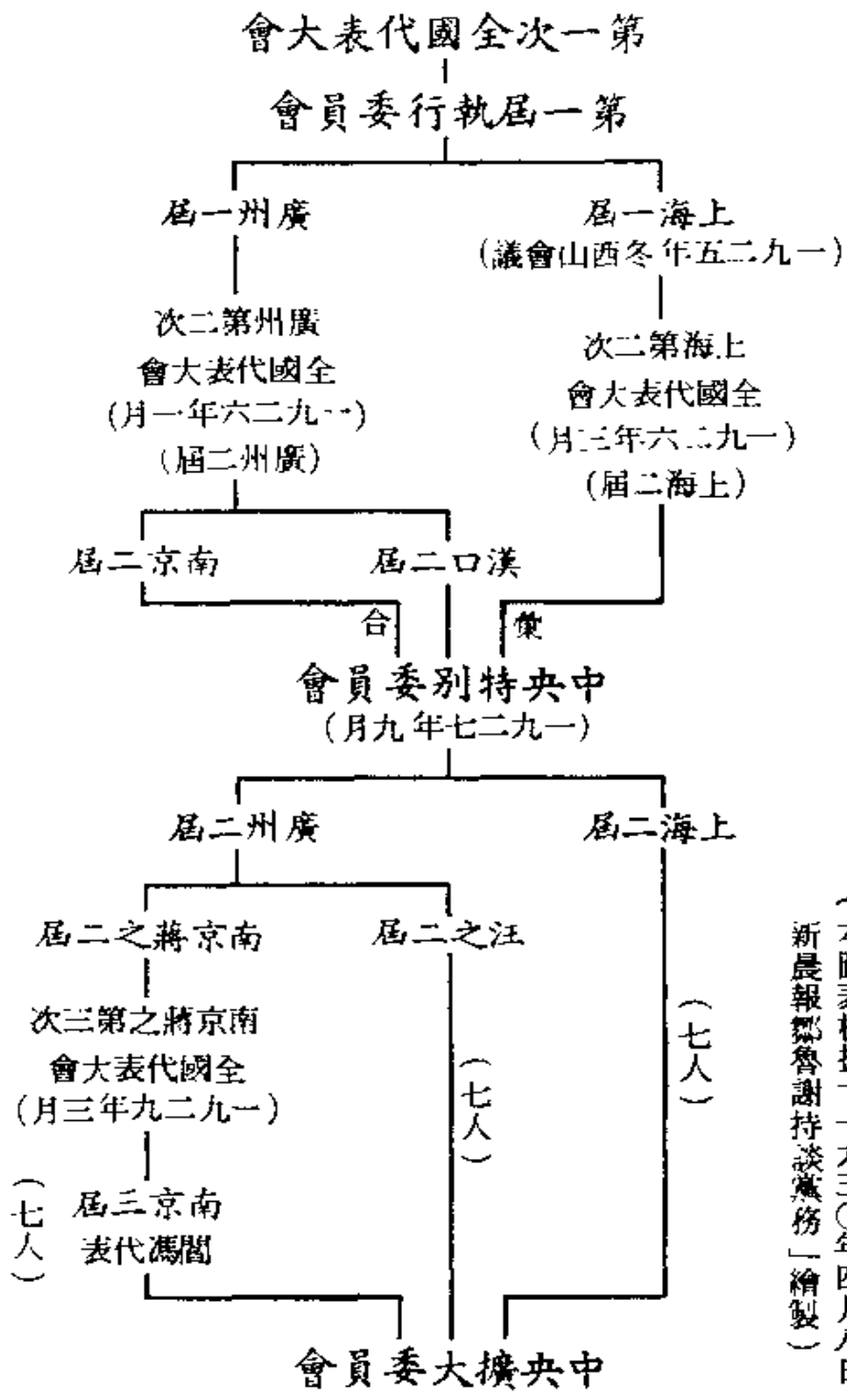
### 北平擴大會議（一九三〇年）

在政治方面，汪精衛左派與西山派在樹立民主、反蔣獨裁的共同目標下，於一九三〇年七月在北平召開國民黨擴大會議，與當時閻錫山、馮玉祥反蔣軍事行動相配合。擴大會議的目標是集中討論如何實現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尤其是有關於建立民主之基礎條件。是年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率兵入關助蔣介石，使閻、馮軍事迅速失利。擴大會議亦被迫遷往山西太原，並繼續會議，務求頒布民主法制，終於在十月廿七日在太原發表「約法草案」及「宣言」，作為在中國樹立民主之藍圖。而擴大會議亦於頒布約法後解散。由於一九三〇年秋蔣氏實已控制大局，所以此一擴大會議之約法並沒有起得任何作用。另一方面，在軍事上失利後，馮玉祥下野放洋，閻錫山亦被迫下野。

一九三〇年的擴大會議代表了汪精衛左派及右翼西山派在爭取民主、反蔣獨裁的共同目標下之聯盟，當然兩派亦各有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兩派在黨統方面，亦發生最大的爭執。國民黨內部正統之爭始於西山派獨自在北京附近召開中央全體會議。其後又獨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滬二屆），以正統自居，與廣州之國民黨二屆大會（簡稱粵二屆）對抗。當國民黨北伐至長江的時候，粵二屆黨統會因蔣介石在南京單獨先行清黨，自立中央，與武漢中央對抗而造成寧漢分裂。到後來武漢方面分共，寧漢滬三個中央便合議統一，以中央特別委員會方式結束寧漢滬分裂局面。黨統問題得以一時解決。後來中央特別委員會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蔣介石控制之中央。一九二九年三月間蔣氏在南京獨自召開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這個行動引起了汪精衛左派及西山派的不滿，反對蔣氏獨裁，否認南京三屆之正統。汪精衛

派宜稱只承認粵二屆為正統。另外方面，西山派因有自己之黨統，故只承認前在上海所召開之滬二屆為正統。故一時引起「粵二屆」及「滬二屆」互爭為國民黨正統。黨統之爭，一度阻碍左派及西山派合作，後雙方各自讓步，黨統爭論才暫時被擱置。現把當時各派系在黨統方面的地位列表如左：

一九三〇年北平擴大會議的組合



(本圖表根據「一九三〇年四月八日  
新晨報鄒魯謝持談黨務」繪製)

在這裡我們要解釋一下陳公博在擴大會議前後對黨統之看法，同時分析一下他和汪精衛的不同立場。

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初，陳氏在北平發表了「解決黨是的兩條大路」一文，反映出當時國民黨內反蔣集團在黨統上的矛盾。由於左派及西山派有各自所承認的黨統，所以在此點上意見不一致。汪派內部對此問題亦分溫和與激進兩派。溫和派以汪精衛爲首。汪氏雖極力維護粵二屆爲正統，但仍顯示出比較隨和的態度。他認爲與西山派合作是必要的，所以不宜在黨統方面太過強硬。而激進派以陳公博爲首。陳氏立場非常強硬，不接受西山派在黨統方面的理論，堅持粵二屆爲真正的黨統，力勸西山派承認其立場。在這方面，陳氏遠較汪氏強硬，故汪氏嘆道：「我不懂公博對我親近一個人都反對。」而「親近一個人」是指西山派。

又陳氏對汪氏在擴大會議結束宣言中「我們願做在野派」一句，甚表不然。此點反映出陳氏對南京政府毫無信心，不相信蔣介石會有容「在野派」之量。其實，當時國民黨左派內部意見也不完全一致。陳公博認爲當時汪派裡面實可再分爲數派，如汪氏嫡系、改組派、公館派及左派等。這些資料向歷史家對國民黨左派的進一步認識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 廣州非常會議（一九三一年）

自擴大會議後，國民黨在一九三一年又再起紛爭。事源於胡漢民反對蔣介石在訓政時期內頒布的約法。胡氏認爲這是違反孫中山的遺訓。這件事導致蔣胡衝突，破壞了自一九二八年以來蔣胡合作控制黨政的局面。

一九三一年二月廿八日，胡漢民辭去本兼各職，幽居到南京郊區的湯山。胡氏的移居湯山，實是被蔣

氏扣留。以胡氏在黨內的地位，當然引起其支持者之不滿，所以廣東黨政軍方面發電忠告蔣介石，而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亦於四月卅日在廣東通電彈劾蔣氏。汪精衛亦於這個時候批評蔣氏這一行動。一時間反蔣運動又再興起。國民黨內各派系又在反蔣獨裁的目標下，再次團結，是年五月間，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非常會議，其後並成立一個國民政府，與南京中央對抗。非常會議又以民主爲題，要求蔣氏下野，開國民會議以制定約法，推動地方自治以培植民主精神。因此廣州當局與南京中央一度幾乎要兵戎相見。適值「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人藉「萬寶山事件」佔領瀋陽，黨內的爭執便停止下來。當時中國在東北共有十七萬多的駐軍，與日本的四萬關東軍成四與一之比；但由於南京方面不願擴大戰事，東北軍司令張學良遂下令不得抵抗，中國軍隊迅即退入關內，日軍遂得以長驅直入，輕易佔領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省。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舉國要求團結，一致對外。在此形勢下，寧粵雙方經李石曾、蔡元培、張繼、吳鐵城及陳銘樞等往返調停，乃決定在上海開和平會議，磋商統一之策。議決寧粵雙方各自召開國民黨四屆大會，然後合併統一。

廣州非常會議集合了國民黨內部反蔣派系而組成，構成分子有汪精衛一派、胡漢民一派、西山派及廣東陳濟棠所領導之軍政當局。但是這一個聯盟，並不持久，因汪精衛與胡漢民之間，在國民黨容共時期已有甚深之芥蒂，而在上海和平會議後，汪氏又與胡氏及廣東方面不和。當時主要紛爭在於雙方對蔣介石去留問題有不同的看法。粵方召開國民黨四屆大會時，對汪精衛等代表在上海和平會議之討論結果，大爲不滿，因汪精衛等在上海和平會議中並無要求蔣介石下野，而粵方認爲此點乃寧粵雙方統一之先決條件。故粵四屆議決推翻和會議案。汪精衛一怒便在十一月廿四日退出粵方四屆大會，另於十二月三日在上海自己

召開四屆大會，汪氏此舉，當時被認爲是汪蔣合作之先聲。

但粵方對要求蔣氏下野一點並不因汪氏退出而妥協，遂於十二月五日再由胡漢民領銜通電要求蔣氏下野。在此形勢下，蔣氏終於在十二月十五日通電去職。寧粵雙方乃開四屆一中全會合併統一雙方黨部，而在寧方支持下，汪氏在上海所選出之四屆代表亦准予參加。國民黨表面上又回復統一，廣州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皆告取消。但西南政務委員會及西南執行部的設立，使粵方在實質上仍自成一天下。

其後四屆一中全會選出林森爲國府主席，孫科爲行政院院長，以結束寧粵分裂局面，此時汪精衛、蔣介石已秘密商議合作。一九三二年一月乃出現汪蔣合作之局面。蔣氏復出後，以專理軍事姿態出現，出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而汪精衛亦以專理政府行政姿態，任行政院院長。至於胡漢民方面，他一不滿汪氏容共期間對他的迫害，二不滿蔣氏把他扣留在湯山，所以以在野姿態獨處一隅。汪蔣合作後，整個中國的政局漸趨穩定，一九二九年來所掀起的反蔣民主運動，又再次沉寂了。

當時陳公博正在歐遊，並無參加非常會議，更因胡漢民之阻撓，未能在廣州立足以反蔣，直至汪蔣合作局面出現後，才回到南京從政。

## 第九章 護黨救國軍

我離上海赴巴黎之前，蔣先生一面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而一面却積極籌備打桂系。他打不打桂系，我們倒不很注意；不過改組同志會也有些短視的人們，以為蔣先生打桂系，我們或者會有出路，最少可以喘一口氣，因為桂系給我們的壓迫太甚了。我當時認識很清，桂系只有地方的力量，而沒有控制中央的力量，而且只有軍事的行動，沒有政治的背景，我們受桂系壓迫，雖然很討厭，但我們若受南京的壓迫，則更是無法抬頭。①

我們為什麼注意三全大會而不注意桂系呢？那時三全大會，蔣先生決定用高壓手段，所有代表都由南京一手指派而不採用選舉制，後來我分析三全大會的代表，指派者佔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我曾著了一本「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價值的估量」，純粹站在客觀去批評，也純粹就事實來分析，這個大會實在算不得什麼代表大會，只配說蔣先生個人的御用會議。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的精神可以算壽終正寢，終蔣先生之世，也沒法把黨弄健全。



這個原因也很簡單，我以為要把中國弄得好，先須使國民黨真正成爲國民的黨，國民黨的憂樂須變爲全國國民的憂樂，國民黨的休戚，也須使它變爲全國國民的休戚。我們如果要達到這個目的，須使有志和有識之士都加入了國民黨，共同奮鬥。如果代表是指派的，則南京所歡喜的人才有被派的資格，南京所不喜歡的人，當然會被排斥。這所謂憑一己之好惡以用人，而人亦只有阿其所好，從前帝皇時候，單憑着一己喜怒以治天下，還有亡國之憂，何況民國成立，民智已漸開明；又何況國民經幾次反專制的奮鬥，若果代表不採選舉方法，有志和有識之士怎肯參加，所以這次大會光是指派代表，實是軟性和慢性亡黨一個方法。國民黨倘若不是執政的黨，與民生國計無關，誰也不去措意，但國民黨是一個當時專政的黨，這樣獨裁武斷，必使中國再復陷入專制時期，我們對於這次代表大會，真是非常憂慮和惶惑的。

全國代表大會可以指派，那各地黨部當然更是指派了。各地黨部的作用，是跑入民衆的核心，指導人民，輔翼政府，如果黨部是選舉的，則負責的責任的，第一要顧到民衆的利益，否則地方的感情和人望墜，他必不能當選。第二要顧到黨員的意見，必定他自己比其他黨員努力，比其他黨員活動，才有當選的希望。倘若指派，則負責部責任的只顧到中央個人的好惡，不復顧慮到黨員，至於人民利益，更非他們所屑措意了。由此類推，中央委員只顧揣摩蔣先生的好惡，不必需要對黨對國的忠誠，而地方黨部又只顧揣摩和逢迎蔣先生和他親信的意旨，不必浪費時間來體察人民的利益！<sup>③</sup>這所謂「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整個黨的前途，遂決意反對這個非法的三大大會。

我離上海之後，還在赴歐的途中，蔣先生知道我們反對，派邵力子先生來上海見王勵齋先生，要求我們維持緘默態度，而提供保證說可以令我們當選爲三屆的中委。然而聯任中委僅是個人的利益，而維持國

民黨的法紀倒是我們責任和義務。上海的所謂粵方委員，對於蔣先生給我們的交易，毫不動搖，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前，終於在京滬大發傳單，公開反對，因此博得這次的所謂三全大會通過決議，一警告汪先生，二開除顧孟餘黨籍三年，三永遠開除甘乃光和我兩人的黨籍。④其實開除我的黨籍是應該的，差不多反對南京的巨浪，都由我一個人煽起颶風，但開除甘乃光先生却未免過於冤枉，我私下替他抱不值。甘乃光既不是一個改組派，更於國內的煽動無關，自從廣州復陷於李任潮之手，甘乃光已遨遊海外，對於我們的舉動，毫不知情，大概南京還根據着十四年廣州時候「甘陳相提並論」的往事，胡先生極力主張來這個無證據的缺席裁判罷了。

我是於民國十七年三月一日至法國的馬賽的，汪先生派了曾仲鳴先生至馬賽接我，並且告訴我一件新聞消息，說接到國內電訊，李任潮被騙至南京，給蔣先生幽禁在湯山。去上海請李先生入京的是吳稚暉先生，因此吳先生爲着營救無方，覺得有負朋友，在蔣先生面前，自己碰壁而死。國內的內戰爆發是我所預期，但吳先生自盡出乎我意料之外。⑤我們看吳先生的文章，在紙上活靈活現顯出一副嘻笑面皮，以慣於嘻笑之人而忽有慷慨輕生之事，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在上海雖然和吳先生打過一場筆墨官司，但我對吳先生老當益壯的勇氣，倒是誠心誠意的佩服。我聽見吳先生自盡，不禁長嘆一聲，非常痛悼。

巴黎終於第二日早上到了，這次算是我第二次的重遊，風景不殊，河山無恙，下午見了汪先生夫婦之後，我倒想在法國作一個一兩年寓公之計。那時我住在城裡，而汪先生却住在鄉村，一星期中，我們也不過見一兩次面。那時法國的改組同志會分會經已成立，人選是由汪先生打電報至上海總部介紹的，當中的委員我只認識龍膺興和顏繼金兩人，他們是廣東大學的學生，是鄒海濱指定出洋留學，而俟我接任之後，

才正式遣派的。汪先生又打電至柏林約王東丞到法國和我相會；王東丞先生是我素識，他在廣州原任黨軍第二師，後來蔣先生說他勾結共產黨，一朝便把他扣留起來，硬送他三千元，迫他即日離開廣州赴上海。後來汪先生至海外，蔣先生曾給汪先生一封信，說汪先生不合勾結了王東丞倒他。這個罪案當然也是三月二十之變以前的整套戲法，同一爲蔣先生神經過敏的舉動。我們相見之後，知道東丞到過莫斯科，到了柏林也將近兩年，現在正研究軍事學，他已由一個豪悍的軍人，變爲恬靜的研究者了。

我居住巴黎一個月，自然無事遊遊凡爾賽宮和楓興舊露宮，間中逛逛魯佛博物院，欣賞歷代有名畫家的傑作。至到四月爲着英國工黨競爭選舉，又到了一次倫敦，那時麥當奴正往鄉村演說，我只和幾個工黨當事人交換些意見，據他們說依着新選舉法，有一百多萬的婦女做了新投票人，這班婦女是否同情工黨，絕無把握。他們的確有些悲觀，焉知那就是工黨第一次登台的機運呢？<sup>⑥</sup>我只住居倫敦兩星期，又重回巴黎，那時我已賃了一層樓在巴黎郊外的雲山門，打算作比較久住之計，一天汪夫人忍不住找我去談話了。

「我以爲汪先生年紀大，身體又多病，才久居外國。怎麼以你這樣年輕的人也打算長住外國？」汪夫人的脾氣一向談話都用責備和質問的神氣。

「不長住又怎麼辦？」我實猜不出汪夫人是怎樣的心事。

「我不信國內一點辦法都沒有？」汪夫人提出了意見。

「什麼辦法？要辦法只有反蔣和打仗，汪先生是不願意的，因爲現在還是汪蔣合作。」我禁不住發點牢騷。

「你怎知道汪先生不願意？現在介石這樣做法，誰也忍不住，只有你才忍得住的！」汪夫人大約用激將方法了。

「對於政治和黨務，我真有些厭了。如果要我幹，汪先生也得回國。否則你們會住巴黎，難道我不會住巴黎？」我那時對於怎樣幹，真一點把握也沒有。

「你肯回國，汪先生也一定回國的。」汪夫人似肯定的保證。

這樣汪先生是要我回國了。我和汪夫人談話之後，再見汪先生商量以後的步驟，汪夫人又每天催我動程，我遂於五月十二離馬賽歸國。

那時我們已陸續接到報告，李任潮先生的確已囚在湯山，而吳稚暉先生的確并未有死，而且根本沒有試過要死那回事。爲着三全大會開會，李任潮先生由廣東趕到南京，一至上海已知大事不好，逗留不進。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幾位老先生苦勸他入京，李任潮不允，吳先生甚至下跪痛哭，以他的老命担保。任潮對於蔣先生是不相信的，但他却相信這幾位老先生，一至南京，蔣先生遂立即送他至湯山的溫泉俱樂部安置，任潮至此也只好天天圍棋，高吟古詩「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的名句了。任潮被囚，廣東陳真如和陳伯南，宣言歸命中央，唐孟瀟秘密上天津，號召舊部，一下便奪了塘沽李鶴齡的軍隊，白健生隻身由天津脫逃至香港。張向華爲朱益之推荐，起用任爲進攻武漢的江右岸的左翼總指揮。廣西舊將俞作柏運動了他的表弟李明瑞（那時李任桂軍的旅長，受胡宗鐸指揮，開赴前線抵禦南京西征的部隊），倒戈相應，武漢的桂系部遂不戰而潰，而且俞作柏已奉命帶着李明瑞回廣西作他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却由旅長一躍而爲總指揮，至此長江流域的桂系算是完全崩潰了。⑦

桂系自然是崩潰，而護黨救國的運動也非常悲觀，因為我們內在的矛盾，充塞於每個人利害之間。第一是汪先生始終站在改組同志會範圍以外；大概他受了別人的貢獻，說與其做改組同志會的領袖，不如做全黨甚或全國的領袖，所以對外發表談話，說他對於改組同志會是同情的，但他本人不是改組同志會的同志。汪先生既然不是改組派，那麼張向華他們自然不加入這個無領袖的同志會了，因之汪先生底下，形成了三派，一派是改組派，那是改組同志會的同志；一派是汪派，那是他左右的親信；一派是左派，那是信奉汪先生的主張，而不屬於以上兩者的。這三派的分野雖然大方明瞭，內部却着實有些傾軋的痕迹。第二是信奉汪先生主張的，各有利害的不同，在文人一方面，只求達到推倒南京和恢復法統的目的，什麼也不計，此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⑧而在軍人則各有本身的利害不同，唐孟瀟所要的是抓回白健生奪去他的隊伍，張向華所要的是希望早日回至第四軍，至俞作柏更是和李白黃有不解的宿仇，他們以為三全大會固然是非法，但無妨先倒桂系，後談法統。第三是上海總部的老先生太遷就事實，他們看看有些把握不住軍人，也只好由他們自由發展，不只唐張不服商量，連改組會的下層也分途幹自己的買賣。⑨其最著名的，廣東黃鳴一、阮若梅等專跟俞作柏走，而且還替蔣先生秘密送信和送款至李明瑞的軍中。這樣一來，桂系固然是倒，而改組同志會的步驟也同時起了混亂，實在不必等汪先生於十九年一月一日解散，改組同志會的精神早就消滅了。

我到達香港已是六月下旬，余愷湛來報告，說俞作柏已回至廣西任主席，他們和俞作柏由上海回來時，同船的還有薛伯陵和李朗如，在上海動兵之先，唐孟瀟、張向華、俞作柏都會和總部接過頭，說等他們覆滅桂系之後，大家立刻都反蔣。後來俞作柏的軍隊至廣州，薛李兩人勸他乘機佔廣東，俞作柏不肯答應。

，及俞作柏回至梧州，他們又勸他宣佈獨立，俞作柏也猶豫，他的藉口是要在廣西整頓軍隊，等到實力充足以後，再行反蔣。我只好苦笑一下，上海總部的先生們也太老實了。其實我們的軍人起始就不應幫蔣先生打桂系，桂系覆滅，蔣力必增，這個各個擊破的形勢已在那時形成，但怎樣辦呢？我們就不聲討南京的非法會議嗎？箭在絃上有不得不發的勢了。

上海總部的主張，要成立護黨救國軍，說馮煥章和閻百川都有代表和我們接頭，其餘石友三、方振武、何芸樵，都有向義的表示，北方及長江中部已沒有多大顧慮，只等着南方首先發難罷了。◎各方的表示，以為張向華是汪先生嫡系部隊，須要張向華先動，然後各方才可放心響應。華北華中既已有總部主持，他們留我在香港策動華南的軍事。這個計劃，我詳細電告汪先生，並請他立刻歸國主持，因他若徘徊海外，終難得一個有力的號召。汪先生覆電他已準備動程，對於計劃也分別認可。我得了汪先生的覆電，遂打了三個電報，一個給孟瀟，一個給益之，一個給向華，請他們發動，並且告訴他們廣西已準備獨立。

桂系失敗的將領那時都避居在香港，李德鄰、黃季寬、胡今予、陶子今、徐廣陶、鄧益能、夏煦蒼差不多全體都在那裡作寓公，祇有一個白健生還是蟄居安南的河內。汪先生在巴黎時，由王東丞的介紹，本來已和桂系的張伯璇有聯絡，桂系失敗之後，遂反蔣而擁汪。不幸我們的矛盾已經沒有方法消弭，而他們本身的矛盾又來，他們對於反蔣是自然十二分的贊同，但幫助俞作柏反蔣，倒是舊恨新仇堆積在一起，無從疏解。當中李德鄰還比較大方，而白健生和黃季寬則對於俞作柏，很有死不兩立之勢。我們無論如何談下去，均不得要領，這個反蔣陣線，始終爲着個人的利害和恩怨，不能統一。

我到香港的消息不久傳至南京，因爲離法國馬賽之時，那裡的中國領事館已報告外交部。我發給朱益

之他們的電報，慢慢也洩漏了。朱益之先生爲着明哲保身起見，據說已把我的電報呈明蔣先生，唐張雖沒有把的我電報公開，却也被蔣先生所刺探。一天蔣先生故意詢及孟瀟和汪先生的關係，聰明的唐孟瀟嘆一口氣說：「我真沒有辦法，汪先生只信顧孟餘和陳公博兩人。」這句不即不離說話，倒使蔣先生相信唐孟瀟不至作反。蔣先生倒知道孟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而且和汪先生究竟沒有深長的歷史。至蔣先生對向華那就比較寬得多了，向華在南京回至宜昌防地之時，去見蔣先生。

「公博回來了，你知道嗎？」蔣先生很嚴厲。

「是，我知道的。」向華不敢隱瞞，實在也不能隱瞞。

「他有給你信沒有？」

「有。」

「說什麼話？」

「他說要做生意。」向華到底不善於辭令。

「我告訴你，公博是沒有辦法的。公博就使到了南京也沒有辦法。如果他有辦法，我是忘八蛋。」蔣先生立刻沉下臉來，這時恐怕他是太急了，所以他已忘記了他的尊嚴，說出市井的粗語。

向華後來一句一句告訴我，倒使我笑起來，我從來沒有見過蔣先生那樣不能自制，這樣真使他太苦了。那位向華先生當時實在不想動的，臨去宜昌之前，派他的內親官先生來見我，說向華已不想打內戰。但向華不動，我們就不幹嗎？我們先專心致志於廣西的發動再說。

當時最使我感覺困難的，是廣西未發動而先告失敗。事實是這樣，俞作柏先生自命左傾，誰知一傾便

傾至共產黨。他回南寧之後，左右都佈滿共產黨徒，而且他還想掌握兵權，又和他的親戚李明瑞各爭隊伍。在香港之時，我和薛伯陵商量，打算我們兩個人一同入廣西，但後來上海總部不贊成我輕離香港，所以只由伯陵先去。①伯陵一至南寧，便感覺俞先生靠不住，那時南京也深悉俞先生的舉動，一下便任命了廣西的師長呂煥炎做廣西主席，來顛覆俞先生。梧州是入呂煥炎的手內了，就是俞先生的外甥黃權師長也把握不住了，至是俞先生旗還未舉，而身先下野。伯陵沒有辦法，又從廣西跑回來，一肚子牢騷，只有找我發脾氣。

「俞作柏和共產黨勾通，你知道嗎？」伯陵氣急敗壞的。

「怎麼說？」我也着急。

「我到南寧，他左右都是共產黨徒。住在我隔壁房間的就是著名的共產黨。」伯陵申訴着。

「你是和他同在上海會議的，而回來也是和他同船南歸的，怎樣你一點也沒有發覺？」我反詰問。

「總之，我們上當罷了，猛野，我們以後什麼事都要慎重和考慮才好。」伯陵很憂鬱的辭去，猛野是當時我的渾名，在廣東土語是「利害的傢伙」的意思。

「失敗是革命者常幹的事，我們總不要灰心。」我只好安慰伯陵，其實當時也入了悲觀的狀態。

廣西剛失敗，張向華在宜昌發動了。向華前此不願發動的消息，由他的親戚官先生帶來，不止帶給我，而且帶給薛伯陵，四軍官佐留在香港的，都不滿意，對於向華批評和詈罵。現在張向華倒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發動，到底爲什麼原因呢？不知道是出於故意或是出於偶然，蔣先生突然的命令張向華的軍隊由宜昌調駐山東的德州，並且派福建軍隊曹萬順一師來接防。向華以爲蔣先生這個命令，是要解決第四軍，因爲



四軍由宜昌調德州是要經南京對岸的浦口的，這樣分批運輸，也容易分批繳械。張向華一個人也不通知，俟曹萬順的軍隊到宜昌，迅雷不及掩耳的給他全體繳械，立即渡河跟着湘西的路線撤向廣西。這時官先生又來香港了，說向華已經發動，兵力共有八團人，要我們籌款接濟，並要求向廣西先容，和指定駐兵的地點。⑫張向華既有八團兵力爲什麼不溯江而下佔奪武漢，却迂迴這條長路到廣西？我有點不明白，但同時又不得不設法接濟。

俞作柏既靠不住，恃之反蔣固不可能，恃之收拾廣西也不可得，於是我和德鄰、季寬商議，請他們繞安南迂道入廣西，或者收拾殘餘，可以響應向華，也可以合力以圖兩廣。德鄰、季寬贊成這個提議，實在他們也正在運動廣西的軍隊，於是他們便秘密離開香港了。⑬

十月上旬汪先生已自法國回至香港，我真像「如釋重負」，以後諸事都可秉承汪先生的意旨，可以不單獨負責。那時我們只有急忙的籌款，至於華中和華北自有上海總部主持。上海總部是時非常活躍，所有反對南京的皆集中上海，而各省省黨部之不贊成指派代表的也舉出代表成立各省市黨部聯合辦事處。指揮軍事的有軍事委員會，辦理黨務的有聯合辦事處，此外更有兩家日報，一家由陳孚木等主持，一家由彭學沛、梅恕曾、陳言、楊全宇、李心輝諸人主持，很是旗鼓鮮明，有聲有色。各路的護黨救國軍也發了委任狀，自第三路以下的總司令，有唐孟濂、李德鄰、張向華、胡今予、石友三諸人，連何芸樵和好幾省的軍長都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受了委任。至於第一路和第二路的總司令當時未曾發表，爲的是留給馮煥章和閻百川，一時聲勢浩大，儼有氣若河嶽之勢。⑭

張桂軍會合之後便計劃再攻廣州。我沒有回至香港之前，李任潮被囚，李德鄰即偷出了上海回至香港

，更上廣州找師長而兼公安局長的鄧益能，想聯同兩廣宣布獨立。然而陳真如和陳伯南都反李了，李任潮的師長徐廣陶和鄧益能也被免職了，李德鄰只有逃香港，而叫黃季寬起兵打廣州。季寬也是動了兵，但據德鄰對我說，廣西實未傾師而出，所以後來廣西軍隊吃了大敗，並且一個師長黃應榆也做了俘虜。這時張桂軍會合，鑒於前次失敗，廣西的軍隊幾乎全體動員，殆以爲佔據廣州是指顧問的事了。

蔣先生知道張桂軍必會攻廣州的，命令朱紹良和毛炳文兩師援粵。以兵量而論，張桂軍實敵不過廣州之數，但大家所靠的是質，而廣西又是哀兵，當張桂軍合攻廣州之時，大家頗具有必得之志。張桂軍由梧州浩浩蕩蕩出發，兵威所至，一路無阻，陳伯南則憑據德國顧問所做的工事，內線作戰。張桂軍兵力單薄，又是久疲之師，圍困了幾天，已佔了白雲山腳下的龍眼洞，終爲陳真如的摩托車隊所攻破，東面的張向華支持不住，西面的李黃軍隊只作撤圍，蔣光鼐和蔡廷鍇的軍隊乘勝追擊，後來一直侵入了廣西，輾轉苦鬥了大半年，等到胡漢民先生被蔣先生囚禁湯山，廣州開非常會議，張桂兩軍才得蘇息。⑯

張桂兩軍正在苦鬥廣州，唐孟瀟也正和馮煥章艱苦作戰。其時蔣先生爲着打馮，曾把唐孟瀟的軍隊移駐鄭州，本來大家約定一氣發動的，馮先生是出兵撞關了，而唐先生反在那裡拚命抵抗。當時我們實在非常焦急，馮先生派在上海的代表天天來總部質問，唐先生反而消息寂然。末後孟瀟派他的代表鄧壽荃先生來港，說明孟瀟拒馮的原因，謂他的前敵總指揮宋哲元先生欺人太甚，就是佈告上宋哲元三個字也大過巴斗，似此非把馮軍打退，不能反蔣。這個理由確是妙不可言，但當時又有什麼辦法？恰恰蔣先生又命令石友三援粵，石友三軍隊一至浦口即改扮護黨救國軍，但石先生也是妙人，他一不攻南京，二不據長江，只在浦口大掠一陣，便扣了許多火車，撤兵北據徐州，和韓復榘連在一起。

唐孟瀟畢竟把馮煥章打退了，他見石友三也起了義，趕快集中軍隊直下武漢，可是先頭部隊剛抵武勝關，便給何敬之擋住。而他自己呢，在後方毫無準備，直給楊虎城一夜襲了營，孟瀟僅以身免，間道從旱路偷過濟南，直至天津，轉道至香港，他的軍隊便全體給陳誠解了甲。自此護黨救國軍便烟消雲散，<sup>⑯</sup>吳外開了一頁北平擴大會議的新史。

在我們失敗之中，還夾着一段痛史，王樂平先生在滬被刺身死，同難的還有潘學吟同志，這是蔣先生叫楊虎他們幹的。至民國廿二年才由我們正式公葬於山東的千佛山，但公葬又何補於他的慘死！

張桂軍的失敗，使我失眠了十幾夜，我並不痛心於軍事上的失敗，因為革命者的失敗，是革命史常有的事，而使我最關心的，是不是我的觀察完全錯誤，而對於革命的低潮應該如何才能補救。

第一，這次張桂軍之合攻廣州，在我們的想像，並不是爲着割據，也並不是爲着私仇。南京的三全大會明明是違法，而國民黨人似乎除了少數人之外，毫不注意。而且張桂軍由動員以至進攻，我們絕不見民衆起來，所有農、工、和小資產階級，都袖手旁觀，絕不參加一些運動。他們並不是不幫助我們而去幫助了南京，他們對於南京和我們兩方面都一樣的冷淡。可見那時的國民黨已脫離了民衆們，至於黨的違法與否都是黨內的事，與他們絕不相干，這樣對於國民黨的本身，我們應該重新檢討一下，<sup>⑰</sup>絕不能單靠幾條空虛綱領就可以號召天下。

第二，自從黨的一分一合，已使許多人們冷淡和灰心，尤其擁着國民黨籍的軍人，他們只知道私人利害，而不卹黨的法統，其新入黨的固然很容易露出原形，即富有歷史的也漸漸歸還本性。譚組安先生本是一個看得透而又是大澈大悟的人，在寧漢分裂之後，遇有會議都在席上打瞌睡，組安如此，其他可知。所

以寧漢一復合，譚組安和程頌雲就想奪回湖南的地盤，而張向華也想以廣東爲他戰功的酬庸地。即如此次護黨軍興，倘若馮煥章、閻百川、唐孟瀟一齊動作，我們逆料立刻可以成功；但閻百川是不願意馮唐發動的，因爲馮唐勝利，他便失了百雄之長的地位。唐孟瀟也不願意馮單獨成功的，因爲馮據有中原，唐便不能作軍人的新興領袖。因此馮起而唐擊之，唐起而閻又躡之，結果使蔣先生逐個擊破，這並不是蔣先生有什麼神機妙算，其實坐於軍人間的矛盾太多。即以廣西而論罷，俞作柏本來可以不必回廣西，當他的軍隊初抵廣州，即可起而佔領，把廣西讓回李白，這樣南方也可以成一個局面；然而俞作柏爲報個人的私怨，又捨不得廣西的地盤，而李白更觸起他們的舊仇新恨，非推翻俞作柏和拿回他們的根據地不可。至於俞作柏與共產黨勾結又是另一問題，就使他不和共黨勾結，他也不能一方面安然奄有廣西，而一方面更進圖廣東的。

中國到底是一個停滯於封建思想的國家，這般軍人先天帶有這些傳統思想，並非一時所能以理論克服，中國恐怕長期陷入於地方軍閥政治罷！這樣，國民革命的北伐前功都盡廢了。然而這種軍人的地方割據觀念，蔣先生也於北伐時期就養成，廣西和湖南是整個來歸的，自然一時談不上軍民分治，但長江幾省是北伐軍力役奪取的，除湖北由我們力爭才任命一個無兵的老軍人孔庚做主席，此外江西給了朱益之，安徽給了陳調元，江蘇於寧漢未分之時也給了程頌雲，這都是養成軍人盤據地方之漸。◎我和朱益之當日也算是一個知交的朋友，但他被任江西主席，我就反對。但蔣先生以爲江西實在找不出一個適當的文人，我雖然極力陳說，但蔣先生有他的成見，我說了兩次也就罷了。

黨不黨在中國人民恐怕沒有什麼興趣，大約人心厭亂，中國應該來一個比較長治久安之局罷。但要長

治久安，必得與帝國主義者和舊勢力妥洽，這個看法徘徊於我腦中，實在無法解決，因此遂患着失眠；以後雖然上了北平，參加了擴大會議，但已鼓不起興味，亦只有聊盡人事，以待天命而已。

## 第九章 註釋

①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陳公博會同黃琪翔在廣州發動政變，驅逐桂系李濟琛、黃紹竑等，引起桂系不滿，因而在南京攻擊汪系。其後，共產黨在廣州起事，汪系更受桂系攻擊。見本書第七章；及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七八年，第八冊，頁一九三至一九五；及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38-147. 當時除桂系外，一般在南京之國民黨黨員，亦對汪系不滿。張靜江要求至少要緝拿陳公博、顧孟餘、甘乃光等汪系委員。吳稚暉亦指責汪系，謂：「不應為垂手可改之特別委員會問題弄兵，二不應驅李濟琛離粵。見「一周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四卷，第四十一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又吳稚暉對廣州事變的態度，可見黃季陸編：「吳稚暉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一九六九年，卷九，頁九〇二至九一五及九六一至九六四。時蔣介石期望與汪精衛合作，故袒護汪系，務求汪系委員能夠出席國民黨四中全會，見「一周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五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及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國民黨五中全會召開時（一九二八年八月），南京委員張靜江、李石曾等，依然指責汪系，但蔣介石仍主調和。見記者：「第五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紀」（上），「國聞周報」第五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九日。由此可見，當時南京委員反汪雖然激烈，蔣介石仍望能調和衝突。至於陳公博主辦之「革命評論」却引起蔣介石不滿，故「革命評論」創刊不及四個月

(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至九月三日)，便為南京當局迫令停刊，見本書第八章。

②據當時漢口市黨部通電中，南京當局指派及圈定代表超過百分之七十，見「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六卷第十期，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陳公博在其「所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價值的估量」一文中，指出南京當局圈定及指派代表，佔百分之七十四，後再根據改定後之事實計算，謂南京當局包辦代表達百分之七十九，見中國青年軍人社編：「反蔣運動史」，中國青年軍人社，出版地缺，一九三四年頁四十六。湯良禮亦指出三百六十名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中，有二百八十五人為南京指派及圈定，幾及總數的百分之八十，見 T'ang L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30), p. 346. 另一方面，George E. Sokolsky 根據國民黨所發表之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資料，指出純粹由南京所指派之代表達百分之四十二點五，由南京所圈定代表則為三十二點六，故指派及圈定代表達百分之七十五點一，見 George E. Sokolsky, "The Kuomintang" in H.G.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31*, (Neudeln: Krvans Reprint, 1969), Chapter 13, p. 1202.

③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大公報」在其「黨治雜感」社評一文中，指出國民黨自握權以來，實際上殊少黨權之活動，稱為黨權的，不外形式而已。事實上，中央地方多為個人政治。見「論評邏輯」，「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九期，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大公報」在另一篇「論整個的黨」社評，指出其時國家統一且已兩年，而各地黨員，尚多未許其施行本地黨部之選舉權，或初已成立執行委員會者，反改為指導委員會，再改為整理委員會，而且登記常常變更，選舉無期延緩，同時黨員之於上級黨部也只有服從

聽話之義務，少有自由辯論之機會。見「論評選輯」，「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七期，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④ 事見記者：「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國聞周報」，第六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⑤ 李濟琛是於一九二九年三月由滬入京，而在此之前吳稚暉曾以人格担保不生危險。見中國青年軍人社編：「反蔣運動史」，廣州，中國青年軍人社，一九三四年，頁四十九。由於南京後來與桂系發生衝突，乃於三月二十一將李濟琛由暗中監視改爲公開幽囚於湯山，見「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六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至於吳稚暉碰壁而死一事，「寒風集」亦有同樣記載，見陳公博：「改組派史實」，「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社，一九三五年，第六版，頁甲二七六至二七七。然而吳氏未真正碰壁。

⑥ 英國工黨第一次上台掌政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而一九二九年六月工黨再次競選成功，重掌政權，是爲第二次執政，見 David Thomson, *Eng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 Book, 1977), p. 91. 陳公博記載一九二九年工黨競選成功，爲其第一次登台掌政，與事實頗有出入。

⑦ 南京中央在瓦解桂系在長江流域之勢力一事中，先派桂人俞作柏赴武漢游說其表弟李明瑞（桂系將領）投誠中央，後由李氏聯絡其他將領如楊騰輝、夏威等投誠，其餘桂系將領胡宗鐸、陶鈞等，因抵擋不住中央軍入侵，退到鄂西，最後爲張發奎部接收，見黃旭初：「記民十八年的武漢事變」，「春秋」，第一八三期，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六日，頁十二至十五；又黃旭初：「半年三變的廣西局面」，「春秋」，



第一八四期，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頁十八至二十一。Lary, pp. 138—147.

⑧有關國民黨左派之理論、內部情形及發展，可參考司馬仙島：「中國國民黨左派——改組派與黨統」，載於「北伐後之各派思想」北平，鷹山社，一九三〇年，頁一三三至一五二；江蘇評論社編：「中國國民黨左派ABC」，北平，卿雲書局，一九三〇年；及T'ang Leang-li, pp. 330—334.

⑨自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後，陳公博由上海往歐洲一行，以後改組派份子在�海總部的事務，陳公博未有牽涉，至改組派基層份子「分途幹自己的買賣」，陳公博亦所知無多。陳公博曾言：「上海的大計，我很慚愧，我的確沒有負過艱巨的。」見「改組派的史實」，「寒風集」，頁甲二七六。

⑩華南地區當以張發奎部為最重要的一支軍力。張發奎於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在鄂西正式通電倡議護黨，見第四軍紀實編纂委員會編：「第四軍紀實」，廣州，懷遠文化服務社，一九四九年，頁二八七；及「反黨運動史」，頁七十七至七十九。

⑪由一九二九年中至一九三〇年春，陳公博在香港主持兩廣軍事，發出護黨救國口號，反對南京中央，故當然不能隨便離開香港，見「改組派的史實」，「寒風集」，頁甲二七七。

⑫上海改組派中央撮合張發奎部回廣西與桂系合作共同反蔣一事，見「第四軍紀實」，頁三一〇至三一三；「反蔣運動史」，頁八十三；及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五年，頁一五〇。

⑬首先離開香港，往南寧者為黃紹竑，後來李宗仁、白崇禧，相繼尾隨，見黃紹竑：「五十回憶」，杭州，風雲出版社，一九四五年，頁二〇一至二〇三。

⑭桂系爲掀起反蔣戰役之先鋒。一九二九年三月廿一日李宗仁等桂系爲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罷免一事，與南京中央發生軍事衝突，李氏後與上海汪系二屆中央聯絡，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就任汪系二屆中央委命之南路護黨救國討賊軍總司令職，後改爲第八路總司令，並通電救國，見「反蔣運動史」，頁四十八至五十一，頁五十三及八十四。張發奎軍則於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響應汪系中央，以護黨救國名義反蔣，張氏並任護黨救國軍第三路總司令，見「第四軍紀實」，頁二八七，及「反蔣運動史」，頁七十七至七十九及八十四。至於唐生智及石友三等，則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通電反蔣，五日，唐生智就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職反對南京中央，見「反蔣運動史」，頁一〇三及一〇六。至馮玉祥雖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一度通電反蔣，却没有與汪系上海中央聯絡，故不以護黨救國名義反蔣。馮氏後因部下投誠中央而失敗。見「反蔣運動史」，頁五十八至六十三，及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香港，致誠出版社，一九七〇年，頁二十八至二十九。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馮玉祥部再度反蔣，亦不以護黨救國軍爲名義，見「反蔣運動史」，頁七〇；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三十三至三十四；及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sh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259-260. 至於閻錫山方面，曾於十月間表示不與馮軍合作，無疑，閻氏仍是袒護中央的。見「反蔣運動史」，頁七十一，及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三十四。

⑮一九二九年十月，張發奎軍通過汪系上海中央之協調，與桂系共同以護黨救國軍名義反蔣，並肩攻打廣東陳銘樞部隊，十二月一日進迫廣州，在近郊爲粵軍擊敗，張桂軍遂後撤，採取退守政策。南京中央指示粵軍乘勝追擊；粵桂戰爭便一直延續，及至一九三一年胡漢民爲蔣介石幽禁，始露出和平曙光。後來

兩廣協商一致團結反蔣。見黃紹竑：「五十回憶」，頁二〇三至二一五，「反蔣運動史」，頁八十一至九十四，及「第四軍紀實」，頁二八六至三八三。

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唐生智、石友三分別通電反蔣，七日，南京中央下令褫唐本兼各職，並同時發一通緝令，着各機關一體拿辦。十二日，蔣介石大量委命攻唐軍職，拉攏各「雜牌軍」將領。越二日，唐生智因無軍費發付各「雜牌軍」，處於四面包圍之勢。至二十日，閻錫山決定支持蔣介石，進軍剷除唐生智，而石友三等態度亦生變化，轉而支持討唐。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唐生智因處四面楚歌中，乃通電出洋，見「反蔣運動史」，頁一〇三，一〇六至一一三。

⑰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大公報」在一篇題為「國民會議之時代性」的社評中，指出國民黨所成立之民衆團體，大率爲黨部之寄生物，全不自主，而此類團體，亦因黨部糾紛而分裂，不特不能代表民衆，民衆反而避之，見「論評選輯」，「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三十一期，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一日。

⑱在北伐戰事中，舊有軍閥軍凡願向國民黨投誠者，國民黨一概予以收容，易名爲國民革命軍，實則一切意識形態與作風，與過去的軍閥本質無異。軍中之人事，依舊自成系統，不受統帥部干預。見「三十年動亂中國」，頁二三五；及 *Chi Hsi-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ssim*.

## 第十章 北平擴大會議

在張桂軍還沒有失敗之時，胡今予先生已自告奮勇，往天津住居。他的目的是想拿天津作一個運動北方的總把；一面聯絡閻百川先生的部屬，一面和深入閻先生內裡工作的潘宜之先生相呼應。閻百川要動了，閻百川要動了，這個消息，時時都傳到了南方。但消息即管傳來，而行動却毫無踪影。馮煥章是失敗了，張桂軍是失敗了，唐孟瀟是失敗了，石友三是失敗了，果然閻先生躊躇滿志，真要動了。

胡今予先生從天津打電報來，說閻先生真要發動，請汪先生派一個代表到北方，①汪先生考慮了幾天，終於派王勵齋先生和我兩個人做代表北上。王先生是北方人，和北方的將領很熟，那時他還在上海總部負責，汪先生打電報請他逕往天津和我會合，我即於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赴日本的香港長崎直航船赴日，繞道門司赴天津。

我們到了天津即住在胡今予先生家內，在天津見過閻先生部將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那是北伐時守涿州的名將，三天之後，便和勵齋往北平。我們在平又會過北平警備司令李服膺、師長王靖國和市長張蔭

梧，但僅僅兩天，我們便又趁早車回天津了。事實是這樣，閻先生或者已下了反蔣的決心，然而他還有不少的顧慮。其一，馮煥章那時已久居太原，他因為軍事失敗，遂下決心單身入晉作說客，他和閻先生會於介休之後，閻先生請他住在太原的郊外，派兵警備，形同軟禁。馮先生雖然屢次表示服從閻先生的指揮，但馮先生在閻先生的心中是不大靠得住的，而且他的部將也是不容易指揮的，這樣隨便發動，是不是會上當？其二，表示服從閻先生的還有石友三和孫殿英諸人，石友三會反過馮先生又最近反過蔣先生，而孫殿英是著名掘清寶皇陵的英雄，這班三山五岳的豪傑，殊非閻先生所易駕馭。其三，北方若出兵南下，側面最容易受威脅的是東四省的張漢卿，這個東面的外交辦不好，殆未易在中原爭霸。其四，閻先生的不穩消息傳出以後，南京曾託許多人調停，最主和平的要算閻先生的老朋友趙戴文，閻先生的躊躇不決，這也是重大原因之一。②因為這種顧慮，閻先生表現於外邊的態度自然是模糊了。

我們剛到北平的第二夜，社會局長梁上棟來見，梁先生是山西人，是王勵齋的老友，也是改組同志之一，他說閻先生還未下決心，山西萬不能隨便去。梁先生不說，我們也是觀察不定，何況梁先生是山西人，他這一說，遂使勵齋先生搖動了。我們既然不去太原，實在沒有理由久居北平，因是到達北平的第三早，便大家又返天津等消息。我為什麼寫這一段來去匆匆的小史？因為證明閻先生起初就舉棋不定，而使歸附者離心，及後兵驕將悍，使閻先生難於指揮，都在起初的時候，給他們看透了閻先生的弱點。

在天津又住了個多月，馮先生算是釋放出來，回至本軍了，徐永昌並且不做河北主席，將要任爲前敵副總指揮了，潘宜之不斷有電來催勵齋和我兩個人到太原了，這樣大概一定要發動了罷，我和勵齋再赴北平，轉道平漢鐵路，沿石家莊入晉。③

山西我從來沒有到過，這次藉着見閻百川先生之便！還是第一次一覽表裡山河之勝。正太路困難的工程，娘子關的雄峻姿勢，一一都收入眼底。我對於山西事前沒有什麼印象，有之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東方雜誌」讀了一篇「閻百川先生的備民政策」。據我推想，山西是百廢俱舉的，然而確是守舊而進步很慢的，除此之外，我什麼也沒有印象。但登車之後使我吃了一驚，那是車廂中男女分座。這種男女界限的劃分，在火車裡頭，我從來沒有見過。後來到了太原，我還問了一個山西朋友，據說男女的劃分還不是當局之意，祇是相沿已久，也無人提過異議，有時女廂人滿，婦女迫得離座到男廂，她們反覺得不自然，所以也聽其維持自古已然習慣罷了。但無論如何解釋，使我感覺到山西對於新文化的接受，還是遲緩，比之山西以外，恐怕要遲到二十年。男女界限的劃分，不止在火車，即在戲院和電影院裡，也像一條鴻溝，彼此不能侵越，可是在大街上倒有許多青年男女駢肩同行，這種矛盾我想不止在山西，大概邊省都有這些現象罷。

車過陽泉以後，倒看見山西境內土地闊和田野治的好景象。大概山西二十年來未受兵燹，老百姓倒能樂業安居，祇是在車上有朋友告訴我，山西白面很流行，窮至行伍裡的士兵，深到家庭裡的婦女，很多有海洛英等毒物的嗜好。閻百川先生爲什麼容許這些惡習流行呢？這一點我至今還不了解。自然有人說這或者省政府因收入的關係，所以縱容他們胡爲，可是海洛英是私運而非公賣，省政府的收入倒是有限的很罷！

我們到達太原已在下午，到車站接我們的有無數的熟人。在漢口很相熟的孔雯軒，到過江西的趙芷青和胡經武，在廣州就已認識的潘宜之，此外留於太原的河北主席徐次辰，調主山西主席的商啓予，都擠擠

擁擠在車站。我們剛到山西大飯店，閻百川先生已來會，我們和閻先生談了一個多鐘頭，閻先生倒虛懷若谷，每事下問。我對於閻先生的貢獻，是幹就要快，因為緩了，在軍事難得佔上風，在政治容易灰了海內的熱望。從這一席話中，我感覺閻先生優於考慮，緩於判斷，只長於靜如處女，而短於奔如脫兔。我當時很感覺到這次會戰恐怕還是失敗多而成功少，祇是那時形勢大有箭在絃上不能不發罷了。

在太原一住就二十多天，我對於閻先生已沒有多大獻議，因為我這人有什麼話一天就說完，並不會吞吞吐吐逢人祇說三分話。這二十多天我最感煩悶的是和謝慧生、鄒海濱兩先生討論黨的問題。那時所謂西山會議人數已並不多，剩下的台柱要算居覺生、謝慧生和鄒海濱，其次要算覃理鳴和傅沐波。居覺生因為在上海運動熊天翼，中了熊先生鴻門宴的毒計，一下便被捕送到南京去幽禁了。這次來太原的是謝鄒傅三位先生，覃先生則留在天津，沒有參加這個討論。我最初主張維持第二屆法統，鄒謝反對，我們請了汪先生的示，讓步至會合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而成擴大會議，然而鄒謝兩先生還因為他們在上海也曾開過他們的第二次全會，堅持着把那些委員也要加入。我以為別的可以讓步，這一點確實難於贊成，我們為什麼要動兵？原因在於反對非法的第三屆全會，現在不獨第三屆可以加入，連環龍路的非法中央黨部也要加入，那不是我們也違了法了嗎？以違法伐違法，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們又何以自白於天下。不過謝鄒兩先生倒是非常倔強的，即使事不成而環龍路的黨部不能放棄，我們越談越成僵局，只有再到天津再說罷。傅沐波先生倒底是一個青年人，不贊成謝鄒的主張，但理鳴不在，他也孤掌難鳴，不好向久於同事的謝鄒抗議。④

在太原無聊之極，倒趁辯論餘暇去遊蘭村，逛晉祠，大嚼傅青主的羊頭腦，和看模模糊糊的電影，以

及聽十足秦腔的山西戲。晉祠風景在山西境內確是一個名勝的地方，有碧水青山，有唐槐漢柏，唐太宗起義的晉陽城，雖然傾圮不堪，但在戎馬倥傯之時，來此一遊，惹起我懷古的幽情，和憑吊的感慨。我讀了晉祠貞觀古碑以後，寫了一首七絕：

「虎步龍行天日姿，中原爭霸盡凡兒，我來剔蘄捫殘碣，碧水青山吊晉祠。」

我們到天津再談黨的問題罷，依在這個願望之下，謝鄒兩先生從正太鐵路回天津，我倒和傅沐波、黃少谷諸人繞道大同一覽雲崗之勝。山西我沒有到過，自然大同我更沒有到過了。雁門的險巖，塞漠的風沙，一日之間，風景變換了好幾次。大同雖然小小一個城池，却充滿歷史傳說的羅曼斯，街道也還齊整潔淨，不如太原的廝雜。可惜得很，我實在沒有機會去欣賞，僅到城門，警備司令趙承綏便帶了一隊官兵來迎接，把我一抬便抬到縣長老爺的衙門，入夜又擺宴洗塵，使我和同來的朋友們都感覺乘興而來，敗興而坐。

還幸第二天風沙稍靜，我們可以騎馬遊雲崗，雲崗的佛像是北魏時的建築物，幾座臨河的峭壁雕滿了佛像。那種莊嚴的佛相，並不如近日俗人打雕塑得俗不可耐的，尤其壁上的神女服裝酷似近日西洋女子所穿的衣服，古代的服裝恐怕東西各國都受了印度和小亞細亞的影響，祇不過蒙古和滿洲兩次侵入了中國，使中國婦女的衣裳越弄越俚鄙罷。祇惜小佛像很多被人斫了頭，據說日本人來遊雲崗很喜歡偷佛像，自然當中也有鄉人偷了不少出賣。最粗俗的要算迷信人們為酌佛願，重塑金身，好好一個石像，裝上土敏土牛鬼蛇神的腦袋，佛像滿身還貼滿了紅色祈福的紙錢，最大的佛像下邊，鄉民還搭蓋了兩座茅屋，養滿了豬羊和鷄鴨。雲崗雕刻是古代的文化，這種稀有的藝術已被埋於鷄豚臭糞之下了。我對趙承綏先生的貢獻，



以爲雲崗是一種藝術，佛像就使被偷了頭，也不宜拿土敏土來補缺，羅馬和希臘很多無頭的石像，如果善於保存，也是文化的象徵。趙先生欣然的接受我的獻議，後來就說雲崗真不如我到時那樣醜陋。

在大同只停留了一日，夜裡十二時附包頭來的火車經張家口回北平。路經南口下車休息了二十分鐘，等調轉機車下嶺，因此又看見當日建築平綏鐵路的工程師詹天佑先生的銅像。南口的工程在世界鐵路史是有名的，大約因爲詹先生是廣東人罷，我瞻仰詹先生的遺像，也引起我對於鄉土豪傑的崇拜。我們到了北平，即當夜赴天津，覃理鳴先生在吳達銓家內食夜飯，我們又到吳家會合。覃先生倒是一個痛痛快快的人，他不贊成謝慧生先生的執拗，他也不滿意鄒海濱先生的囉嗦。我那時還和鄒海濱先生打了一次筆墨官司，然後藉着汪先生的調停，擴大會議才勉強宣告成立。⑥

.....

擴大會議是什麼呢？表面上合着一二三屆的中央委員，骨子裡還容納了上海的二屆兩三人。那時我雖是堅持着要維持護黨的法統，祇是汪先生大有讓步的決心，我還記得汪先生有一次來電很憤激，說我不應該過於堅持原來的法統。汪先生既是那樣讓步，勵齋和我都沒有話說，擴大會議就那樣成立。老實說，改組同志會是汪先生後來在十九年一月一日通電解散的，就使當日不解散，改組會的精神也在那時消滅得無影無踪。因爲改組同志會有它的主張，有它的立場，而閻先生另外有他的一套，西山會議派又有它的私見。我們既會在一塊，改組同志會的主張只好一骨碌袋起，只談反蔣，不談主張，這樣改組同志會的精神便根本萎謝了。⑦還有的是改組同志會以反對非法的三全代表大會爲號召的，現在北平的擴大會議，既不維持過去的法統，也難謂爲合法。並且閻百川、馮煥章，都是三屆的委員，爲着事實，沒爲方法不把他們包

含在會議之內，這樣改組同志會以反對三大大會始，而以容納三屆的委員終，更且包含了第一屆委員而又包含了上海的第二屆委員，雖然上海的第二屆沒有明白抬出招牌來，但實質上已融冶在一塊，由是改組同志會僅有的立場也因此消失了。⑦

我對於此次擴大會議的辦法，內心非常之不贊成，無如汪先生既有這種堅決主張，我們若不讓步，北方的局面也會受嚴重的影響，於是東湊西湊，擴大會議於是乎成。至於閻百川先生個人呢？他素來揭櫫容納各方人才，於是北方的落伍軍人和退休政客一個個變為三山五岳的英雄，一氣騰聚北平，很像擺下一個諸仙大陣。

軍事是發動了，馮煥章已做了前敵總司令，鹿瑞伯被任了前敵總指揮，徐次辰副之，隴海一戰，西北軍已進至蘭封；石友三主席山東，孫殿英主席安徽，都已內定。至於山東方面的軍事，閻先生打算自己主持，傅宜生因為在涿州之役和張漢卿有相當的交誼，由東四省借了一百輛列車以為運兵之用，山西的戰將如傅宜生、張蔭梧、王靖國，也都調了德州方面作戰。

黨務和軍事有了粗糙的確定，汪先生遂由香港假道日本到北平，所謂粵方委員除了何香凝仍舊堅持聯俄，容共，農工，的主張，和王樂平在上海被刺身死之外，全部來了北方，就是宥翔詩酒的經子淵也趁了熱鬧，參加這個擴大會議。⑧

汪先生抵平之日，正是共產黨焚佔長沙之時，北方的軍事正在進展時候，李、黃、白、張，也從廣西動兵，傾師而出，放棄了廣西，而進畧武漢。擴大會議趁此時候命令張桂軍隊恢復長沙，但以蔣光鼐和蔡廷鍇的軍隊從廣東啣尾緊追，張桂軍僅僅佔了長沙，又回頭和廣東的軍隊戰鬥，在衡陽附近受了挫折，又

退回桂柳。

懷仁堂做了擴大會議的地址，上海的各省市黨部聯合辦公處也搬了來，而鎔解於會議內的各部門。然而當時西山會議派正誠心協作之時，又來了山西李冠洋反對改組派的運動。原來閻先生對於軍政黨都有他另一套的手法，當時他的勞資合作論就是李冠洋的大稿。李冠洋先生是山西人，原始屬於丁維汾先生反共大同盟旗幟之下，及至被派回山西辦黨，遂離大同盟而專替閻先生幫忙。我頭一次到太原之時，李冠洋曾拿閻先生的勞資合作論和我研究，我很驚訝的其中許多理論和我的「革命評論」相同，李先生也不自請的說內中採取不少「革命評論」的主張，那篇勞資合作是代閻先生主稿。⑤既然李先生的主張許多和我相同，而他爲什麼反對改組派呢？這就因爲小組織的關係，他每月拿了閻先生四萬元辦黨，終不能不別樹一幟，以表示他自己有才力，有能幹。擴大會議那時雖然不含一些改組派的主張，而一切事務倒多落於改組派之手，這樣外有南京的強敵，內有山西的對峙，徒有形式的改組派，那時已岌岌可危。⑥

隴海路的戰事，馮先生始終保持他的內線作戰計劃，一連幾個月，南京固然屢次失敗，而閻馮也毫無進展。關心政治的人們屢次催閻先生組織政府，而閻先生以軍事爲理由，始終猶豫不決。山東方面倒很順利，韓復榘的軍隊固不能抵禦晉軍，迫得向東撤退，晉軍遂渡河佔領了濟南。可是得之易而守之難，蔣先生從廣東調蔣光鼐和蔡廷鍇的軍隊北來，在汶河一戰，晉軍大敗，幾潰不成軍，能夠全師渡河北歸的僅有王靖國一師的隊伍。⑦這次晉軍失敗，北方還有一個流傳的笑話，說是因爲秋雨連綿的關係。山西軍隊多數是抽白面，那就是海洛英，他們拿烟捲安上白面抽，作爲鴉片烟的代用品。這次交鋒，一連下了幾天大雨，洋火點不着，無法可抽海洛英，毒癮既來，交鋒大敗，這個笑話倒底有否其事，我不得而知，但山西

軍隊間有抽白面的毒癮，大概也不能爲諱。濟南這一戰，擴大會議的命運也隨此告終了。

.....

那時具有舉足輕重之勢的，是那徘徊關外的張漢卿。南京固然對他極其奉承，北平對他也曲意巴結。蔣先生的代表張岳軍和吳鐵城，閻先生的代表賈毓儒和薛子良，大家齊集瀋陽，各逞蘇張之舌，一勸其合縱，而一勸其連橫。聰明的張漢卿，使他部下的軍人和他們鬼混，自己却老裝着病，輕易不肯見人。濟南失守，張漢卿到了葫蘆島主持開幕典禮，順便到了北戴河，北平一班朋友勸我去見張漢卿，夢想或者於無可如何之中，想出一條出路。

本來我初來北方之時，汪先生曾有一封介紹信，請我於便中時候，看看張漢卿。說張漢卿這人玩是太好玩，但脾氣還乾脆，並且說我也是乾脆的，或者見面之後，能夠投契也未可知。迨我到北方時候，第一爲着組織擴大會議忙，忽而天津，忽而北平，忽而太原，接着汪先生也來了北平，使我不能抽出一個時候到關外。其次我聽見張岳軍和吳鐵城都在瀋陽鬼混，賈毓儒和薛子良則終日坐冷板凳，那我實在不能陪他們向張漢卿上衙門，所以一耽擱便耽擱到現在。

張漢卿既到了北戴河，那裡的人不比瀋陽那麼複雜，郭復初又適在那裡避暑，來了一個電報，說顧少川也贊成我到那裡一行。我和汪先生商量之後，便和覃理鳴一起去作說客。

北戴河對於我眼中又是一番新景色，說也可憐，中國避暑的勝地，都和我沒有緣份。除了牯嶺在十六年因公上過去兩三天，青島和北戴河對我竟直是一個生客。我們抵北戴河之時，夏天算是恰恰過去了，郭復初到車站等我們，還有張漢卿的部下胡若愚也來迎接，給了我們許多不可靠的歡喜消息。他們都說小張

縱使不助閻，也決不助蔣，張岳軍和吳鐵城都跟他到葫蘆島，到北戴河，但是始終張漢卿都沒有和他們深談。這個消息或者是可喜的，然而賈毓儒和薛子良也始終沒有和張漢卿深談，這他們便不解釋了。

顧少川替我們約了張漢卿，他打算第二天夜裡請張漢卿和英國公使藍浦森食飯，並且在飯後玩撲克，請我們於夜裡十時到他的別墅見面。我們依約而去，十時後藍浦森才走，撲克局面已在開場，我們——顧少川、張漢卿、覃理鳴、郭復初和我——五個人就在廳外的走廊朝着海談話。顧少川是主人，只負介紹之責，不參加意見的，郭復初因為他自己是一個敲鼓邊的人，也不大說話。我爲着年齡起見，讓覃理鳴發揮他的宏論。

覃理鳴先生運用其戰國策的口吻，想遊說張漢卿，說他這次來見，不但是要救中國，還要救張漢卿的本人。他的理論很長，我也記不清楚。但好玩的張漢卿，本來中國就不在他的眼內，自己更不需乎拯救，覃先生的高論當然一毫也聽不進他的耳朵。

張漢卿的話匣開了，說他姓張的不會聽任何人的游說，只於東四省有利的他都願做。他說他父親交給他東四省，如果做得不好，對不起他的父親，並對不起東北的人民，也對不起一班老前輩。張漢卿說了半陣話，又起身說對不起，要入內解手，良久良久才出來，說他夫人鬧肚痛，他要招呼她，但後來有人告訴我，他是嗎啡針癮發，要找副官打了針才能繼續談話。

「漢卿先生的意見我很明白。」我單刀直入。「但東四省是沒有可以中立的，今日戰事已成僵持的局面，我以爲你不幫助閻，簡直幫助蔣也是一個辦法。」

「公博先生，你的意見很對。但無論如何，我非從長考慮不行。」張漢卿真認我乾脆，故也直接表白

他的意見。⑭

這場談話算是告終了，撲克場內已再三的催促張漢卿，座內真是珠光寶影，無數的夫人小姐們正興高采烈的在鬥撲克。這種玩意我是玩不來，僅和張漢卿摸了四圈麻將便歸旅館就寢。熬了半夜不打緊，忽然我得了重傷風，這個重傷風病一直到退入太原時，才能痊愈。

第二天臥了一天床，第三天便趕回北平，外間的傳聞說覃理鳴和陳公博見了張漢卿了，累得擴大會議一般人空歡喜一陣，而張岳軍和吳鐵城還耽擱了好幾天，但我知道這個情形，並且斷定張漢卿將於最短期中轉變，急轉直下取消他的中立態度。

濟南一敗，北方軍事已根本動搖，殘餘的晉軍不但退至黃河北岸，而且越過德州，更退滄州。隴海線的西北軍雖然能維持原來的陣地，但樊鍾秀已在許昌炸死，石友三以不滿意閻先生在濟南處置爲名，不聽命令擅自把他的隊伍撤至河北岸的新鄉屯紮。軍事形勢如此，平津看看入於蔣先生的掌握，這樣順手牽羊的事還不幹嗎？張漢卿先生便一手拿了蔣先生五百萬現款和一千萬公債，一手便下令出兵入關。⑮當他舉兵入關之時，照例在瀋陽舉行一次會議，那位張老將張作相自然老成持重，不肯贊成，但自楊宇霆和常蔭槐被張漢卿謀殺之後，所謂老派已沒有力量，環於張漢卿左右都是佻達急利之徒，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園、前門的戲院，無一處非張先生和他左右日夕的綺思所寄的：只動兵而不至於用兵，爲什麼不幹？所以這次會議，於決定之後才請張作相參加，一班所謂老派也只好緘口不言，讓張先生乘傳入平津。

張先生倒也文縷縷的，動兵之時，通告閻先生說東北軍要來平津駐紮，每至一地，先期通知晉軍讓出防地，以避衝突，而晉軍也只好先期撤退，正合着閻先生的「禮讓爲國」。東北軍的前頭部隊是于學忠，

他本駐在灤州，到天津非常便當，何況北寧鐵路本在東北軍的高紀毅手裡。

東北軍一至天津，擴大會議便起動搖，大家在懷仁堂召集一個會議，打算全部遷入太原，表示和閻百川先生共患難，其中也有一部份委員以在外活動爲名，到天津看風色。汪先生是擴大會議的主腦，自然首先表示入山西，汪先生既決心西行，我自然不能例外。照那時的情形觀察，失敗是失敗定了，軍事既然遭了極大的挫折，而政治上又一無主張，甚至一個政府自軍興數月也成立不起來，趕到事無可爲，閻先生才草草於九月九日九時在懷仁堂就了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其他各部一概未能成立，當時就算成立罷，<sup>(14)</sup>一般聰明練達的人，對於部長也恐怕雖三顧草廬還高臥不肯就聘的。

我們一行人於早上四時到西車站附車往石家莊，車剛過長辛店，忽有電話趕來說蕭仙閣要來報告東北軍的消息，我們又不能不停着等待。蕭先生的好消息報告，我已叙於「三月二十之變」的一章中。我們被他阻遲了行程，於第二天深夜才到石家莊，即在鐵路飯店住下，重新商議後來的計劃。

閻先生早已在石家莊，自開戰以來，他都以石家莊爲大本營，來過兩次北平，到過兩次山東的前綫，其餘時間都在娘子關口的正太總站上。我們雖然到達此地，山東退下來的情形還是不十分清楚，前方將領也正在滄州間做收容工作，一時沒有回來，倘使隴海綫上還站得穩，大局雖然危急，還不至於崩潰。我們到後，要定一個新的計劃，還得要等材料，於是把擴大會議的委員們和各部分人員先送往太原，汪先生和我留在石家莊等候。

我們何妨趁這時候往鄭州一行，汪先生提議着。我那時也願意見見馮煥章先生；我對於馮先生充滿古

怪的印象，有人說他冬天穿上大兵的衣服，而裡面統着狐皮。有人說他請客好用粗米白菜，客走之後大嚼其魚翅。有人說他在南京之時，有政府供給的華麗汽車不坐，而和士兵一同坐貨車。有人說馮先生對於高級軍官不客氣，動不動打軍棍和罰跪。這種印象都糢糊而錯亂，使我腦內描不出一幅馮先生的圖畫。我十七年在上海時候，郭春濤囑馮先生之命來見，曾送我一件老羊皮袍料，這是我們已往僅有的往來，但我在漢口之時的確對於馮先生沒有很好的感想。我聽見馮先生治軍很嚴的，所有文武部屬都要穿布衣，早上還要上早操，那怕你年紀多老，也要隨班上這堂早課。然而每次馮先生的代表來漢，無不大嫖大賭，他的參謀長每夜在華商總會俱樂部，打五百元一底的麻將。我那時斷定馮先生終久要失敗的，因為輕信人的性靈太厲害，部屬只有作偽應之，相率而為偽，遲早必召崩潰。可是我始終沒有機會看馮先生，我倒要真真認識他一下，看看他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怪物！

汪先生和我於到石家庄的第三天便乘專車往鄭州，那時同行的還有王東丞，他和西北軍的軍官很熟，這次同行，一半算是侍從武官，一半也算軍事顧問。鄭州白天是不可以去的，每天都有南京方面的飛機來轟炸，火車須於晨光未亮之前就要進站。我們車過彰德就要算時間，第二天絕早過了黃河橋，馮先生派了汽車到站相接。

馮先生的總司令部在一間隔城牆不遠的破廟中，他自己更住在另一間小破廟內的神廳裡。我們到後，就在神像面前促膝而談，天一大亮，便同往城牆邊一座棚廠內食油條和稀飯。人家對於油條稀飯的滋味怎樣，我不知道，可是我倒非常的高興，我孩童時代，每朝進學之前，照例食一碗稀飯和兩條油條，此時我一面看着初出的朝陽，一面食新鮮的油條稀飯，倒惹起我孩童時代的回憶，和增加我不少的朝氣。



果然八時左右，南京的飛機便到了。可憐那時也沒有防空哨。只由前敵陣地看見飛機經過，打個電話來，城牆上更有站崗的哨兵，瞭見飛機飛近，長吹一聲哨子，便算空襲警報。城牆邊掘下幾個防空洞，既沒有鋼骨水泥，也沒有木樁板壁，我們遠見飛機來臨，很從容的縮入地洞談話。大約馮先生每日必有兩次在洞內辦公罷，有臨時安置的軍用電話，有幾幅地圖，還有一部「資治通鑑」。這時來轟炸的飛機只有八架，集中目標在車站，炸彈聲隆隆的响，夾着逆擊一兩聲炮聲。那是不是高射炮呢？當時北方還沒有這樣濶氣的高射炮，只把一兩尊野炮向着天亂轟，飛機狂暴地炸了兩個鐘頭，又施施然去了。據說蔣方來的飛機時間很準確，每日早上八時，下午二時，照例降臨，可幸炸彈還不很大，炸了一個多月，鄭州車站畢竟沒損傷，只有幾架貨車被炸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嘗飛機轟炸和防空洞的滋味，我想飛機還不怎樣可怖，所以後來在南京，在武漢，在重慶，在成都，對於日本來的飛機，我都夷然視之。自然後來的轟炸比鄭州轟炸的規模大不相同，不過有了這次防空經驗，我總覺得飛機不是決戰的最有效兵器。

趕到飛機走後，我們出來草棚食午飯，我很留心馮先生的待客盛饌，桌上有一盤燉鷄，一盤豬肉，一盤蔬菜，兩盤饅頭，此外還有幾個小碟。這餐早飯的味道倒不錯，我想馮先生確異乎我所聞，大概世故漸深，作風改變了。飯後我們在草地散步，我詢問黃少谷給我介紹的宣傳處長雷季尚，他告訴我馮先生一向都是如此，不饑也不豐，有沒有客，菜俱是那幾樣，至於外間宣傳馮先生惡衣惡食，那是故甚其詞。大約馮先生治軍是認真的，對於軍官是過於嚴厲的，至於平常起居，倒不是太不近乎人情，我對於馮先生的觀念，到那時算是有些改變。

這次我們和馮先生談話，大都談談過去，談談未來，實在沒有談到什麼計劃，至夜馮先生更提議汪先

生應該到到開封，他打算打個電話到前方蘭封，叫高級將領們到開封相會。汪先生是難得到前方的，各將領也想趁此時機領領汪先生的訓話。汪先生答應了，我們食了夜飯便開車到開封，半夜裡鹿瑞伯和龐炳勳等前方將領都來，在車內談了兩小時，我們便還鄭州，不再停留，一直駛至新鄉才停下。

石友三那時駐紮在新鄉，他是不奉命令而自由撤退的，他的任務是擔負西北軍的左翼，他經兩次戰爭之後，一聲不响便往後撤，留下一個大空隙，幾乎西北軍受了蔣先生的大包圍。石先生既是那麼逍遙，而閻馮兩先生一點也不敢執行紀律。石軍雖然勢力不大，也還是一個大軍團，倘一不滿意，在後方搗亂起來，由新鄉以至石家莊，一些軍隊也沒有，那我們真可以一起變為俘虜。⑮石友三已和張漢卿發生了關係了，閻馮兩軍中人這樣傳說。這個可能性自然很重，因為石先生原是吉林人，而石先生又是善變的奇人物，加上蕭仙閣在他左右，真是極天下的奇事，他都可以毫不介意，逕情直行。當汪先生離石家莊之時，閻先生再三請託，希望汪先生能夠順路望望石友三，藉着汪先生的面子，使他不好意思反戈攪亂這個已殘之局；在鄭州時馮先生也贊成這個辦法，所以我們一面在鄭州車站打個電話給他，一面車至新鄉便停住，打算入鎮見面。

石先生倒很客氣，不讓我們到鎮裡，親身到車站來，我們見面時，賓主寒暄，狀還親切。汪先生拉他到車廂內說了一陣話，無非說他的軍隊既要整理，很可以安住新鄉，閻馮那邊如有誤會，汪先生可以替他解釋。石先生切矢說他沒有異志，只是軍隊經過幾次戰鬥，不能不加補充，閻馮兩先生不諒解他的困難，所以除自動後撤，沒有其他辦法。我們在車站散步，見石先生的兵士皆着起新武裝，軍帽的式樣和閻馮的軍隊都不同，高高很像法國的軍帽，精神靠着形式鼓勵，很有些糾糾之勢。那是法國式的軍帽嗎？我問？

不是不是，那是東北軍的式樣，也就是模仿日本軍的式樣，旁邊有人低聲說。呵！誰說石先生沒有和張漢卿勾結呢？那倒證實了，連軍服也改換了！我們的軍事更難樂觀了！

我們回至石家庄，山東前方的將領，除傅宜生之外，張蔭梧等都已回來，閻先生提出軍事的新計劃，徵求汪先生的同意。這裡所謂新計劃，合隴海路的西北軍、雜牌軍，以及在山東平津退下來的晉軍，收拾殘餘還有五十多萬人，打算放棄河南，集中河北，把東北軍驅逐出關，據河自守，以待天下之變。這個計劃是不是可以行呢？當然是一個計劃。但以我當時的推測，計劃雖好，不易實行，因為馮軍的軍心已變，而晉軍已無鬥志。一天我們為避飛機，到鄉村談話，馮先生的參謀長劉驥恰於那時來石家庄，汪先生也邀他同行，順便問問軍事。

「我想軍事或者要更壞下去，我們如果把擴大會議解散，或者使軍人方面容易應付也未可知。」汪先生有意或無意的說。

「我很贊成汪先生的主張，因為軍事恐怕沒有大的希望了。」劉菊村不假思索的下斷語。

我在旁邊聽見，心內在打算盤，劉菊村只是馮先生的參謀長，在汪先生面前有這大胆的陳說，縱使不代表全部的馮軍，至少可以代表一部分的心理。⑩當時我也不願參加意見，因為參加意見也沒有用，總歸一句話，就是劇場上的打敗仗成語「大事不好了」！

對於這個新提出的軍事計劃，汪閣討論了很久，認為可行，其實除了那個辦法，也沒有其他高明之見。但這事必須通知馮先生，為着來往電報說不詳細，閻先生打算再請汪先生一行，自己也陪同前往。汪先生把這事告訴我後，又邀我同行，我說你們要談軍事，我可以不必去。汪先生聽見我不去，默然不語，沒

有幾久，又叫人找我談話，說閻先生還是希望我再走一次，說我「明，決，快」，非我去不行。我這人到底豪氣，聽見閻先生恭維我明決快，我又準備再走一趟鄭州。

即夜我們掛了一輛專車往鄭州進發，半夜馮先生派人來報告軍情，我們只得在半路上一個記不起名稱的火車站上停車相候。這一耽擱便已到差不多天亮，剛過順德府，有人來報告，說石友三軍隊已自由行動，一部分軍隊已斜出大名。閻先生立刻變了色，因此行必要經過新鄉石友三的防地，這個消息如果確實的話，豈不是大家立刻要全做俘虜。閻先生躊躇了半刻，教停下車，要偏勞汪先生自行，自己掛了一個小機車，把我們的車輛分作兩半，我們南轅，他自己北轍。閻先生怕做俘虜，難道我們就不會做俘虜嗎？不過當時實在再無適當的人去鄭州，我們仗着自己是文人，而石友三又在浦口舉過兵，和我們有過聯絡，憑這一點關係，大胆唱空城計。

我們三天之內，兩過黃河，我在車內睡不着，天色微濛之時，又到黃河橋，我眼見一兩隻水鳥逐流上下的低飛，忍不住謔了一首七絕：

「四野奔流遍甲戈，兩番深夜渡黃河；雄心漸似秋心淡，欲化閑鷗逐逝波。」

馮先生還在前時的破廟等我們，汪先生把來意說明之後，馮先生也不猶疑的贊成。

「但這事辦起來，恐怕有許多困難吧？」汪先生聽了馮先生贊成之後，加這麼一句。

「事雖困難，勢在必辦。」馮先生很斬釘截鐵的說。

這事算已原則決定了，至於如何把全部軍隊退至河北，如何驅逐奉軍，如何佈置沿河的據點，那是軍事專家之事。那早照例食油條稀飯，照例八點鐘飛機來炸，照例午飯是燉鷄、大肉、饅頭、不過在許多照

例的當中，在午飯後我覺得有些異樣了。中午汪先生和馮先生都休息睡午覺，我和王東丞走進參謀室，看見張省三和李興中在抽三炮台香烟，他們見我來很歡迎，說：「公博先生，請抽一根三炮台，馮先生那裡只有紅粉包，大概你不過癮的。」我們一面吸烟，一面談到軍事。他們談話倒不避忌我們，認為軍事無望，據河自守也不是計劃。他們有主張和蔣先生開和平談判的，也有主張派人去見張漢卿請收編的。這些都不是沙中之語，而是公開討論。這種事我是有經驗的，在廣州失敗時候就有這個現象，這完全表現了軍心動搖，崩潰只是時間問題了。

剛食過夜飯，消息似乎很緊，據說南邊已有一團南京軍隊衝入，更有一個情報說黃河橋附近就有百多土匪竄入來，馮先生還鎮靜，在神廳上退回了他的走廊，攤開地圖在地上，和幾個參謀在那裡點着蠟燭指手畫腳。少頃我們都到草地，馮先生就在席棚下打軍用電話：

「喂，那邊有些小子衝進來，你們趕快派一營人去堵住。」馮先生口角還掛着笑容，把軍用電話掛上，又和我們談話。

他一面談話，一面催我們早點動身回石家莊。王東丞在我耳邊說：「我們催汪先生早點走罷，聽見軍事很緊，這邊早晚便要失守。」我那時已經證實，所謂百多土匪就是南京方面的便衣隊，我們在九時左右便上車，馮先生還很從容的陪我們上車站。

那夜在路上再不停留，第二天過新鄉也看不出什麼動靜，這樣我們便回石家莊了。我們和閻先生見面之後，即於第二天早上入太原，汪先生至太原時，車站還很熱鬧，全城的文武官員、黨部、民衆團體，都在站上歡迎。在山西大飯店門前，汪先生還對大家演說，但李冠洋他們有幾個人在大呼「打倒改組派」，

我因人聲喧鬧，聽不見，可是有些改組同志聽見，大發牢騷。我按住他們，叫他們不可以和李冠洋先生一羣人那樣沒見識；我的看法閻先生不久也和我們一樣失敗，只是冠洋先生要表示李派的力量，不能不開一陣，恰像囚在籠內的一羣雄鷄，大家都走了背運，依然還要相啄的一個小把戲罷了。<sup>(17)</sup>

擴大會議借了傅青主的祠堂開會，大家無事可議便討論起草臨時約法。<sup>(18)</sup>僅僅兩三天，隴海路上的軍隊便全部崩潰，孫連仲和幾個將領帶着軍隊過了南京那方面，大概他們不願再受苦，怕渡河。馮先生的根據地陝西也給楊虎城襲據，劉郁芬僅以身免，西北軍全部除宋哲元帶了張自忠和馮治安兩部沿途受擊退過河北之外，其餘都給蔣先生收買過去了。民國十五年時候，河南督軍岳維峻手上掌着七十多萬兵，不兩星期便烟消雲散，我當時很駭異，以為逐個排頭砍去，兩星期也殺不了七十多萬人；但到了這時，我却恍然大悟，軍心離散，真是不崇朝便如山倒，那麼楚項羽垓下的兵卒，聽了楚歌一夜散盡，的確並不是歷史上的神話了！

閻先生從石家庄來了一個電話，說馮先生已退回娘子關，很希望汪先生到那裡會商善後，那時我們雖然沒有食不下咽，却真是寢不安席，至太原沒有幾天又要再走娘子關了。在娘子關的車站，會見了閻馮兩先生，我們就在樹林裡舉行會談。東北軍那時佔了平津，佔了張家口，而隴海路上又那樣潰敗，軍事自然是入於不可收拾的境地，但事到其間，也只有據娘子關以自守，徐商善後之局。

說到此地，我很想緩和點緊張空氣，補寫一段離奇的軟性新聞。其實是這樣，我們在未再走娘子關之前兩夜，太原黨部的同志，請我們看髦兒戲。太原差不多是一個荒涼的堡壘，古典的廟宇，你想髦兒戲還

有漂亮的麼？大概是無聊罷，或者是我急於去觀光戲院的內容，我也隨着大家去欣賞。我到戲院時，看見陳樹人先生兩夫婦高踞包廂，他用絕不打緊的詩人風度去聽戲，我確有些艷羨。他兩位老人家在十時左右便走了，我也懶懶欲睡，只是一個人回飯店還不是睡覺麼，打熬下去便算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飯廳內又碰着。

「博老，我昨夜也看見你聽戲呢！」樹人先生一路都招呼我做博老，因為我叫他做樹老，他有點不服老，這是回敬之意。

「是的，爲什麼你夫婦兩位那樣早便走？」我不經意的問。

「委實沒有看頭，我們走後還有好戲嗎？」樹老似乎餘興未盡。

我太跳皮了，存心要和樹人開玩笑。我們一般朋友都叫陳先生是陳兩人，因為他的名字叫樹人，而他平時作詩，題目最好寫「贈閨人」，左一首贈閨人，右一首也贈閨人，所以我們暗地裡常戲呼他是陳兩人。

「怎麼沒有？你走後，演珠簾寨，那個扮二王娘的，真是艷奪天仙。」我開玩笑說。你想太原的髦兒戲是北平的四五等角色才來，而扮二王娘又照例是一班內次一等的角色，那裡會有好戲？

「這樣，你今夜還去嗎？」陳先生好奇了。

「怎麼不去？我今夜打算去捧她？」我又開玩笑。

「你打算怎樣捧法？」陳先生認爲真實了。

「我已包了六個廂房，和池子前排六行位子，並已定了四對花籃。」我知道太原戲院的池子是官廳禁

止包的，而且九月涼秋，塞外草衰，不止沒有花，連一根草也找不出，花籃更是無從提起。

我說完之後，腦內早忘了一乾二淨，即日陪着汪先生往娘子關。第二天早上回太原，有人報告我，說樹人先生在中央黨部通知了各職員，說陳公博捧那戲子，她必定可觀，叫各職員不妨隨興看看。公博捧戲子，真是奇跡了。那天夜裡，中央黨部真是空營而出，惟是看不見花籃，更看不見捧戲子的濶少爺，因為我已經往娘子關了。

改組同志會山西幹部爲着這件事，還舉了兩位同志來勸告我，說在此困難之時，不宜捧女戲子，我又出頭出角的改組派，應該善自檢點。這兩位同志是改組派，自然來意甚誠，而且措詞也溫婉有禮。我禁不住大笑，把那頑笑告訴他們，惹得他們也笑個肚痛。

真是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太原都知道我捧戲子，只是那二王娘是什麼，既然是次等角色，當然不會登她大名在海報，於是做好事之徒，千方百計找出她的名字叫做郭艷霞。過了一個星期，汪夫人陳璧君到了太原，她是專好搜小報告，聽耳邊神的，捉着我一定要請她聽戲。我把上次的新聞告訴了她，並說這件事已鬧得這樣滿城風雨，請聽戲我可以出錢，但親身奉陪，敬謝不敏。

「好，這也使得，我看她漂亮不漂亮。如果漂亮，傳傳謠言，倒還值得，倘若不漂亮的話，那倒太冤枉了。」汪夫人和我開玩笑。

那夜我真出了山西票十二元，訂了兩間廂房請汪夫人聽戲。夜裡十一時我還未睡，汪夫人一羣人已聽完戲，打從我的房門經過，拍我門：

「公博，你真冤枉了。那個戲子太不漂亮，手臂全是黑的，黑得像起了魚鱗。」我還未及開門，她已



同房休息去了。

黑又有什麼要緊？我一生沒有捧過戲子，這次過屠門而大嚼，又何妨担些虛名呢？好事的覃理鳴又把那位郭小姐找到了山西大飯店，據他說她的手臂真是全黑的，原因是下等角色，在班內少不得每天都要燒茶煮飯。覃老先生大約也看她不上罷，只找過她一次便不再領教了。

我們的同鄉名士馬小進先生，那時他是太原一家大學的國文教授，兼了擴大會議的秘書，公餘之暇，專作打油詩以自娛。有一首是咏郭小姐的：

「國事真是丟那媽！近來心事亂如麻，從來不食山西醋，來看佳人郭艷體。」

他許多鹹詩都不傳，獨這一首，因為有所本罷，倒不脛而走。我真對他不起，這首詩竟直張冠李戴，人都說是我作的，因此郭小姐享了一個短時期的盛名。這段故事，陳樹人先生始之，馬小進先生終之，我担負了虛名，而郭小姐得了實惠。

.....

擴大會議依舊每日進行它的約法起草委員會會議，討論了許久，才把孫先生的建國大綱定為第一章的大綱，以下分章規定細目。汪先生倒很起勁，每日必到會，孳孳矻矻的討論，而我呢，除了第一第二兩星期以外，十次倒有九次缺席。汪先生對我的懶惰不高興，但他是很客氣的，對我還沒有表露責備的意思。其實我何嘗懶惰，只為信念不同，我總以為國家的根本法，首先必須提倡民權，各地的自治一點基礎沒有，而想實行民主，這是根本走不通。雖然有那一本黑字白紙的約法，誰來執行，誰來監督，實是一個絕大的疑問。我雖然是一個「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的一個人，但要我花精神於這種空虛的會議，我倒不如

多看點書，多考慮些實際事實。

軍事到了那時已無可爲，但閻先生持着不屈不撓的精神，打算整頓軍容，據關固守，若事不得已時，退陝西，走寧夏。閻先生或者有這個決心，然而軍心早已渙散；山西軍隊都是舒服慣的，要他們背井離鄉，千里裹糧，事實上絕不可能。況且西北是著名貧苦的，這次西北軍的崩潰，就是他們怕回陝甘，渡黃河這樣西北軍還不願受這種苦，山西軍又焉能忍那樣痛。南京和北平兩面這時倒怕激事過急，恐生劇變，於是提出和平條件，只要閻先生下野，山西全省可以保存，對於山西軍隊的實力也不會分割。我們正在開約法會議，山西的代表已絡繹到北平，我們若久留山西，倒變成一種障礙之物。

我們趕快把約法起草完竣，公佈後即離開山西罷。⑨閻先生對於這個提議是默許了，難得閻先生始終如一，在我們離晉之前，還撥出山西省銀行紙幣一百萬元，大約那時合了現洋可值五十多萬，以爲擴大會議移津後的秘密經費。諸事停妥，我們便分途離晉。

怎樣走法呢？當時有三條路可走，一條是循正太鐵路出石家庄以至平津。一條是出大同沿平綏路至北平，一條是從山西腹部越關至河北。但這三條路都要秘密走才行，那時不只平津在東北軍控制中，連石家庄也已有了一旅東北軍駐紮。謝慧生和鄒海濱是附着山西代表的專車至北平，恃着代表的招牌掩護，藏在他們的車廂內。汪先生是出大同走平綏路，我因爲人太多，恐怕累了汪先生，等汪先生一夜離了大同，我才搭車至北平。

這次出亡，要經張家口，經北平，經北寧路，處處都有被扣留的可能，大概總要改裝了。我買了一件長袍，一頂瓜皮小帽，留起了鬍鬚；買了一部「三國演義」，預備在車上無聊時看看，並向高啓予借了一

部汽車往大同。

大同的行程，大有今非昔比之象，我知道北平憲兵司令楚溪春早已退至那裡，但我是出亡的人，不好看他，只在一家小客棧住下，每天住宿費是五角山西票，合着大洋不到三角錢，嘗了這種味道，也可以增加些經驗。我到小客棧時，看見一輛汽車開進來，並且聽見汪先生副官的聲音，我知汪先生也到了，只是不住在我那小客棧，我爲着使汪先生休息起見，只在房間溫「三國演義」。

第二天起來，知道汪先生已於昨夜十二時走了，是夜我買了一張三等票，也由平綏路出北平。在車站碰見覃理鳴也背着手在那裡踱方步，等包頭開來的車，覃先生告訴我今日才由太原趕來，在小客棧很受憲兵檢查的閉氣。憲兵問他是什麼職業，他回答是「辦筆墨」的。湖南所謂「辦筆墨」，即是辦文書當老夫子的意思。怎料湖南話的「辦筆墨」，在山西人聽來倒像「辦秘密」一樣音調。那時警戒森嚴，有人來山西辦秘密，這還了得？於是憲兵囉唆了，覃先生解釋了半天才踱過這度難關，我聽見之後，真笑到打跌。覃先生是買二等票，我是搭三等的，他於是高踞着車廂，我却要鑽到蓬車內。這個三等車也好玩，沒有位子，只搭着幾條長橈，雖名客車，實是貨車，這時因爲天冷，當中擺着一個火爐，還幸車內人數寥寥，我倒覺得非常舒服。第二天午間到張家口，東北軍上車來檢查，這幾個兵大爺倒很隨便，上車來看了幾眼便走，下午五點多鐘便抵北平的西直門了。

我往那裡宿一夜呢？朋友是不可以拖累的，旅館更不可以住的，有了，我想到我的法文先生法國太太那裡逗留半夜再說，她是一個外國人，是和中國的政治不生關係的。我到東棧槽胡同，天已深黑，這位太太倒嚇了一大驚，但她很慶幸我離了太原，她自己睡在梳化，讓出她的房間給我睡。我到三點半鐘便起床

，趕搭五點的快車往天津，法國太太還煮些牛奶，烘兩塊麵包，給我作早餐，她的盛意真是可感。

車開以後，大雪便漫天，呵，今天不是重陽嗎？怎麼今年下雪怎樣早！三等車廂連我只有兩個客，沿途天色微濛，已分不出是不是天還沒破曉，抑或因下雪而黑暗。四野田疇全成了銀裝世界，樹上的秋枝，田間的茅屋，一概被雪罩着，好大的雪呵！

到了天津，天氣倒變了晴，只是車站的屋簷，雪已融化，滴滴像漏水。我僱了一部手車到胡今予家，全家還沒有起來，當差的進去報告，今予才披了一件寢衣起身。不久郭復初也到了，大家很高興，爲的是重復見面。

「汪先生也於昨日到了，但我還未見，只見了王東丞，據說汪先生住在一個他的工人家裡。」今予對我報告。

「是的，我在大同等他起了程，我才於第二夜動身的。」我也據實說。

談了半天，他們只批評我的布長褂、瓜皮小帽，迄未談及我的鬍鬚，我有點氣不過了。

「你們見我還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沒有不同的地方呵！」他們有些奇異，並且端詳我很久。

「我留了鬍子，你們沒有發見嗎？」我真發急。

「哈，哈，你不說，我們真不知道。」今予笑起來。

「你就在嘴上貼一張字『有鬚在此』罷。」郭復初加這麼一句。

我有些氣，拿起鏡子來照，果然嘴上的鬚，活靈活現的一邊二十九條，一邊三十二條，並且還不黑，

還不長。鬍子可以數得出，它的成績也可想見，我於是又決心剃去。到了天津已有兩天，汪先生和璧君先生才見面。

「你什麼時候到的？」汪夫人問。

「我倒來了兩天了。」我說。

「我們昨日才到的，我們在大同還耽擱一天，遊雲崗，並且在豐台還逗留了半日看菊花。」汪夫人像解釋似的，她的脾氣無時不想秘密她的行動。

「呵！是嗎？」我只笑了一笑，心想汪夫人又向我賣靈符，其實她在什麼時候動身，什麼時候到達，我都知得清清楚楚，只是說穿了大家沒有意思。

過了幾天，擴大會議各人又重張旗鼓，分配工作。汪先生又草擬了一篇宣言，說明擴大會議的工作，和今後的行動，我很不贊成中間有我們願做在野派的一句話，我和郭春濤都爭得很激烈，而汪先生則似乎非堅持插入這句不可。我的見解，在中國的現狀，南京那裡肯容納在野派，言之於事無補，轉灰天下之心，我那次堅持，並不是爲着有成見，而是爲着盱衡時局而發，汪先生對我的堅持，認爲不止有成見，簡直似乎反對他。郭春濤過了幾天對我說：「我們不要堅持了罷，汪先生前夜回寓時和我同車，他對我嘆氣，說：『我不懂，公博對我親近一個人都反對。』這樣汪先生對你恐怕有了誤會」。我只苦笑一下，大概所謂親近一個人是指西山會議派罷，既是這樣，我不如離天津算了。

我搭了一艘津港的直航船於十一月十五日到香港，不料十三日香港「大同報」已登出汪陳破裂的天津電訊，我那裡有意思有資格和汪先生破裂呢？算了吧，我也不再辯。我在香港住了一個多月，在十九年一

月一日報上登出汪先生解散改組同志會的宣言，當時我即草了一個贊成通電，託廣西駐港主持人夏煦蒼打到天津，那時我知道汪先生早已到了香港，但他不叫我見面，我也不好去見他。自是我於十九年一月底便離港赴歐洲，直至十月一日才由歐洲回抵香港。那時胡漢民先生早被蔣先生囚在湯山，廣州非常會議早已成立，九一八事件已哄動了世界，而寧粵兩方又要開和平會議了，世事的變幻真是太多而且太速啊！

## 第十章註釋

①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閻錫山發電蔣介石，主張禮讓爲國，黨是決諸黨員，完成整個的黨，反對武力統一，此電爲閻氏反蔣的先聲。汪系二屆中委陳公博、王法勤及西山派二屆中委謝持、鄒魯乃先後北上聯絡閻氏，見「反蔣運動史」，頁一三七至一三九，及一六二。陳公博等於一九三〇年三月抵達天津，見「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七卷第十一期，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② 當閻錫山籌備反蔣時，蔣介石仍盡力拉攏並委派閻氏部下已在南京任監察院長的趙戴文，持親筆信趕返太原，勸閻氏服從中央。故此，閻氏一度躊躇不決。見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四十八至五十一。

③ 陳公博等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日由天津赴北平，即晚赴太原。見「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七卷第十一期，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④ 黨統問題成爲汪系與西山派合作之一大障礙。汪系只承認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選出之二屆中委爲正統，否認西山派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上海選出之滬二屆中委的地位；而西山派亦不輕易放棄其立場，故兩派爲黨統問題而起紛爭。陳公博對黨統之意見如下：「解決黨是只有兩條大路，一條大路是維持黨統，一條大路是從新幹過。……要談統，則不能不承認十五年來領導全國革命的二中（粵所選出之二屆中委）。」見陳公博：「解決黨是兩條大路」，「護黨救國集」，出版地缺，一九三一年，頁二十五至二十六；至於西山派意見，鄒魯表示：「黨統早已破碎，……爲事實計，非團結整個之黨，不足以救黨。而

欲團結整個之黨，祇有就一屆，或粵滬兩個二屆，或合各方各屆之執監委員，組織一種委員會，以執行黨之職務，最爲適當。」見鄒魯：「黨統問題」，「澄廬文集」，第二集，廣州，一九三四年，頁二九至一四一。另章振亦發表意見，謂「現在首先要成立一中央幹部委員會，凡係一二三屆革命份子，一致參加，但並不根據三屆合一之名義，將來一切黨政問題。均取決於中央幹部。」見「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七卷第十二期，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

⑥由四月開始，陳公博與鄒魯等，連日在太原、天津、北平等地討論黨務問題，爭論雖多，仍漸有進展。但在六月一日，汪精衛發表東電，再次強調粵二中爲合法黨統，再次引起鄒魯、謝持等不滿，並於六月五日發電駁斥，故黨統問題，一時又再引起紛爭，後由閻、馮等奔走調停，擴大會議才於七月十三日成立，見「反蔣運動史」，頁一七〇至一七五。陳公博謂由汪氏調停下，擴大會議始告成立，與事實頗有出入。

⑦擴大會議之目的，在於打倒蔣介石之獨裁，與改組派之主張無關，詳擴大會議七月十三日之宣言，載於「反蔣運動史」，頁一七五至一七六，及「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三十一期，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一日。

⑧擴大會議成員包括第一、二屆中央委員，上海西山派二屆中委及部份南京三屆中委。改組派在擴大會議與各派妥協之程度甚大：第一，改組派一改以前反對西山派之立場，與西山派在會議中合作；第二，改組派本以反對南京三屆大會爲號召，但擴大會議却容納部份南京三屆委員參加。這兩點充份表現出改組派的立場盡失，因而引起部份國民黨「左派」不滿，見 Tang Leang-li, *Wang Ching-wei: A Political*



*Biography* (Peiping: China United Press, 1931), p. 217.

⑧參加擴大會議之黨員名單，見「反蔣運動史」，頁一七五，及「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二十八期，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⑨有關閻錫山統治山西之政策，可參考 Donald G. 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⑩擴大會議之黨務組織，多在改組派手上，遂為其他派系不滿，見「反蔣運動史」，頁一八一，及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九十八至九十九。

⑪由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十五日，南京中央軍與晉軍在汝河會戰，結果晉軍大敗，棄守濟南，見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八十九至九十一。

⑫當閻、馮軍與蔣軍在中原會戰，東北的張學良成為雙方激烈爭取之對象。蔣氏派駐東北游說張學良之代表有李石曾、張羣、吳鐵城及方本仁等，閻馮代表則有賈景德、薛篤弼，汪系代表有陳公博，西山派代表有覃振，見周佛海：「盛衰閱盡話滄桑」，「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香港，春秋出版社，一九六七年，頁二〇六至二〇七。

⑬張學良於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發佈進兵關內的動員令，十八日即發出巧電，派兵入關，見「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周佛海曾言，閻錫山捨不得用錢勸張學良入關，而南京方面却是揮金如土，張學良入關，南京方面錢用得太多，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周佛海：「盛衰閱盡話滄桑」，頁二〇六至二〇七。

⑭ 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擴大會議委員，舉行宣誓典禮，同時並議決國民政府組織大綱，推定國府委員及主席，九日正式成立國民政府。但張學良在九月十八日通電入關，擁護南京中央，時局大變，擴大會議成立之國民政府，便草率收場，見「反蔣運動史」，頁二〇二至二〇三，及鄒魯：「擴大會議」，「澄廬文集」，第三集，頁九十四至一二三。

⑮ 當東北軍入關，隴海線晉軍紛紛撤回黃河以北，石友三態度亦起變化，發出通電，擁護張學良，脫離與擴大會議之關係，率部由魯西開往豫北，見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一〇九。另參考 Gillin, pp. 113—115.

⑯ 自東北軍入關後，馮軍內部起嚴重分化局面。馮軍中堅之吉鴻昌、梁冠英部，為蔣介石收買，投誠中央；馮軍外圍部隊，如宋天才、李萬林、王殿閣、李萬如、范龍章、趙冠英等人亦先後投誠中央。故當時如再想以軍事對抗南京中央，實無多大希望。見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一一〇至一一一；及 Sheridan, pp. 261—267.

⑰ 國民黨內部，一直都有各類型之小組組織，見陳公博：「小組組織問題」，載於「革命評論」，第六期，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頁一至二，及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想」，頁二〇三。在擴大會議時期，西山派及一部份國民黨小組組織不滿改組派在黨、政中佔有優勢，曾發動小規模請願遊行及張貼標語，見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九十九。

⑱ 東北軍入關後，九月二十五日擴大會議繼續在太原開會，討論起草臨時約法，約法草案既成，約法起草委員會即於十月二十七日呈擴大會議，依法通過，見「反蔣運動史」，頁一九九至二〇〇；太原約法草

案，見鄒魯：「回顧錄」，第二冊，頁三八二至四〇八；有關約法各方面的問題，見鄒魯：「澄廬文集」，第三集，頁二十九至九十三。

⑲擴大會議在十月二十七日通過約法草案，公布宣言，隨即宣布停會，各委員於十月二十八日離開太原，見「反蔣運動史」，頁二〇四，及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一一一。

⑳陳公博是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離開天津到香港，見「寒風集」，頁甲二七七。又汪精衛與陳公博在某些問題有不同意見，可參考本書第十一章。

## 第十一章 廣州非常會議

廣州非常會議，我始終沒有參加，但我雖然沒有參加，而改組派的朋友倒有許多身與其事，這一段史實，我打算從我出國時起，到參加南京政府時為止，全是傳聞的不寫，專敘述親身所聽，親目所見的。

我爲什麼出國？①原因真是複雜到難以敘述，讓我一件件的描繪在下面罷。

以前我不是說改組同志會自始的主張就不統一，組織就不健全嗎？實在說，改組派的成立，是成立於一本我所著的「國民黨所代表是什麼」那本小冊子，②末後「革命評論」刊行，更標出許多主張。歸根一句話，或者我是對，或者我是錯，我承認社會是有階級的。因爲有階級，就有階級的爭鬥，我自然不承認階級爭鬥的過程和終局，像馬克斯那樣宿命論的呆板。對於階級爭鬥，有些國家是不能避免的，有些國家是可以預先設法消弭的，我的理論根據是承認社會有階級，而提出種種方法去消弭階級爭鬥。

然而顧孟餘先生是否認有階級的，他也知道有階級，但恐怕提出階級兩個字，會惹起爭鬥的情緒，他於是提出「職業」，提出了「界」代替了階級的名詞，對於我那本小冊子分析成農工和小資產階級認爲不

對，所以改組同志會成立之初，起了不少的爭論，終於後來經汪先生調停結果，把小資產階級改成了「小市民」。

汪先生是調停了，但他還是依顧先生的主張，而且他一次從巴黎來信，採納了林柏生先生的提議，主張國民黨是「超階級」，我批評了一頓，雖然不算激烈，也是不大客氣，於是汪先生更不滿意。

改組同志會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上海——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因中央委員難於產出，即以粵方委員爲中央，換一句話說，即是以汪先生爲領袖。但不知汪先生聽了誰人的話，以爲汪先生要做改組派的領袖，不如做全黨的領袖，這句話我也承認爲有十二分的理由，自此汪先生雖然數數來電，指示改組派的方畧，並親自提出歐洲幹部的名單，但他對外宣稱，他對於改組同志會是同情的，但他不是改組會的同志。③

汪先生既然否認他是改組派的領袖，那領袖自然是顧孟餘和陳公博了，然而孟餘先生身弱多病，談一個鐘頭的話就要睡一天的床，而且他最怕麻煩，怕談話，怕見客，於是一切事務都集中我的身上。不過我始終也未承認過我是領袖，並且我也最怕做領袖，以我的地位、年齡、脾氣，都不合領袖的資格，祇是慢慢一班同志既沒有人請教，不期然而然的集中一切問題到我身上。在一班派外的人物，雖然或者不以爲我奪取領袖地位，但在他們看來，我的形勢有些像歷史上權臣用事，勢傾人主。

派外的人物都有這些感覺，汪先生的左右，自然有些不安。加以汪先生未回國之前，廣西的俞作柏因勾結共黨，立刻失敗，於是廣東一班將領，又把廣西失敗的責任，推到我的身上。這件事情，的確我蒙不白之冤，俞作柏在民國十七年我祇見過一次面，這次他運動李明瑞是上海總部同意的，張向華和唐孟瀟是

和俞作柏會過議的，薛伯陵和李朗如是陪着俞作柏在上海計劃，而且又陪着他一路由上海回香港的。他們怎樣做，我在巴黎，一概不知，迨我由歐洲回至香港，俞作柏早已回桂。但張向華他們，本來就不願意動，及撤兵回至廣西，找不到俞作柏，自然光起火來，於是俞作柏失敗，我要負責任了，俞作柏勾結共產黨，我也要負責任了，他們不止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而且勝則居功，敗則諉過，諉過應該諉之什麼人，自然又是我陳公博了。

不止如此，還有一件滑稽的事情，當俞作柏定期舉兵之前，我曾在香港通電，數蔣先生十大罪狀，討蔣的檄文，無過是千篇一律的成語，當中有幾句話，「成則總理在天之靈，不濟則以死繼」，而汪先生左右又指出那是以領袖自居的語調。那公博不是要想做領袖嗎？汪公館充滿了這種苛刻的批評，可憐我蒙在鼓中，直至民國廿四年陳春圃先生才在南京告訴我這件事。<sup>④</sup>

改組派的成立，我要做領袖，而俞作柏的失敗，我要負責任，經過許多許多人浸潤之僭，汪先生也感覺不安起來，於是在回香港的時候，汪夫人和汪先生對着我和余愷湛遂有以下的談話。

十八年十月初旬，汪先生回國至香港，<sup>⑤</sup>我第一次見他在山村道，我坐在客廳，汪先生還沒有下樓，汪夫人先出來見我。我們照例說一番海程上的說話，汪夫人說：

「汪先生以前苦苦不肯回國，而這次又急急的回國，你知道汪先生的意思嗎？」

「汪先生不是在巴黎時已約好回國的嗎？」我莫名其妙。

「是的，汪先生以前苦苦不肯回來，是不願意當領袖，這次急急回來，是想早一點讓出他的領袖。」

汪夫人解釋他們回國的意思。

「那不是笑話麼？除了汪先生，誰人配做領袖？」我還以為汪夫人開頑笑。

第二天夜裡，余愷湛跑來見我，說：

「我剛才看見汪先生，他說了一番話，說他這次回國，是要幫助你幹的。他說公博年來很努力，應該做領袖，所以這次回國，是幫忙你幹，而不是他自己幹。」

我雖然不明白汪先生的意思，但知裡頭包含了許多文章。但汪先生太不了解我的性格了！我自始至終就沒有政治的興味，只有打不平的脾氣。倘使沒有蔣先生三月二十之變，我深信我不會反蔣。倘使蔣先生不成立南京政府，我深信我不會反蔣。倘使蔣先生不叫我們倒李任潮，跟着又給李任潮幾十萬元打我們，我深信我不會反蔣。倘使蔣先生不違法指派代表開大會，我也深信我不會反蔣。⑥我發起改組同志會是爲着我個人嗎？無非爲着汪先生罷了。我聽了余愷湛的報告，又印證汪夫人之言，使我兩夜通宵沒有睡，那時我真想離開，只是送佛送上西天，在失敗時期，怎好離汪先生他去！

在張桂軍圍攻廣州時候，汪公館謠言又來，說我的左右爲爭廣東省政府的廳長，幾乎發生衝突。我聽了只是苦笑一下，我當時實在沒有什麼左右，而且汪先生徵求我的同意，倘若廣州國民政府能夠成立，叫我做內政部兼外交部，我推辭再三，說內政部我還可以勉強担任，但外交已擺着郭復初在那裡奔走，我何苦兼了許多不能幹的職務。兩個部我都不肯兼，難道要兼省政府主席，而又讓左右的人爭廳長，這些空穴來風之言，真令人有口難訴。⑦

我們在北平開擴大會議時候，李朗如先生又來報告造謠言，說香港的改組派幹部開會，李伯賢宣稱汪先生不配做領袖，有領袖資格的祇有陳公博。還幸汪先生很坦白，李伯賢他也認識的，遂把李朗如給他的

報告與我看。我明知李伯賢不會說那樣蠢材話的，但不可以不查。我爲着這事打了一個電報到香港，不止李伯賢沒有那樣說，並且他根本不是幹部常務委員，根本就沒有參加過幹部會議。朗如先生爲什麼愛挑撥了？我想起來他恨我不替張向華籌餉。我自回港之後，曾在李登同處借了十萬元給俞作柏，汪先生回來之後，我們又共同向李登同借了三十萬元給張向華，末後又向南洋烟草公司借了十二萬元給張桂軍，財源就是如此，說到籌款，真是百尺竿頭不能再進一步。末後張向華在圍攻廣州失敗，轉入廣西，再攻南路，朗如又要我籌款，我說向華得了南路，軍餉應當可以自籌，我們的財源枯竭，再難設法。這個話我還不是直接給朗如說的，而是給一封信與汪先生，不料汪先生坦白的將我的信件公開給朗如看，李先生自此恨我刺骨。朗如先生的脾氣，我是深知的，他的爲人或者沒有惡意，祇是婆婆媽媽的好搬是非，算了罷，何必辯護，等待成功，早點身退便了。

經過許多刺激，我真有些意興闌珊，到了北平之後，酒我也喝，牌我也打，管他呢，人生貴適意，暫時擺脫政治，我早就決定了。自太原再退天津以後，汪先生竟懷疑我反對他，我想這是時機，應當走了，<sup>⑨</sup>所以在天津時，擴大會議選舉了我辦刊物，我一再固辭，一聲不響，於十一月七日便乘船回香港。

還有一件事最使我感慨的，汪先生見了「大同報」所載的汪陳分裂消息，給我一封信，說他沒有對我不起，何以有這傳聞。汪先生早就回香港，然而來信還署着由天津發。我回了汪先生一封長信，把上項的事件詳叙一過，並說我自認在國民黨裡僅得朋友兩人，一是汪先生，一是廖先生，廖先生已死，當然只有汪先生一人。說到汪陳分裂，不論是歷史，是地位，是年齡，是資格，都難配得上分裂兩個字，「大同報」所載消息是在十一月十三日，而我十五才到香港，可見消息的刊載，我還在途中，天津誰人造謠，我倒



莫名其妙。這封信發了以後，又促成我離國的決心，而且改組同志會是解散了，我對該會已不需要負任何責任，還是走罷，最少可以清清自己的頭腦，換換空氣。

十九年一月底便趁德國的郵船往意大利，自是在海外渡了幾個月的流浪生活，羅馬、威尼斯、維也納、柏林、捷克、巴黎、尼斯、盧森堡，一直至到比利時才安住下來。我爲什麼要住比利時呢？說起來沒有多大理由，自然那裡的生活比較便宜是原因之一，而最大理由是捲烟好而又便宜，我是抽烟捲的，我實在捱不住專賣烟捲的價昂而又味澁；倫敦烟捲好，然生活又太高，左右思量，遂擇定比利時做一個安樂窩，遁逃藪。

我在歐洲流浪了幾個月，真感覺得有點苦悶，我別的沒有嗜好，只有抽烟捲，看電影，食中國飯。各國的烟捲貴而不佳，看電影絕對不敢入大戲院，尤其不願意入中國的飯館。我很怕碰到本國人，因爲反對我們的，固然不好相見，贊成我們的，也難於答覆，而且每逢碰着一個人，要背一篇很長的故事，我沒有這種耐性，也不願花費這些時間。

比利時的春天委實太惹人愛戀了，有不冷不熱的天氣，有不鬧不寂的通衢，有叢密的森林，有青蔥的田野，我每天在飯館食完午飯之後，倫敦的泰晤士報也從飛機運到了，我照例在街角買一份泰晤士，在路旁的公園長凳坐下，吸一口的烟捲閒讀着。

陡然使我吃了一驚，胡展堂先生在南京被蔣先生扣留，送往湯山安置，這個消息在「泰晤士」的國際新聞欄內印在第二行。①這是什麼一回事？趕快又買了幾張法文報，但所登的消息比「泰晤士」更簡單。在中國可算是一件大事了，可是坐在小公園看報的人們，面孔上一些表情也沒有。啊，是了！這羣歐洲的先

生們，對於中國事情本來就隔膜，尤其對於胡漢民三個字，面生可疑，等於我們中國的大人先生，對於東歐和南美的政治家名字，絕不認識，縱使有人提過他們的名字，根本也懶得去強記。

過了一些時，報紙又登着南京開國民會議了，廣州的非常會議成立了，汪先生也入了廣州了。中國方面寄來的報紙，說當胡先生被扣時，汪先生在香港會發表過一篇宣言，對於蔣先生是責備，對於胡先生是批評，我心想胡先生已是昔爲座上客，今爲階下囚，汪先生何苦這樣！<sup>⑩</sup>當夜我起了一張信稿，打算勸勸汪先生，想了一下，事已過去，說也無補，又把那信稿撕掉。

國內的朋友漸漸有信來，勸我歸國，我的錢也將次用盡，歐洲雖好，不是久戀之鄉，就此打疊回國罷。八月又灣轉了意大利，附了一艘德國貨船歸國，九月二十過了錫蘭的哥倫堡，船上已得無線電，日本軍隊已於十八日佔了瀋陽，<sup>⑪</sup>這種無頭無尾的消息，更使我惶惑，於是在船上打了一個電報給汪先生詢問真相，直至船到了星架坡，才有機會讀報紙。九一八的經過，真相漸明，惟南京方面怎樣應付，廣州方面又怎樣應付，我還是不知道。

我於十月一日才到香港，汪先生早使人來通知，請我不必到廣州，他定期五日來香港見我。在香港這幾天非常之忙，因爲廣州已在打算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各省的改組同志也有一部分人參加，香港是別省到廣州必回之路，他們找我談談國際情形，說說未來做法。

汪先生果然在五日到香港，夜裡請我食飯，並邀我早一些到，告訴我廣州的情形。我見了汪先生之後，他原原本本告訴我他到廣州的經過，他說：

「你剛回，許多情形你是不清楚的，請你不要問，我從頭至尾告訴你。待我告訴你完畢之後，你還有

不明白的地方，你才問。

「廣州我不願意去的，知道去也沒有好結果，但白健生和張向華打從廣西來見我，說汪先生就爲同志打算，也要到廣州一行，汪先生不到廣州，我們是沒有出路，根本也不能和陳伯南合作。白張這樣勸我，我不得不到廣州，我可以說我這次到廣州，不是爲主張，而是爲同志。」

「廣州是歡迎我，而不歡迎你和孟餘的。他們有一個口號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請我去，對於我的朋友一概擋駕。⑫我到廣州之後，展堂雖然還囚在湯山，他託鐵道部的警官鄧鐵真打了一個電報給古勤勤和孫哲生，說：『目前捨汪無足與蔣對抗者，但陳甘萬不能共事。』哲生倒也老實，給這電報與我看，所以我派人請你在香港等我，就因爲他們對於你和顧孟餘、甘乃光都拒絕。」

「我打算一有機會便走了，在廣州非常受氣，不獨許汝爲當衆向我無禮謾罵，連小小的西山會議派桂崇基也當衆和我爲難。」

末後汪先生更告訴我，爲着九一八事變，寧粵應該合作，奔走調停的陳真如已到廣州，大概兩方合作也沒有什麼條件，只是商量合作的辦法。現在已有了一些眉目，即是南京須要把胡展堂和李任潮釋放出來，同時兩方面都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把一二三屆的委員都選出連任，更擴充名額安置歷年有功之人。⑬我聽了汪先生這番說話之後，我第一勸他這次不要當和議代表，第二勸他應該和胡展堂合作，我正談到這裡，汪夫人已看完日場的電影回來，一進門口見了我，便說：

「公博，汪先生都告訴了你廣州的情形嗎？我們真氣死了！」

「公博還勸我和胡展堂合作呢！」汪先生笑着說。

「什麼？你勸汪先生和胡展堂合作？你知道不知道他們要去皮存骨。」汪夫人氣虎虎的。

「我都知道，但我還是這種主張。」我堅決地說。

「好罷，我們下次再談罷，我今夜還要趕回廣州。」汪先生結束了這次談話，我們跟着食飯，汪先生並叫我和孟餘接頭；顧先生也是不能去廣州的，所以留在香港。末後汪先生更叫我先到上海和宋子文接洽，我可沒有答應，後來許久汪夫人告訴我，因我不肯先到上海，汪先生很不滿意，大約汪蔣第二度合作，已在那裡進行而且成熟了。<sup>⑭</sup>

大概是十一月罷，陳真如又啣南京之命南來，一切條件已商量妥當，蔣先生下野，國民政府主席由林子超先生代理，行政院長本是蔣先生兼的，也辭了職，由陳真如代理，更把陳真如的十九路軍駐防京滬，使得廣東方面的人安心到南京。<sup>⑮</sup>

汪先生果然又親自出馬當和平會議的代表，他臨行之時，路過香港，又約我去談話。

「我真不能和展堂合作。你知道嗎？古勤翁他們對你實在猜忌之至。我臨動身時，古勤翁臥病，他說要來送我行，我因為他病，倒去看他。勤翁和我談了一陣，我說：『勤翁，還有什麼話呢？』他說：『我還有一句話，如果汪先生要和胡先生合作，必須要離開公博。』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公博是共產黨，汪先生不知道嗎？』我說公博真不是共產黨，勤翁長嘆一聲說：『汪先生，你給公博騙了！』這樣，他們只和我合作，而不同我們的同志合作，怎麼合得起呢？」汪先生長篇大論的說了一遍。

我聽了古勤對我的批評，我真忍不住笑起來，我勸汪先生說：「我們不要聽古勤翁的說話算了，我個人是毫無問題，我看汪先生還是和胡先生合作有利。」大概當時也許是事實，也許是汪先生已具成見，

也許汪蔣合作早在我回港之前已經成熟，我無論如何說法都說不進去。而且前幾天我也見過孟餘，他反覆說明汪蔣有合作的必要，他說汪蔣在民十三年在廣州同負艱巨，雖然中間仳離，可是有過共同的歷史。而且汪蔣的左右多數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身，性格多數相同，比不得胡先生底下全是官僚，格格不入。我印證了汪先生夫婦的說話，不覺默然，算了罷，反正國家到了這個地步，難道我還堅持一己之見到底嗎？不過我默祝，即使汪蔣合作，汪胡也不可再破裂。

我辭了汪先生出來過九龍，在渡船中正碰着伍梯雲和傅秉常一羣人也在船內，他們正過海去附美國郵船到上海。我見梯雲坐在艙內，人很多，只和秉常在艙外的船面說話，我請他轉達梯雲，勸胡先生千萬和汪先生合作。

在香港又住了一個多月，上海的和平會議已開，孫哲生又趕回來開四全大會，那時國民政府的主席雖然不知道定什麼人，可是行政院由孫哲生組織，倒是雙方同意。孫哲生在淺水灣酒店約我談話，提出組織各部問題，徵求我的同意任實業部長，而孟餘則為教育部長，我答覆他等我問問汪先生的意見再說。

那時汪先生已有電來，邀我到上海，南京方面朱益之、丁超五、周啓剛，也聯名電邀我到京，我這樣便啓程，京粵兩方正忙着開四全大會，我兩處都沒有出席。我想將來問題正多罷，兩方面都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的大世界遊藝場開了一個選舉大會，選出了十名中央委員。據汪先生說，廣東的名額，本由他們操縱，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滬開會，根據代表的名額，產生這十名中委。這個辦法，我心內真是不贊成，有經驗的汪先生，多顧慮的顧孟餘，居然有這樣非常手段，我雖然佩服，但究竟以為不可以為訓。①⑥

到上海時，和平會議早已結束了，中委也選出了，胡先生不止釋放出來，而且已回廣東了。<sup>(17)</sup>

「你還主張和胡展堂合作嗎？他反對你極烈呢！他勸我回廣東，我鑒於在粵的氣悶，實不願回。最末後他說：『精衛，如果你要和我合作，你必定要離開公博。』」「你爲什麼原因那樣不能諒解公博呢？」我問。

「我別的都能諒解，惟有他在文章裡批評我，我實在不能諒解。」汪先生又反覆的把胡先生臨別的話告訴我。

「我主張汪胡合作是爲着整個黨的前途，並不爲着我自己。胡先生反對我，最多我不能做官，他總限制不了我的活動。我的年紀還輕，可做的事業也很多，汪先生不要爲我個人打算。」我又反覆的想汪先生最後容納我的意見。

十二月二十第四屆的全體執監委員要在南京開會，汪先生忽然患病臥在醫院，不能起牀。在我的想像，汪先生若然不到上海則已，到上海終歸要入南京。我很想汪先生和孟餘在京主持黨政，而我則留在上海辦雜誌，汪先生這一病，我的計劃倒變了幻夢。我到醫院辭行，汪先生談了一陣，我便辭去，剛剛我到了房門口，汪先生又叫我轉回，他臥在牀上對我說：

「我還有一句話；你到了南京，對於一般老先生是必要讓他們一點。這班老先生的心理，我是很明白的。他們的心內說：『你公博的能力，我是承認的，但年齡終歸是我大，你不讓我，我是不答應。』這樣，我想既然合作，你就讓他們一點罷。」

我那時也不好怎樣回答，汪先生這番說話，我是感激的，然而我的確是一個敬老慈幼的人，共產黨和第三黨的朋友們不少在雜誌的文章內公開罵我是温情主義者，是封建道德的殘餘。大概汪先生是怕我和吳稚暉先生再吵鬧罷，好！從此我真緘默不作聲，看看我是不是像吳老先生所罵的「毫無忌憚的小人」！

南京是到了，有三個人我很難見面，去見他不好，不去見他也不好。那三個人呢？第一個是蔣先生，我差不多是反蔣的急先鋒。第二個是吳稚暉，在上海我們打筆墨官司，真是雙方都頭崩額裂。第三個是李任潮，我驅逐過他，而他又曾替我樹立過共禍紀念碑。但中國真像譚組安先生所說，到了不了之時，自然就了。我們到南京，全住在鐵道部的寄宿舍，蔣先生打了一個電話找汪夫人，說他知道他們到京，本來是想來看我們的，因為鐵道部人太雜，請汪夫人、孟餘，和我三個人，至軍官學校相見，這個第一重難關算已度過去了。

第二天夜裡，蔣先生在勵志社宴請全體中委，我突然碰見吳老先生。幸運得很，他坐近門口，而我遠遠坐在另一邊。誰知等到席散之時，他老先生還站在門口不走。這太難了，難道他不走，我也不走嗎，正走到廳心，碰着陳布雷先生，我差不多當他是救難符，拉着他說話，心中期望吳先生快快出了門，我好走到。諳於世故的吳老先生，大約也知道我面嫩，笑吟吟的走到我身邊，和我握握手，說：「公博先生，幾時到的？」這把手一握，算是兩家前嫌盡釋，莫逆於心，這樣二度難關也度過了。

第三度難關跳得更容易，當全體會議的第一天，我到會場門首簽到時，李任潮先生正在署名，兩個人偶然一碰頭，拉拉手，他說：「公博先生，你好嗎？不見很久了。」這樣兩個人一起說話，一起入場，舊日的怨恨全算冰消瓦解了。

當全體會議之前，日本又進兵錦州，那時上海的學生全體到京請願，一天竟打入了中央黨部。真是全國沸騰，人心激昂，中央雖然還沒有具體辦法，可是國民政府主席倒已選出來，五院院長和各部部长也都分別選定和特任，這樣廣州非常會議就此結束，而國難也跟着一天一天的嚴重。⑱

## 第十一章註釋

①擴大會議失敗後，陳公博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離開天津到香港，一九三一年一月轉赴歐洲，在歐洲居住數月。及至胡漢民被囚於湯山後，陳公博接到國內同志來信，促其返國，乃於是年九月起程，並於是年冬天回至南京，見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寒風集」，頁甲二七七至二七八，及頁甲二八一至二八二。

②「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一書，草於一九二七年四月，成於是年八月，直至是年十月在廣州出版，見陳公博：「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上海，復旦書店，一九二八年，頁一。

③改組派只佔國民黨左派之一部份，見 T'ang Leang-li, *Wang Ching-wei: A Political Biography*, p. 188, 及司馬仙島：「中國國民黨左派——改組派與黨統」，載「北伐後之各派思想」，頁一三三至一五二，汪精衛素以左派領袖自居，故不想只做改組派之領袖。

④汪精衛系內有不同之小組織，見本書第九章正文及註⑧。

⑤一九二九年十月汪精衛回國，先至香港，陳公博亦有同樣記載，見本書第九章。

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大部份由南京中央指派及圈定，參考本書第九章註②，由此引起部份國民黨員之不滿，有護黨救國之號召，反對南京中央。汪精衛、陳公博等二屆十四位中央委員，曾在滬發表宣言（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指斥南京中央所作所為，及宣布三屆大會之不合法，見 T'ang

L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347—348.



⑦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張發奎軍會同桂軍進兵廣東，是年十二月兩軍攻打廣州，但在廣州附近被擊敗，張桂兩軍遂於十二月十二日後撤，故汪精衛等無法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見「第四軍紀實」，頁三一〇至三二九，及「反蔣運動史」，頁八十三至八十六。

⑧陳公博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離開天津到香港，見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寒風集」，頁甲二七七。

⑨陳公博在另一篇文章中有同樣記載，見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寒風集」，頁甲二八二。

⑩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在「總理逝世紀念日告諸同志」一文中表明對此事件之意見，另在三月十四日發表之「爲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更清楚表明自己立場，見「反蔣運動史」，頁二八五至二八八。又「華字日報」報導汪精衛在天津對胡被扣留事發表談話，謂「胡漢民被囚並不足惜，但立法院長如有失職，應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提出彈劾，不應拘留」。這次談話顯示汪精衛對胡漢民仍有芥蒂，見「華字日報」，一九三一年三月六日，第一張第一頁。

⑪九一八事變之經過詳情，見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學院，一九六四年（？）。至於九一八事件之文獻，可參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三十三至三十四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年缺。

⑫陳公博因曾參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之廣州政變，及後引起十二月共產黨在廣州起變，故不受「粵方」歡迎，又顧孟餘、甘乃光爲有名之國民黨「左派」，而「粵方」則受到陳濟棠、胡漢民、孫科及西山派等「右派」之影響，故二人不受粵方歡迎。因此，國民黨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非常會議，及以後成立的黨

組織及國民政府組織，均無陳公博、顧孟餘、甘乃光等人參加，見「反蔣運動史」，頁三四二至三四三，頁三四七至三四八，及頁三九三。

⑬九一八事變後，南京中央及廣州政府商量合作，在上海舉行會議。當時會議之談判經過及達成之種種協議，見「反蔣運動史」，頁四五七至四八九。

⑭廣州非常會議在寧粵和解後，曾經指責汪精衛背棄非常會議，與蔣介石進行接洽，見「反蔣運動史」，頁五〇六及五一二。

⑮在粵方代表要求下，陳銘樞之十九路軍調駐京滬，確保粵方代表安全，見蔡廷鍇：「蔡廷鍇自傳」，香港，自由旬刊社，一九四六年，第一冊，頁三二二至三二三，及「反蔣運動史」，頁四五八及四六五。

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汪系代表指責廣州第四屆代表大會推翻上海寧粵和談會議所達成之決議案，乃退席回香港。其後汪系代表陸續乘輪到上海，並於十二月三日，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代表大會，另選一批中央委員，脫離廣州中央之控制，詳見「反蔣運動史」，頁五一九至五二〇。

⑰胡漢民於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為南京中央釋放，即由京啓程赴滬，是年十一月五日由滬赴港，二十九日抵廣州，見「反蔣運動史」，頁四六四至四六五，頁五〇四至五〇五，及頁五〇八。

⑱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進攻上海，南京中央深覺受日本威脅，乃一度遷都洛陽，詳見本書第十一章。

## 第十二、十三、十四章說明

從一九三一年末至一九三五年末，就國民政府內政而言，最重要的是汪蔣合作之局面。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內部各反蔣派系，組織廣州非常會議與蔣氏之南京政府抗衡。九一八事變後，雙方在舉國要求團結的形勢下在上海召開和平統一會議。其後，粵方召開國民黨四屆大會討論上海會議的決定。在這次大會中，汪精衛與胡漢民因蔣介石的去留問題產生衝突。汪氏更因不滿胡漢民堅決要求蔣氏下野而退出四屆大會。汪氏的行動，一方面擴大了汪胡的不和，另一方面亦為汪蔣合作埋下了伏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在粵方堅持下同意下野，促成了寧粵雙方的復合。國民黨隨即召開中央臨時會議，議決以林森暫代主席、陳銘樞代行行政院長職。其後在四屆一中全會選定林森為國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陳銘樞為行政院副院長。中全會最重要的決定是改組中央執監委員會，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設常委三人，輪流作主席。中政會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一切議案俱要中政會議決。中政會三名常委為蔣介石、胡漢民及汪精衛；但當時蔣氏仍留在奉化，汪氏稱病，胡氏在粵，常委之職形同虛設。對於孫科出任行政院長一職，蔣汪均表不滿，而採取消極杯葛行動。此外，宋子文於財政方面有計劃地打擊孫氏，加以外交方面百籌莫展，孫科乃知難而退。

孫科之去職，使行政院長一職虛懸；因而促進了汪蔣合作之可能。汪精衛於孫科去職後，先派顧孟餘與陳果夫聯絡，商討汪蔣合作。汪氏更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在杭州與蔣氏會晤；協議由蔣氏主理軍事及剿共，汪氏出掌行政院。這時候，汪蔣合作局面乃成。汪氏遂先行入京，而稍後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

日舉行的中央臨時政治會議便通過汪氏就任行政院長。但在當晚，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爆發。這一戰役，自一月廿八日延續至三月一日，其間國民政府鑒於南京受日本軍艦威脅，恐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乃遷都洛陽。同年三月六日，中央政治會議亦通過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坐鎮南京；汪蔣合作正式開始。

#### 汪蔣合作（一九三一——三二年）

在汪蔣合作期間，中國政府的當前急務在於應付日本對中國的侵畧。對日外交遂成爲蔣汪合作中的重要課題。當時汪氏執掌的行政院，乃主理外交事務的最高機關。在當時反日愛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下，汪氏所受的壓力自然比蔣氏爲重。就對日的政策而論，據陳公博在第十三、十四章及「八年來的回憶」一文指出，汪氏本是主張對日作戰的，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再到一九三五年「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抵抗。但在「古北口之役」中，汪氏據前方將領報告，得悉中國武力實在太差，無法抵抗，便漸漸傾向主和的政策。陳氏之說，也未必毫無根據。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張學良採取不抵抗主義，不肯出兵救熱河；汪氏憤然通電辭職，遠赴歐州。而在汪氏離國的幾個月間，行政院長一職一直虛懸，只是由宋子文代署。本來，汪氏曾三番四次推薦宋子文就任，宋子文亦樂意登台，無奈蔣介石反對。陳公博解釋其中原因謂蔣氏要對日緩和，不願自己嫡系的人物首當其衝。姑勿論汪氏主和抑或主戰，南京政府自九一八事件以至「塘沽協定」的簽訂（一九三三年五月卅一日），及華北政務委員會成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期間在對日外交上的一貫政策乃是「內求自存、外求共存」。實質上乃是希望運用有限度的讓步，加上圓滑的外交手腕來滿足日本對中國的要求，而不致於辱國。對日本的基本方針是贊同日本所提出的「中日提携」口號，認爲在「互惠平等、互尊重權」的基礎下中日的關係是可以調

整的。但國府亦承認在調整中國必須有所「犧牲」，所以爲表示中日和平的誠意，中國對犧牲已下定了「決心」。在當時日本軍國主義高漲下，這種弱國外交方針很明顯的只能求苟安於一時。據陳公博的記載，自九一八事件以來，南京政府陷於剿共與抗日的兩個難題之間，在軍事上又捉襟見肘，而在對日外交方面亦不利，所以在七七事變之前，國府仍難找出一個合理對策。再者，當時的抗日情緒高漲，所以身爲行政院長而主理外交的汪氏，未免要負起大部份責任。正如陳公博所指出，當汪氏自歐洲回國擬成立「華北政務委員會」以便和日軍折衷時，汪氏本推薦黃紹竑任政務委員長。後來却遵照蔣氏的意思，選出黃郛担任。黃郛到達天津後立刻與日方簽訂「塘沽停戰協定」；而協定的內容，行政院在事前却得不到報告。在協定簽署之後，身爲行政院長的汪氏便成了衆矢之的。從這事亦可以看出汪蔣合作的微妙處。

#### 十九路軍與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一——三四年）

一二八淞滬之役後，十九路軍一舉成名。但十九路軍的抗日，却與蔣介石「安內攘外」的政策發生了抵觸。十九路軍原爲北伐時第四軍的一部份，起初只有蔣光鼐的六十一師和蔡廷鍇的六十師，指揮官是陳銘樞。三人都是粵人。中原大戰時，蔣光鼐的六十一師、蔡廷鍇的六十師和陳濟棠屬下李揚敬的六十三師奉調北上阻止李宗仁統領的張桂聯軍。但是由於這三師的北調，身爲廣東省主席的陳銘樞羽翼頓失，後爲陳濟棠排擠而去。到後來十九路軍克復濟南，重定北方大局的時候，京滬衛戍便歸十九路軍負責，而陳銘樞又當了行政院副院長兼交通部長，並在上海組織了「社會民主黨」，匯成一股勢力。十九路軍調京滬路之後，中央有意從經費方面限制十九路軍，把經費削減了一半。淞滬之役時，日軍屢次增兵，而十九路軍請求中央派兵增援多次，中央均置諸不理。當時盛傳中央恐怕十九路軍抗日聲名過大，功高震主，便讓

十九路軍孤軍作戰、不加援助，借日軍之手消滅十九路軍。其後蔣氏雖調張治中率第五軍俞濟時等部參加作戰，但一般反蔣人氏則認爲此舉乃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事範圍。另一說法則以爲蔣氏派他的嫡系第五軍協同抗日是表示他已盡力支持十九路軍，但蔣氏在對日尋求和平的大前提下，盡力避免戰事擴大。不過在一二八之役後，蔣光鼐和蔡廷鍇成了民族英雄，陳銘樞的聲譽鵲起，而十九路軍的聲名也凌駕在黃埔之上。

淞滬之役後，蔣氏爲防止十九路軍再度抗日滋事，有碍和局，乃將蔣光鼐、蔡廷鍇的部隊調防福建，並發表蔣光鼐爲福建省主席。據陳氏解釋，蔣介石的策略是利用陳銘樞和陳濟棠當時的矛盾，故意調陳銘樞的十九路軍往福建，使他們鵝蚌相持，而自己則高踞南京，坐收漁人之利。在十九路軍調福建之後，陳銘樞因牽涉到招商局貪污事件而辭職，中央竟不加以挽留，乃憤而出洋。

陳銘樞出國後，權力既失，和十九路軍的關係距離日遠，心中憤慨，乃於一九三三年初回國，希望策動十九路軍革命，乘機奪回十九路軍的領導權。另一方面，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後，便有謠言謂中央要把該軍各師分別調往各省「剿共」，藉此分散十九路軍的實力，以便各個擊破。其次，不論十九路軍有關軍、政、財各方面的要求，中央均未批准，致令蔡、蔣等將領極感憤懣。終於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及第三黨份子和社會民主黨份子，齊集福州，積極組織「人民政府」。最後由第三黨人士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人民政府」，推選李濟琛爲主席，同時宣言打倒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廢除青天白日旗。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一致聲討。

福州方面更於一九三三年十月派徐明鴻代表與共方談判，要求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因而召開緊

急會議。共方對福州方面的態度，一直爲史家所爭論。有一說以爲共方分爲兩派：周恩來等主張立刻派兵赴福建協助福州人民政府；但毛澤東等則主張慎重，要求十九路軍先配合紅軍，消滅駐閩西的國軍，然後紅軍方能援閩。其後中共史家却說毛一直主張援閩，後因國際派的反對而採觀望態度。但各項史料顯示，毛澤東與國際派當時均主張慎重，待閩方有實際反蔣及「民主化」行動，才積極援閩。

基於以上立場，中共方面遂派潘健行與福建方面簽訂「反日反蔣初步協定」。此項決定只能視爲「互不侵犯協定」；雙方在軍事及經濟上並沒有具體的合作條款。對於雙方在軍事同盟及經濟合作等問題，尙待福建方面表現積極反蔣及進行民主改革後共方才願意具體訂定。基本上，共黨對於與福建方面合作並不樂觀，對於福州方面的軍人領袖聯共的誠意十分懷疑。福州方面對於與中共的聯合也並不熱切，也沒有著意實踐「反日反蔣初步協定」的條款。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日，朱、毛聯合發出電報指責閩方於初步協定簽訂後月餘，仍未採取反日反蔣行動；要求閩方集中武裝與國軍決戰，組織義勇軍，予人民以各種自由。此外，共方認爲福建政權在土地政策方面只談「計口授田」而不讓農民沒收土地，尙欠革命性。並表示這些要求達到後，共方隨時準備與閩方訂立軍事同盟。閩方對共方的各項要求不單不作任何反應，反而在上海報章上否認與中共有任何關係。結果當十九路軍面對蔣軍強大攻勢時，共軍並不加以援手；而十九路軍方面也不採取積極抵抗，以致大部份都不戰而潰。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福建終爲中央軍所佔領。

## 第十一章 一二八之役與政府遷洛

一二八之役自然將來歷史有官書的記載，我這裡所記述的是當時的情形，和政府的內幕。

或者，我要記述還是應該從汪蔣合作當時的情形敘起罷。我進南京之時，汪蔣到底合作的成熟已到了什麼地步，我一概蒙在鼓裡，或者因為我會勸汪先生和胡展堂合作，所以汪先生不再和我商量。十二月底我到了南京，璧君曾約我和顧孟餘到何敬之家談過兩次話，當時在座的有主人何敬之，和來客陳果夫、于右任、葉楚傖、邵力子、朱益之等幾個人，那時原定國民政府主席舉于右任，而行政院長選定孫哲生，那就是將國府主席和行政院長分給寧粵兩方的意思，汪先生只願意任政治會議主席，而不願兼其他的實際職務。不過到了一中全會，主席團提出國府主席是林子超，行政院還是依照前議，至於中政會則設常務委員三人，即是汪先生、胡先生、和蔣先生三位。<sup>①</sup>

南京對於孫哲生長行政院大概早是不滿意的，宋子文已有計劃的打擊孫哲生，他暗地裡叫財政部職員全體辭職，來一個總同盟罷工。哲生對於財政了無辦法，他知道自己兼，會場台，因之還是徵求宋子文，



子文本來有計劃的，當然不肯幹，繼之又徵求孔庸之，庸之或者想幹，但也爲着他們的團體罷，婉轉的拒絕。孫哲生沒有辦法，只好命黃漢樑署理，一切部長都特任，惟有財政部是署理，那自然整個行政院搖搖欲撲。

黃漢樑上台之後，一籌莫展，軍餉本來早已欠了不少，只是在他半個月任內，就有一千多萬發不出。至於政府的經費，只是實業部一部，原來經費是每月八萬多元，黃先生一月之內只發過三萬元支票，而這三萬元支票當中，有二萬元是空頭，始終支不出。這樣怎麼幹呢？單是財政一個問題，已夠行政院倒塌了。

其次陳友仁的外交部，除了在漢口硬幹一個方法以外，也提不出什麼辦法。他主張和日本絕交，這個案提出中政會討論了幾次，毫無結果。我當日也是不贊成絕交的，因爲絕交是應該斷絕一切關係，連僑民也應運送回國，中國有的是租界，對於漢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中國能有力收回收回嗎？日本僑民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國也能有力把他們送回本國嗎？況且絕交第二步便是宣戰，當時寧粵兩方都不夠力量對外戰爭，並且也始終沒有預備對外戰爭，這樣無效的絕交，僅是一種高調，實在於國家無補。<sup>②</sup>

蔣先生在他的奉化故鄉，發出通電了，他明白的反對對日絕交和宣戰，說對日宣戰三天就可以亡國。蔣先生既是這樣主張，如果真是對日戰爭，他的軍隊當然不會打仗，張漢卿已明白的不抵抗，閻百川剛由大連飛回山西，自然也無力打仗，這樣如果真打起來，只有兩廣的軍隊了。兩廣的軍隊固然沒有準備對外，即使有了準備，也不能以兩省之衆而敵日本全國之師，況且由兩廣調兵至北方，更是一件談何容易之事。

財政無辦法，外交上尋不出一條端緒來，孫哲生先生又怎樣能支持下去呢？於是借着外交政策不行爲名，一去上海便不再回南京，連帶離職的還有內政部長李君佩先生、外交部長陳友仁先生、鐵道部長葉譽虎先生，甚至南京的市長馬星樵先生也一去而不復返。南京真成了無政府的狀況。③

孫哲生能走，我是不能走的，第一，我們本來不是一個責任內閣，無連帶辭職的束縛，況且他們事前一點都不通知我，而且又只是走而不是辭。第二，國家的事總不是一件兒戲事情，豈能發公子哥兒的脾氣，連一個交代都沒有。我們正在南京徬徨着，忽然聽見汪先生由病榻一躍到了杭州會蔣先生了，我打了一個電報去也不回，隔了一天聽說汪先生和蔣先生一齊由公路到南京了。這幾天的變化，我真如墜五里霧中，事後汪先生對我說，他知道南京已成無政府狀態，而且上海的事件又緊，不能不扶病到杭州，會見蔣先生想出一個辦法來。

汪先生突然到杭州，孫哲生他們絕對不能原諒的。他到杭州的前一天，馮煥章去見他，醫院說汪先生病得很厲害，不能見客。孫哲生也去見他，醫院還是拿病狀厲害爲理由，謝絕來賓。昨天還病重，今天忽然乘車到杭州，這是什麼一回事，任你如何解釋，孫哲生他們依然不能諒解。

南京政府正入了混沌狀態，上海終於打起來，日本海軍見了陸軍在東四省建奇功，也想援例在上海來一次瀋陽事變。④恰巧三友實業社的工人，打死一個日本和尚，海軍方面提出種種的過分要求，上海市政府都答應了，依然還要躍躍欲動。上海事件那樣緊張，而孫哲生死也不肯回，於是在一天之內，便提出汪先生任行政院長，改組行政院。當時忙得要死，各部長也不及補人，外交部長由司法行政部的羅鈞任暫兼，鐵道部由我暫兼，而內政部則由汪先生暫兼，因爲政府須要立刻遷洛。⑤

如果真是戰爭，南京確是危險的，只在南京的下關，就泊有日本幾條兵艦，把國民政府擺在日本炮火射程之內，豈不變了容易作城下之盟？行政院一成立，即商議馬上把政府遷洛陽，二十五六兩天，各部都把重要文件裝上火車，由津浦路轉隴海路出發。

當日各部部長沒有行的僅四個人，軍政部何敬之是留守南京的，自然不能走。外交部羅鈞任要負外交職責，也只有暫留。交通部陳真如本來是京滬衛戍司令，也不能不坐着指揮軍隊。至於我呢，本來沒有留的必要，但我真要看怎樣打法，對內戰爭和對外戰爭怎樣的的不同。羅鈞任並且留着我幫忙他，我只交帶次長郭春濤帶着職員移洛辦公，我留在南京看熱鬧。

我們四個部長約定每日在薩家灣外交官舍見一次面，以備交換情報，二十七中午，我們照例會見，何敬之沒有來。

「真如，倘若日本海軍真要打起來，你們是不是要抵抗？」我急切的要問個究竟。

「據高佬蔡說，上海打不得，那裡沒有陣地。將來要打，也必定要撤兵至真茹和南翔。」高佬蔡是蔡廷鍇的渾名，真如解釋着。

「真如，你錯了。你們除非不抵抗則已，要抵抗還是應該在閩北。你們以為閩北不是陣地，但日本人佔了閩北，不來真茹和南翔，你們豈不是有抗戰之心，無抗戰之實。而且我承認這次上海戰爭，還不是軍事戰爭，而是政治戰爭，倘若在閩北不流一滴血，閩北必將變為日本的租界。」我把許多理由告訴真如。

「公博說的話很對，趕快打電話到前方。」羅鈞任承認我的獻議。

真如想一想，承認我有理由，即在桌上拿起軍用電話打至上海找蔣光鼐：

「你是景然嗎？公博主張除非不打，打就要在關北。你的意見怎樣？」

「賢初也是那麼主張，就這樣幹罷。」蔣光鼐停了一陣，在電話那一頭答話，大約已得了蔡廷鍇的同意。上海的戰爭差不多成了定局，我們得到許多消息，都說日本海軍非冒險行動不可，只是痴心愛好和平的人們，心裡還掛着一線的希望。日本總領事送到上海市政府的要求，吳鐵城市長都接受了，並且也正式道過歉了。據吳鐵城的報告，日本領事館也很高興的告訴他，大概已沒有什麼變故，然而日本的外交豈是在領事館手內的？一月二十八早上三點鐘，日本的海軍陸戰隊，事前沒有一點通告，進攻關北，而十九路軍也積極抵抗，掀起了上海一二八之的民族戰爭。<sup>⑥</sup>

國民政府在一二八之前夕，已遷到洛陽，林主席駐節在洛陽的西宮，而蔣先生和汪先生則乘了專車到徐州，聽見上海戰役已開了弊端，又折回至浦鎮。我們差不多每天都過江到浦口去見汪蔣兩先生，說也滑稽，上海兩軍不管日夜炮火連天，日本陸軍陸續由日運送上海登陸，吳淞和關北橫被轟炸，而灣泊南京的日本兵艦依然安詳的浮在長江的水面，我們每天過江都繞過日本兵艦面前，而中國的海軍也行若無事的，相對着像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一夜，日本兵艦畢竟炮攻南京的獅子山了，我雖然住在安舖營，每夜都睡在羅鈞任的家裡。他那裡有軍用電話，每天戰況均有詳細的報告。我們正在飯後，忽聞隆隆一聲炮聲，那不是大炮嗎？我們走出天階，看見天際火光又閃爍一下，來了第二炮，接連着放了幾炮，便又寂然停止。何敬之的電話來了，說日本兵艦在開火，他正在調查開炮的原因，至於獅子山炮台方面，決定暫時不還炮。到了夜半，第二個報告又來，說有人對日本兵艦通岸的浮橋擲手榴彈，所以日本兵艦開炮。夜太深了，讓軍上警戒着，明天再說罷。

。反正幾條日本兵艦佔據不了南京，可是南京那時真是在唱空城計，除了憲兵之外，恐怕也沒有其他軍隊來拱衛這個首都。

這場上海戰爭打了一個月零三日，十九路軍爲着日軍在瀏河登岸，感受側面的威脅，由閩北退到南翔，中間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請救兵，企圖張漢卿動員，以牽制日本之師，想造成一個南北全面戰爭之局。張漢卿受了瀋陽不抵抗之名，大約這次總要吐吐氣罷！誰知我們到了北平，看看環境，已像一盤冷水澆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當時就有人告訴我，張漢卿絕不會動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訴我，說蔣先生先一日已派人來，說任潮和我並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們和張漢卿混了幾口，可以說毫無結果，漢卿倒以上賓之禮待我們，照例約了十幾個重要人員陪我們食飯，臨走時親自到車站送行，說到出兵一節，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我沒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爲有人說漢卿還聽李先生的話，或者李先生可以幫我們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談了許多哲學，說了許多抽象的名詞，依然不着邊際，更不要希望他能夠向漢卿說話。

這一場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陽開第二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罷。⑦這次旅行重新經過保定、石家莊、鄭州，以至洛陽的故宮，開了五天的全體會議，我便往山西，重與閻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績都沒有，只替十九路軍在閻先生那裡捐了十萬個手榴彈。

上海的戰事，十九路軍的確沒有方法支持了。蔣先生雖然調了張文伯的第五軍參加，然而兵力還不夠使用，共產黨趁着江西的軍隊向下游移動，乘虛而入，佔領了撫州，蔣鼎文那師由贛東調至浙江以赴上海之援，沿途也被共產黨邀擊，未至杭州，而十九路軍已退。說句實在話，上海的一二八之役，兩方都不是

很認真，佈滿上海的謠言，說蔣先生實在不願戰，只是十九路軍已啓鑿，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sup>⑧</sup>

蔣先生之不願戰，我也是原諒他的，當時根本上一些準備也沒有。我還記得一次我和汪蔣兩先生在浦鎮的車站山上的工程師住宅內談話時，蔣先生還說了許多埋怨十九路軍的話。我解釋着十九路軍不得不戰，而且上海的戰爭，我認爲是政治之戰，而非軍事之戰，末後我更說：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釀成內戰。」

「內戰，我是不怕的。」蔣先生很堅決的維持自己的意見。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別的話岔開，我記着汪先生告誡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語。

經各國公使的努力調停，上海算是停戰，而且開了和平會議，終於簽定了淞滬停戰協定；那個協定，只有請讀者翻正史，恕我不贅述。<sup>⑨</sup>協定簽訂之後，我們的外交次長郭復初給人打破了頭，一班所謂人民團體的代表，對於停戰憤憤不平，他們只知停戰之可恥，而不知軍事之無法，大家去見郭復初要求說明，把一筒紙捲的銅圓，擲在郭先生的額角，使郭先生進了幾天醫院，至今額上還留了一條紀念痕，來紀念他此次在折衝壇坫的功勳。但有什麼要緊呢，郭先生爲這一擲，後來立刻做了中國駐英大使。

日本算是勝利了，在虹口公園開了一個祝捷會，在會場上給高麗的革命黨投了一枚炸彈，白川大將送了命，重光葵公使送了一條腿。重光葵還不錯，雖然臥病在醫院，刻刻還希望和平，至病好離滬之時，還諄諄的說話，希望中日早日恢復和平。我心裡想這位重光葵先生，還算得上一個政治家，雖然受傷，依然維持他的遠見。自此上海又歌舞昇平，直至廿六年八月又淪入血海。

## 第十二章註釋

①中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二日在南京舉行。有關是次會議的背景請參看第十一章說明。四屆一中全會選定林森爲國府主席、孫科爲行政院長、陳銘樞爲行政副院長。另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設常委三人，由蔣介石、胡漢民及汪精衛膺任。見「一周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三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反蔣運動史」，頁五四八。

②陳友仁自一九三一年繼顧維鈞出任外交部長後，力主對日絕交，並請求召開九國會議。其時寧粵雙方均不打算對日宣戰，所以汪蔣均主張慎重。陳以政策不能施行，乃憤然去滬，呈請辭職。從下引其辭職談話，可反映他的論點：「當余就外長職之初，因過去蔣介石對於東三省主張其消極抵抗政策之故，以致錦州失陷，而中國軍隊且全部撤退於關內，外交問題至是乃愈陷於困難。根據上海和會之決定，本一致反對消極無抵抗之政策，且主張積極政策，以不失領土不辱國權爲方針。余經兩星期之考慮，以爲貫徹和會之政策，則對日絕交之事，實爲必要而不可免之方法，蓋必先有此者，而後引起國際間之重視，使華盛頓條約九國或凱洛非戰公約諸國不能不召開會議，而此項會議，或能於東三省問題得一公正而妥善之解決也。」見「一周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九卷第六期，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③自從陳友仁因外交政策辭職後，黃漢樞、李文苑、葉恭綽、馬超俊、陳羣及傅秉常等亦相繼辭職。詳見「一周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九卷第六期，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④中國的東北一向爲日本人劃爲勢力範圍。一九三一年七月，日本人在吉林萬寶山挑唆朝鮮人與中國農民

衝突。事後更提出「萬寶山事件」之賠償要求。在這事件的交涉期間，日軍更於九月十八日傍晚攻佔瀋陽。其時中國軍隊在張學良命令下不與抵抗，並撤出東北。日軍遂得以順利佔領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九一八事件後，引起中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在上海的抗日救國運動更是積極。日本在國聯會議未能迫使中國承認東北的事實，乃希望在其他地區找藉口製造事端，以圖重演九一八事件。其時正藉上海抗日情緒高昂，乃希望借上海事件迫使中國承認東三省的事實。見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及「革命文獻」，第三十三輯；並參看陳克華：「中國現代革命史」，香港，春風雜誌社，一九六三年，下冊，頁一至十一。

⑤一二八事變後，日本軍艦泊於南京下關者增至七艘。國民政府鑒於南京受日本軍艦威脅，恐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乃決定遷都洛陽。除何應欽留守南京、羅文幹負責外交之外，其餘重要人員均在一月卅日晚北上赴洛主持一切。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國府通電全國遷都洛陽，時汪精衛代孫科出掌行政院。詳情參閱竟遲：「政府遷洛誓與暴日決鬥」，「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七期，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二日。

⑥上海自九一八事件以來，中日雙方關係異常緊張。一九三二年一月廿一日，日本領事就日本僧人在寶山路被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緝兇、道歉、賠償及取締抗日行動，解散抗日救國各團體。一月廿五日下午，日領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從前所提出之取締反日團體事項，務於四十八小時內予以圓滿答覆，否則日本海軍將自由行動。一月廿七日上海市長吳鐵城在日方壓力下下令取消一切抗日團體。當晚八時，日司令鹽澤向吳鐵城再送最後通牒，限於廿八日下午六時以前將對日要求之切實答覆送到日領事館。吳鐵城於廿八日下午一時五十分答覆日本領事，表示完全接受日方四項要求。



當時日本領事亦表示滿意，於下午四時通知各國領事日本將取消對中國之軍事行動；而一般商民亦以為從此可以避免戰爭爆發。怎料在廿八日下午十一時卅分（按：陳公博謂廿八日早上三時是時間上的錯誤。）日軍分七路由虹口租界攻入華界；時華界之十九路軍已奉命退駐淞滬鐵路線以西一帶，故日軍如入無人之境，輕易進佔天通庵車站及北站，並企圖攻佔閘北。十九路軍七十八旅展開反攻，將日軍擊退，遂揭開了一二八上海之戰的序幕。見「海上血戰記」，「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七期，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二日；「滬戰詳情」，同上，第九卷第八期，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九日；竟遲：「日軍擴大滬戰」，同上，第九卷第九期，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愛華：「淞滬血戰初集」，香港，聚珍印務書樓，一九三三年。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香港，宇宙出版社，一九六九年，頁廿三至六十四；Paul O. Elmqvist, 'The Sino-Japanese undeclared war of 1932 at Shanghai', *Papers On China*, 5: 39—74 (1951); William Crane Johnstone, Jr., *The Shanghai Probl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 268—291.

⑦中國國民黨四屆二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在洛陽西宮東北園召開。大會主席為汪精衛，出席中委共八十人。會議討論內容主要是檢討滬戰的形勢及討論國民政府的內部改革。詳見「一周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九期及第十期，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及三月十四日。

⑧對於蔣介石不願戰，有意讓十九路軍孤軍作戰的傳說，在上海一二八之戰時十分流行。據「十九路軍興亡史」作者丘國珍憶述，當時傳說謂：「中樞分爲兩派：一派主戰派，一派是反戰派。主戰派是西南各實力派所支持的中樞大員們，他們想乘戰局之擴大而奪取中央政權；反戰派是中央大員們，他們嫉忌十

九路軍的聲名過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聽任十九路軍孤軍奮鬥，諸事制肘，不調援軍。」見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頁七十八。並參看愛華：「淞滬血戰初集」，頁十七。在蔣介石與協同十九路軍抗日的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的通電中亦可發現蔣氏及張氏均極力消除這種傳說。如蔣氏致張治中電文，力促第五軍「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鬥」；而張治中亦覆電表示「願與十九路軍團結一致」，並謂「中傷者會造中央使十九路軍孤軍奮鬥，聽任犧牲之說。」見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頁七十九至八十。至於一般反蔣人士則相信這個傳說，如李宗仁認為「淞滬之役時，蔣氏雖令調張治中率第五軍愈濟時等部參加作戰；表面上是協同抗日，事實上則以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事範圍。」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福州人民政府與廣州『六一運動』」，「明報月刊」第一五七期，一九七九年一月，頁六十。另外，「反蔣運動史」亦謂淞滬之戰期間，蔣不應援，以至十九路軍後援不繼，退至第二防線。見「反蔣運動史」，頁六五四。有些說法却以為蔣氏派他的嫡系第五軍協同抗日已表示他已盡力支持十九路軍，但為免擴大與日本的衝突，不得不主張和平。見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91. 不過蔣介石是否積極十九路軍抗日，至今仍未有定論。

③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在上海簽訂的中日停戰協定條文如左：

「第一條：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週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戰鬥行爲。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

第二條：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此項地位，在本協定附件第一號內列明之。

第三條：日本軍隊應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一如中華民國廿一年一月廿八日事變以前之原狀；但鑒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點。此項地點，在本協定附件第二號內列明之。

第四條：爲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爲委員，該委員並協助佈置撤退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書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該委員會之組織及其辦事節序在本協定附件第三號內訂明之。

第五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本協定用中口英三國文字繕成，如意義上發生疑問時，或中口英三文間，發生不同意義時，應以英文本爲準。〔據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頁六十三至四引。）

## 第十三章 長城古北口之戰

民國二十二年新年的某一夜，我正在上海的意大利公使館食夜飯，人數只不過十來個人，夜飯剛完，齊亞諾公使接到一個消息，臉上顯著不愉快。他拉着我到了他的書房，說日本軍隊已佔據山海關了，這消息是山海關意軍拍電到上海意國兵艦報告的。我立刻離開公使館，當夜即回南京，而南京的情形，立刻浮現着緊張空氣，可是大家猶是等着，看看張漢卿的態度，因為沒有得張漢卿同意之前，南京是不好動兵的。<sup>①</sup>

從北平傳來的消息，張漢卿到底肯動員，萬福麟也立下了遺囑，督師向灤河出發了。不到兩星期，萬先生沒有到前線，便已退回來。至於灤州方面後撤的抵抗部隊，步兵倒變了騎兵，他們去時是走路，回來擄了老百姓不少的騾馬當坐騎。

汪先生這時又忍不住，一聽山海關失守的消息，又從歐洲跳回來。<sup>②</sup>原本汪先生在去年的夏天，因為張漢卿不肯動兵出關救熱河，憤而通電辭職，到歐洲養病。那時我恰有事赴上海，臨行知道汪先生要北上

，和張漢卿商議出兵援湯玉麟，曾通知羅鈞任，如果汪先生要飛北，請他通知我，以便同行。誰知疏忽大意的羅先生，他竟直和汪先生與宋子文一聲不响的飛北平，絕不給我一個電報。汪先生是到了北平，而張漢卿只和汪先生見過一次面。大概張漢卿或者是託大，或者是難於答覆，總推着病不接頭。他若裝病不出門也罷了，而他夜裡偏和宋子文划船遊北海。汪先生這一氣非同小可，此來專為商議軍事，而結果落得一個無聊。他知道張漢卿已是沒有希望，匆匆回到南京，遂通電辭職。這次山海關又失，他老人家再也忍不住，又匆匆由歐洲回中國。

張漢卿這次退兵，雖然兵敗而將不亡，他再也不好意思留在北平，於是通電下野，準備出洋到外國。臨行之時，把河北的主席王樹常免了職，換了非東北籍的于學忠，把察哈爾的主席劉一飛免了職，換了非東北軍的宋哲元，他的意思是表示大公無我之心，順便企圖為收拾人心之計。③部署定了，一直至上海預備出洋，並且捱了一個多月非人的痛苦，請了美國的米勒醫生，把嗎啡針癮，硬行戒斷。

汪先生這次歸來，很使我耽心，他主持了一個淞滬協定，④已給人家批評不少，這次回來，準又再訂一個什麼的協定。因為汪先生雖然離國幾個月，行政院長還是虛懸，他雖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真除，蔣先生只是不答應。我又怎樣能夠幫助汪先生呢？只能聽其自然罷。

蔣先生之虛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許因為汪蔣合作的關係，⑤也許蔣先生要對日緩和，不願意自己嫡系的人物首當其衝。當汪先生離國的前後，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子文也很高興，準備登台，對於行政院的副院長，自然子文非預先找替身不可。一夜我在羅鈞任家裡喝酒，忽然子文到了南京，用電話找到我的家裡，又追蹤我到羅鈞任的家裡。我和鈞任倒喝得有七八分醉意，踉蹌走到鷄鳴寺的山頂子

文家中，子文拉我出陽台，他說：

「公博，你看什麼人最適宜當副院長？」

「最好是黃季寬。」我極力推荐。

「黃季寬怎麼行？他不能代表汪先生。」子文質問我。

「季寬近來得了蔣先生的信任，而且汪先生也有許多事和他商量。」我還推荐着。

「可不可以再想想？」子文追着問。

「我的意思，第一是黃季寬，第二是黃季寬，第三也是黃季寬，若要找第四人，那是顧孟餘了。」我依然堅持我的意見。

「黃季寬不必提了，孟餘也未必肯幹，他也似乎不適宜幹。」子文說罷便默然。

第二天早上子文趕至牯嶺和蔣先生商量，他們談什麼話，自非局外人所得而知，但他出來之後，對澳洲的朋友端納說：「什麼都完了 All is finished。」完的是什麼呢？自然蔣先生不答應子文當行政院長，終汪先生的出國期間，行政院還是由子文代理，顯然的等着汪先生回來，對日緩衝，這樣汪先生回國，那有不再幹行政院之理？

汪先生回國，我們照例是到上海歡迎的。我到碼頭稍爲遲一點，汪先生已換了小輪從別處登岸。他留下汪夫人等我，一直把我送到賈爾業愛路另一所地方。我到達之時，汪先生和孟餘均已在座。汪先生首先提出行政院問題，說他準備辭去不幹，聰明的顧孟餘也跟着汪先生說行政院不能再做，汪夫人更聲色俱厲的闡明行政院不能幹的理由，我只保持着緘默，一聲不响。

「公博，你的意見怎麼樣？」汪先生忍不住。

我不覺笑起來了：「汪先生的理由很充足，汪夫人和孟餘先生的陳義也很高，可是據我看來，太不切於實際。你想汪先生出國幾個月，行政院始終沒有換人，顯然的蔣先生不願他人幹，至於什麼理由，我姑且不去分析。這樣汪先生出國，行政院還不換人，那有今日汪先生歸國，行政院倒去換人之理？而且汪先生這次歸來，豈不是爲着山海關丟了，所以急急又來共赴國難嗎？赴國難是要負責任的，今日回國，而不負責，對外又將何辭解釋？自然誰幹行政院都倒霉，而且一個內閣的最大作用是軍事、外交和財政，今日軍事汪先生是不能過問的，蔣先生的外交情報又多不到外交部的，財政更由子文一手把持，連問都不許的；這樣的行政院，又那能再幹？可是不能是一件事，不能不幹又是一件事。這是我的意見。」

「你這樣愛幹，你自己就幹去。」汪夫人大聲的似斥責。

「如果汪先生到南京提出我當行政院，而又通過的話，我不幹是忘八。」我反抗着。

「你不用吵了。」汪先生對汪夫人抑制着，「公博的話未嘗無理由。」

這個談話便結束，汪先生回到南京之後，重新又幹行政院。我一天碰見汪夫人，和她開頑笑：

「你不是拚命反對的嗎？怎麼你又不作聲呢？」

汪夫人只愕然一下，再不答話。我心裡想，原來汪夫人那天的造作是哄我的，我爲什麼不學孟餘，也贊成汪先生辭職，他自己幹不幹，我樂得一點都不負說話的責任。

張漢卿下野之後，早離了北平，蔣先生親自北上，到了保定，中央軍調了四師人至長城各口，並已經命軍政部長何敬之兼了北平軍事分會的代主席。長城各口戰事正緊，汪先生便叫我北上勞軍。我歡迎汪先

生時，到了上海，那時情形，恰像上海戰爭時的平津，地方依然七邑無驚，人民依然安居樂業，一切戲院、電影院、飯館、跳舞場，還是紙醉金迷，肩摩輻湊，我嘆了一口氣，中國就是那樣一個國家。我的火車過黃河，雪正飄飄打滿了車窗，我一時感觸，胡謔了兩首詩：

「去年海上角聲哀，今又征聲動地來。還是江南風景好，梅花依舊及時開。」

「風雪蕭蕭寐不成，每逢危難賦長征；黃河渡口冰初結，關外遙知已鑿兵。」

我剛到北平，何敬之已使人催我見面，我食了一頓早餐，敬之已有三次電話來。迨我到居仁堂時，敬之和季寬已在座，季寬雖然是內政部長，他是一個軍人，那時已奉蔣先生的命令，勸助北方的軍事。

「公博先生，你來得很好。今天請你替我們做一件事。」敬之央求的說。

「什麼？」我有些愕然。

「各路軍隊都敗下來了，打敗仗不要緊，他們已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宋哲元的軍隊已撤過了長辛店。這樣實在太丟人，所以我想你今天說幾句話。」敬之說。

「你的命令還不聽，難道他們聽我說話嗎？」我還不明白。

「不是這樣說。我要你對他們說，中央已有辦法，不要他們作無謂的犧牲，這樣他們的心安便穩住了，不至於大家忘命的逃跑。」原來敬之要我做的是另一件事。

「我是奉命勞軍，只能說激厲將士的說話，我那能空口提出了無根據的和平？」我實在不願撒謊。

「事到今日，也不能不勞煩你了。敬之顯然進退維谷。」

「這樣我要砍頭的。」我還推辭着。



「如果中央責備你，要砍頭大家一起砍罷。」敬之和季寬齊口合聲敦促我。

這真出了我意料之外了，爲要穩住軍隊，我只好担下血海的關係。那時我想打個電報給汪先生也不行，因爲何敬之拖住我食午餐，一點鐘各將領便來，我真是分身不出。午餐剛完，各將領都頂盔貫甲的齊到，他們還嚷着前敵怎樣的勝利，他們的軍隊都在紮硬寨打死仗。

「今天請諸位來，沒有別事，只因爲陳部長奉命北上勞軍，並帶了中央的旨意來宣示，請陳部長給我們說幾句話。」何敬之說了幾句開頭語，登時滿座浮現出嚴重的氣氛，一切的眼睛都注視着我，滿充了疑駭的目光。

「兄弟今天奉了中央之命來慰勞各位，諸位同志都勞苦功高，中央非常之掛念。自然今日軍事很緊張，前方將士浴血苦鬥，奮不顧身，這不獨中央欣慰，全國的人民也屬望於諸位深且切。不過中央還有一個意思，即是我們以血肉之軀而與鋼鐵相拼，中央也不會叫諸位作無謂的犧牲，最近期間中央當另行想出一個適當辦法，使各位不至於終久困苦的。」我那時已變了一部機器，專靠着何敬之在那裡轉擊。

我那番說話真是不得已的，並且也是言不由衷的，但爲穩定軍心，我又有何法可想？我說了這番話後，萬福麟先生首先眉心起了笑容，其餘一切人等都露了愉快的顏色，大家雖還在矜持，禁不住鬆了一口氣。

這樣混了兩個鐘頭，我真坐立不安，回至旅館之後，立刻給汪先生一個電報。何敬之夜裡又催我回南京，說這邊真相，非簡電所能詳，要我親自回京報告，請中央急行設法。至於北平呢，何敬之打算留下一師中央軍死守，萬不得已時，與城共存亡，並且打算埋下炸藥和煤油，待日軍進城時，首先從紮禁城焚起。

我看那時真不能打了，軍事我不懂，前方我也沒有去過，只有三件事，我覺得很滑稽；其一，北平夜

問每夜宣布戒嚴，把人力車、汽車截在街上過夜，而日本的軍官倒坐了電單車，到處橫衝直撞。因為北平戒嚴，照例要對於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送通行證的，中日沒有絕交，日本也有公使館，我們還得送通行證，因此日本軍官可以在戒嚴時期，通行無阻。我們想想，我們爲什麼戒嚴，當然是對付日軍，今戒嚴戒不到日本軍官，而單戒了本國的人民，這次仗從那裡打起？其二，我們軍隊源源由北寧路輸送，而北寧路照例要經過塘沽。爲着辛丑條約的關係，塘沽就有日軍駐紮，日本的憲兵，每天站在車站，拿着一本日記冊，對於我們的軍隊往來運輸，人數若干，番號什麼，軍器多少，一一抄下。大凡用兵，最要緊是使敵人不知自己的虛實，現在軍隊輸送，一一要經過敵人的眼睛，這次仗又從那裡打起？其三，最滑稽的，于學忠恐日軍迫近天津，在天津四週做了防禦工事，日本軍官聽見，一定要參觀，屢次要求，拒却不得，于學忠只得派了幾個參謀陪他們去看濠溝。唉！這樣滑稽，這次仗又從那裡打起？我回至南京對汪先生陳述之後，我貢獻一個結論，即是，要打得要大規模的打，正式的打，這種零碎的仗，非正式的仗，不要再打了。⑥

蔣先生得前方的情報，當然比我們更清楚，中央軍雖勇，敵不住日本的大炮和飛機。長城各口在張漢卿手中，本無工事可言，中央軍隊到了之後，草草做些工事，大炮一來，全給毀壞了。還有最痛心的事，前方將士還沒有看見日軍的影子，便先作了犧牲品。因爲我們的炮火射程沒有日軍的那麼遠，縱有少數大炮，數量也比不上日軍那麼多。這次戰爭，實在說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準備，軍事既難解決，還是走外交的途徑罷。

南京討論了一回，打算成立一個北方政務委員會，以便和日軍折衝，人選問題，着重在黃季寬，因爲季寬早已在北方，而且以內政部長兼政務委員會的委員長，也似乎合理。商量停妥，汪先生遂提出於中政

會，但我到會之時，使我吃一驚，政委會的條例依舊，而入選已換了黃膺白。那又變卦了！恰好汪先生坐在我前一行，我寫張條子給汪先生，問何以人選變了，汪先生在那張小紙批了幾個字：「改提黃膺白完全出蔣先生之意。」中政會許多人看見黃膺白三個字，一時鬧起來，首先站起來的是羅家倫，他不好反對黃膺白，只說北平無設立政委會之必要。跟着羅家倫說話的又有幾個人，當時局面，真是僵化。汪先生從前行又遞過一張條子，說：「兄剛從北回，請多說幾句話。」我爲着緩和這個僵局，並解救汪先生的困難，不得不站起來解釋。我也不好護持着黃膺白，因爲我那時根本就和他沒有見過面，只申述許多理由，北方政務委員會有成立的必要。經過我這番解釋，這個提案算是通過，其實我就不解釋，這個案還是要通過的，黃膺白之提出，誰不知是蔣先生的意思，不過大家要使黃膺白難堪，特意搗這麼一個小蛋。

黃膺白被任爲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之後，⑦逗留在上海，遲遲不行，前方軍事又那樣緊急，日軍越過灤河，長城各口相繼陷落，我們真是急極。⑧後來我們打聽，才知道膺白先生正在和日方的宮內大臣接頭，因還沒有回話，所以在上海老等。

遲之又久，膺白才北上，東京的宮內大臣是否有回話，而回話的內容又是怎樣，我們一點都不知道。膺白經過天津，在車站上還吃人打一槍，幸而遇刺不中，他終於到北平就了北平政務委員長的職。

北平的東面已全爲日軍佔領，正陽門前的石路已掘起來，安設鐵軌，把東西兩車站聯絡起來，預備退兵。一直至到日軍望見了北平的煤山，望見了北平的燈火，日本公使館才打電話找黃膺白，商議所謂塘沽停戰協定，⑨不到一天已經簽好字，實際由黃膺白、何敬之、張岳軍、黃季寬四人負責。至於條件的內容是否電呈過蔣先生，我不得而知，但行政院則始終得不到隻字的報告，直至協定簽好字之後，才將全文用

電報打來。汪先生到底肯負責，一聲不响，把這協定責任，完全担在肩上，我後來問他，他只嘆口氣，說：「誰叫我當行政院長呢！」

塘沽協定簽字不久，又來一個何梅協定。⑩所謂何梅協定，就是何敬之和日本的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梅津的協定，這個協定，連外交部都沒有存案。這個協定的文字非常籠統，以後日本動不動說中國違反塘沽協定，所謂塘沽協定，把何梅協定也包含在內。在中國怕傷了睦誼，怕啓了弊端，對於日本動輒提出協定違背的無理取鬧，也始終沒有公開駁斥過，於是天下都起了懷疑，以為這個協定的背後，還有許多密約。北方戰事算已告一段落，然而後來種下了無數的禍根，汪先生也變為全國衆矢之的。

### 第十三章註釋

①日本以當時國民政府採「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乘蔣介石忙於在江西「剿共」，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舉兵佔領山海關。見陳克華：「中國現代革命史實一」，下冊，頁五；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六年，下冊，頁五三二。而當時駐在華北長城附近的東北軍仍由張學良指揮，因為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原設於瀋陽的東北政務委員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移設北平。同月二十五日，東北政務委員會（後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改稱北平政務委員會）改組，國民政府任命三十一名政務委員，而以張學良為首席委員。軍事方面，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北平綏靖主任，並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就職。後張學良又呈准設立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採理事會制，由張氏任理事長，其後張氏雖然辭去北平綏靖主任一職，却於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日代理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見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頁二二至二五。故此張學良對於山海關事件的態度甚為重要，詳見黃紹竑：「黃紹竑五十回憶」，頁二四三；H.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I, 66.

②汪精衛於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自上海携眷出國赴歐養病，見 Boorman, III, 373。又沈雲龍編，前引書，下冊，頁五〇六。但當他聽到日軍攻山海關的消息後，即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發表「日本侵華宣言」，並立刻自德返國，見同上書，下冊，頁五三二。汪氏於同年三月十七日返抵上海，二十日到南

京，並於三十日復職行政院院長，同上書，下冊，頁五三七至五三八。

③張學良所以通電下野，因為他在長城各口戰役領導失敗後，其部將湯玉麟於熱河一戰中更不戰而退，故感愧對國人而辭職。按：張氏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致電國民政府，引咎辭職，電文中謂：「……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於國家，無益於大局，應懇迅賜命令，准免各職，以示懲儆，一面迅派大員接替，用申國紀。……」見「革命文獻」，第三十八輯，頁二三三〇；李雲漢，前引書，頁二八。同月十日，國民政府准張學良離職，而張氏之部隊由于學忠、萬福麟、王以哲及何國柱分統，見沈雲龍編，前引書，下冊，頁五三七。並參閱 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n Arbor: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pp. 4-5. 及黃紹竑，前引書，頁二四三。

④當淞滬之戰爆發時（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衛正担任行政院長，見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載於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吳興記書報社，一九七四年，第四冊，頁一八六；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七八年，下冊，頁六二九；沈雲龍編，前引書，下冊，頁四七六。但因職務所在與環境特殊，於是負起淞滬協定（即上海停戰協定，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簽定）的責任，見沈雲龍，前引書，下冊，頁四八三；陳克華，前引書，下冊，頁二二；鄒魯：「回顧錄」，第二冊，頁三七八；吳頌皋：「十年來的中國外交」，載於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抗戰前十年之中國」，香港，龍門書店影印本，一九六五年，頁四三。而於同年五月二十日，汪精衛受到監察院彈劾，謂其未經立法院審議，違法批准中日上海停戰協定。見沈雲龍編，前引書，下冊，頁四八四。

⑥關於蔣汪再度合作的內容，詳見本書第十二、十三、十四章說明。並請參考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上冊，頁二一〇至二一一。至於蔣汪在杭州會議（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協定蔣氏專任「剿匪」，汪氏出掌行政院一事，見梁敬鎔：「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一一七；陳克華，前引書，下冊，頁十三；「反蔣運動史」，頁五五二至五五八；Lin Han-sheng, "A New Look At Chinese Nationalist 'Appeasers'", in A.D. Cook & H. Conroy (eds.), *China and Japan: A Search for Balance Since World War I* (Santa Barbara & Oxford: ABC—Clio Inc., 1978), p. 226. 但在此期間（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蔣汪間亦並非沒有歧見，汪氏更稱常常受到制肘，見Boorman III, 373。其後汪精衛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六日發表意見謂張學良對日不抵抗，且向中央要素巨款，遂請辭行政院長職，並電勸張學良同引退，以謝國人，見沈雲龍編，前引書，下冊，頁四九四；李雲漢，前引書，頁二四。嗣後於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決議以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汪氏仍保留行政院長名義，同上書，頁四九七。是後汪氏稱病出國，直至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始回國復職。

⑦汪精衛的和戰態度，據陳公博指出從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以至一九三三年長城古北口之役仍是主戰的，只是在古北口之役後，察覺到中國之軍力實不堪與日本一戰，乃有主和的傾向，見「八年來的回憶」，頁一八六。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玉法亦引錄上述資料，認為汪氏當時是主戰的，見張玉法，前引書，下冊，頁六二九。至汪精衛從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至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期間內的主戰言論可見於「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參考是書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日、八月六日，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四月十四日等條，而於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汪氏則論及抵抗與交

涉並行之原則，見沈雲龍編，前引書，頁五四二。

⑦黃郛（字膺白）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就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長」一職，而黃紹竑、李煜瀛、張繼、韓復榘、于學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羣、王揖唐、丁樹翰、傅作義、周作民、恩克巴圖、蔣夢麟、張志潭、王克敏、張伯苓、劉哲、張厲生、湯爾和、丁文江、魯蕩平等為委員，見上書，頁五四三；沈亦雲：「亦雲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下冊，頁四五二；李雲漢，前引書，頁三十；Boorman, II, 191.

⑧黃郛是於五月十四日從上海動身，十五日到達南京，十七日中午過天津，十七日下午才抵達北平，見沈雲龍編，前引書，頁五五〇至五五二；吳頌皋，前引文，頁四六。

⑨塘沽協定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簽定，全文可見於「革命文獻」第三十八輯，頁二二二至二二三三；沈雲龍編，前引書，下冊，頁五六九；沈亦雲，前引書，下冊，頁四六八。關於黃郛與此協定之關係，請參考本書第十五章註釋⑬。關於汪精衛與塘沽協定之關係，有一種史料指出汪、蔣及孫科等人曾於五月二十八日在廬山舉行會議，並核准簽定「塘沽協定」，故陳氏稱汪精衛對此絕不知情一事，尚有待商榷。見 Lin Han-sheng, p.228.

⑩關於「何梅協定」一事的來龍去脈甚為複雜。何應欽本人亦矢口否認有此協定存在，據何氏的記載，謂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在華製造了「河北事件」（包括暗殺親日報人胡恩溥及白逾桓，和孫永勤之「義勇軍」與日軍之衝突等），引起了一連串日本對華的強烈要求和脅迫，至六月九日何氏與日方酒井隆及高橋坦會談，日方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在河北的黨政機關，撤退駐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及撤換



日方指定的軍政人員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動等。何應欽於種種壓力下遂於七月六日給日方一項通知，其全文如下：「逕啓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閣下。何應欽。」但何氏却謂是項通知，既未由其簽字，亦未蓋章，又無「約定」和「附帶事項」等字樣，故此「何梅協定」絕無其事。惟在同一文中何應欽引錄了蔣介石辯稱絕無「何梅協定」一事說：「我（即蔣介石）可以對各位說：絕對沒有這個『何梅協定』。這件事怎樣講起來的呢？就是日本向何部長提出要求中國撤退河北境內的中央軍隊，並撤銷所有平、津、冀、察黨部和特務機關；何部長回一封極簡單的信答覆他說：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們中國已經自動辦好了。信中只說幾句話而已；但是，他（日方）拿了這封信就無中生有，張大其詞，說是成立了什麼『何梅協定』。」以上詳見何應欽：「河北事件中絕無所謂『何梅協定』」，見「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六期，一九七七年，頁一一九至一二二。故此，有否「何梅協定」已不成問題，因為其結果還是相同的。另參考李雲漢，前引書，頁六八至七九；梁敬鎔：「所謂『何梅協定』」，「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五期，一九六七年，頁六至二十；梁敬鎔：「日人岡田有關『何梅協定』的一封信」，「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一期，一九六八年，頁十九至二十。黃郛亦指出：「即世所傳之『何（應欽）、梅（津）協定』，實則僅口頭應允，並無文字紀錄。」見沈雲龍編，前引書，下冊，頁八七九。

## 第十四章 福建人民政府

福建的人民政府，雖然還沒有後來陳伯南先生失敗快得那樣滑稽，但也夠使人駭愕和可笑。由他們起事時始，以至失敗時止，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主張，他們有什麼把握，又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失敗那樣快。

福建人民政府的主要人物，自然是我的老朋友陳真如，<sup>①</sup>但真如原本是擁蔣最力的，忽一變而為反蔣，這其間原因很複雜，有些關係主觀的，又有些關係客觀的。真如的個性，志大而才疏，好高而騫遠，他原是一個好好的軍人，但因為志大才疏，以為天下事不足平，中國的政治非他出來治理沒有辦法。因為好高騫遠，於是許多共產黨和第三黨失敗下來的人物，一時麤集其門，時時拿理論去煽動他，拿領袖去引誘他，於是真如很想取蔣而代之，甚至乎以為國民黨的政綱和政策還不夠。

至於客觀方面，蔣先生有許多事實，使真如感覺不安。在蔣先生眼中，真如是一個有力和有識的軍人，真如在廣東還當師長時，蔣先生就有許多事託他主辦。他趕許汝為，事前和他商量。招致唐孟瀟加入國民革命軍，派他當代表。囚胡展堂，使他安定廣東。而真如呢，的確也替蔣先生賣盡許多氣力，寧漢分裂

，真如寧可放棄了他的軍隊，也不贊成武漢而走南京。②張桂軍圍攻廣州之役，完全靠他十九路軍之力，才反敗爲勝。蔣先生在擴大會議之時，真是精疲力盡，也全憑十九路軍恢復濟南，才重安北方之局。③似這樣大家推心置腹，不應該兇終隙末了。可是在寧粵復合之後，真如以調人之功，頗有舉足輕重之勢。京滬衛戍歸十九路軍了，陳真如並且當了行政院副院長而兼交通部長了，而且行政院各部的部長，佈滿真如左右的人，除了陳孚木做交通次長外，實業部的次長許錫清，教育部的次長段錫明，內政部的次長羅貢華，甚至乎國民政府的參軍長呂超，上海市的社會局長麥朝樞，都和真如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這樣情形，真合着古語所謂勢傾朝野，自然非蔣先生和他左右所能忍受的。

自十九路軍抗戰之後，蔣光鼐和蔡廷鍇更成了民族英雄，海內外耳有聽，聽十九路，目有視，視十九路。④各人只知有十九路軍，而不知有黃埔，只贊揚陳真如，而不贊揚蔣先生。因此連參加滬戰第五路的張治中的黃埔軍隊也被埋沒了功勳，還有許多不滿意於蔣先生的人們，專在那裡作幼稚宣傳，說蔣先生本來就不抗日的，說蔣先生始終不肯以實力援助十九路，後來並且說十九路之失敗，完全爲蔣先生所阻撓，這一下更非蔣先生所能忍受了。

滬戰停止之後，蔣先生會和蔡廷鍇談過一次話，暗示蔡廷鍇要脫離陳真如，蔣先生這個手法不獨使真如感受徬徨，整個十九路也起了恐怖。兼之蔣先生的嫡系部隊，逐漸向南京附近集中，這或者爲拱衛首都，或者爲便於訓練，但軍人的感覺究竟和文人不同，十九路已不敢再衛戍京滬，亟謀脫離京滬範圍，極力運動往福建屯駐。

在十九路軍正醞釀離滬前後，我在上海會和真如見過面，勸他不要作奇想，他說：「你怎麼知道，現

在包圍於十九路左右的已有六師人，只在一夜間，便會全部被解決了。」

「十九路軍是有功於國家的，蔣先生敢冒這大不韙嗎？」我表示不相信。

「蔣先生什麼做不到？」真如表示對蔣極端的不信任。

我知道這時真如已爲利害和環境所困，我的話再聽不進去了，末後我又和他開頑笑：

「我們反蔣，你還幫他打我們，現在你又要反蔣了，當心你還像以前的一般人被蔣先生各個擊破。」雖然我知道真如有異志，我還是留着他所推薦的許錫清先生在實業部，他雖然提出兩次辭職，我還是苦留他，終於一天，他不肯再留了。

「你爲什麼一定要走？」我問許先生。

「大概他們快動手了。」許先生也很坦白。

「他們真要動手，你辭職還不遲。」我勸他。

「那時恐怕走不脫。」許先生表示着堅決。

「你們打算用什麼名義動手？」我又追問。

「這個我還不知道。」許先生真是不知道的。

「算了罷。」我替許先生分析！「現在動手，無疑的一定失敗。如果不成立政府，必師出無名，要成立政府罷，有兩個不可能。第一，政府是有綱領的，我敢担保，真如提不出什麼綱領。第二，福建單獨必不能成功，其勢非聯絡兩廣不可。廣西是不敢發動的，如果陳伯南不答應，廣西是不敢發動的，但陳伯南現在那樣舒服，肯冒險麼？他不滿意胡展堂，便捧出中央，不滿意中央，又拿出胡展堂，他爲什麼要組

織政府，再戴上一頂大帽子。

「你們如果請我做參謀長的話，快不要說反蔣。現在明明白白擺出一條好路，你們連合閩粵桂三省的兵力，其戰鬥力實不可侮。倘若三省，齊向江西共產黨進剿，共黨一定崩潰，這樣你們一有剿共之功，<sup>⑥</sup>二得天下之望，至時大可向中央擺出改革政治方案，何必要反蔣呢？」

許先生只笑了笑，因為他知道拿這種書生之見以勸真如是沒有用的，而且或者他自己根本不敢說。許先生辭了實業部次長不久，又被任為福建的財政廳長，我想福建或者一時沒有變故罷。

一夜十點鐘，汪先生忽然打個電話來，說要來我家坐，我情知有大事，但還想不到真如居然到福建。

「福建已動手，你知道嗎？」汪先生坐下便說。

「我還不知道，他們怎樣幹？」我問。

「情報還不清楚，只知道他們已動手，今早他們已開人民代表大會，把中華民國改了中華共和國，並且成立人民政府，把國旗也改換了。」汪先生告訴我大概消息。

「他們一定失敗的。」我立刻判斷。

「我們走不走呢？」汪先生問我，因為我們初進南京，即立誓不贊成再有內戰，蔣先生再發動內戰，我們決定辭職。

「我以爲我們不必走。因爲這次他們幹法，與擴大會議和非常會議不同。他們改國號，改國旗，我們在南京固然反對，不在南京也應當反對，甚至乎我們逃亡海外，也得反對。既然都是反對，我們何必走！」我分析着。

發動，這一點實在陷真如於兩難論，無從解釋。第四，真如首先和共產黨妥洽，這或者是第三黨的政策，那時江西的共黨雖然還是聲勢煊赫，然經過經濟的封鎖，食鹽和布料發生極大的恐慌，真如首先送了許多鹽和布與共產軍，但趕到福州人民政府發難之時，共產黨動也不動，使十九路軍獨蒙軍事的失敗。⑥第五，也許是歷史關係罷，十九路的前身是第四軍的第十一師，而第四軍的前身是鄧仲元、鄧鏗的第一師，它和國民黨有深長的歷史，一切將領都受過國民黨的洗禮，現在不要黨，還要換旗，使一般將領都懷疑，都反對，因此不旋踵便烟消雲散，只便宜了蔣先生多得了一省，而十九路在滬抗戰的英名，至此僅留下了一個陳迹，而軍隊則根本消滅了。

二十三年春天，我往南洋視察實業，路經香港，真如託了一個朋友來見我，問我願不願意和他會面，政治是另一問題，而交情猶在，怎麼不可以會見？一夜我們又回復舊時的生活，啣着烟捲，東拉西扯談天。

「你爲什麼這樣冒失，幹下了這樣荒唐的事？」我對真如是不客氣的。

「還談什麼？自然我失敗了，你批評我冒失。倘若我成功了，你又會稱讚我聰明。」真如勉強着解嘲。

「我不是批評你失敗，人家失敗還打三兩仗，惟有你失敗，連一槍也不響，這又何說？」我真替他抱不平。

「那是高佬蔡要負責任，我幾次和他商量集中軍隊，他總說老蔣的軍隊沒有那麼快來。我到福建之時，會要他召集軍事會議，他也說不用，他個人就可以代表十九路全軍，要問大家，倒不如問他一個人。唉，已失敗了，還更有何說！」真如那時十分的沮喪。

一個冒失的陳真如，加上一個粗率的蔡賢初，又加上一個荒唐的黃琪翔，那福建還有不失敗的嗎？更那有失敗不快的嗎？我也再沒有話可說，自此真如已另起爐灶！組織他的社會民主黨，又組織一個革命大同盟，直至八一三上海第二次抗戰，蔡賢初首先到南京，陳真如和蔣景然跟着也來聚合，<sup>⑦</sup>我勸他取消了他們的組織，反正他們的組織也不過那樣一回事。以後我出使歐洲，回國之後，在漢口差不多每日和真如見面，他也不談軍事，也不談政治，只埋首學做詩，發發牢騷，寄寄清興，我對於福建人民政府的事也隻字不提了。

## 第十四章註釋

①陳銘樞發動閩變的原因很多，總的來說可分爲兩項。第一，是陳銘樞的個人政治野心；第二，是他對蔣介石的不滿。自從一九二八年被委任爲廣東省主席後，陳銘樞即成爲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廣東省主席任內，陳致力發展「神州國光社」，並出版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其後在江西任剿匪總司令時更與A B團（A B是 Anti-Bolshevik 的簡寫，即「反布爾什維克」。）王禮錫等往來，並委任王氏爲「神州國光社」主編。在王禮錫的領導下，「神州國光社」在上海出版的「文化雜誌」及「文化評論」十分暢銷，一時吸引很多不滿國民黨的人士。在一九三一年陳銘樞在上海任京滬衛戍司令時更秘密組織社會民主黨，與第三黨及改組派等頗有聯系，這些都成了後來福州人民政府的中堅份子。上海一二八事件以後，陳銘樞更因十九路軍的抗日功績，聲名大噪，風雲一時。所以於一九三一年間，陳氏已有足夠本錢獨當一面。而他與蔣介石之間的衝突，更助長他另樹革命旗幟的決心。早在一九二九年蔣氏提升他屬下的陳濟棠執掌廣州軍事時，即已令到陳銘樞不滿，但由於他更不滿陳濟棠，所以在寧粵對立時，始終站在南京方面。及至一二八上海戰役時，陳銘樞轄下的十九路軍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更爲尖銳。由於十九路軍認爲蔣氏無心抗日，存心使他們孤軍作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滅他們，所以在戰後發表「告全國書」，痛陳政府沒有全力支持抗日。蔣介石亦因十九路軍聲名過噪，大有功高震主之勢；乃力圖磨滅十九路軍對人民的號召。在滬戰停止後，立刻調派十九路軍入閩「剿匪」。其目的頗令十九路軍懷疑。有傳說認爲蔣氏希望借「剿匪」把十九路軍漸漸消滅。李宗仁更認爲這是蔣氏的陰謀，把原爲粵軍的十九路軍調到福



建，希望使他們與廣東的陳濟棠火併。陳銘樞與蔣介石的衝突在一九三二年愈見明顯。是年，任實業部長的陳銘樞因屬下貪污事件牽連，不得不向蔣氏辭職。蔣氏竟毫不挽留，批准辭職。陳氏一怒之下，悄然出洋，浪跡香港及法國；憤慨之餘，乃決心以十九路軍作爲後盾，在福建發動政變。Eastman, pp. 87-93; 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頁二〇至一二二；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香港，中文圖書供應社，一九七四—五年，第二冊，頁五九八至六〇〇；「反蔣運動史」，頁六五四至六五六；「李宗仁回憶錄」：「福州人民政府與廣州『六一運動』」，「明報月刊」，第一五七期，一九七九年一月，頁六〇。

② 見本書第五章註②；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頁六。

③ 有關擴大會議時的形勢請參閱第十章。是時十九路軍仍未正式成立；只有蔣光鼐擁有六十一師及蔡廷鍇有六十師。蔣介石爲防止南方的粵桂軍與北方的閻馮會師南京，乃急調蔣光鼐的六十一師、蔡廷鍇的六十師及陳濟棠屬下李揚敬之六十三師分由梧州出發，集中韶關，經湖南，追擊粵桂軍，牽制其北上。在衡陽洪橋一役中，十九路軍大挫李宗仁部，迫使其退回桂林。衡陽之役後，十九路軍即被調赴山東，協助津浦路之戰。據丘國珍憶述，當十九路軍抵濟南時，閻錫山在山東的主力部隊均集中泰安以南，汶水之線。留在濟南的部隊只有他的高級指揮機關及後勤部隊；十九路軍因而可以輕易攻克濟南。見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頁九至十三。濟南的失守，影響整個中原大戰至大。而其中最大的影響不在於濟南失守本身令馮閻軍有何重大損失，而在於濟南的失守，爲蔣軍平定了津浦路之役的形勢，並加速蔣介石與張學良的合作。由於張學良的介入，致令本已相持不下的戰局大爲逆轉，蔣介石得以轉危爲安。

見「反蔣運動史」，頁二二九至二三二及本書第十章註⑫⑬⑭。

④一二八淞滬之戰後，十九路軍成爲中國人民心目中抗日的象徵；蔣光鼐、蔡廷鍇成爲民族英雄。見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頁七七至七八；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頁五九九；Eastman, pp.91-92;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明報月刊」，第一五七期，一九七九年一月，頁六十。

⑤陳銘樞發動閩變時正當國民黨軍隊對江西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時期，一九三三年五月，國民政府與日軍簽訂塘沽協定，日軍暫時停止南侵，華北緊張局勢稍形和緩。蔣介石乘此機會，動用贛、粵、閩、湘、鄂五省兵力，對共區展開大包圍，以「步步爲營，建立碉堡，兵工築路，逐步推進」爲基本戰畧。蔣氏將各省部隊區分爲西、南、北三路軍，以何鍵爲西路軍總司令、陳濟棠爲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爲北路軍總司令。而十九路軍則爲東面福建省的屏障。西南兩路軍及十九路軍的責任均爲防堵，「剿共」主力爲北路軍。陳公博認爲陳銘樞應聯合閩、粵、桂三省的兵力以「進剿」江西共軍。此舉似乎並不可能。首先，陳銘樞與陳濟棠根本已不和，很難爲「剿共」而放棄前嫌。其次，蔣氏對「圍剿」共區早已有了一定戰畧，決不能容許粵、桂、閩三方面斷然行動。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頁五九四至五九八。

⑥陳銘樞與江西蘇區共軍接觸之說，在福州事變發生前已有傳聞。福州人民政府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成立後，南京方面更以福州人民政府與共黨勾結爲宣傳，以孤立他們。如蔣介石於十一月廿三日致蔣士電文中即謂陳銘樞「謀與共匪合作，信使不輟，最近互不侵犯之協約，已議定接濟匪區物資及軍事互助之辦法」。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頁六〇〇。另中央社南京十二月十四日亦發出電訊，列出「陳李在未叛前與共黨所訂密約條件大要」，其內容包括「閩方給匪費卅萬元」、「閩對匪糧及其他必需品

應予便利」及閩方「取消匪區封鎖，並予以物質接濟。」見「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十卷，第五十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至於福建方面會否給予共方物資援助則沒有實質資料印證。至於福州與共方的關係，詳見本章「說明」及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頁五九八至六二〇；William F. Dorrill, "The Fukien Rebellion and the CCP: A Case of Maoist Revisionism", *China Quarterly*, 37: 31—53 (1969); Eastman, pp. 120—127.

## 第十五、十六章說明

在第十五章裡面，陳公博以目擊證人及汪精衛親信的身份描述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那天汪氏被刺而大難不死的情況，並且試圖解釋這次事件的真相。在這個過程中，讀者更能體會到國民黨左派在黨爭中的困境及瞭解到汪氏在行政院裡每每受到制肘的實況。汪氏被刺的原因及經過和「汪蔣合作」期間黨內的各種問題，便成爲這一章的兩個主題。

### 汪精衛遇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南京黨部召開六中全會的日子。會後政要在大門前拍照留念。就在這個時候，汪氏被刺，身中兩槍，其一中左額，另外一槍中背近脊椎；經醫治後，左額一彈被取出，但是另外一彈却未能取出。在汪氏被刺現場中，情況混亂，議論紛紛，而陳公博當時亦甚爲衝動，似認爲行刺是蔣介石指使的。他說：「我那時非常之焦悶，也悲憤，那時我如果有一根手槍在身旁，也許打一個人。」但是當行刺事件過了一段時間後，陳氏自己的推理，却顯示到行刺的主謀是另有其人。

至於行刺的對象及主謀，當時有幾種分析。那時候有份量的報章，如「大公報」的評論等，認爲汪氏被刺可能是誤中副車。即是說行刺的目標似爲蔣氏而非汪氏。這一個說法和陳氏在本章中段的解釋有很多相同點，而這一個推理即是說行刺與蔣氏無關。兇手孫鳳鳴當場被汪氏近身侍衛桂述軒槍殺，故未能留活口。（註）但事後查出，主謀是賀坡光和他主持的農光通訊社。據陳氏所知，該社是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發動政變的福建人民政府有關係，而該次行動是反國民黨活動之一。要是汪、蔣不在場，他們也要打倒幾個中央委員。

綜上所述及根據現存資料中可以找到的線索，汪氏被刺是反國民黨的行動之一，目標似是以蔣爲主，而汪氏之中槍在行兇主謀方面看來，已算是達到某種目的。蔣氏主謀一說似說不通，倘若以後有其他珍貴資料面世，提供充份證據，又當別論。

#### 汪蔣合作（一九三三年——三六年）

當汪氏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悄然赴歐養病的時候，亦即是左派在黨內每况愈下的開端。陳氏始終認爲汪氏的行政院沒有實權，軍事、財政、外交大權都旁落。在這一章裡面，陳氏舉出很多例子去說明在軍事、財政、外交方面汪氏是如何受蔣氏及其親信宋、孔二氏所把持。至於汪氏以行政院長身份可以做到的事情，換句話說，他被制肘到甚麼程度，歷史家還需要更多的資料才能得到一個完滿的答案。但是蔣氏在「汪蔣合作」的形式下，肯定操縱了大權。

一九三〇年代中國政府的當前急務是對付日本的侵畧，所以主持外交的行政院當然是衆矢之的。而以行政院爲首去主張與日和談的政策是不受國人所接受的，尤其是當時反日的愛國民族主義正在掀起了一個高潮。在這方面說，主和是政府明定的政策，但是蔣氏的態度模稜兩可，使政界分爲和戰二派，而陳氏以爲蔣氏因此能夠置身度外，不致受到直接指責，矛頭遂指向汪氏。編者認爲陳氏的解釋畧嫌簡單。其實中國政府自從九一八事變以至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成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及簽訂「塘沽協定」（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何梅協定」（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等等，都節節讓步，使日本能夠蠶食東

北及「中立化」華北。國事真是一籌莫展。在這個期間，蔣、汪二人均希望運用有限度的讓步，再力滑的交涉，去滿足日本的需索，而同時又不致於辱國。九一八事變便是一個例子。陳氏在第十七章「學良的說話，揭露出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國府無意在東北打硬仗來抗拒關東軍的入侵。反之，蔣望日本佔領東北以後便以山海關爲界，不再入侵華北。就爲了日軍以後仍然蠶食華北，所以張氏在五年九月非常悲憤。他身在西北負起他不願意的重任（「西北剿總」副司令）去「剿共」，而自己却返回老家。當然，張氏所說的這一段話，尚待攷證；但是從這些蛛絲馬跡，亦可以見到國府當時的困從政治學的眼光來看，國府當時的政策可以算是運用「妥協政策」（Appeasement），希望能確保<sup>11</sup>」。國府實施這個政策的主因有二。第一是主和派認爲中國軍隊比日本的委實差得太遠，戰無可戰，<sup>12</sup>個假設在真正發生戰事時，究竟是否一定戰無可戰，當然是見仁見智。即是說，愛國抗日民族主義高產生的力量，和以國共合作爲原則而組織起統一抗日戰線的形勢等等，也是可戰之道。」第二是蔣氏「剿共」心切。自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圍剿」成功後，蔣氏更立心消滅共黨勢力，所以他便在西立了「西北剿匪大本營」，務求殲滅在延安的共黨巢穴。這就是著名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而西變便醞釀出來了。

### 兩廣事變（一九三六年）

汪精衛遇刺後以療傷名義而出國，胡漢民則在先一個月（一九三六年一月）從歐洲回國，但在同年便逝世。先是，在「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成立之後，胡漢民儼然是西南的領袖。胡氏逝世後，原在廣東有號召力的領袖如李濟琛、陳銘樞等因「閩變」的影響而無法擡頭，形成陳濟棠在廣東

位不斷提升。陳濟棠的野心日見顯露，加上誤信扶乩，終於發動了「六一運動」。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西南執行部及政委會以陳濟棠、李宗仁爲首，電請抗日；七日，兩廣軍改稱「抗日救國軍」，遂向湖南出兵。

在此之前，共產黨已完成「長征」，並在一九三五年底把黨中央由江西移至陝西。當紅軍到達陝北後，不斷發表宣言，要求與國民黨團結抗日。次年二月，更以激發各黨派展開統一陣線和更能接近日軍前線爲口號，由彭德懷等率領紅軍東渡黃河，進攻山西。無奈受到閻錫山重兵阻截，無功而退。但在四月廿五日，共黨中央再次呼籲全國各黨派聯合抗日。而在個多月後，兩廣方面又以抗日爲名，與南京對抗。

陳濟棠出兵後，南京方面發電勸阻無效，蔣介石立即調動他在華北、西北的嫡系軍隊三十餘萬備戰，內戰隨時有爆發的危險。後來，經蔣介石代表蔣伯誠在廣州多方運動，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通電擁護中央，師長李漢魂亦稱病離職，陳濟棠只得悄然下野。

當南京明令陳濟棠免職時，曾同時發一電令，聲明廣西維持現狀，仍以李宗仁、白崇禧分任廣西正副綏靖主任。但陳濟棠下野後，蔣介石又急欲解決李宗仁、白崇禧。故即電派白崇禧出洋攷察，另調李宗仁往中樞軍委會任職。李、白強硬反對，蔣氏遂派大軍壓境。但蔣氏深知戰爭一發即不可收拾，而華北、西北軍隊南調，便無法對付西北的共黨；遂決定放棄武力，採取和平的方針解決。

平息兩廣事變後，一九三六年十月，蔣氏隨即趕往西安，訓令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匪」，由是而釀成「西安事變」。

（註）：「大公報」當時的記載是說兇手被張學良打倒，但沒有表示他是否用槍。從陳氏轉述張氏的

說話，可以看到張學良是用拳頭把手槍打落的。據汪氏家屬的回憶，兇手孫鳳鳴是被汪氏近衛桂述軒所槍殺。至於桂氏當時爲什麼那麼着急去槍殺兇手而不留下活口，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是一件懸案。



## 第十五章 汪先生的被刺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汪先生遇刺於中央黨部，身中了三槍。①民國以來，國民黨人物遇刺沒有不死的，只有一個不死的就是汪先生，這也可以算開國民黨人被刺史的新紀元，汪先生也可以算是大難不死，許有後福。

那天是開六中全會的第一天，閉會之後，趕着要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早上很像有點先兆，大凡開大會，差不多刻板的，七時到紫金山謁陵，九時行開會典禮，跟着開預備會議。開會典禮之時，中執會推定汪先生演說，程序上原有默念的，司儀的人員大約忘記了，喊着演說，張溥泉先生大概抵不住，連聲呼喊司儀人，可是那時汪先生已步上台上，聽聞身後有嘈雜的聲音，許是一時神經感受不寧，在演說時候，神色是蒼白，聲音是顫抖，汪先生最擅長於演講的，今日到底爲什麼，台下的人們無不怪詭在那裡揣想。

演說完畢，照例又是攝影了，中央委員全集中中政會新廈的門首等攝影，蔣先生遲了不來，中央黨部的職員催了兩次，末後說蔣先生已上了樓，不來了，攝影師才動手拍照。我和黃季寬同站在大廈門首的右

邊極端，因我記得汪先生十九年底對我誥誡，凡事須要讓讓老先生，所以每次攝影，我都站在最後一排，或者站在兩翼的末端，總不肯和老先生們挺着胸脯站在前列，在鏡頭前顯着威武。

攝影剛完，人便嘈雜的亂動，大家回身上右階預備入會議室開預備會。我知道要有一回的，橫豎不是立刻開會議，我們何必忙，我在身上掏出一包烟捲，自己啣了一枝，又給一枝黃季寬，正在劃洋火，忽然聽見連珠的槍響，我發夢也想不到有人開手槍。

「爲什麼今日放起鞭炮來？」黃季寬很詫異的，他原本是一個軍人，這時連手槍的聲音也辨不出。

「我也奇怪，實在沒有必要。」我吸着烟捲，意思是等這枝烟捲抽完了，才上會議室。

一時參觀攝影和參加典禮的人們，像潮水般湧出，又像波浪般分散，我的經驗從下意識透出來，使我知道有奇變。人羣剛湧散，朱驢先生已氣喘敗壞的從石階走下來。

「什麼事？」我問。

「有人打張靜江先生。」驢先說畢便走開了。

跟着驢先過來的是張漢卿，他見了我，說：

「兇手拿着了，我一拳把他的手腕擊倒，手槍跌落地，拿了他了。」他說完也走了。

「等一等罷，季寬，抽完烟再說。」我向着季寬說，我的心裡，既以爲人也沒傷，兇手已就獲，我們大可以不必急迫。

砰！砰！又聽見兩聲槍，我眼見大廈門首空地上睡着二人，警察還要拿駁壳槍打他，我急步上前止住警察：

「不要再打，我們還要問口供。打死了，那裡得憑據！」

我說完之後，回首已不見黃季寬，我步上石階，曾仲鳴朝着門外衝出來，額角有一塊血跡。

「你受傷嗎？」我那時有些着急了。

「不是我，汪先生受傷了。」仲鳴說了便走。

我上了石階，鐵柵已關閉，六七個警察露出了駁壳守衛着，我一入門首，汪先生斜睡在地上，面上許多血，身上的西裝和內衣全染透了鮮紅血。汪夫人屈一隻腿跪在汪先生的身旁，和汪先生把脈搏，蔣先生也屈了一條腿在汪先生的右邊，把着右手，只說：「不要緊，不要緊，不要多說話。」

「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汪夫人很悲憤的，但還沉得住。

「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罷。我死之後，要你單獨完全負責了。」汪先生氣有些喘，說給蔣先生。

我那時非常之焦悶，也悲憤，那時我如果有一根手槍在身旁，也許打一個人。②但也奇怪，我時時都携有手槍的，獨這一天沒有帶。

「公博，你站着做什麼？還不快去打電話找醫生，並請你趕快通知金陵大學的何文傑。」汪夫人催促我，何文傑是她的未婚婿。

我上樓之後，搖了幾次電話才把中央醫院的先生們說通了。末後又打電話到金陵大學，好容易才通知教務室去找何文傑。把所有的電話弄通，已經有十多分鐘，我下樓之後，汪先生還睡在那裡，蔣先生和汪

夫人還依然站在一旁，可是人數已減少很多，中央秘書處把各委員都請上樓上，是使傷者得以安靜的意思。我忍不住又走出新廈等醫生，那時全院真是鴉雀無聲，兇手還呻吟着睡在那裡，間有一兩個工人伸出頭在窗外探望，面上都深刻着大難將至的神色。又過了五六分鐘，中央醫院的醫生和救護車才來，他們在裏紫汪先生，我也上樓看看是不是開會議。

樓上會議室也充滿了嚴緊的空氣，祇不過加上嘈雜的人聲。我看各人面色最憂鬱的還是閻百川，他自從和蔣先生破裂之後，這是第一次到南京，一碰就碰上這次奇變，他心中自然比什麼都難受。③這時又聽到當時兇手放了三槍，便給張溥泉攔腰抱住，否則或者要放多幾槍。爲什麼當時誤會張靜江先生被刺呢？原因張先生本不良於行，也不良於站，攝影時也坐着一張椅子，事變一起，他便滾倒在地，各人一時以爲他被打倒了。還有孔庸之先生，他也來不及走進門中，他急得往旁邊的汽車下一滾；祇是急迫起來滾進去容易，這從容時爬出來就難，他的隨從費了許多工夫才把他拖出來，一件馬褂的袖子，扯開了兩半。

那早會議還是照常進行，散會之後，對於兇手的來源已有些眉目。那個兇手名喚孫鳳鳴，是晨光通訊社的採訪員。晨光通訊社成立已一年多，軍警到社搜捕時，餘黨早已遠颺，祇贖得幾件破傢私，和一堆紙灰，那是秘密文件燒毀的痕跡。④晨光通訊社在市政府請求備案的担保人還是實業部兩個職員，當中一個是郭春濤的堂弟，這兩個傢伙對於晨光社的背景一些也不知道，真是代人受過的兩個傻瓜！

汪先生被刺消息傳出後，鬧得全國風雨，上海更盛傳我也在被刺之列，北四川路還有些外圍報館，把我的照片搜出來，掛在窗外來充實它的新聞。中央黨部是什麼地方？那天開六中全會又是什麼一個日子？在軍警森嚴之地行刺，除了蔣先生自己的特務隊，還有何人？這不獨大家在那裡證實，而且廣西的李德鄰

和白健生來電正式質問了。蔣先生自己也懷疑着，第二天下午找我和顧孟餘，谷正綱，唐有壬，到軍官學校談話。

「我看這件事不是自己人幹的，因那種子彈不是配那種的手槍，而且他們所用的手槍也不是那一種。」蔣先生解釋着，他所謂自己人，自然含意甚明，實在當時他也失了自信。

「我看也不是自己人幹的。因為自己人要幹，隨時可幹，何必在中央黨部，更不必在開全會那一天。在中央黨部幹這行刺事情，很明白要打擊國民黨。不過有三點要請蔣先生注意的：第一，這次行刺是有組織的陰謀，因為晨光社成立一年多，陰謀的醞釀最少也有一年的長久。第二，看兇手身邊僅有幾塊錢，可以斷定這組織是沒有大筆經費，大凡兇手行兇之後，沒有不想脫逃，現在他的身邊僅有此數，想來那組織也不見得充裕。第三，既然這次是有組織的行動，而晨光社居然在京混了一年多，那就可以判斷他們還要繼續施行他們的陰謀，並且在京的組織恐怕不止一個晨光社。」我大畧把這次事件從客觀上分析一下。

從各方面傳來的消息，蔣先生對於他的特務隊很懷疑，一次他召集了特務隊的負責人火罵，說：「你們每月花了幾十萬，就幹出這類好事嗎？限你們三天之內，把兇手緝獲，否則要你們的頭。」果然不到幾天，晨光社的社長兼主兇賀坡光，從鎮江捉到解到南京，另外還捉了許多人，關在監獄，等候裁判。兇手們的供詞，我始終沒有機會窺其全文，僅知道和前幾年的福建人民政府有關，據說那班兇手久無成績，總機關要撤消他們經費，所以那天孫鳳鳴見了蔣便刺蔣，見了汪便刺汪，倘蔣汪都不在，也隨便放幾槍，打倒幾個中央委員算數。⑤這個刺汪案一直至汪先生二十六年一月回國還未結，汪先生還上呈文國民政府，請求特赦他們，這班人後來怎樣處置，我一些也不知道。

汪先生的槍傷，中央醫院始終取不出子彈，就是左額的子彈也等到德國醫生諾爾從綏遠飛回來才取出，至於背後子彈，在上海時給牛惠霖開一次刀，也找不着子彈所在地。⑥還有一件不愉快的印象，是在開五全大會時，汪先生所提出的中央委員名單，蔣先生無法幫助選出，彭浩除和郭復初兩人也是在選舉之後，蔣先生用主席團名義，提出補上。汪先生所想舉出諸人不獨沒有預期的被選，原來屬於汪先生一系的白雲梯，鄧飛黃，范予遂，郭春濤，一致落選，⑦還有唐孟瀟則得一個候補委員，他的部屬何鍵和劉建緒倒高高在上。

汪先生於二十五年二月離國養病，我勸他回南京一次才起行，他也不採納我的獻議，悄然離滬，啓程之後，才留給我一封信。行政院長怎樣辦呢？汪先生正式辭職，蔣先生也正式登台，在此交替之中，還有一段小把戲。一天蔣先生找到軍校談話，說行政院只有汪先生和他自己才能負起這個責任，他因軍事不能兼顧，意欲任顧孟餘爲副院長，在汪先生出國之時，以副院長代行行政院長的職務。

「孟餘是不會幹的，倒不如請蔣先生任命孔庸之或何敬之代理。」我知孟餘一定拒絕的，所以誠懇的獻議。

「無論如何，也請你走一走，徵求孟餘的意見。」蔣先生說。

我第二天附飛機至上海，至明故宮機場候機時，宋子文也恰來趁他包定的飛機。「公博，你到上海有什麼事？」宋子文問。我告訴他，我奉蔣先生之命徵求孟餘同意爲行政院副院長。

「Honest 誠實的嗎？」子文用英語對我說，禁不住笑起來，我也笑了。

孟餘對於副院長自然一口的拒絕，我覆了蔣先生的命，任務便算完畢。行政院整套角色都換了，民國

二十四年底的新行政院成立，又是一番新氣象。

最可嘆的，汪先生這次被刺，還有許多人在心內喜悅，更有些人在口上批評，例如立法委員樓桐蔭在法官講習所稱孫鳳鳴爲民族英雄，大有可惜張良的博浪一擊，誤中副車之勢。據我的分析，汪先生被刺，最少有幾種人高興，一種是共產黨，一種是人民陣線，<sup>⑧</sup>一種是福建人民政府遺下的人們，一種是蔣先生底下的從龍之士，又一種是盲目被人宣傳者。共產黨和人民陣線是反對整個國民黨的，國民黨內有力的人被刺，無論是誰，終歸是快意的。福建的人民政府失敗之後，都結怨於南京一羣人，蔣固然是他們所恨，汪也是他們所恨，因汪不在南京助蔣，則蔣未必龐大起來，這次行刺的兇手縱使不由他們遣派，如汪被刺，在他們視之也是一件痛快之事。至於蔣先生底下的人們，在上級的人比較能知大體，下一些的人所謂青年後進，以爲汪在，蔣終不能獨尊，還有揣摩風氣的，反汪雖然或者會被蔣先生痛罵，但一定必爲蔣先生所喜。而且陳果夫和陳立夫兩位先生門下的所謂二陳派，和改組派鬥爭了許久，一有機會，還企圖進攻，<sup>⑨</sup>那個樓桐蔭先生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至於一般受盲目宣傳的人，以爲中國應該立刻和日本宣戰，中國的力量不但可以取回東四省，還可以直搗日本的東京，南京對於這件便宜順利的事不肯幹，就因爲有一個汪精衛在那裡做秦檜，大家差不多以爲汪先生一去位，中國便立刻可以宣戰，日本便崩潰了。<sup>⑩</sup>

要而言之，汪先生自從民國二十一年進南京，差不多自己替自己掘下一個大陷阱，他固然極意的表示親愛精誠，竭力合作，然而汪蔣之間，還有重重的隔關。我呢，第一次汪蔣破裂，結果也是汪蔣合作，第二次汪蔣破裂，結果也是汪蔣合作，那麼我難道還幹第三次反蔣的急先鋒嗎？而且汪先生每逢汪蔣合作，差不多唯蔣先生之言是聽，別人的說話，他不但不會採納，而且認爲破壞，我還是沉着一些，諸事不問，

且把中國的經濟幹出一些眉目再說。

汪蔣之無法合作，實在有種種原因，第一，他們兩個人的個性本來就不同，一個愛說話，一個愛緘默。一個感應很快，一個城府很深。兩個人雖然共負大責，而蔣先生對於一切機密都不願竭誠討論。國家大事本來應該和衷共濟的；什麼才是和衷，基本條件當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那裡和起，濟又由那裡共起？第二，他們兩位先生表面雖然客客氣氣，而暗中還在爭領袖。在汪先生方面，以為他在黨國，有歷史，有地位，有助勞，除了孫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過他老先生是謙抑為懷的，他不願當正式的領袖，不願大張旗鼓的做黨的總理和總裁，不過他自己雖然不願做正式的領袖，同時他也不願他人做正式的領袖。至蔣先生方面就不然了，他出身是軍人，對於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實際的領袖，還要做名義的領袖，一天沒有達到登其大寶的願望，他到底不甘心。他們的性情和脾氣根本相異如此，合作兩個字真是無從提起。

以上是主觀的，論到客觀，在南京的幾年中，汪先生的受氣，恐怕不在廣州非常會議之下，讓我簡畧寫點出來：

一個行政院，也就是一個內閣，它的大作用跳不出軍事財政和外交三者。汪先生初入南京，宋子文勸汪先生不要管軍事，他說蔣先生最怕汪先生過問軍事，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是不要過問軍事。宋子文的說話，自然是受蔣先生的命令來說的，那些說話那裡是勸告，簡直是警告罷了。汪先生自是對於軍事毫不過問，對於蔣先生手下的軍隊自然不敢問聞，即對他以為是屬於自己的第四軍，也時刻避嫌，不願接近。四川的劉文輝本來是擁護汪先生的，在汪先生行政院長的任內，就為劉湘攻擊。劉湘是受蔣先生卵



翼的，購買軍械和飛機，得蔣先生助力不少，因為四川深處腹地，運送軍械要經上海，經南京，經漢口，倘使蔣先生不幫助，隨時都可扣留。二劉在四川打起來，中央政府一些也不敢過問，我在中政會議提過幾次要制裁，可是大家似是莫逆於心，絕對通不過。中央既然不能制裁，中央既然不能講法律，地方只有實力解決了。因之劉文輝終於失敗退了西康，汪先生祇好承認事實，徇蔣先生之意，任命劉湘做四川省政府的主席。<sup>⑪</sup>

財政一項也爲宋子文絕對把持，用人是專斷的，政策是秘密的，汪先生初到南京，想介紹唐有壬做財政次長，子文很乾脆的拒絕。財政部所做什麼事，行政院再也休想知風聲。宋子文這位先生，他把持財政的情形，不獨把汪先生擠在門外，蔣先生也有時朦在鼓裡，後來蔣先生再忍不住，壓迫他辭職，換了一個聽話的孔庸之。但孔老先生是只聽蔣先生的話，而絕不聽汪先生的話，就是法幣政策罷，那是國家何等重大的事，連孫哲生也給他秘密通知了，可是對於汪先生就隻字不提。提出預算案哪，發行公債哪，增減稅率哪，事前絕不討論，都是臨時提出行政院，非立刻通過不行，也非立刻實施不可。宋孔兩位親戚真是蕭規曹隨，他們的態度，並不是提出議案，而是指揮會議。<sup>⑫</sup>

說到外交，汪先生也是難於作主的，那時的外交，還說不上方針，全國只是瞎跟着國聯，以爲國聯等於英國的國會。英國的國會權力，除了男不能變女，女不能變男之外，什麼都可以解決，不過巴力門是英國的國會，而國聯是世界的國會，一般中國人都那樣想。外交部長羅鈞任先生根本就不談，也不想方針，私室內擺下一副牙牌神卦，遇到外交緊急之時，擺擺牙牌卦以下休咎。趕到羅鈞任去職之後，汪先生兼了外交部，蔣先生的外交情報還是到不了行政院之門。那時豈止外交情報蔣先生沒有盡量告訴汪先生，連在

北方的黃膺白委員長，也未必得到蔣先生的情報。一次黃膺白很憤慨了，對着日本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給我，那能夠？還有更痛苦的，蔣先生答應了日本什麼樣，日本人來要求，我拒絕，他說蔣先生已答應了，趕到我打電問蔣先生，果有呢？」他又憤慨的說，他有一次再忍不住，打電報到牯嶺罵蔣先生，請他對於外也應該解釋一下，電報示了一句話：「毋使天下後世，以弟爲愛國者，而以兄爲生是把兄弟，私人來往電報，都稱蔣先生爲弟，而稱自己爲兄。」

軍事、財政、外交，三項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開會都討論蔣先生又以剿匪爲名，請求中央把剿匪區域都劃給行營，無論軍事、財政、司法行營辦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長深院了。剿匪區域，不過是一個名稱全國財政會議，忽而召集全國建設會議，高興起來，打電叫南京的關係部院參加的部院在旁邊頂着二門打聽消息。牯嶺是一個很幽閒的避暑地，那時已變了南超先生自然還謹慎地守着國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簡直是委員長行營的秘書處，不書處中一個尋常的文書股罷。

行政院是這樣，中央黨部汪先生也難得過問，中央黨部一個秘書處，一個組民衆訓練部，汪先生也無從干預。中央黨部的秘書長是葉楚傖，葉先生是一個好立兩夫支配。組織部是陳立夫，他不但管黨的組織，而且管特務隊，更且直接管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陳，邵先生在西安事變無意中給楊虎城的軍隊打死

大會開會後，爲着敷衍胡先生，換了劉蘆隱，而劉蘆隱始終沒有就過職，一路由副部長的二陳系的方治操持。<sup>⑭</sup>至於所謂民衆訓練部在民國二十一年洛陽開二中全會時舉了我，一向我都不問，而交給副部長王陸一負責任。

我是懶惰嗎？不，我實在管不了。無論那裡有民衆糾紛，我派人去調查，各地黨部一律奉命擋駕。更有奇怪的，我時常派人到上海調查和調解勞資糾紛，這個特派員住在遠東旅館，上海市黨部就派人住在遠東旅館，那個特派員住在大東旅館，上海市黨部也派人住在大東旅館。爲什麼呢？他們怕改組派活動，所以不得不派人監視和偵查。其後黃埔和二陳鬥爭，民衆訓練部還更難處。上海的總工會違法成立，中央是不能過問的，漢口的總工會被黃埔趕了二陳系，自行佔據，中央只好塞明閉聽，讓他們鬧。黨部太沒有辦法了，我辭了兩次職，中央也不管，最後葉秘書長索性連我的辭職書也不給提，我只好交給王陸一先生，讓他天天召集科長們在他公館打小麻將了。

各省黨部自然一氣的起下承上，打擊改組派。浙江省黨部可以把改組派的人綁票，等到選舉完竣才放出來，山東省黨部更不客氣，關了許多改組派，選舉完竣，還囚在牢裡，老不釋放。汪先生自解散改組同志會後，已沒有組織，然而改組派的朋友也不許活動，汪先生祇好嘆口氣，一直等到廿五年改組派的朋友都變了羔羊，<sup>⑮</sup>這些奇怪的現象才慢慢減少。

大事叙過了，我還叙些小事。我也不願說蔣先生有意和我們爲難，但底下的從龍人物，揣摩風氣者多，我們剛到南京，上海已辦了不少專對我們攻擊的雜誌。當中雜誌最著名的要算「現代新聞」，這個雜誌是屢次改名換姓的，而主持人是從前跟李之龍的丁默村。這個「現代新聞」，每次都有系統的登載共產黨

階級的人心了。」他們趕快向蔣先生上條陳，在軍事委員會內，成立一個資源委員會。聰明的錢昌照先生，他替蔣先生拉了許多專門人材，丁文江，翁文灝等，都網羅在軍事委員會的幕下。這個資源委員會專門和實業部爲難，這也難怪他們，孔夫子還說，我待價而沽諸，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又那能責怪君子知幾其神的知識階級。

……

小事說過，我似乎又該補述一番大事。那時中國的大事，最大無過於中日問題。汪先生對於日本問題的態度，他對於軍事不大了，最初他主張積極抗戰，一二八九路軍能夠在上海作戰，不能不說汪先生是一個幕後的支持者。他看見張漢卿不抵抗，憤而辭職下野，這也不能說他純粹由於衝動，他的確有愛國的誠心。及至他下野出洋，在歐洲居住幾個月，他已明瞭國際的情形，國聯本身是沒有力量的，英法對於中國是不願幫助的，美國更是保持孤立的，蘇俄是靠不住的，所以他願意担上千鈞重担，對於他毫不知情的塘沽協定也担上兩肩，大概他那時已決心希望對於中日問題尋求一個解決方案。

汪先生的意見如此，可惜他在二十四年八月之前，始終沒有告訴我們。至於蔣先生呢？他有他的如意算盤，他知道要打共產黨則不能不聯日，要抗日本則不能不聯俄，但共產黨正盤據着江西，怎可聯俄以使共產黨坐大呢？他決意使汪先生和黃膺白對日妥協，使他可以專心剿共；等到共產黨消滅之後，然後才以國民政府的資格，拿莫斯科政府作對手，訂立軍事同盟，這樣中國回頭抗日本，東四省一定可以收回，華北一定可以脫日本的羈絆，而他自己的民族英雄一定可以成功。

我在二十三年夏天，已看出汪蔣所走的路太紛歧，我力勸汪先生不幹，一而再，再而三，汪先生也討

厭我起來，一次竟徵求我的同意去任德國大使。汪先生太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勸他不幹，是想大家都不幹，我並非想置身事外，貪圖舒服，而到外國去養老。我謝絕汪先生的好意，一直捱到二十四年夏天，荏苒又是一年我忍不住，遂打算單獨辭職。

民國二十四年的夏天，汪先生的糖尿病和肝病一齊發，在上海醫了一個多月，醫生勸他到青島。那時黃季寬奉了蔣先生之命往四川，商洽一個對日和平方案，帶到青島和汪先生商議。汪先生打了一個電報來，囑我和黃季寬一齊到青島商量，我在八月五日早晨在明故宮等候黃季寬由上海坐飛機來，附機一起飛青島。

到了青島，季寬和我齊見汪先生，季寬把那個方案很謹慎的掏出來，和汪先生討論了一陣。奇怪得很，我雖然同季寬一起見汪先生，汪先生却始終沒有給那方案我看。我也不再問，只在旁邊洗耳恭聽，我們談畢出來，汪先生囑我第二日下午三點鐘單獨見面。

果然第二日下午我單獨去了，汪先生劈頭便問：

「你真打算辭職嗎？」

「怎麼不是，我真是，天也捱不下去了。」我決然的答覆汪先生。

「唔！你打算什麼時候辭職？」

「汪先生什麼時候回南京呢？」

「我大約十五回上海，二十回南京，聽說蔣先生也將回來，他要約我相見。」

「汪先生如果二十回南京，我準備二十五日上辭呈，希望在九月一日交代。」

好，就這樣決定罷，我們又談了一陣繼任的人選問題，我便興辭而出。那時我真高興極了，夜裡和沈

成章市長大喝其酒，真有些無官一身輕的感覺。趕到第五天下午，我還大醉睡中覺，汪夫人到了東海飯店，從床上拉我起來：

「汪先生有事找你去，怎麼你喝得這樣醉？」

「我面上太紅了，等今夜再去罷。」

「不行，他有事等着你呢！」

我跟踉的趕到汪先生所住的韓復榘別墅，汪先生只是一個人在房中。

「你真打算走嗎？」汪先生問我。

「汪先生不是已准我辭職了嗎？」我很驚異的何以汪先生有此一問。

「我決定了，我是不走的，我勸你也不要走。」汪先生面色突然沉下來，我和汪先生做了朋友十幾年，沒有見過他那樣斷然的態度，「也許我在病中，我的說話是帶病態的說話。我們要中國復興，起碼也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今年已五十多了，我沒有其他報國之道，只有中國再不損失主權和領土，就是我畢生的工作。」

「汪先生是決定的了。」我問。

「是，我是決定的。」汪先生面色還是那樣沉毅。

「我可不可以再說幾句話呢？」我再問。

「自然可以說。」汪先生還是很嚴肅。

「我現在翻歷史，承認秦檜也是一個好人。因為國家到了危亡關頭，終要找出一個講和的犧牲者。但

一個人的犧牲很容易，而時間也飛得太快。我想秦檜當日何嘗不想自己暫時犧牲，受人唾罵，等南宋設法中興，然而秦檜是犧牲了，終於無補南宋之亡。就是清朝的李鴻章，過去的袁世凱和段祺瑞，也都想一面妥洽，一面設法復興，然而李鴻章死了，袁世凱和段祺瑞也死了，中國還是那樣不振，至到今日國難更嚴重。我想今日與其說是賣國，不如說是送國罷，因為賣國，私人還有代價，送國是沒有代價的。可是今日送國大有人在，黃膺白優爲之，張岳軍也優爲之，又何必你汪精衛去送國。」我乘着酒意，一氣說了許多衝動話。

「不過黃膺白他們送國是沒有限度的，我汪精衛送國是有限度的。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兼外交部？我什麼都不願幹，難道希罕一個外交部長？就因爲別人做外交部，蔣先生不會聽話的，我做外交部，他雖也不聽話，可是我打一個電報去，他終要考虑一下。這樣或者對於國家可以得多少補救，這是我的意思。」汪先生對我的疑問，又加以解釋。

「不過我對於這種無計劃的犧牲，總覺得值不得。」我又想勸諫。

「說到犧牲，都是無計劃的，有計劃便不能算犧牲，我決意做這犧牲品，我已五十多了。」汪先生聽了我話，沉思了一陣，又加上一層決意。

「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沒有聽過汪先生這樣決心的說話。好，既然汪先生決定要跳水，難道我好站在旁邊看嗎？我不走就是了。」我也下決心。

我談畢之後下樓，汪夫人已洗了海水浴回來，我說：

「汪夫人，我從來沒聽過汪先生那樣決心的說話，十幾年來今天還是第一次。」

好，又不走罷了，翌午我和季寬又飛回南京。過了幾天中政會開會，爲着外交問題吵起來，首先由張溥泉發難，而反汪大將張厲生繼之，把汪先生批評得體無完膚，汪先生聽見了，由青島來一電報，呈請中政會辭職。這場風波又使張岳軍啣了蔣先生之命跑青島一次，才決定汪先生維持行政院的局面，至六中全會爲止，開了會後再商量人選。

.....

說到第二次汪蔣合作，在汪這方面不能不算竭誠，而在蔣方面，則猶存疑忌。不止第二次如此，即第一次合作時，汪先生於萬難中也提出蔣先生復職總司令，本來不必趕李任潮的，也徇蔣先生之意和桂系不睦；當時炙手可熱的桂系同情是失盡了，國內對於汪先生善變的謠諑也流行了。至於第二次汪蔣合作，汪先生也於洛陽的二中全會提出蔣先生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是也尖了胡展堂先生的期望，和李白對汪的熱誠。當汪先生提出委員長提案時，我兩次請汪先生慎重，汪先生怫然變色，說：「我死也要這樣做。」不止汪先生對蔣開誠布公，連汪夫人也對蔣棄嫌修好，每次我們稍有一兩句批評蔣先生，即用斬釘截鐵的態度，封住了我們的口，說：「我是相信他的，我不懂你們懷着什麼壞心事。」唉，汪蔣合作原是一件事，我們何必反對，白費唇舌呢！

不過蔣先生有許多對不起汪先生的地方，凡反汪的中央委員，蔣先生無不置之高位，那位張厲生先生本來一無所長，但以反汪最力，得任爲組織部長了。改組派的同志，具有君子知幾其神的技術的，無論頂不堪，但求人罵汪精衛和改組派的，準有相當的工作。對於中日交涉，情形更顯明，汪先生之妥協，本是蔣先生授意的，但主和之罪完全推在汪先生身上。



固然蔣先生有他的困難，中國毫無對外作戰的準備，事實上不能作戰，但他是帶兵的，不是拿筆的，一國的軍事最高當局，若說不能戰的話，馬上塌台。汪先生知其然，他爲着大局，爲着蔣先生，只好以文人資格，不斷發出妥洽論。

蔣先生的態度也真模稜，對於全國人士，當然不願意漏出「字」和「」，即對於他的部下，凡主戰的來見他，他告訴他們一定要打，凡主和的去見他，他告訴他們怎樣去妥洽。因蔣先生的模稜，底下遂分了兩派，互相攻擊，互相詆譏，然而他們雖然互相攻擊和詆譏，但對外都是蔣先生的人，於是對外宣傳都說主和是汪先生的主張，南京凡是主和的人們都因受了汪先生的暗示。甚至乎那位孔庸之老先生也對金融界宣稱，蔣先生主戰，汪先生主和，中國之不戰，坐於汪先生從中作梗。孔老先生根本就反對戰，但那是另一回事，他對外宣傳，總是歸罪汪先生，這是中國銀行董事長李馥蓀先生親口告訴我的，馥蓀先生是老實人，不會對我說假話的。

中國是一個被侵畧的國家，何況東四省事實上被日本佔據了幾年，又成立一個滿洲國？并且日本駐華軍人的橫行，販毒，走私，扶持了殷汝耕組織冀東自治政府，支撐着宋哲元半獨立的冀察委員會，那都是一件一件千真萬確的事。於是全國的人心憤怒了，激昂了。蔣先生事實上不能打，但不打又失人望，底下的聰明才智之士，迫得替他作虛偽的宣傳，說蔣先生隨時都想打，不願打的只有一個汪先生。蔣先生的底下人都這樣說，一定不會假的罷，於是汪先生遂又變爲衆矢之的。

蔣先生對於這些宣傳，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固然沒有禁止，也從來沒有在公共場所辯明。中政會議攻擊汪先生不止一次，蔣先生總是不作聲。六全大會，汪先生受傷臥在中央醫院，蔣先生替他作外交報告，

其時我真代蔣先生耽心，因為在報告裡頭，說打罷，立刻引起變故，說和嗎，蔣先生絕對不敢負這責任。到底蔣先生有肆應之才，拿着孫先生的民族主義講演中，揀出一節背誦了一過，出席的人們大拍掌，張溥泉大聲叫：「我們不信任外交當局，我們只有擁護蔣先生。打倒外交當局，打倒外交當局。」一時拍掌附和之聲，震動屋瓦。蔣先生也不替汪先生辯護，也不聲明和汪先生共同負責，我只有暗暗地把黃膺白電報背一遍「毋使天下後世，以兄為賣國者，而以弟為愛國者也。」

至於私人談話，蔣先生也不是不說幾句良心話的，六全大會，西南的代表到會，蔣先生請他們私宴時，曾對黃季陸先生說：「汪先生這幾年為國，為黨，為我，都說不得的，請你們不要再反對。」但蔣先生為什麼不公開說一兩句這類的負責話呢？那只有蔣先生自己才知道，我是莫測高深的。

平情而論，蔣先生這幾年當中，「最高領袖」四個字，由他底下的人喊出來，由黃埔喊到廬山的軍訓團，由軍訓團喊到全國，也未始非汪先生所做成。這位汪先生在南京，軍事財政不過問，外交做了蔣先生的護身箭鏢子。胡先生是默默無聞，並且在廣州抑鬱死了，汪先生又低首下心的，差不多變了蔣先生的幕僚了，天下的物望無所歸，結果大有民國初元「非袁莫屬」之勢，於是「全國最高領袖」遂由暗暗叫喊而明明抬出來，天下之人大有莫逆於心，無有間然之象。

蔣先生的獨裁，都是老汪做成的，國內的人這樣說，黨內的元老也這樣說。于右任和居覺生等老先生，因見事無可為，而且又要在南京做官，終於馴服了。還有些如不樂做官的蔡元培，為宋子文免職而不服氣的李石曾，再也忍不住，在二十四年頭，約汪先生到上海，憑着老友資格，當面向汪先生質問，並要汪先生反蔣。

「汪先生這幾年在南京的工作，縱然不是養成獨裁，也是掩護獨裁。」他們向汪先生責備。

「實在說，前幾年我的力量雖然不能說比蔣強大，也可以說至少和蔣頡頏。可是我的力量都被你們老先生同心協力打光了。打光了我的力量而又勸我反蔣，究竟是什麼意思？」汪先生這次算是對一般老先生報了一個仇。

最高領袖是養成了，主張妥洽又全是汪先生的罪了，汪先生被刺，怪不得有一部分高興！

## 第十五章註釋

- ①關於刺汪的經過，參看「大公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汪院長遇刺詳情」一文；及「國民黨六中全會記」，「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四十四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
- ②陳公博暗指蔣介石。但陳氏事後的解釋似表示此案與蔣氏無關。
- ③一九三〇年，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倒蔣失敗後，閻氏揚言遷居大連，退出政治生涯，而實際上則退暗進明，重返山西，重整政權。一九三二年，國民政府委任閻氏為「太原綏靖主任」。一九三四年，閻氏提出一個「造產救國十年計劃」，希望匯集足夠的力量抗日反共。蔣介石為使閻氏與國民政府有更密切的關係，便邀請他參予一九三五年在南京舉行的國民黨五全大會。詳參 *Gillis*, pp. 121-124. 及陳少校：「閻錫山之興滅」，頁一二五。
- ④根據南京警察廳長陳焯對刺汪兇手的公佈，孫鳳鳴是安徽滁州人，年三十二，曾充十九路軍排長，福建十二師混成團機團槍連連長，行刺左輪手槍係由胡雲卿供給。胡氏為晨光通訊社社長，該社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由胡氏等請市社會局登記。刺汪案發生後，警察廳派員馳往該社搜捕餘黨，則該社內所有人員已於事發前潛逃無蹤，所有文件亦均焚燬，於灶前檢得案上留函一件，函面寫「留交來人們」五字，箋上寫着「本社之事，與郭智謀、吳璜、周希齡三君（按：彼為該社担保人。）毫無關係。」詳參「汪院長遇刺詳情」、「國民黨六中全會記」等文，見註一。
- ⑤根據「大公報」及「國聞周報」，晨光通訊社的社長是胡雲卿，賀坡光只是總編輯。（同註①、註④。

〔關於賀坡光的生平事蹟，參看黑漢：「刺汪案重要角賀坡光」，「大風」，第五十四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頁一六八八。至福建人民政府，參閱本書第十四章。至於當刺殺的對象，當時懷疑是蔣介石而非汪精衛。「大公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目的似在蔣」一節云：「晨九時一刻，全會開幕畢，中委集階前攝影，汪立前左方，……此時一青年自旁擠過，距汪三尺許，連放三槍，汪立倒地，張繼……將兇手抱住不放，兇手亂開槍，又放五下，張學良趕到，將兇手打倒。……先是清早謁陵時，蔣委員長之衛士見有三男一女徘徊蔣前後，形跡可疑，遂加注意。至中央會畢，羣出攝影，蔣隨行隨與葉楚儉談此後會場戒備事，未行至階前而變作，蔣乃登樓。……事發後中央黨部閉門搜檢，有兩人圖逃，逃上樓匿圖書館，蔣衛士查明，即陵園徘徊之人。……」

⑥照汪氏家屬的解釋，汪氏在中央醫院是由院長劉瑞恆設法把額部子彈取出，但是手術沒有成功，以後轉由德國醫生諾爾取出。至於背部子彈是由牛惠生醫生在汪的上海寓所開刀，不是由牛惠霖醫生開刀，子彈仍是取不出來。汪氏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赴歐，也是希望利用德國溫泉去養病。

⑦當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提出大會主席團人選如下：蔣中正、汪兆銘、于右任、孫科、居正、林森、張繼、戴傳賢、鄒魯、馮玉祥、閻錫山、顧孟餘、許崇智、時子周、恩克巴圖、林曦、梅公任、麥煥章、潘公展。除以上十九人外，再由大會推定十一人，共三十人，由大會票選決定，但最後大會團名額改為二十三人，除上述十九人外，加上陳果夫、吳忠信、王泉笙、樂文濤。參看「國民黨五全代會記（一）」，「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四十五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而參予五全大會的出席者中，蔣氏的親信、黃埔軍校成員及CC派的人數較四全大會大大增加。參攷Robert C. North,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5.

⑧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間，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提出了「人民陣線」的口號。而在一九三六年一月，鄒韜奮、沈鈞儒等在上海成立救國會，並先後提出了「人民救國陣線」、「聯合戰線」、「民族聯合戰線」、「救國陣線」、「救亡陣線」、「抗敵陣線」、「全國救國陣線」、「中國反日聯合戰線」、「救亡聯合戰線」、「全民陣線」等口號，參閱沙千里：「七人之獄」，上海生活書店，一九三七年十月，頁一六二至六四。可是，當時國民黨和日本方面，却把「人民救國陣線」和「人民陣線」等同起來。引同上，頁七十五，又穆欣編著：「鄒韜奮」，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七八年，頁二〇〇，至於「人民陣線」的實質，鄒韜奮有如下的說法：「『人民陣線』這個名詞用在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很容易令人誤解，不如用『民族聯合陣線』來得清楚。『人民陣線』這個名詞大概是借用自法國的人民陣線，正因有着這樣的淵源，所以很容易令人誤會。爲什麼呢？因爲中國努力民族解放的聯合陣線和法國的聯合陣線是有着根本的差異，不應混爲一談的。……所以我們主張，爲明瞭起見，不可再用『人民陣線』這個名詞，應該用『民族聯合陣線』，使人一望而知是以民族解放爲本位的聯合陣線；是對外的，不是對內的；是中華民族的任何份子，除漢奸外，都可以參加的。」詳「大公報」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所載「沈鈞儒等答辯狀五」，第一張第四版。

⑨關於改組派與二陳派之爭，參閱江上清：「關於改組派的種種」，見其「政海秘聞」，香港致誠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頁七十三至七十四。至於改組派的主張及成長，本書第八章說明與註釋已有詳細記載，不復贅引。

⑩陳公博在本章稍後部份又云：「孔庸之老先生也對金融界宣稱，蔣先生主戰，汪先生主和。中國之不戰坐於汪先生從中作梗。」有關當時評擊汪氏妨礙抗日的言論，見「汪衛衛毀滅了自己還要誣蔑了總理嗎？」見「護黨論文選輯」，一九三五年，出版地缺，頁二二三至二四一。至反對汪、蔣不抗日的言論，參看「反蔣運動史」，頁五五五至六五六。

⑪有關二劉之戰，可參看 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34, 87, 106. 至蔣氏與劉湘之關係，參閱同書，頁一二四至一二八。

⑫長期以來，宋子文表現一種主動和獨立的政治態度，並不依附蔣介石。一九二七年，蔣氏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宋子文却支持武漢；後來又反對蔣氏與宋美齡結婚。而在當時宋氏因得到上海財團的支持，常與蔣介石和國民黨其他領袖發生爭執，且公開反對蔣氏對日本和共產黨的政策。反之，孔祥熙則一向支持蔣氏。一九二七年春，他參加了南京政府，又贊成蔣氏與宋美齡的婚事。而且他對政治的意見十分圓通，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繼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後，隨即表示全力支持蔣氏的反共運動，且事事諮詢蔣氏意見。參攷 Parks McLendon Coble, JR., "The Shanghai Capitalist Clas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75), pp. 39—40 and 183—185.

⑬黃膺白的電報發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原文如下：「……弟（按：指蔣介石。）如要兄（按：黃氏自稱。）依舊留平協贊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真實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

，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爲弟，悞國者爲兄也。」（黃沈亦雲：「亦雲回憶」，下冊，頁四九二。）事實上，黃郛在當時備受抨擊，在塘沽停戰協定後一年，「大公報」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之「短評」云：「……有人以爲臍白與日本不知有多少關係，他要如何便如何；亦有人以爲日本人要他如何便如何，此皆過於簡單，缺乏常識。臍白這次匆促受命，係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長蔣、汪二先生之邀。……他的報告建議，請示都對蔣、汪二先生。與他工作有關的中央部會，亦由蔣、汪二先生聯繫，不知者以爲他不賣別人的賬，國民更以爲其中有秘密，都是誤會的。在北平，凡與日本人會商之事，無不與何敬之先生共同，派出代表亦軍分會，政整會各指定而合作。」同上書，頁四七八引。當時，要求外交公開十分普遍。「大公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社評「北方時局」云：「此後外交情形，宜以各種正式或非公式之方法，隨時儘量公開，使一般國民隨時明瞭國家之真正地位。按過去兩年，凡關外交，宣布極少，故經過及真相如何，一般國民殊不能盡知。」，第一張第二版。同時，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蔣介石召集的全國學術代表談話會上，北平、天津的學校代表，提出的四項意見之中，第一項就是請求政府公開外交，公佈中日交涉的各種文件，詳「大公報」，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十六日，均見第一張第三版。並參閱胡適：「我們要求外交公開」，「大公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張第三至四版；及「再論外交文件公開」，同上，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第一張第二版。另參閱「北平晨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關於外交公開」，見「論評選輯」，「國聞周報」，第十三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及金仲華：「談公開外交與秘密外交」，「大眾生活」，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頁二六一至二六二。



⑭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五全大會開幕，西南中委鄒魯、劉蘆隱等如期出席，參看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三一四；及「國民黨五全代會記」，「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四十五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次月，召開「五屆一中全會」，劉蘆隱膺選為宣傳部長，劉氏辭而未就。「楊永泰被刺案起訴書」，「大公報」，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第一張第三版；及「劉蘆隱答辯狀」，第一張第四版。據「大公報」記載楊永泰被刺案透露有關劉氏之生平，劉氏在一九三七年為四十四歲，住上海蒲右路，自辛亥年起，即追隨孫中山從事國民革命。見「大公報」，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第一張第三版；六月十日，第一張第四版；及六月十四日，第一張第四版。劉氏因教唆刺湖北省主席罪名成立，被判徒刑十年。「大公報」，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第一張第三版；及六月十四日載之「楊永泰被刺案判決書」第一張第四版。

⑮ 改組派即「中國國民黨各省市海外黨務改組同志會」的簡稱，自一九二八年成立後，在上海設立總部，後又在各地設置分部，領導地方組織。到一九三〇年馮、閻反蔣失敗，北平擴大會議垮台之後，改組派在上海的總部基本上解體，各地方組織的活動也逐漸消沉下去，只有一些高層份子，仍然進行政治活動。詳見本書第八、九、十、十一章。一九三一年春，改組派組織正式解散。一九三二年一月，汪精衛再到南京，與蔣介石合作，汪氏雖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前改組派份子陳公博、顧孟餘、曾仲鳴等亦任高位，但一切政治主張，都遵照蔣介石的意旨辦事。一九三五年汪氏被刺，次年二月離國，汪精衛、陳公博的勢力隨之次第消滅。參看江上清：前引書，頁六十八至八十三；又陳少敏：前引書，頁二〇；並參看本書第八章，註④。

## 第十六章 陳伯南先生下野

陳伯南先生下野，本來是一件極其微細的事，似乎值不得敘述，不過這次雖然沒有放過一槍，蔣先生也因此動過三四十萬的大兵，爲着這點，或者也不能算一件太小的事，祇好加以描寫。

伯南先生怎樣下野的？那經過也太滑稽。不過那滑稽還不止下野的當時，就以他坐鎮廣東八年的勛績，也夠耐人尋味。我不大佩服伯南先生的才幹，但不能不欽羨他的福氣；說他處事有沒有一兩手的技術呢？那也不能一筆抹煞。他自從寧粵合作之後，拿着一個西南政務委員會在那裡變戲法，倘使他不滿意於南京，便說西南政務委員會的議決如何如何，倘使他要抵抗胡展堂先生，又說中央的命令怎樣怎樣。要而言之，終他在粵的數年，他確有他的神通，雖然不大高明，但也左右逢源，無不如意。

他對於他私人財政的安排，確是不大理於人口，他縱容他的老哥陳維周走私，所謂走私，實在是公然的輸運；他們利用兵艦走私貨，海關人員，只好白着眼讓他們逍遙往來，他更縱容他的夫人莫秀英作投機買賣，廣東沒有公債可炒，她就炒香港紙幣，廣東銀號有不利於她的開盤，她居然親自帶憲兵馬弁出馬，

立刻禁止銀號交易。他和他的夫人，他的老哥，究竟有多少私產，誰也無法估計，只是陳維周先生爲着他未嫁的女兒死亡，唸佛念經，開喪接弔，一用便二十幾萬，這可使一般窮措大張口結舌而不能下的。

伯南還有一種古怪的脾氣，他迷信風水，迷信扶乩，舉凡迷信的事，很像歸他個人獨佔，一股碌包攬在身上。他用的軍官，要先替他算命，看他們的八字是否和他老先生相沖；要先替他們看相，看他們面上和身上到底有無反骨。他凡是舉大事，是必要扶乩用不着說了，最妙的他聽了風水先生的說話，說洪秀全的祖墳本來出皇帝，因爲葬錯了方向，洪秀全才失敗。他用勢力，出金錢，終於買了洪秀全的祖墳，硬把他的母親重新由墳裡掘起，安葬在洪秀全的祖墳裡。

陳先生許多妙事，確夠他的失敗了。他的失敗不要緊，還累我爲難了許多天。事實是這樣，當汪先生入南京主政之時，我們會約定不再贊成有內戰，如果蔣先生再激動內戰，我們首先設法阻止，倘或阻止不來，則惟有辭職下野，以爲消極的抗議。<sup>①</sup>可幸我們在京四年當局，還沒有這種不祥的事發生，直至胡展堂先生逝世，我以爲廣東再不會動了。

我還記得胡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到南京時，孫哲生先生約了一班廣東人在他陵園寓所談話，在座的有李文範、吳鐵城、馮超俊、陳策、傅秉常、劉維熾，一大羣人。孫哲生先生請我入書室，問我對於廣東今後的態度怎樣，我當時有一個很明白的表示。我說：

「汪先生在中央服務幾年，沒有想過在地方樹勢力，我個人則更久矣乎不想回廣東，所以你對於廣東怎樣，只有通知我一聲，我無不鼎力相助。」

「不過你得注意，你或者想拿廣東作一個力量，然而你的矛盾還靠你自己解除，因爲陳策、陳慶雲、

張惠長，是你的親信，他們就給陳伯南趕出來。你是含舊怨而與伯南交好呢？還是要修舊怨而與伯南交惡，另樹新的力量呢？那你只有自己選擇，我是無從助力的。

「祇有一節，我要再三聲明，我和汪先生都不贊成再有內戰的，南京打廣東，我們固然不贊成，廣東打南京，我們也不贊成。除此以外，你對廣東要我助力時，我總盡力幫助。」

不料胡先生死了不多時，廣東居然向湖南出兵，<sup>②</sup>其原因如何，我至今還莫明其妙。當時紛紛其說，有說陳伯南先生老早已想舉兵，祇是要舉兵，不能不奉胡先生為領袖。現在的伯南先生已今非昔比，他實在不需要領袖，而自己要當領袖。胡先生在世，他不好舉兵，胡先生逝世，他立刻要動手。也有說陳維周曾帶了一個相士名喚翁半玄的到南京謁見蔣先生，他們看出蔣先生大運已去，必將下野，因此趁此時機，舉兵爭霸。這說是否真實，我不得而知，但維周先生的確會來過南京，路經上海，適我也在那裡，也來見過我，他很恭而敬之的稱我為老上司，我問起理由，他說我在廣東當農工廳長時，他是當縣長，所以有僚屬之雅。

伯南對於這次出兵大事，聽說還扶過一次乩，那乩上大書「機不可失」，於是伯南先生遂下決心，找了李德鄰到廣東開會議，決定以抗日為名，分兵出湖南和江西兩省。德鄰是無可無不可的，對於反蔣，正合着他的胃口和主張，拿了伯南幾百萬軍費，便回廣西發動。德鄰和健生商議，健生還是很懷疑，德鄰因此還發過一次脾氣，說：「你們不是天天說反蔣嗎？現在伯南已決心了，你們又不幹，是何道理？」

湖南主席何芸樵先生也接受了伯南一百二十萬，準備歡迎兩廣部隊入湖南。但廣西的部隊已出黃沙河越至衡州，廣東軍隊還未至郴州，到了郴州又有一部分撤回廣東界。為什麼呢？難道又妥洽嗎？不是的，因為伯南又扶乩，神仙告訴他，此次舉事，實在不必用兵，可以傳檄而定。蔣介石必倒，那又何必真要出

兵，多此一舉。

那時正是夏天天氣，南京的氣候，正和廣東的消息一樣悶熱。我夜裡關起門看書，白天打打網球，祇由朋友方面傳來消息，說這次內戰一定打成了，說蔣先生已調動三十多萬軍隊了，又說陳辭修依舊主張調停，又說余漢謀恐怕要降南京。我是不主張再有內戰的，既然不在其位，且自由它，還是讀我的書，寫我的割記罷。

一天中午，我正在看書，天氣太悶人，不由得心內起點焦燥，我的副官進來報告，說：

「蔣委員長的副官處來電話，說今夜委員長請客，如果部長去的，就送請帖，不去的，就不送請帖了。」

「說我身體不舒服，謝謝罷。」我沉吟了一下。蔣先生的飯，我最怕食。因他老先生往往終席不發一言，而被請的賓客又都誠惶誠恐，固然無酒可飲，亦無烟可吸，縱使來賓身邊帶烟捲，爲那乾枯的空氣所壓，誰也不願意首先抽烟。而且廣東的軍事正緊張，難保不討論內戰問題，更使我無可置答。

副官回了話，請帖却依舊送來，到了八點鐘，蔣公館又來電話：「陳部長不舒服，是不是不能起床？若能起床的話，還請來一下，因爲蔣先生有事奉商。」

這一下却使我爲難了，我吩咐副官答覆，說我的確不能來食飯，假如有事的話，請於席散之時，再打電話來，我準到蔣公館領教。九時過去了，十時又過去了，我如釋重負，心裡想大概不會再迫我了罷，迨時鐘到了十時半，蔣公館終於來電話，說席已散了，蔣先生和賓客正等着，請我立刻去。

蔣先生那時住在孝陵衛的孔庸之公館，我到時，大家都坐在屋後的草場，電燈沒有亮，人數又很多，

從廳內射出的燈光，我微濛的看見都坐着廣東人，唐少川、王亮疇、孫哲生、李君珮、陳樹人、陳策、傅秉常、劉季生，還有許多人，我不大記得，大概都是留京的粵籍中委。蔣先生招呼我坐在他的左手，我知道一定爲着陳伯南的事情，並且推測到已經定了辦法，只不過要我來畫一個諾。

「余漢謀已於今天到南京了，」大家沉默了一陣，蔣先生向我說，似乎告訴我一點好消息。

「余漢謀這次來，不是陳伯南叫他來的，是他自動來的。」蔣先生又加上一句解釋，恐怕我還不明白。

「我們大家商議一個提案，提議取消廣州政治分會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請你也簽個字。」這時孫哲生向我發議論了。

哲生先生手下的大將陳策，已不待我答話，趕忙從口袋中拿出一張紙，上面自唐少川以下都署了名。蔣先生看我沒有筆，吩咐他的副官進廳內拿筆墨。統一是我的主張，取消各地的政治分會，尤其是我的主張，但這幕戲劇，顯然是孫哲生佈景的，但爲什麼不在事前通知一下我，却似擺設鴻門宴，強迫我簽字。我心裡大不高興，簽了字便辭了蔣先生回去。

哲生先生當時確乎非常起勁，因爲余漢謀之來，曾和他接過頭，除了省政府主席，蔣先生內定黃慕松之外，其餘廳長人選，哲生都想出主張，民政廳定了立法院的秘書長梁寒操，建設廳定了實業部次長劉季生，不過財政則蔣先生早已定了宋子良，哲生想那時過問財政，已來不及。甚至余漢謀軍隊的政治部主任也定了立法委員鍾天心，陳策先生雖然很想重握珠江的海軍，到底僅得一個虎門要塞司令。

余漢謀一變，廣東各軍隊都搖動起來，師長李漢魂來一個關雲長掛印封金，通電辭職，別一個師長鄧

龍光也連帶通電反對，不辭而行。有幾艘兵艦逃出了粵海，歸附了中央，更給伯南以致命傷的，黃秉衡帶了許多飛機師，駕了飛機，一氣飛到南昌中央的飛機場降落，銀樣腊頭鎗的陳伯南，看大事已去，宣佈下野，末後還聽人說一件笑話，他事急起來又扶乩，乩上還是照舊大書特書「機不可失」。呵，前次乩語所謂機不可失，並不是說時機不可失，而是說飛機不可失。現在飛機已全飛附中央了，大事也去了，伯南先生似乎還不大識時務，派了一位師長陳漢光到牯嶺見蔣先生，他是答應下野，但請蔣先生不要交廣東給余漢謀。下野的人物說話還靈應麼，當然照例應毋庸議，於是陳伯南先生只有悄然下野了。<sup>③</sup>

陳伯南先生下野之後，又便宜了幾個人，財政廳、兩廣鹽運使，自然交代不清，繼任的人物宋子良和唐海安得了很多好處，才風平浪靜的過去。廣東問題既已解決，蔣先生想以高壓之勢，屈服廣西，不俟李白的同意，發表了白健生當浙江省政府主席，黃季寬當廣西綏靖主任，然而李白知道若服從蔣先生命令，無異乎自殺，反正都不了，不如抵抗罷。

廣西不獨不服從，並且出兵廣東的南路，佔據了北海，並且在海口又鬧了一件交涉。蔣先生到底能忍耐，急忙化軍事的解決為政治的解決，兩方代表坐了飛機來往了幾次，白健生和黃季寬的任命終於取消，白後李白依然坐鎮廣西，西南又宣告和平解決。<sup>④</sup>

廣東問題，其起也勃然，其終也寂然，不滿一月，兵不血刃，而大局安定，這真是我們始料所不及，匪獨西南民衆之福，蓋亦中華民國之福也。

## 第十六章註釋

①汪精衛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廿一日到南京，出任行政院院長。其入京情形及所發表的談話，詳閱「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九卷第六期，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又「政府遷洛誓與暴日決鬪」，同上，第九卷第七期，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②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西南執行部及政委會，以陳濟棠、李宗仁爲首，電請抗日。七日，廣東、廣西軍改稱「抗日救國軍」。八日入柳州，中央有電勸導。十一日，兩廣領袖覆電，措詞激烈。十二日，中央軍人衡陽，廣東軍退耒陽。十四日，退出湖南，參閱「一周簡評」之「兩廣出兵」，「國聞周報」，第十三卷第二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及「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要」，同上，又「一周簡評」之「兩廣時局」同上，第十三卷第二十四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二日；又記者：「粵桂問題之展開」，同上。至陳濟棠起兵之種種因由，陳公博所述與「李宗仁回憶錄」所載者大抵相同，詳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福州人民政府與廣州『六一運動』」，頁六十一至六十三。

③南京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明令陳濟棠免職，陳氏於七月十八日離廣州至香港。余漢謀爲第一軍軍長，本是陳濟棠的心腹，後來陳氏疑其有貳心，密派特務暗中監視，爲余漢謀所悉，乃漸生怨懟之心。陳氏發動「六一運動」後，蔣介石派蔣伯誠爲代表，前往廣東。蔣伯誠勾結余漢謀，余氏乃於七月中旬通電擁護中央。詳李宗仁，前引文，頁六十三至六十四。

④南京明令陳濟棠免職時，曾同時發一電令，聲明廣西維持現狀，仍以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分任廣西正副



綏靖主任。蔣介石突然變更原意，電白崇禧「出洋攷察」，李宗仁調往中樞軍委會任職。李、白覆電反對。未幾，又接覆電，改任白崇禧為浙江省主席，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桂局善後則由黃紹竑出任廣西綏靖主任，負責處理。廣西不服，蔣氏動員壓境，旋又欲放棄武力解決。終於在馮玉祥緩頰之下，蔣氏乃採和平解決的方針。參看李宗仁：前引文，頁六十四至六十五；及 *Lary*, pp.198—199.

## 第十七章說明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中的一個轉捩點，它使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再度聯盟，共同對抗日本的侵畧。整個事件的經過有很多異說，即使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和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也大有差異之處；主要的是「西安半月記」內處處斥罵張學良，而「西安事變回憶錄」却着着爲張學良辯護，謂其舉動實爲愛國心所驅使；其次是蔣著並無提及共產黨與其夫人的會談，而宋著則指出一個「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即周恩來）曾與之商談，並說該人甚明大體。

張學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就任「西北剿總」副司令，並代理總司令（蔣介石）職務。楊虎城是陝西省實力派的首腦，一九二九年以後擔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和西安綏靖主任，並一度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蔣介石對於張、楊不甚信任，除免去楊虎城陝西省主席及調去他的一旅軍隊外，又安排晏道剛和「藍衣社」首腦曾擴情分別担任「西北剿總」的參謀長和政訓處長，加以監視。一九三五年後，張、楊展開了聯共抗日活動。此時蔣介石因要應付「兩廣事變」，在華北、西北的嫡系部隊幾乎全部南調，無力對付西北。「兩廣事變」平息後，蔣氏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匆忙趕到西安，訓令張、楊繼續剿共。但張、楊都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乃以避壽爲名，由西安飛至洛陽，住了一個多月，調兵遣將，在軍事上作了一連串的部署。十二月四日，蔣氏重臨西安，提出兩個方案給張、楊抉擇：（一）服從剿共命令；（二）如不應允剿共，就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分別調駐福建和安徽，而陝西、甘肅兩省則讓給中央軍去剿共。張、楊與蔣氏數度談判後，仍堅持不打內戰，不離開西北。最後便在十二月十二日拘押了蔣氏。

當時國民黨內對蔣氏被囚有兩派主張。何應欽（當時為南京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極力主張討伐張，楊，炸平西安；宋子文、宋美齡則反對討伐，力主用和平方式營救蔣氏。但是當時的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却通過了討伐的決議，而南京隨即傳出謠言，謂主張討伐者別具用心，希望借此逼使張學良殺害蔣氏，以便何應欽接代蔣氏的職位。一些反對國民黨的史料更指出，當時確有「何篡蔣位」的陰謀，謂何氏於西安事變後三天即使人與劉湘、龍雲、王伯羣等人商議，並準備推汪精衛為國民黨總裁，而何氏本人則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云云。宋美齡在一次演說中也同意有關之傳說，並親自出面召集黃埔軍官和空軍人員開會，勸他們不要聽從何應欽命令，又央請蔣氏的英籍澳人顧問端納（William Donald）前往西安，探明情況，居中調停。宋子文、孔祥熙等又與英、美駐華使館保持密切聯繫。在這種情況下，討伐的決議便消聲匿跡。於是，蔣氏的被囚從「國家大事」一變而為「宋、孔二家的家庭私事」。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內指出，宋子文在十二月十九日決定入陝一事，曾遭人阻撓，宋美齡等乃主張：「政府雖不能與叛變者直接談判以自貶威信，亦應准許我等作勸導叛變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後，政府令各報登載，充分說明子文此行，純為私人資格之意義」云云。

蔣氏被捕以後，張學良、楊虎城立即通電全國，提出八項主張，陳公博所載，次序略有出入，然內容大致相同，詳見本章註⑥，不復贅述，最後，經宋子文、宋美齡、端納與張、楊談判後，達成了六項協議：

- （一）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 （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

- (三) 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 (四)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 (五) 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 (六) 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蔣氏對上述商定的條件，提出以「領袖人格」保證，不作書面簽字，回南京後分案逐步執行。

## 第十七章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對於我是絕大的一個謎。讀者要知道內容，愛讀「官書」的，可以看看蔣先生自己著的「西安半月記」，①愛發現秘密的，可以看看依格斯諾 Edgar Snow 所著的「遍佈中國的紅星 Red Star Over China」②——後來有人譯為「西行漫記」。我呢，對於這兩本書，以為「西安半月記」有不少自己隱諱的地方，而遍佈中國的紅星則太袒護和頌揚共產黨。

我對於西安事變說它是絕大一個謎，不是說它謎在原因，而說它謎在結果。蔣先生在西安究竟答應了張漢卿、楊虎城、和共產黨什麼條件，恐怕除了參加西安談話的幾個人之外，誰也始終蒙在鼓裡。③

廿五年十二月十二夜，我記得是張岳軍在他的外交部官舍請我們食飯，那夜是兩桌人，孫哲生也在內。那夜我不知爲什麼，大概是偶然罷，不到七時便到了外交官舍，除了我之外，一個客也還沒有到。張岳軍匆匆的下樓招呼我，又匆匆的上樓，我覺得他神色張惶，而又故作鎮靜的樣子。這時已有兩三個客來，張岳軍又下樓拉我到飯廳。

「蔣先生被捉了。」岳軍還沉着。

「是被誰捉的。」我有點驚詫，因我以為蔣先生還在洛陽。蔣先生的行踪報紙一律不敢登載的，我對於蔣先生的行踪也一向不願意打聽。

「被張漢卿捉的。」岳軍似乎怪我連蔣先生早到西安的臨潼還不知道。

「現在蔣先生在那裡？」我不由得感覺有些悲哀。

「今早在華清池被捉，解到西安城了。」岳軍聲音也顯了哽咽，但嘴邊似乎掛着苦笑，掩飾他的悲痛。

「唉。」我不覺流下淚來，「我雖然和蔣先生很隔膜，但我實在太難過了。」我抑制不住我的傷心，因為蔣先生倒底是國民黨一個負責人，今日遭遇了這個悲運，我起了同情和可憐之感，不覺把一向不滿意於蔣先生的反感消失了。

「不要再說，孫哲生來了。」岳軍抑着我，其時孫哲生入了客廳。

那夜的宴會算是草草終席，主客也不再提。席散之後，岳軍告訴我他要去何敬之公館開會議，而我則要去告訴汪夫人，我約定見了汪夫人之後，再到何公館會合。

是的，我一向一肚子不高興蔣先生，自入南京之後，我的態度依然一般的強硬。我有一個怪脾氣，也可以說是一種偏見，我凡是交朋友，如果這個朋友第一次對我不起，我很容易原諒他，因為一個人誰沒有過失呢，誰不會有誤會呢？如果這個朋友第二次對我不起，我也原諒他，或者那不是他的過失和誤會，而是一定我有不對的地方？我再反省，再原諒。及至這個朋友第三次對我不起，那就不管是他錯或是我錯，

我決定不再做朋友。蔣先生對我不起，不止兩次了。我最不平的是他無緣無故弄起三月二十之變，他要爭領袖倒也罷了，他偏偏在李家橋對我胡謔謠言，說他之逐汪，是爲汪要謀害他，我這個人一世都不肯受人騙，叫我如何能容忍？末後第一次汪蔣合作，我對於他也算棄嫌修好了，然而他一定要我們驅逐李任潮，及至我們失敗，他又拿幾十萬給李任潮打我，這種翻雲覆雨的手腕，不只使我不慣，並且也使我沉不住。民國十七年胡先生由歐回國，他真張惶失措，要我替他辦宣傳，要我叫劉鐵夫到塘沽奪白健生的隊伍，及至胡先生提出妥洽方案，他反而壓迫「革命評論」，迫我出洋，又在三全大會警告汪先生，開除了我們的黨籍。這種舉動還能談政治道德嗎？還能講個人友誼嗎？我決定不再和蔣先生做朋友了。

民國二十一年到了南京之後，我決定只和蔣先生存在着政治的關係，絕不恢復私人的友誼。他寫信或打電話來請，我一定去看他；他徵詢我的意見，我一定知無不言。至於他請公飯的應酬，我照例請三次去一次，除此我從來不自動上他的門。自民國二十一至二十四年，蔣先生爲着剿匪住江西，那時廬山儼然變了一個太上政府，我足跡就沒有踏上過牯嶺，無論南京夏天天氣怎樣悶熱，我也接受着。

我的不奉承蔣先生，顯然是公開的秘密。「到底公博有骨氣。」蔣先生底下的人也私自下了這個意外的批評。

「公博，你爲什麼不敷衍敷衍蔣先生呢？」汪先生大約也有些看不順眼，一天終於勸我。

「我已決定不和蔣先生做朋友。爲着政治關係，汪先生不能不敷衍蔣先生，至於我呢，沒有很大的政治關係，我就不願意再敷衍。」我依然堅持着我的成見。

至於宋子文也屢次勸我不妨對蔣先生讓步，我說：

「蔣先生是不容易做朋友的 General Chiang is very hard to make friends with。」我用英語答子文，我們兩個人向來談話都用英語，因我不懂他的上海話，而他或者也不懂我的官話。

「蔣先生不要朋友，只要僚屬的 General Chiang does not want any friend; he only wants subordinates。」子文這樣答覆我。

老實說，我就願意做僚屬，也不願意投到蔣先生的門，算了罷，我還是做我的「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祇是我當日聽了蔣先生被捉的消息，心內倒有些悽然，我一生的脾氣都不願落井下石的，也鄙視幸災樂禍的，他一世英雄，縱橫捭闔，桀驁梟雄，結果也像胡展堂和李任潮被人扣了，我不由得不滿一掬同情之淚，對於他一向的強項，似乎已登時軟下來了。

而且他的被捉，生死未可預期，他落在別人的手也還罷了，今日倒落在無法無天的張漢卿，無知無識的楊虎城，和素與國民黨敵對的共產黨之手，如何使我不同情，不悲憤！

.....

東北軍早有異動的消息，差不多也成了公開的秘密，我早就知道了。④錢公來先生是一個東北人，從前做過張漢卿的秘書，也是一個改組派的朋友；張漢卿自從解除了副總司令之後，他閑住在北平，雖然他閑住，可是對於東北軍的人都熟悉，對於東北軍的消息特別靈通和清楚。他爲着張漢卿蓄有異志，曾兩次到南京報告我。但他老先生的意思，并不是有害於張漢卿，他以爲我和漢卿有相當的友誼，希望我勸勸漢卿，早日懸崖勒馬。

「張漢卿已和共產黨妥洽，陳先生知道嗎？」錢先生誠懇懇的告訴我。



「我一概不知道，這恐怕是謠言罷。」我無論怎樣也想不到張漢卿有這轉變。

「事情很的確，因為張漢卿入陝之後，給共產黨打了幾次敗仗，損失了好幾萬人，此後他的東北軍，見了共產黨差不多望而生畏。除了這個原因之外，又有兩個近因，第一個是張漢卿自離開北平，他的底下人許多失了業，譬如王卓然他們就加入了人民陣綫，有人還說他們加入了共產黨。這班人早已鑽入陝西張漢卿的幕下，自命爲東北軍的新派，日日慫恿張漢卿左傾。第二個原因是陳立夫們也太不管好歹了，五全大會張漢卿提出王樹常和他的秘書長爲中央委員，然而立夫選出不知名的CC系，使張漢卿和他底下的人都不滿，這班失意的先生們，更日日慫恿他反南京。陳先生，你想涓涓不塞，收成江河，我們爲着國家，爲着漢卿個人，也應該設點法。陳先生，你和漢卿是好朋友，所以我請你有機會勸勸他，以免他走入自殺之路。」錢先生又誠懇懇的請求我。

「他怎樣和共產黨妥洽？」我還是不大清楚。

「東北軍不打仗已大半年了。他們也不打共產黨，共產黨也不打他們，聽說他們還做軍械的交易，東北軍預先把軍械埋在指定的地下，共產黨來，一哄便走。等到共產黨拿到了軍械，把購買軍械的錢埋在那處，東北軍又哄回來去拿錢，這樣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錢先生又嗟嘆着。

「這樣大事，難道蔣先生毫無所聞嗎？」我不勝驚異之至。

「這個我不知道。蔣先生也許知道一點風聲，但知道又那能奈何張漢卿？不過他們實在那裡幹了，錢先生確關心國家和張漢卿的本人。」

「他們拿什麼口號不打共產黨？」我又追問着，因爲總不明白張漢卿變得那樣快。

「他們主張抗日，主張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錢先生到這時候才告訴我東北軍的最近主張。

「張漢卿不是著名不抵抗的？爲什麼今日又大吹大擂抗日？」我忍不住笑起來。

「那自然哪，他怕在東北打仗，所以不抵抗日本。現在他在西北又怕打仗，所以願意回老家。我看他怕打仗是真，抗日是假。」錢先生到底是一個改組派，對我說出他觀察出來的真意見。

我答應錢先生倘我見着漢卿時，一定苦勸他，可是我自從和錢先生談過話之後，張漢卿就沒有來過南京，祇是從朋友方面得了些未可全信的消息，說他時時請了太太和小姐們到西安玩，就在西安賓館開跳舞會，一時還未動南京和上海的遊興。這個東北軍異動的消息太嚴重了，我本來也想告訴蔣先生，不過一來我不願上他的門，二來他和張漢卿的關係比什麼都密切。張漢卿自從舉兵入關，摧破擴大會議，蔣先生當他是中興的功臣，并且聽說張漢卿的夫人于鳳至曾拜宋老太太作乾娘，社會上又久已傳聞，說張漢卿要聘孔庸之的小姐作媳婦。這樣差不多等於君主時代，立中興之功，兼外戚之貴，我如何肯犯「疏不間親」之嫌，去報告這個未可全靠的消息。而且說到張漢卿罷，我對於他的印象還不錯，最使我認爲漂亮的是在鄭州兵敗時留給我們那一封信。我認定這個人祇是太愛玩一點，但還是一個爽快人，然而在他離國向我辭行時，和我談過一次話，我又認定這個人不知有國，只知有己。

他離國赴歐，⑤真是一個極失意的人，我這人是永不打落水狗的，何況我對他有相當好的印象？我不免對他安慰，不免對他同情，一談就談到日本進兵灤河和攻長城各口的事件。

「日本鬼子真可惡。我知道他們一定要搶東北的，得不到東北是不肯住手的，所以在奉天我也不抵抗了，錦州也讓出來了。我以爲他們總可以心滿意足了，不料他們今日又要打入關。日本鬼子真可惡！」⑥

張漢卿悔嘆着他的掐指神算不靈，於是在無意中對我發悶氣。

呵！原來他在瀋陽的不抵抗，錦州的讓出，都是他故意的，而且在計劃中的，這我可不能原諒了；所以他回國之後，管他駐節武漢，管他移防陝西，我都是冷冷的，因為這種沒有心肝的人，我不願意和他們做朋友。錢先生大概不知道我對張漢卿最近的態度，還請我勸勸他。這種人是勸得下的嗎？祇是徒費唇舌而已。

錢先生回北平不久，蔣百里先生從德國歸來。他是替蔣先生走德國路綫的，這時又回國報告。他本住在上海，專等蔣先生回京，但蔣先生久留洛陽不歸，百里只好前去。他路過南京，照例來看我，他告訴我要到洛陽看蔣先生，順道還要考查西北的軍事。我告訴他最近張漢卿的情形，叫他最好只到洛陽為止，再不要上西安，恐怕東北軍旦夕有變，不要受那無辜池魚之累。百里先生似信不信的，依舊起程，實在當時我也是似信不信的，最多以為張漢卿有一部分隊伍勾結了共產黨，實在沒有料到他本人就是一個西安事變的罪魁禍首。百里先生至西安之後，果然做了半個月的俘虜，他回來時，還悔恨不聽我的金石良言，受了一場驚恐。其實我也何嘗是未卜先知呢？只和他說了一句笑話：「不聽山人之言，致有今日之禍。」

現在我可以重複敘及當夜的情形了，我離開外交官舍，即至赤壁路見汪夫人。他在我未到之前，已得西安事變消息，和我談了一陣，我們一同到何敬之公館。門鷄關的何公館那時立刻戒起嚴，巷口和門口滿佈警備，我們入室，已見了不少人在座，大概中央委員和各院部的長官，凡是知道這個消息的，都不期而會的集在何敬之家裡。可是人只管多，不像開會的樣子，主人的何敬之忽起忽坐，而聚在廳內的各人，都

在那裡交頭接目，囁囁私語。我見那樣紛亂的情形，忍不住對何敬之提議：第一、政府應將真相公佈天下，以釋羣疑。第二、政府應該明令討伐，免得張漢卿拿住蔣先生對中央要挾。第三、以上兩件事辦到，才打電西安要求釋放蔣先生。何敬之在口袋裡掏出一本日記簿，把我的提議一一記上。那時大家手忙腳亂的混至十一時，又一起到中央黨部開緊急會議。

那時的空氣是緊張，情形是悲憤，許多年青的中央委員，平日盛氣虎虎的，到了那時，不知如何是好，多數緘默不作聲。到底還是戴季陶先生首先站起來，演說一番大道理，結論是主張中央明令討伐，這個提議，在一致沉默和悲憤之中，全體通過。⑦何敬之又報告當日下午已派飛機到西安和臨潼偵查，據說在華清池前面，有好幾堆穿黃色制服的，頭對頭的倒臥地上作梅花形，那無疑的全是殉難的守衛憲兵，死後給張學良的軍隊棄置在那裡。又說西安城上已遍樹了紅旗，這個消息，到後來才証實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只是飛機師有先入爲主之見，發生了這種錯誤偵察。

過了一夜，南京已接到西安通電，張漢卿和楊虎城已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立刻採取抗日政策。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衆救國運動。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會議。⑧南京把這個通電扣留起，一心一意的籌備討伐，不過事情突然起了變化，早上蔣夫人已從上海回京，堅決主張和平解決，并叫澳洲人端納飛陝，⑨探明張學良的真意。這位端納先生在東北時原是張漢卿「顧而不問」的顧問，他是外國人，想張漢卿不致加害的。那時可以說黨部的意見是一致，家庭的意見是不全同，黨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個對峙的形勢。在中央黨部是不問蔣先生的生死，專着

重在中央的威嚴，在家庭則不願考慮政府的威嚴，專着重在蔣先生的自由和生命。有一次在中央軍校開會，蔣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發脾氣，痛陳不能和張楊講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這幾年以來，就自己訓練成一個以道自任的大賢人，穿必馬褂長袍，寫必楷書正字。他那時對於張楊，大有「與漢賊不兩立」之勢。到了十六日開中央政治會議之時，更大聲疾呼，主張聲罪致討，說到大義凜然之時，不惜大拍桌子，以補其聲淚俱下之不足。孔庸之自然跟着蔣夫人主張和平解決的，因此給季陶大罵一頓，連連謝過不遑。庸之先生本來在會場上是素來盛氣凌人的，或者因蔣先生被困西安，沒有靠背罷，那時真是低聲下氣，變了一個寬客大度的謙謙君子。連那位平日怙怙倪倪的居覺生院長也乘時主張正義了，他站起大呼：「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討伐派大約是勝利了，然而不然，南京忽然傳出一種謠言，說何敬之爲什麼要堅持討伐，爲的是不願保全蔣先生，他要迫到張楊情急，對蔣先生加害，他好繼承蔣先生的大位，升做軍事領袖。⑩這種謠言實在來的可怕，照這樣說話，則大凡主張討伐的，都是別有用心，我雖然沒有冀倖大位的嫌疑，但以事成僵局，只好不管。爲着西安事變，我倒得幾日的清閑，宋子文和蔣鼎文的來往，我也從不過問，因爲那時蔣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國家大事，而是宋孔兩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無法過問了。

蔣夫人又在中央軍校演說，居然提出說主張討伐的別有用心，以是何敬之只好噤口不言，戴居兩位老先生只發乾急和悶氣。我看這種情形，不特不好參預，還以早日離京爲佳，趁着汪先生聞得西安事變，趕緊回國之時，我和汪夫人遂於十二月三十三日先期赴香港迎候。

我們是在二十五早抵香港的，我即上岸，而汪夫人却乘原船直駛星加坡。夜裡我一個人無聊，往平安

戲院看電影，至到十時左右微聞各地的鞭炮聲，我心懷疑着，這是什麼，或者果真萬幸，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罷。迨電影完畢出場，街頭報販真賣着號外，說蔣先生已平安離西安，我心頭一喜，雖不知經過怎樣，但蔣先生得安然脫險，總是好的。

我在二十六日打了一個電報去慰問蔣先生，一住香港便十多天，等到汪先生在一月十二日抵香港，我才陪同他一起乘船回上海。那時中央派了周佛海、邵力子、周啓剛，來迎汪先生，我又問問他們我離京後的情形，及蔣先生脫險的經過。

「蔣先生這次吃了這個大虧，以後大概要改變些罷？」汪先生在船上閑談起。

「我敢担保他不會改變。因為蔣先生平日的舉動，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氣。政策是由理智發生的，碰了壁當然要改。但脾氣是先天帶來的，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你想蔣先生已是過了五十歲的人，他能改變他的脾氣麼？」我笑着分析蔣先生的脾氣，汪先生也笑了。

我們回南京之後，知道蔣先生早已回奉化養病，張漢卿也已受過軍事審判。他的受軍事審判，只不過是一個形式，照例的定罪，也照例的特赦，這幕喜劇，雖然不是預先演習過，却早已預先排好的。只可惜臨時軍事審判的審判長李協和先生，還在審判時受張漢卿一頓大罵，說南京這樣腐敗，那樣反動，一個個都應被革命。差不多除了蔣先生一個人之外，人人都該罵；他雖然不罵蔣先生，但他居然捉過他，囚過他，放過他，這也太夠了。李先生雖受了這一肚子氣，也無可奈何，終於張漢卿隨着蔣先生到奉化，在他的夫人于鳳至沒有由英國回國之前，蔣先生還叫趙四小姐陪他日日逛雪竇山，在山谷內大放鞭炮，聽着霹拍的迴音，來排遣他的悶氣。

在南京又碰見蔣百里先生了，<sup>①</sup>他是西安一個偶然的階下囚！我詢問他當時事變的實況。

「在事變當時，你受了驚恐沒有？」我問。

「那裡沒有！那時只好聽天由命罷了。在別人還不知什麼事，我倒憶起你的警告來，斷定是張漢卿作反。」百里事後想起，也化驚爲笑。

「我真替你耽心。你本來不必去的；若真不幸，豈不是天外飛來的橫禍？」我補述我在京替他焦心的情形。

「還好，我們沒有一個傷。只是一個不幸的邵元冲，他或者因爲是一個文人，聽了槍响慌了，趕快爬過西安賓館的牆找地方跳，楊虎城軍隊看見有人在牆上爬動，放了一槍，恰恰打破他的腎囊，這樣才喪命。」百里又惋惜着。

「你們被禁時，豈不苦悶嗎？」我想知道他們被禁的情況。

「那到沒有什麼。我們自幽禁一起之後，張漢卿跑來看我們，連說對不起，并每人給了二百元，叫我們打小麻將消遣。我們事到其間，也只好聽天由命，終日大打麻將。」百里又笑起來。

「還有什麼奇怪新聞？」我又問。

「呵！還有陳調元結婚的故事，因爲陳繼承夫婦來西安，還帶着一個老媽。那時我們被捉，四處被汽車集中起來，囚犯的運輸是不分貴賤尊卑的。剛好陳調元和陳繼承的老媽同車，大家笑他和那個老媽結婚，我爲此倒做了一首鹹詩呢。」百里先生忘記了當時的痛苦，談起更感興趣了。

「那夜會擴情還在西安電台廣播，開首他說算不是受脅迫的，到底是不是出於自動？」我又憶起會擴

情的廣播來，曾先生是蔣先生最親信的一人，我不大敢信他有這樣事。

「那倒確是自動的。現在蔣先生已把他關起來，說他無恥。」百里詳細告訴我。

「聽聞蔣先生在受困時，態度很強硬，這還像一個樣子。」我又想問蔣先生的狀況，那時「西安半月記」還沒有出版。

「是的，當時態度的確很強硬，但到蔣鼎文離西安時，態度反而軟了。大概當他被捉之時，情知必死，所以不怕死，追後來蔣鼎文可以離西安回京送信，又不覺有生還之望，所以反而怕死了。唉！人總是人，很難說的。」百里不禁深深嘆口氣。

「我聽見人說，蔣先生對張楊的訓話，還是過後補做登報的，你知道不知道？」我又憶起蔣先生那段訓話。

「當時蔣先生夫婦在西安起飛時還很狼狽，大概他沒有時間訓話罷。」百里沉默了一回才答。

.....

西安事變的實況，我大概清楚了。蔣先生答應了張楊什麼，誰也不知道，他沒有簽字於任何條件是事實，然而他確曾保證實行幾件大事，也是一個事實。我們但知蔣先生離陝的那夜，全國都在放鞭炮，並且警察沿街拍老百姓的門叫放鞭炮，說張楊服從蔣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樣的拍老百姓的門叫放鞭炮，說蔣先生服從張楊的主張了。

那真是一個謎了，不過那謎慢慢也露了一些曙光，廿六年三月間，中央召集一個全體會議，通過一個「根絕赤禍案」，雖然該案開始批評了共產黨一頓，但該案的內容，確是容許共產黨活動的。⑫共是不剿



了，紅軍可以收編了，蘇維埃的邊區政府也可以存在了。張岳軍的外交部換了一個王亮疇，所謂愛國七君子也逍遙出獄，在各地火吹火播的演說和出小冊子了。

西安事變閉了幕，蔣先生和蔣夫人還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記」和「西安事變回憶錄」的合刊。<sup>⑬</sup>一天中央政治會議正開會，宣傳部長邵力子剛坐在我的旁邊，他正心誠意的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問他看什麼？他隨手把那本草稿遞給我，說：「你看看罷，看有沒有毛病，這本書還沒有出版呢。」我一看原來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個鐘頭一氣讀完，會議還沒有散。

「這本書很有毛病，應該斟酌過才可出版。」我對於力子先生貢獻。

「我也這麼想，你試說那毛病在那裡？」力子也虛懷若谷的問我意見。

「我草草一看，便發現半月記和回憶錄很矛盾。你看蔣先生在半月記處處罵張漢卿，而蔣夫人在回憶錄倒處處替張漢卿辯護。而且蔣先生在半月記裡從不說他見過共產黨，見過周恩來，蔣夫人在回憶錄則敘述張漢卿介紹一個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既說他是「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又說「彼等并未參加西安事變」，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實不盡的馬脚。我以為既有半月記，就不出回憶錄也罷，如果回憶錄一定要發刊，非大加改削不可。」我對力子貢獻着，因他是一個宣傳部長，宣傳不妥，他也有責任的。

「你說得對。」力子很坦懷。

這樣，這本半月記合刊，印刷好又停止發行，忽發忽停，反覆了三次，結果還是出世了。我責任不在宣傳，自然不管這些閑事。許久我又碰見力子，我問他爲什麼還是讓他這樣矛盾，他說：「蔣夫人一定要

這樣，不肯改，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敘述西安事變算已完畢了，我想還補一段尾聲罷。廿七年夏天的一夜，我們已由下游退至武漢，就是武漢也差不多要失，那時蔣先生每個星期六都在武昌開一次座談會，散會後我和張岳軍一起渡江回漢口。那夜在船上僅得我們兩個人，武漢江面那樣濶，就是風平浪靜，也得費半個鐘頭左右才渡得過江左岸。我們在船上太無聊了，我又和他開頑笑。

「你真是走『秘運』了。中央政治委員會你是秘書長，大本營你也是秘書長，最高國防會議你又是秘書長。倘若國民參政會成立你又做秘書長時，秘書長都給你包辦完了。」我們時時沒有事便彼此說笑。

「唉，我真不耐煩幹。我會對蔣先生辭過職，我願意不穿洋服，就穿軍服。穿洋服就是希望蔣先生放我出洋，穿軍服就是希望蔣先生叫我帶兵，我還是頂瓜瓜一個土官生呢！」張岳軍一半嘆氣，一半說笑。

「誰叫你文武全才，今日正好弄得文武不武。」我又故意挖苦他。

長江是那麽急流，船走了半小時還是不能抵岸，我偶然長嘆一聲，因看見武漢就要失，而這次仗到底無法結束。

## 第十七章註釋

①「西安半月記」主要描述蔣介石以其高尚人格感動了張學良及楊虎城，以致他們要釋放蔣氏。書中其他重點指出於事變之前，蔣氏深信楊虎城無謀叛之迹，謂：「蓋虎城參加革命之歷史甚久，亦為本黨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變也」。見蔣中正、蔣宋美齡著：「西安半月記、西安事變回憶錄」，（按前書題為蔣中正著，後者為宋美齡著。）南京，正中書局，一九三七年，頁十一。又指出張學良看到蔣氏之日記大為感動，謂：「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同上書，頁二六。按：「西安半月記」一書實為陳布雷為蔣氏代筆，見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七年，頁一一〇。

②在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37) 一書頁四〇一至四四一中史諾首先指出東北軍與西北軍不滿的原因。及在蔣介石被南京方面以何應欽為首積極籌備討伐西安叛軍之情形，但鑒於種種實際環境下，蔣介石乃要與張學良、楊虎城及周恩來等各方面協商。陳公博所指史諾有袒護和頌揚共產黨之處，大抵是史諾指出了共黨在經濟、政治及軍事各方面都極需要和平，又講述西安事變善後時，共黨切實履行他們所訂定停止內戰的種種措施。

③張學良，字漢卿（一八九八——），遼寧海城縣人；國民革命軍北伐末期，張氏率東北軍易幟歸順中央，時為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國於是得到統一。一九三〇年九月汪精衛等於北平召開

擴大會議時，張學良曾舉兵入關摧毀之，自始成爲蔣介石的愛將，惟於九一八事件中，因不抵抗關東軍入侵，東北三省遂陷於日，得「不抵抗將軍」名。一九三三年四月離國赴歐，次年返國。一九三五年九月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並代行總司令職務。西安事變後隨蔣介石返南京，遂爲軟禁。國民黨遷台，張學良仍未獲釋。生平見 Boorman, I, 61—68; Wu Tien-wei, *passim*; 並參考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西安事變與周恩來同志」，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頁十三至八二。楊虎城，原名彪，陝西蒲城人（一八九三——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辛亥時參加革命，一九二四年入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初隨馮玉祥參加北伐，一九三〇年升任爲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主任，並一度兼陝西省政府主席，唯自一九三一年起楊虎城與蔣介石間常有衝突矛盾。西安事變後，於一九三七年四月楊氏被迫辭職出洋，同年十一月返國後被囚，更在一九四九年被殺。生平見 Boorman, IV, 6—7; Wu Tien-wei, *passim*; 王德昭：「楊虎城」，載於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第一卷，頁一一九至一二五；羅瑞卿等，前引書，頁三一至八二。雖然蔣介石在西安沒有簽署任何文件，但從各方資料顯示蔣介石會以其領袖個人人格保證一些協議，據中共方面謂該協議有六項：已引錄於本「說明」中，不復贅述，詳見羅瑞卿等，前引書，頁五四至五五；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一卷，頁二三八。Wu Tien-wei, pp. 138 and 151—152。另參攷郭曾愷：「一個歷史問題的交代」，載於「西安事變三憶」，澳門大地出版社，一九六二年，頁八六及九一；漱流：「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懺悔錄』」，「明報月刊」，第三十四期，一九六八年十月，頁二六至二七。

④東北軍有異動的原因甚易理解，自東北三省及熱河相繼失陷之後，東北軍被調往西北「剿共」，「剿共

「時却蒙受重大挫折，（楊虎城的西北第十七路軍「剿共」時的遭遇亦大致相同。）而共黨則極力向他們爭取，使他們理解到剿共是對他們沒有益處的，反而被蔣介石利用，使他們消滅於與共黨作戰的「自相殘殺」中，嗣後中共方面調派了很多特工到西安的東北及西北兩軍中運動，試圖達成「抗日反蔣」爲口號的統一戰線以應危亡。參考 Wu Tien-wei, pp. 1—57; Snow, pp. 401—410; 羅瑞卿等，前引書，頁四至二五。黃德昭，前引文，頁一二二至一二四；毛澤東，前引書，第一卷，頁二三八；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三編，頁八一至八九。

⑥張學良是於熱河失守後，引咎辭職，而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携眷及英籍澳人端納離滬赴歐，見沈云龍編，前引書，下冊，頁五三九。並於次年一月八日自意大利返抵上海，見同上書，頁七二。另參考 Wu Tien-wei, pp. 5—6; Boorman, I, 66.

⑦據中華民國外交部白皮書第二十六號稱，張學良曾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事變前十二日）發出其不抵抗命令，全文如下：「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抵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爲要，張學良，魚子秘印。」見梁敬鎔：「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二五。該書亦指出不抵抗的政策並非張學良一人的責任，當時身爲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的蔣介石亦應當負此責任，同上書，頁一〇七至一〇九。唯梁敬鎔亦辯稱當時蔣氏的消極戰畧不爲人諒解而已。同上，頁一一〇至一一一。

⑧國民政府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舉行中央政治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一）關於處置張學良叛變，推何委員應欽爲討逆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二）由國民政府即下令討伐；（三）推于

委員右任宣慰西北軍民。而政府亦於同日頒討伐令，引錄如次：一、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將所部軍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全國人民，同深憤慨。政府爲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着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兇氛，而維國本，此令。二、特派何應欽爲討逆總司令，此令。見「西安事變史料」，出版年地缺，頁八至九。另參攷 Wu Tien-wei, pp. 96—97；羅瑞卿等，前引書，頁三六及四十；王健民，前引書，第三編，頁九二。

⑧陳公博所記之八項主張與張學良、楊虎城關於抗日救國八項主張的次序畧有出入，然內容大致相同。詳見本章說明及羅瑞卿等，前引書，頁三四至三五及九五；黃德昭，前引文，頁一二四；王健民，前引書，第三編，頁一〇一；蔣中正：「西安半月記」，頁二九至三十；蔣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頁三至四。Wu Tien-wei, p.82.

⑨端納(William H. Donald)是英籍澳人，新聞記者出身，在中國居住二、三十年。九一八事變前已與張學良有來往，事變後任張學良之顧問。又曾在一九三三年四月與張學良同赴歐，返華後任蔣介石顧問，極爲宋美齡信任，見羅瑞卿等，前引書，頁三六註①。吳天威更指出端納因受到張，蔣雙方信任，故能達成雙方的和談，故吳氏譽之爲「和平的先鋒」，見 Wu Tien-wei, pp. 94—96。宋美齡的回憶錄中亦屢次提及端納居間調停，曾謂：「當時余對西安事變已具一種感想：譬之造屋，端納既奠其基，子文已樹柱壁，至上樑蓋頂完成之工作，實爲余無可旁貸之責任矣。」見「西安事變回憶錄」，頁二八。另參攷 Wu

⑩ 這個謠言在當時十分流行，認爲何應欽力主討伐張、楊和轟炸西安，企圖藉此置蔣介石於死地，又謂何氏同時準備促汪精衛回國主持大計，且與桂系接頭，又與日本駐南京領事頻頻聯繫云云。見江上清：「政海秘聞」，香港致誠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頁一二二至一二三；並參考羅瑞卿等，前引書，頁三六及五六。

⑪ 蔣方震，字百里，（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浙江海寧人，早年曾留學日本及德國，學習軍事，後對於中國軍事科技的改進及現代化甚有貢獻。蔣氏亦曾任吳佩孚、孫傳芳及蔣介石等的顧問。西安事變時曾以其無黨無派的身份居間調停釋放蔣介石的事宜。生平見 *Boorman, I, 312-317*；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二年；曹聚仁：「蔣百里評傳」，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一九六三年；薛光前：「蔣百里的晚年與軍事思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九年。

⑫ 根據王健民紀錄，「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是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見王健民，前引書，第三編，頁一〇三。陳公博所記是項決議在三月通過，實誤。該決議中提出「最低限度之辦法」四項：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澈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權統一，爲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澈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爲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第四、階級鬥爭以階級利益爲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

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衆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居民爲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見王健民，前引書，第二編，頁一〇四；Wu Tien-wei, pp. 168—189。此四項議案顯然是接納了中共方面前些時候提出的「四項保證」，即：（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見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附錄於羅瑞卿等，前引書，頁七五及九七；王健民，前引書，第三編，頁一〇二至一〇三。然吳天威更指出國民黨所提出的條件甚爲苛刻，中共基於本身陷於危亡之境，故所作的建議極大讓步。詳見 Wu Tien-wei, pp. 182—191。

⑬宋美齡於「西安事變回憶錄」一文中所顯示者最重要的有以下各點：其一、指出她之要保存蔣介石之性命，並非出於婦人救夫之意，見「西安事變回憶錄」，頁四。其二、她不贊同討伐西安叛變者，同上，頁四至六。其三、她曾到黃埔軍校演講，促請軍校學生鎮定處斷，同上，頁十四。其四、透露時論中謂南京主戰派有「借刀殺蔣」的陰謀，同上，頁十六。其五、暗示曾與周恩來（原文中所謂「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會談兩日，同上，頁四五至四七。而其他方面證據亦顯示宋美齡及蔣介石曾經與周恩來等中共方面接觸，見 Wu Tien-wei, p. 147；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2；羅瑞卿等，前引書，頁五四；漱流，前引文，頁二七；郭增愷，前引文，頁一五二至一五三。



# 陳公博先生年譜（簡表初稿）

周化人編

歲次

年齡

國事

專事

壬辰（一八九二）

一歲

光緒十八年

是年八月二十九日先生生於

廣州。先生祖居原籍乳源。

父親譚志美，曾任廣西提督

。母親徐氏。是年孫中山先

生二十七歲，汪精衛先生九

歲，廖仲愷先生十四歲。

癸巳（一八九三）

二歲

光緒十九年

甲午（一八九四）

三歲

光緒二十年

中日戰爭發生，滿

清敗績。朝鮮獨立

。孫中山先生創立

興中會於檀香山。

乙未（一八九五）

光緒二十一年

四歲

清與日訂馬關條約，割台灣及澎湖列島於日本。孫先生第一次在廣州舉事。

丙申（一八九六）

光緒二十二年

五歲

中俄訂密約，以旅順、大連及東北築路權予俄。孫先生在倫敦蒙難。

丁酉（一八九七）

光緒二十三年

六歲

德國租借膠州灣。

先生父親交卸廣西提督職務，回廣州居住。大孔門內長泰里先生開始讀征東、征西、水滸、封神等小說。

戊戌（一八九八）

光緒二十四年

七歲

戊戌政變，康梁君主立憲運動失敗，西太后再執政。英租威海衛。

先生身體在弱，聘拳擊教師練習。孟蘭會時與旗人子弟鬥，傷數人，自是受管束；因種下仇滿思想。

己亥（一八九九）

八歲

光緒二十五年

法國租借廣州灣，英租九龍，美發表宣言，主張「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

先生在慈父嚴母之下，受良好之家庭教育。

庚子（一九〇〇）

九歲

光緒二十六年

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京。鄭士良在惠州起義，史堅如在廣州起義殉國。

先生聞炸彈聲，父親告以係史先生所為，惜其未中，而史先生則被殺了。入塾讀四書五經及古賦。

辛丑（一九〇一）

十歲

光緒二十七年

清廷與八國聯軍訂辛丑條約，賠款四億五千萬兩。

受業於梁雪濤先生，開始講論語。先生問：「爲什麼不講大學？」業師說：「大學太深。」先生說：「『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似應先講。」業師爲之驚異。

壬寅（一九〇二）

十一歲

英日同盟。

光緒二八年

癸卯（一九〇三）

十二歲

光緒二九年

日俄戰爭。黃興舉事於欽州。孫先生舉事於鎮南關。

先生父親與傅佐高等籌劃於年底起義，但事洩不果。

甲辰（一九〇四）

十三歲

光緒三〇年

日俄之戰，俄敗，轉讓旅、大及南滿鐵路於日，並割庫頁島南段。

乙巳（一九〇五）

十四歲

孫先生在東京聯合各革命團體，組織中華革命同盟會，集中革命力量。

先生於私塾讀四書五經，感到無興趣，而看各種小說，由小說事蹟而讀史書來參證。

丙午（一九〇六）

十五歲

光緒三二年

春，先生父親與傅先生籌劃於樂昌起義，用會黨擾湘南，集舊部佔韶關，與東江互相聯絡，目的在襲取廣州。

丁未（一九〇七）

十六歲

陳公博先生年譜（簡表初稿）

四月十七日父親率先生出發至粵北、贛南、及湘南，召集會黨準備起義，以港方餉械不至，被清軍圍困，因遣部眾，自投官軍，以免株累，遂解廣州監禁終身，先生因事先遣返廣州，得免於難。於夜渡北江時，先生曾賦詩一首（五古）以見志。先生避居香港為報館校對，藉以維持生活，一年後復返廣州。（編者按：陳公博與父確在丙午四月出發，但陳父在丁未三月遣散部眾，並遣鄧錫恩送陳公博返廣州，旋避居香港。詳「少年時代的回憶」，「丁未的失敗」見陳公

光緒三十三年

戊申（一九〇八）

十七歲

光緒三四年

黃興起事於河口。  
熊成基起事於安慶。

博：「寒風集」，頁甲五至八；及「補丁未一件事」，同上書，頁甲二八四至三一四。）

己酉（一九〇九）

十八歲

宣統元年

倪映典起事於廣州。

先生肄業於廣州育才書社，過着極窮苦的生活。

庚戌（一九一〇）

十九歲

宣統二年

汪先生偕同志赴北京謀刺攝政王事敗被執繫獄。

在育才書社。

辛亥（一九一一）

二十歲

宣統三年

英日續盟。三月廿九日廣州之役，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

先生卒業於育才，英文已有根柢，光復後任乳源縣議長及民軍參謀。廣東光復後，父親於九月十九日出獄，胡漢民擬派當民軍總司令，不就，祇任軍事顧問及省議員。

壬子（一九一二）

二十一歲

民國元年

孫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於南

八月廿五日父親逝世，享壽八十一歲，葬於白雲山之麓

京。

。遵父命棄武習文。五月先生  
生在育才書社任助教。

癸丑（一九一三）

二十二歲

民國二年

二次革命，國民黨  
失敗。

甲寅（一九一四）

二十三歲

民國三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  
發。

乙卯（一九一五）

二十四歲

民國四年

袁世凱謀叛國，竟  
接受日本廿一條件。

丙辰（一九一六）

二十五歲

民國五年

袁世凱叛國稱帝。  
蔡鐸雲南起義推翻  
之。

丁巳（一九一七）

二十六歲

民國六年

張勳擁溥儀復辟，  
段祺瑞討平之。段  
毀法，孫先生在廣  
就大元帥，宣言護

畢業法專，再入北京大學哲  
學系肄業，仍藉通訊稿收入  
維持學業，思想上頗受陳獨  
秀、胡適的影響，與同學譚

戊午（一九一八）

民國七年

二十七歲

法，南北對立。

聘函（平山）、譚植棠、區聲白爲友，在圖書館認識毛澤東。在北大。

己未（一九一九）

民國八年

二十八歲

日本奪取德之膠州灣，中國參加歐戰。廣州大元帥府改組爲大總裁制。

在北大。

庚申（一九二〇）

民國九年

二十九歲

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勝利。大戰結束，和會開於巴黎，孫先生赴法。

北大畢業，遊返廣州，任法專教授及教育會評議員。汪先生任會長，創辦「羣報」

陳炯明由漳州率粵軍回粵，驅逐桂系。孫先生重返廣州。

先生與平山、植棠成立廣州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

陳獨秀來粵。

辛酉（一九二一）

三十歲

孫先生由桂林回師

先生與李勵莊女士結婚。七



民國十年

廣州，轉道北伐，免陳炯明職。

月初赴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會議，與各地代表周佛

壬戌（一九二二）

三十一歲

民國十一年

陳部葉舉叛變，孫先生避居軍艦，及離粵赴滬。

海、李鶴鳴、李漢俊、張國燾、包惠僧和俄國代表馬令和吳庭斯基商討。

上海中共對先生誤會，因之先生脫黨而堅決赴美。十一月赴日本候船。在熱海遇廖仲愷與越飛會談。

癸亥（一九二三）

三十二歲

民國十二年

滇桂軍入粵逐陳炯明，迎孫先生回粵。

二月十二日由橫濱赴美國，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經濟，作馬克斯學理的研究。在哥倫比亞大學。

甲子（一九二四）

三十三歲

民國十三年

中國國民黨改組，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於廣州。北京政變，孫先生應邀北上，主張開國民會議。

，解決國是。

乙丑（一九二五）

三十四歲

民國十四年

三月十二日孫先生逝世於北平，七月汪先生任中常會主席。

二月離紐約赴倫敦及歐洲考察。聞惡耗，速歸國。任廣大教授，隨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兼省府農工廳長。

丙寅（一九二六）

三十五歲

民國十五年

夏，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八月廿七日克汀泗橋。卅日克賀勝橋。十月十日克武昌。十一月中旬克南昌。繼克安慶、南京。

先生改任國民革命軍總部政務局，於七月廿二日由廣州隨軍出發，赴武漢任財委會主任，兼任江西省政務委員會主任。

丁卯（一九二七）

三十六歲

民國十六年

春，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武漢，但部份中委另組南京國民政府，四月十八實

回粵任省政府主席。

戊辰（一九二八）

民國十七年

三十七歲

行清共，寧漢分立。汪先生四月返國，主持武漢。七月，十五實行分共，第四軍回粵護黨。

二月二屆四次全會在滬決議蔣中正復職，特委會取消。

己巳（一九二九）

民國十八年

三十八歲

南京中央召開三全代表會，因圈定代表違反黨之民主原則，汪先生率左派中委宣言反對。

三月先生赴法國謁汪先生，五月返香港，與張發奎桂軍聯合攻粵。

庚午（一九三〇）

民國十九年

三十九歲

汪與閻、馮召開擴大會議於北平，反

奉汪先生命赴北方與閻馮聯絡，召開擴大會議，失敗，

陳公博先生年譜（簡表初稿）

辛未（一九三一）

四十歲

民國二十年

對獨裁·張學良率兵入關助蔣。

南返。

汪先生在粵召開非常會議。「九一八

先生一月赴歐洲，不久返國。

」事變，日占東三省，汪主張「共赴

國難」大團結。

壬申（一九三二）

四十一歲

民國二十一年

「一二八」淞滬戰爭。全國統一。林

先生任實業部部長，統一全國度量衡制度。

森任國府主席，汪先生任行政院長。

癸酉（一九三三）

四十二歲

民國二十二年

聘德國軍事顧問團訓練陸軍。

編纂「中國經濟年鑑」，辦「民族雜誌」。

甲戌（一九三四）

四十三歲

民國二十三年

策粵漢鐵路及隴海鐵路。

著「革命與思想」。

乙亥（一九三五）

四十四歲

民國二十四年

十一月汪先生在中央黨部被刺，卸任

先生辭實業部長，著「四年從政錄」。

丙子（一九三六） 四十五歲

民國二五年

就醫。實施法幣政策。

汪先生赴歐養傷。

著「軍中環記」。

丁丑（一九三七） 四十六歲

民國二六年

西安事變發生，應中央電召返國。義大利伊阿比西尼亞。

先生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奉政府命赴義大利一行，並到倫敦謁首相張伯倫。

戊寅（一九三八） 四十七歲

民國二七年

「七七」蘆溝橋事變，遷都重慶。中俄成立互不侵犯協定。德義日成立反共協定。

先生離成都旅港，初不贊成汪先生和平主張。

己卯（一九三九） 四十八歲

平、津、滬、京、粵、漢相繼失陷。汪先生主和，離渝赴河內，發表豔電重慶拒絕和平，並

先生爲道義之故，勉赴上海

陳公博先生年譜（簡表初稿）

民國二八年

開除汪先生黨籍。行刺曾仲鳴。和平運動展至上海，與日方商談和平條件。是年德併捷克，德蘇訂互不侵犯協定，瓜分波蘭，因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

庚辰（一九四〇）

四十九歲

先生被選爲立法院院長。

民國二九年

汪先生與日方談判之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完成，成立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六月，德軍攻入巴黎。

辛巳（一九四一）

五十歲

德移西線勝利之師

先生兼任上海市市長。

民國三〇年

，東征蘇聯，佔領

壬午（一九四二）

五十一歲

民國三十一年

基輔，圍史太林格勒及莫斯科。日海軍偷襲珍珠港，美對日德義宣戰。十一月美軍在北非登陸。

在上海。

癸未（一九四三）

五十二歲

民國三十三年

春，德軍在史太林格勒被擊敗。夏，美軍過地中海攻義。

先生在上海市長任內，接收各國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完成上海市政之統一。

甲申（一九四四）

五十三歲

民國三十三年

九月，義大利投降。冬，羅、邱、史會於德黑蘭，美助蘇聯反攻東線。汪先生十一月十日，病逝日本。六月，美軍登陸諾曼第，八月恢復巴黎，德

先生繼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

乙酉（一九四五）

五十四歲

陷于夾攻中。

五月會師柏林，德

無條件投降，八月

日本投降，二次大

戰結束。

日本投降後，先生維持東南

半壁之完整，以待政府之復

員，中間曾一度飛往日本，

旋即回國，並發表自白書一

篇。

丙子（一九四六）

五十五歲

杜魯門特使馬歇爾

將軍來華，調停國

共之爭，但不成

功。

六月三日在蘇州殉國。

民國三五年

（編者按：周氏編此年譜，親南京政府立場甚明，編者未盡同意。然為保存原著，未予修改，謹此註明。）



# 少年時代的回憶

## 前言

「良友圖畫雜誌」約我作一篇「少年時代奮鬥的回憶」，我很高興便答應了。因為我原來已打算寫一篇自傳，並且已定名為「四十年回憶錄」，祇因種種原因，一擱三年。我不能寫自傳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大凡寫自傳的，無論他怎樣客觀，下筆時自己總難免夾雜些強烈的主觀和偏狹的情感，有了主觀和情感，自傳便減了它本身的價值；第二、我自參加實際政治以後，依一身的經歷與政治上的秘密發生不少關聯，不老實寫出來，這自傳等於騙自己和騙人，若果老實寫出來，一定對於政局多少掀動無聊的議論；第三、我個人自問確沒有像盧騷寫懺悔錄這樣勇氣，其理由或者我根本不是一個文學家。一本自傳光擺出嚴肅的骨骼，而埋沒了愛戀的歷程，不如不寫，還可以保存些「不自欺」的面目。因着這些原因，不獨四十年回憶錄不能下筆，恐怕五十年回憶錄也都只存夢想。

良友給我的題目，我斗胆把「奮鬥」兩個字刪去，因為奮鬥是有目的的，我坦白的說，我在少年時候實在沒有什麼目的，如果勉強說有的話，那就是英雄思想，然而這種思想實在與教育的目的相背馳，這「不可以為訓」的思想，實在不應作一般少年的示範。以下便是我的正文。

## 一 癸卯的突變

在癸卯時我是十一二歲，這個時期是我一生思想和行動的一個大轉捩。我生於一個暖衣足食的家庭。在六歲時我父親才從廣西解了提督的職務回到廣州。大概因為晚子的關係，父親很鍾愛我，兼着身體很孱弱，每月都病咳嗽，雖然從六歲時候便開始讀了什麼薛仁貴征東、征西、水滸、封神等小說，和唐詩三百首，直到九歲才正式請了一位專家先生教我讀四書。每天除了讀書以外，家內還有兩位拳師，早晚也玩些拳棒。不過我身體雖然弱，却是洵氣不過。我的母親是續配，因為父親鍾愛而放縱我的原故，所以她管教我特別嚴，世上嚴父慈母的成例，我的家庭倒變了慈父嚴母。不幸得很，我的住居適在廣州的北門，這北門以內差不多是旗滿駐防官兵住宅的特別區，這些旗滿子弟，飽食終日，只有跑馬射箭，風氣所趨，一班孩子也好搬瓦弄石。一天我們街上建了一個盂蘭會，母親知道旗滿孩子是不好惹的，禁止我出門。可是小孩子看熱鬧的心事很切，到夜裡九點鐘便偷出去了。到了盂蘭盛會，這班旗滿孩子以為我孤另可欺，聚了十幾二十個孩子，圍迫上來嚷着叫打。當時我也許急極，也許要試試身手，一碰上便打傷了四個孩子。這場禍是鬧大了，打出重圍回家之後，門首已聚了不少旗滿人。父親出來賠了許多好話，並且答應養傷，才告無事。父親於是申斥了那兩位拳師，以後連玩些拳棒的權利也根本剝奪。沒有事不許出門，就是有事出

門也派一個跟人帶着。從此以後我便深深種下了反對旗滿的思想。

我是關住了，可是父親倒要實行造反。當時父親也不知道什麼是革命，只知道是造反。我現在回憶起來，父親爲什麼由提督而跳到造反一條路，不出幾個原因：一是父親是一個熱情愛國者，自庚子亂後，他天天罵洋人，罵李鴻章，罵皇太后。若今日拿很時髦的名詞翻出來，他是反帝國主義，反漢奸，反君主制度，然而當日複雜的狀況，父親絕不願加以理解的；二是父親從洪楊打出來的人物，眼見着旗營的腐敗，而他本身又是武官，總有些可取而代之意；三是父親早歲從軍，結交許多會黨，這會黨中的教條會規很使他不能輕易擺脫。當日介紹父親和香港黨人結納的，我還記得是一位叫傅佐高先生，這位先生是一個不第秀才而信奉耶教的，而且是我們的老同鄉乳源人（我原籍福建上杭，後遷乳源，我祖父才從乳源遷廣州）。父親自從往返香港幾次以後，似乎有點特異的動作。到了那年十二月我的母親生日，外間搬進了不少的禮物，牛肉乾餅乾幾十箱，幪帽（即便帽）二十多箱，還有十幾箱東西擱在床下，似乎很神秘，我偷偷打開看，原來都是簇新的剪刀。我知道內中必有許多文章，可是我一開口，父親都反常的疾言厲色止住我不准發問。此事一直到了事發之後，才知道餅乾和牛肉乾是起事時的乾糧，便帽是起事時的符號，剪刀是起事時，在雙門底用來翦人的辮髮。（雙門底現已改爲永漢南路，是廣州當時的南京路，每至大除夕買花過年的無累幾千人，當時計劃就在這裡舉事。）

可是事情大變了，不知是自己團體告密，或是有人發覺，在臘月廿九下午六點鐘，傅先生忿息跑到我家裡，說廿八下午四點時候，我們有四個人在雙門底被人跟踪抓了去，現在總督（彷彿是德壽）已令駐守沙面西橋的楊副將，往搜芳村的教堂。楊副將是信教的，傅先生也信教的，所以知到消息很早。

然而父親還是很鎮靜，因為運到我家內的東西是傅先生一人經手，只有傅不被拿，消息不會宣洩，而且傅有教會作護符，當時教民很有力量，被拿也可以由教士隨便保釋。其次父親是退職的提督，沒有特別理由，是可以頂着這個招牌勉強擋一下，癡心還希望第二天除夕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舉。夜裡傅先生又來，說抓去的人僅是一小部分，機關還不會全都破獲，可是芳村教堂所存儲的糧械全行搜去，香港和四鄉來的弟兄已都退却，明天除夕的舉動算是流產了。

家內所藏的東西怎樣打發呢？牛肉餅乾是食不了的，便帽是沒有用的，尤其是剪刀須想方法安置。從第二天起傅先生已逃往香港，父親只把十幾箱剪刀推在井中，其餘各物想不出安置辦法，也只好大胆的留在家內。這次事情很平淡的消散，只把捉住的幾個人砍頭了事，我家內更草木無驚，我當時所影響於思想的，只知道造反是可以幹的，這次不成，還有第二次。心內憧憬着水滸內梁山泊的大聚義，大名城的劫法場，至於革命，還是未懂。

## 二 丁未的失敗

到了丁未，漸漸有了洋學堂，然而我還在私塾念書，五經雖然讀完，新知識除了周老師教過的代數幾何，其餘科學非常隔膜。廣州的西村有了高等學堂了，虎門也有陸軍小學和水師學堂了。追求新知識是少年的天性，何況在青年時個個都自負不凡，尤其當日很迷信范仲淹「以天下爲己任」的偉大志向？我天天嚷着入學堂，可是父親有他特別的理解，他當時通訊對外還有傅佐高，而對內地會黨就無法委託別人。他是一個頂樂觀而又主見特別倔強的人，他對我說「成功就只在一兩年，有了辦法再入學堂罷。」到了丁

未這年，各方面似乎有點騷動，北江各地都有信來，不說這裡有三五百人，就說那裡有一二千人，當時各地民智尚還樸實，不至如辛亥時候的民軍，起碼都吹着過萬的。那位傅佐高先生更是辦法多而樂觀，今天說槍枝已在途，明天說炸藥已運到。卒於四月十七父親和我，另外有兩個姓陳的會黨就離開廣州到清遠了。果然在琵琶江口有三十多人等着我們，住了幾天便往英德，由此而乳源，而宜章，而橫過贛州，週遊了三省邊境，十月才回乳源。當時父親爲什麼要選擇乳源這個地方，因爲乳源是我們的祖居，以鄉紳資格住居僻縣，可以爲所欲爲，多少有點掩護。而且乳源是湘粵的交界，萬一有事，也易於行動。無如當日的情況，我看了之後，並不像在廣州所想的樂觀，其一、毘連三省各縣一枝快槍也找不出，英德和清遠的所謂弟兄，有快槍的絕不肯來，傅先生的槍彈更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其二、一班人的思想神氣，倒不像革命黨，而有點像義和團，雖然口號是打倒滿清，但是同時也要打洋人，甚至乎竟有些朋友主張只殺貪官污吏而不敢說要殺皇上。父親和我都知形勢已非，然而情同騎虎，已沒方法可以收拾。在這六個月的期間，帶來的幾千塊錢都在「煮大鑊飯」（這是廣東拜會黨的術語）內煮完了，担任傳遞消息的傅先生也消息漸疏了。父親急得沒有法子，只有派人回廣州把兩三間舊屋變賣了，佛山有兩間綢緞莊也頂給合股夥計了。

乳源雖然是僻遠，而風聲總得慢慢的往外揚，第一個注意的是乳源縣程知縣（他的名字我已忘記），第二個注意的是南韶連總兵雷鎮毅。這還不要緊，這班毫無知識而又血脈憤張的弟兄們，在殺貪官污吏的口號之下，找不到貪官污吏，便先把礦山上幾名兵士先開刀了。當時各地還算是承平，一件尋常命案，已牽動全省，何況殺的又是官兵？總督張人駿一面發電北京參革父親，一面電雷鎮毅令朱福全帶了四營官兵，去鎮壓暴動，這都是後來我逃回廣州所得的消息。這位朱福全入民國以後，還做過一任南韶連鎮守使，

滇軍入粵，才由李協和先生把他解決。

大概是三月罷，風聲已經緊急，所有要殺貪官污吏的弟兄們因為風聲緊急而又無把握都慢慢散去，是湖南的從徑口逃走，是英清的連樂昌都不敢經過而繞道走連山。贖下的所謂效死弗去的只有六百多人，而手內所拿的不是梭標，就是烏槍。我還記得一夜我們在大草坪集合時候，一位龍頭叫做「拗頭」的，攘臂大呼，不要害怕，他懂得神打，他可以立刻教習各弟兄，使槍炮不會打入。父親是出身行伍的而且又知道庚子的失敗，知道大勢已沒有挽救了。幾日以後的夜裡，他喚我說，「你走罷，此地不可再留，我喚老人家鄧錫恩跟你回廣州，並給你一匹馬，到韶州以後，便可換船回省，再聽消息。」我說：「父親不走，我怎可以走？」父親說：「你先脫險，我個人可以過湖南，兩個人逃命是不容易的，你走以後，我更放心而從容逃走了。」父親平時對我極慈愛，可是當夜顏色很有點嚴峻難近，不容我置詞。那裡知道父親的說話只是騙我先逃，而他反挺身犯險呢？微明的時候，我和老鄧騎馬渡過十三瀧，過了樂昌即奔韶關，過西河灘時，有一個駐姓陳的把總看見我的馬肥偉可愛，硬搶了去。還幸身上尚餘二十多塊錢。我們兩人由韶關徒步到英德，才乘木排回廣州，這一段失敗史，就這樣結束了。

### 三 民國的前夜

父親終於我走後被捕了，他被捕的原因，不是不能逃而是不肯逃。他後來告訴我，失敗很明白，大不丟了個人性命，如果一逃，令乳源的人民都會草木不留，故寧願犯險，不願累人。所以我走後，他把六百多人也遣散了，及朱福全到後，父親還公然找他，自請解省。他承認四個官兵都是他殺的，至於造反他

是不懂。朱福全既得了主名，也無話可說，父親便這樣鎖着解省，而英乳各縣的確沒有辦清鄉的手續，倒草木無驚的過去，父親這樣勇敢和犧牲，是最值得我記憶而願引為模範的。

父親在我走後便跟着派人到廣州促我逃香港，這人大概是他附船而我是附木排的關係，倒比我先到。父親信內還有兩句話「與其拼死斬嗣，毋寧倖存再圖」，加以母親的焦急惶懼，我遂單獨避居香港。可是在港怎樣生活呢？還是虧得傅先生介紹到一家報館當校對，這家報館自然是和革命黨有關，但我不願丑表功，索性連名字我此刻都懶得說。薪水是每月十二元，工作是由下午三時起至夜裡一時止。當時報館裡因為太窮，許多編輯和記者都當義務，有時短評沒有人做，也不得不大胆執一下筆。可憐十數歲的孩子，腦內那裡來的許多材料，有時竟連題目都找不到，於焦悶煩憂之中，便學會抽煙了。時髦的煙捲，自然沒有資格抽，我所抽的只是江門的生切煙，這種煙糰，後來愈來愈大，至今還沒有方法可以戒脫，這是我為什麼抽上煙捲惡慣習的歷史。在這個報館工作當中，後來我發覺傅先生何以不能接濟我們，因為第一，香港的機關始終沒有統一，傅先生所接洽的僅是沒有力量的一個。第二，當時大家還沒有一定的計劃，並不是有成算的舉事，而是無計劃的搗亂，只借失敗為宣傳。第三，當日還是玩民軍的把戲，成則張大，敗則不提，何況當日我們的舉動又是一個腹內胎死。我抱着「好漢打落門牙和血吞」的硬態度，隻字不提，埋頭工作。

父親終於解到廣州，任奔走營救的只有一個老朋友孝廉公梁鼎臣，傅先生自然也是着急的一份子，可是造反大事，營救是談不上的。張人駿以嘯聚羣民圖謀不軌的罪名，奏斬父親，後來還鞏一位父執直隸人華承瀆向陸軍部尚書（當日的官制如此）鐵良關說，才改為永遠監禁。這個辦法父親是始料所不及，雖非

喜出，而巳是望外。我也於一年內回到廣州了。父親雖監禁在南海縣監獄，還寄語不許我回。但我呢，一因回省可以常看父親；二以母親沒人照料，很感不便；三我的學業前途也很困難，在港長夜工作，絕無時間可以補習，所以於翌年暑假便回廣州居住。

回省以後，眞真是城郭猶是，人民已非，六親斷絕，故舊走避，除了每星期到監獄探望父親兩次以外，生活和學業這兩個問題，竟直無法解決。傅先生是沒有能力，絕不可靠，無已，還是找朋友。這幾年來，眞是一言難盡，因為學堂是萬無能力可以進去，旁的不必說，單是冬夏兩身制服，已經無力自籌。我只好投考河南一間育才書社，學習英文，每月除學費兩元以外，也沒有什麼膳宿，也沒有什麼制服，在這個學校足足捱了三年，等到辛亥革命成功，才算畢業脫離這間培養貧窮子弟的育才書社。

在此三年之間，負債纍纍，債主幸而有限，第一個是父親的朋友華承灑，他那時跟松壽在福建當老夫子，每三個月寄我十五元。第二個是我同學梁模珩的母親，這位老人家三年以內借給我三百多塊。第三個是數到同學劉祖英，他雖沒有錢，時常借衣服給我當。這個時期母親和我商量應該設法生點利，商量的結果，在家內養幾隻小豬，另外作些手工替人穿牙刷，我們實在不懂養豬的，沒到一年來已瘟了幾隻，終於不敢再嘗試了。穿牙刷每百枝僅得工錢一分二厘，這也不能算生利，只好窮日夜之力工作，稍以彌補。每日雖然照例還有兩餐，而每餐的飯菜以不過五分銀爲限，這是四年困苦生活的經過。到了末後兩年我的英文算已有點眉目，夜間幫幫人教書，說起來很是慚愧，眞是誤人子弟不少，但爲生存起見，又有何法？父親在監獄裡也習慣了，禁卒因爲他是提督，有點另眼相看。重犯因爲他是會黨，特別尊敬。革命黨因爲他參加造反，所以也相當推崇。當日他也準備在獄以終餘年，萬不料後來居然可以重見天日。更有點奇怪



的，母親向來有吐血的毛病，我更瘦骨支離，然在此困苦顛連之中，母親舊病不獨不復發，日見強健了，我也一天一天的粗壯，也不咳嗽，也不痰喘了。是豈憂能傷人，抑是苦以尅病呢？

#### 四 辛亥的後奏

廣州革命黨三月廿九之役，清廷搖動了，湖北武昌十月十日起義，清廷終於推倒了。父親在舊曆九月十九日廣東獨立的時候，大搖大擺出了監獄，父親和母親相見時悲喜交集的情況，我現在時時回憶，還覺得淒愴。父親當選了省議會議員，又兼了都督府軍事顧問，而我呢一時也很荒唐的活躍。這時傅佐高先生又復出現，當選了乳源縣議會議長，我也是一個掛名縣議員，他老先生畢竟懷賢若渴，趕來見我父親，要讓位於我。同時和我父親同獄的湖南人黎萼，自任爲民軍領袖，大招兵馬，也要請我當參謀。我那時已二十歲，似乎也以革命黨自待，大有拔劍擊柱的態度。父親畢竟老成，畢竟有見地，一天他在司令部把我找回來，痛罵一頓，說：「你有多大年紀？有多大學問？要當議長，當參謀。你如果要做事，先去當大兵。民國安定以後，得要讀書求學。否則這議長和參謀根本害了你一世。」我聽了父親訓斥以後，便遵他老人家吩咐，辭了議長，撤了參謀，去當學生軍。入伍之後半個月，升了一個班長，一個月後又升了司務長，到元年二月南北統一，不及出發便解散了。在解散時，本來已預備送南京作入伍生，然而父親也不許。這個理由我至今還不明白，大約父親自己是學武的，故要我習文，但這是揣測，到底父親什麼意思，當時並沒有告訴我。

民國元年九月父親逝世了，我感念着父親的教訓，和知道自己學識的膚淺，即下決心，擺脫一切，把

政治的朋友也謝了往來，預備入一所專門學校。但入學是要錢的，所以回到母校育才書社充當助教，希冀積儲點讀書之資。在育才整整兩年半，知道這個希望靠不住，又決心拋棄了而入法政專門學校。是時兼了一個香港報館通訊，月薪三十元。一面養親，一面求學。猶幸三年之中，都考試九十分以上，免繳幾十元學費。悠悠忽忽，這幾年無善足陳。民六畢業再入北京大學，當時一面靠報館的通訊，一面靠我的朋友范志彬幫助，在民九時候又在北大文科算是畢業。當在北大時期，我的思想又生一轉變，當時校長蔡元培，教授陳獨秀、胡適、蔣夢麟、李石曾、章士釗各位先生都曾予我一個思想上的影響。可是五四運動，我沒有努力的參加，因為當時我們已另有組織，對於「新潮」運動，認為不徹底，更感覺到光是請願，尤其是懦弱可憐。我一次參加新華門請願，站兩個鐘頭便走了，在香廠新世界散過一次傳單便以後再沒有去了。

民九回到廣州，其時剛剛粵軍回粵，孫先生在粵軍佔領廣州之後到了，汪精衛先生和廖仲愷先生也同時回粵了。汪先生所擔任的是廣東教育會會長，我當時在教育會當一個評議，廖先生雖然是財政廳廳長也兼了評議，大家都孳孳矻矻的討論教育，研究教育，全國教育會那年也在廣州舉行。到了民十一年，我漸漸感覺知識上的恐慌，我除了辦報以外，更在法政專門當教授，和任了宣講員養成所所長，無論碰到什麼問題，都與經濟學有關，我既根本不懂經濟，所以遇着什麼問題，都沒有方法可以解答。自己的學識的確太膚淺了，還是到外國再研究去罷。承教育委員會的許可，決定辭職渡美。那時孫先生剛由桂林回粵，廣東學校的校長和陳炯明有關係的一時全部退却，法政學校也碰了這個難題。汪先生那時奉命往浙江和盧永祥接洽，臨下船的那一天還找我去，勸我不要往美國，他和廖先生都希望我接法政校長。我的頭腦確空虛

而感知識荒，汪廖兩先生的盛意是可感，可是爲着知識的前途，只好硬着頭皮敬謝，迨後葉舉和洪兆麟竟炮擊總統府，那更不能一朝居了。秋天到日本原想就此留下，但覺得人地不甚相宜，翌年二月遂離橫濱去美國。在日本的時候，遇着廖先生也和俄使越飛來東京。我們在東京見一次，在熱海見一次，廖先生還三番四次的勸我回國担任法政校長，但我的學問做教授還不夠，如何再可以當校長？我坦懷告訴廖先生我的志願以後，便不辭而行。我記得二月十二日動身，十四日還在船上接廖先生勸我回國的電報，但舟行海中，怎樣可以回頭呢！我留美直到民十四年二月才繞道歐洲回國，在美也靠夜裡教育華僑子弟來維持生活和學費，回國之時也靠汪廖兩先生在廣東大學匯我一筆川資，至歸國以後的事，大家也許知道，這是我少年至中年的一段簡單故事。

## 後語

良友本來約我寫五千字以內的回憶，誰知一口氣竟寫過了格。因爲字數的關係，少年時詳細的環境，還沒有寫出。民九民十共產黨成立的經過，我比較知得很多，也沒有寫出，這只好俟至將來了。綜合我的半生，在學問方面起始習法律，繼而習哲學，卒之習經濟，樣樣都懂，樣樣不精。而事業方面，當過學生，當過教授，當過校長。當過校對，當過通訊，當過編輯。更當過大兵，當過下級軍官。事業這樣駁雜，所以養成了仇爽的脾胃，而同時也流於跼弛的惡習。而且少年時候沒有一個讀書系統，以故沒有國學的根底。沒有進過正式中小學，以故很缺科學的常識。我寫這篇自述，不過供讀者茶餘酒後的談資，并不希望一般青年拿它作範本。

## 八年來的回憶

我這篇回憶是從二十七年離川寫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說是汪先生和平運動的簡單實錄。本來在今日大統一時候，我對於保存國家和地方人民元氣的心事已盡，對於汪先生個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置而不述。但既然奉命要寫一篇簡述，那麼，對於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說的，不說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運動就無法說明它的起源。對於我的主張也不能不說的，不說明我的主張，這幾年的經過，便無從說起。對於這幾年來我的工作的心情，也不能不說的，不說明，便不知道這幾年來此間人們的苦悶和掙扎，類於矯飾，而不是坦白的自白。我也知道，我參加和平運動的經過，由反對而卒之參加，重慶的同志們都很了然，就是不寫，大家都明白，因此，我決定不諉過，不矯飾，很簡單的寫一篇回憶。不過，我對於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然而至今還抱極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國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總想這次外有日本的侵畧，內有共產黨的搗亂，國民黨總不至於再有破裂了罷。若要不破裂，只有從我做起，所以由民國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離重慶止，而且一直到現在，我對於黨始終沒有批評過，對於實際政治

也沒有批評過，然而還有汪先生離開重慶的一件事，更有組織南京政府的一件事，這是我夢想不到，而引爲絕大遺憾的。以下分段說明這幾年來的經過：

### (一) 汪先生的心境

關於汪先生的和平理論，我不打算寫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論，這幾年來有出版的言論集。我要寫的是汪先生由民國二十一年以至民國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國二十五年後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張和平的動機。

汪先生在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張抵抗的，在民國二十二年長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張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張學良不願意抵抗而通電邀張學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國。在長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歸來，共赴國難，那時候汪先生總以爲中國只有抵抗才有辦法，可是也因長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爲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爲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並看不見敵人，只是受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

汪先生那時不但主持行政院，還且兼了外交部長，我當時大不以爲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爲然。外間的批評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爲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當日許多人都會勸汪先生說：「上海的淞滬協定爲『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協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應該分辯一下。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日的心境。同時他還

對我說：「武官是有責任的，他們絕不說不能戰，文官是沒有打仗責任的，他們當然可以唱高調要戰，今日除我說老實話，還有誰人。」我告訴他，外間的批評很是惡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憤懣的答覆我：「我死且不懼，何畏乎罵。」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國二十三年，環境更是一天一天惡劣了，當日的國事，我知道是蔣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負責的，然而外間的觀察，顯然已窺分爲兩個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犧牲，願意替國家負責，願意替蔣先生負責。可是據我觀察，國事至是，危險非常，第一，中國要戰，應該舉國一致，中國要和，也應該舉國一致，如果把蔣先生和汪先生認爲兩種主張，那麼國內不難明顯的分爲和戰兩派，在大難當前，而黨內有兩個不同的見解，可以促成黨的分裂。第二，國內搗亂的份子很多，惟恐國民黨團結，惟恐蔣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撥者以機會，國的分裂，黨的分裂，是我決不願再見的。那時國內的報紙，對於汪先生攻擊已漸漸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報紙記載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國，說汪先生送他到車站，還哭了一場，報上還譏諷汪先生，登了兩首詩，那兩首詩的全文，我已忘記，只記得有兩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我那時真苦悶極了，我不是不愛國，同時我也愛汪先生，極不願汪先生就這樣犧牲了。因此，我又勸汪先生辭職，等到和戰大計決定之後，再負責任，也不爲晚。

我正在勸汪先生辭職的時候，倏然聽到一個消息，說汪先生的女兒也反對汪先生兼外交部長。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對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部長。」我聽了之後，非常難過。同時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陳友仁離職之後，汪先生對我說，蔣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長，我力辭不幹。當時我不幹有兩個理由，第一因爲英美報紙，久已宣傳我是一個極端左翼份子，

那時外交正在緊迫，不能不靠英美幫忙，如果我幹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於中國無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歡應酬，而外交官第一個要件就在應酬，這樣我幹外交部，於公於私都沒有好處。不過，我聽見汪先生這一句聰明人肯幹外交部的話，立時想起替汪先生分謗，顧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見汪先生，提出我願意幹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說：「現在我幹外交部，就是人家不聽我的話，還要考慮一下。如果你來幹外交部，怕恐人家連考慮也不會考慮。」我說：「這樣，請汪先生向蔣先生說，我自告奮勇去幹駐日公使怎樣？」汪先生說：「你要替我分謗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駐日公使是一樣的情形。」我聽了之後，更無話可說。

至到民國二十三年下半年，我的確苦悶達於極點，除了一般人攻擊汪先生主和之外，還有些人見了汪先生面時主和，離開汪先生時便主戰，還有些人力勸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還來見我，要苦勸汪先生不要主和的。其實當時情勢混沌達於極點，戰固然說得太早，但和也無從說起。我勸汪先生以暫退爲宜。末後我見汪先生堅持負責，我只好單獨向汪先生提出辭職。可是我每一次辭職，汪先生總不答覆，這樣一直拖至民國二十四年夏天。

民國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罷，汪先生肝病復發，到上海進醫院了。後來依醫生的勸告，又到青島養病。在八月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個電報說：「黃季寬剛由重慶見過蔣先生回到上海，携帶有對日方案，定於八月五日由滬來青一談。」我於六月五日在南京飛機場等候黃季寬，當天飛至青島，下午同黃季寬一同見汪先生。汪先生那時病得很消瘦，看了那個方案以後，沒有說什麼話，回頭只對我說：「公博，你是不是還要不幹？」我說：「是的。」汪先生說：「這樣也好。」我聽說「汪先生」允許我不幹

，如釋負重，和黃季寬一齊退出來，當夜便和青島市長沈鴻烈痛飲一頓，第二天早夜我和我朋友喝酒，沒有去見汪先生，至第三天中午還是喝酒，汪先生使人來找我了。

我酒還沒有大醒，去到海邊一個別墅去見汪先生，這次是我面紅耳熱說話的第一次。過去我雖然常和汪先生討論，有時免不了辯論，然而那一天簡直可以算吵起來。事後回想，真不勝悲涼之至，汪先生一見我，便很嚴肅的問我了：「公博，你說不幹，是真的不幹嗎？」我說：「我不願幹，自去年已決其心，那還有假的。」汪先生說：「我病還沒有好，或許今天我的說話是病態的說話，我不獨我要幹下去，我勸你也要幹下去。」我那時真是醉還未醒，我說：「汪先生能否容許我說幾句話？」汪先生說：「當然可以。」我說：「汪先生你說病態的說話，我今日是醉態的說話。現在許多人都罵汪先生是秦檜，我今天就承認秦檜是好人罷，但秦檜是犧牲了，然而無補於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說汪先生是賣國，但賣國還應有代價。像今日的情勢，一日賣國百里，其誤不止賣國，簡直是送國罷了。我想送國不必你汪精衛送罷。」汪先生奮然說：「公博你的話是為汪精衛說的，不是為中國國民說的。人家說送國是沒有限度的，我汪精衛送國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也快到五十歲了。中國要復興，起碼要二十年，不要說我汪精衛看不見，連你陳公博也看不見。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復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這是我和你的責任。因此不獨我要幹，我勸你也要幹。」汪先生這番話，使得我無話可說。我只好說：「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難道我好站在旁邊袖手嗎？」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時我知道蔣先生將於二十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個電報，說他決定辭職，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辭，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島那時那樣堅決要幹，不到十天又決定辭職。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願意不幹，內中變化



的理由，我也不去再問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於中央黨部被刺受傷了，更因受傷而出國療治了。我對於汪先生受傷是極痛憤的。汪先生出國一直到西安事變後才匆匆歸國，自西安事變發生後，汪先生更是傾向和平，以爲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如果中日兩國戰爭，結果在國際恐怕只便宜了蘇俄，在國內只替共產黨造機會。總括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遠因是受了長城古北口之役的影響，近因是受了西安事變的刺激，或者我個人的觀察還是相信比較別人的觀察爲正確。關於汪先生的心境，我寫得似乎太長了，但不詳寫汪先生的心境，便無從說明汪先生主和的癥結。至於後來因主和而離開重慶，那是我始料所不及，並且我前後反對了二十餘小時，還不能阻汪先生離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 (二) 和平運動前後和我的主張

如果有人問我，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實在沒有方法答覆，因爲我至今還不知道始於何時。在汪先生通知我的時候，我只知盡我的力量反對，無暇探問始於何時。到後來事機已經成熟，我仍是反對，也懶得去探問始於何時。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罷，時間我已記憶不清，我正在成都籌劃如何訓練黨員，和公開在四川省黨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學生分期演講「三民主義與科學」，我接到汪先生的電報，說參政會開會在即，囑我早一兩天到重慶。本來我在黨裡是被指定爲參政會內國民黨團的指導員，因此我即起程赴重慶，到達重慶，我還記得是早上去見汪先生的，當時汪先生通知我，對日和平已有端緒。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我一句話也不能說，只聽汪先生自己講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這樣大

的事情，爲什麼汪先生事前一點也不關照我。當時在座的，我一時也記憶不清，彷彿蔣先生是不知道的，又彷彿說待時機成熟，汪先生還要離重慶的。我聽了之後，大不謂然，因爲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張，我當時對汪先生陳述幾個理由：第一是自從國民政府於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廣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間經過好幾次黨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國二十年底寧粵合作，黨復統一。方今國家多難，不容再破。第二是對外問題，首在全國一致，戰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戰爭時候，和戰見解，國內或有不同，但儘管別黨別派不同，而在國民黨內萬不可有兩種主張，否則易爲別黨所乘，黨一失敗，國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絕不熟悉，但由過去幾年交涉而論，日本絕無誠意。日本對中國的要求什麼是他們限度，我們是沒有方法知道的。對於一個國家，我們不知道他的對我要求至何程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絕對危險的事。其他還有許多理由，我現在也記憶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對汪先生言和，更反對汪先生離開重慶。這樣辯論到十一時，汪夫人說，你們辯論時間太久了，食過中飯再來談罷。我離開汪公館，便一逕到中南銀行找周佛海，並順便找陶希聖。佛海對我說：「你一定嚇一跳罷？」我說：「怎麼不是呢，這樣大的事情，爲什麼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說：「我也對汪先生說過，應該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說，公博近來太懶，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們都走，他是不能單獨再留的。」佛海的說話這樣，陶希聖也是一樣。我聽見這句話，默然無話可說，只得長嘆一聲：心想，那裡怕我懶，只怕我反對罷了。下午食了午飯，我再見汪先生，力陳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這樣又辯論到黃昏，我才回旅館。以後我每次見到汪先生都不贊成這個主張，後來汪先生說，這事雖有頭緒，尙無結果，等到將來發展再談罷。

說到此地，我可以說說自民國二十年底至到離開重慶，甚至乎到今日我的主張了。我的主張說起來

是很簡單，就是個人無論如何犧牲，最要緊黨萬不可以再破裂。我還記得在擴大會議失敗之後，我個人到歐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廣州有非常會議召集，我即沒有過問。到了九月我想這樣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國試試進行一種黨的團結。歸途剛抵錫蘭的哥倫堡，即聞有瀋陽九一八之變，我還記得當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詩：「海上淒清百感生，頻年擾攘未休兵，獨留肝胆對明月，老去方知厭黨爭。」自是決心進行黨的團結，中心總以為黨有辦法，國事才有辦法，否則黨一失敗，國亦隨之而亡，縱然倖而不亡，亦必衰敗。

但要黨團結，先從那裡着手呢？我以為先須從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對於實際的政治從來不批評，對於黨也從來不表示意見。老實說，我並不是沒有批評和意見，但是再想想，多一種意見，便多一種糾紛，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見是不是絕對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絕對的好，那更不必說，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說，我為謀黨的統一和團結，先不必期之別人，還是先求之自己。我心中所祈求的，黨萬不容再分裂，蔣先生和汪先生千萬須合作到底，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後以至今日的一貫主張。

而且當日國家實在也太危險了，中日問題時刻都有立刻戰爭可能，軍需工業，中國還談不到，而且也不能一促而幾。但中國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萬担怎麼辦？每年缺乏麵粉二千萬担怎麼辦？民國二十一年中國棉花產量只得七百萬担怎麼辦？中國一有戰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戰而屈。這都是我的實業部職權範圍，我應該埋頭於解決這些問題。黨的問題，我為團結，我且讓其他同志去幹。

我對黨務求團結，不但我在實業部四年如此，就是我離開實業部後也是如此。我還記得我離開實業部

後，張岳軍先生曾奉蔣先生之命徵求我同意做意大利大使，我堅辭不就。固然我的母親太老，我不願離開她，同時我深怕離國太遠，而汪先生又離國治療，易爲造謠者製造謠言的機會，黨內的謠言一生，結果有時非意料所及。我離實業部以至八一三事變，始終未離南京一步，這是我爲力求黨內團結的苦衷，當時或者沒有人會了解的。

在民國二十七年我們退到漢口時候，黨的統一呼聲又起。我記得有一次陳立夫和陳辭修兩先生來德明飯店看我，陳辭修先生說，過去黨的糾紛，我們三個人都應該負責任。我笑說，在民國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說我應該負兩分責任，在二十一年以後，我絕不負任何責任。立夫先生也說，這幾年來公博先生實在沒有責任。黨的統一是我極端贊同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經開始以靜默的態度而等時機的來臨了。其實在我歷年的回憶，在每次糾紛當中，我都不是居於發動地位，而結果每一次都變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寧漢分立，我在南昌主張國府和總司令部遷漢，當時我知道共黨並沒有多大力量，總想以國府與總司令部同時遷漢，可以鎮壓下去，但後來畢竟引起寧漢的分立。在十八年自「革命評論」停版以後，到了歐洲，本想作久居之計，後來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國，遂有張桂軍之役和擴大會議。至今回憶，自己也覺有些不可思議。我敘述這些經過，我並非諉過，更並非卸責，因敘述之便，不禁引起這麼的感想。

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罷，時間我已記憶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從重慶來一個電報，叫我立刻至重慶。我到重慶時，汪先生告訴我，中日和平已經成熟，近衛已表示了幾個原則，一、承認滿洲國，二、內蒙共同防共，三、華北經濟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領事裁判權，五、相互不賠款。中國如答應，則日本於兩年內撤兵。我對於第四第五兩原則沒有意見外，其餘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則都不贊同，尤其不贊成的是汪先

生離開重慶。我的最大原則是「黨不可分，國必統一」，黨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夠了。我們要救國才組織黨，今黨不斷分裂，救國更從何談起。汪先生說，中國的國力已不能再戰了，非設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爲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我們難道袖手以待亡國嗎？現在我們已無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們結果必爲共產黨的俘虜。當時我已辯無可辯，我說，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蔣先生之命至歐洲，當時原可以不必急急歸國，當日很多人在歐美多藉口辦理外交或採購物資，逍遙海外，以待世變，我不忍各同志在國內掙扎苦鬥，故願同甘共苦，匆匆求歸。我的志願如此，我寧願真到了這個時期，一同犧牲算了。汪先生說，我們革命黨死何足懼，難道眼前看幾千萬的老百姓也跟着我們同死嗎？汪夫人這時說：「好了，我們一定走的，你不走時，一個人留在此地好了。」我們辯論，到了此時，已經無法可辯。我也無法可阻汪先生離渝。至於以後怎樣，我不得不再考慮。

汪先生是決定於十二月二十左右離渝了，我回成都以後，苦悶達於極度，第一想到我不隨汪先生走，不難人家看作我個人在內地作汪先生內應的工作，就是不這樣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罵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罷，數年來我苦心孤詣，隱忍自重以求黨的統一的苦衷都盡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東北是丟了，內蒙共同防共也等於丟了，所謂華北經濟合作也等於共有，於中國前途絕無好處。自回成都以後，每夜都不能合眼，我祇有最後一個希望，即離川以後，以個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組織政府，更希望黨對汪先生的制裁能夠緩和，減少汪先生的衝動，這樣我可以從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夠中途中止他的行動，這是旦夕所祈求的。時日已記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日左右，汪

先生派一個副官來成都通知我，叫我務於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氣關係，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飛雲南，但汪先生已前一日赴河內。到了河內，我寫了一封信呈蔣先生，託張岳軍和朱驥先兩先生轉呈，中間畧述我的主張。並盼黨能對汪先生寬大，使我得盡最後的努力。

在河內住了幾天，近衛聲明已發出，汪先生起草一個答覆，交周海佛，陶希聖，和我三個人帶去香港發表，是即所謂艷電。我臨行之時，力勸汪先生不要離河內，並且不要和日本人來往，以示無他。我回到香港以後，心想我的心願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動，或者可以得重慶各同志的諒解。

中央黨部終於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對汪先生下令處分了，末後更有會仲鳴之死，我想我勸汪先生不要離開河內的主張怕又會中變了。我那時悲觀達於極度，想請汪先生不要離開河內恐怕不能實現了。我那時真是感覺人微言輕。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關係，不能阻他離渝，以六年來苦心孤詣以求黨的團結統一而敗於一旦，我尚有何話可說。恰值我的母親病重，我遂閉門不出，更不表示意見。不久聽見汪先生赴滬了，而且更聽見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個電報給汪先生，那個電文我已不存，我只記得大意，說以先生的地位萬不宜赴日，並且最後一句話說得很嚴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國人。」汪先生覆我一電，說「弟爲愛國愛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面國人？而且在此國家敗亡之時，更不計及個人地位。」我接到這個電報，又只有長嘆而已。

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罷，汪先生到了廣州，叫我到廣州一行，並且派人對我說，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種君子協定，他不求我贊成，只希望一見以便討論。我到了廣州住了兩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協定，現在內容我也記不清，大致和近衛聲明及後來的中日基本條約差不多，我終認爲不滿，以爲非中國所能接

受。

不久，上海召集幹部會議，邀我和何炳賢出席，我決定不去，只是何炳賢赴滬，我囑咐他最要緊是阻止「汪先生」組織政府，其餘善後問題，我再設法挽救。其後何炳賢的確極力反對組織政府，並且和當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辯論。我當日有一種痴想，以為我什麼都不參加，或者汪先生不致於組織政府。那裡知道以我個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決心，更不能排除當日的羣議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說中日基本條約的草約已開始討論，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後就是反對也來不及。我想這或者是一個關鍵罷，如果我逐一反對，那麼組織政府可以延擱，以後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國一致才舉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個月。那裡知道我到上海時候，所謂基本條約已討論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來才討論了。我在上海住了半個月，只是和須賀辯論些海軍問題，這都是無關宏旨的虛話，我再無心逗留，終於十二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將離開上海的幾天，一夜汪先生請我吃飯，我碰見影佐禎昭。我說：「這那裡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影佐答覆我：「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飯後，我把影佐的話報告汪先生，並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說：「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

### （三）南京政府的組織和我決定的原則

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到香港的，當我在上海的時候，已經見有組織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終沒有談起，只是從旁聽說某人預備做什麼部，某人預備做什麼而已，我反正不願與聞，就不願與聞到底

，我心想趕快離開上海再說。同時我希望重慶急急出一個辦法，我不是因為汪先生要組織政府，要重慶不能不及早謀和，而是重慶最好有一種表示，使上海一般人不至急於出以積極行動。可是回到香港以後，我沒有辦法通知重慶，在香港誰人可以代表重慶，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二十七年到歐洲時候，曾携張岳軍先生一本「羣密」，在八月時已知道不適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初三或初五罷，陶希聖和高宗武兩位早上忽然來訪我了，我吃了一驚，問他們爲什麼來香港。他們說我上船之後，他們也隔一兩日便走了。他們兩人當然並沒有說什麼，祇說他們走後，汪先生便要找我了。我當時實在驚詫不已，找不到什麼話可談，等到第二天再找他們時，一個也找不着，我那時實在不知高陶二位的意見。在滬時候他們對於佛海不滿意，說佛海許多閒話，我是知道的，至於對基本條約不滿意，我始終沒有機會聽到。直至後來他們公開發布基本條約初稿，我才恍然大悟。對基本條約不明白的，但爲什麼不對我說呢？不贊成汪先生組織政府，也爲什麼不早對我說呢？

汪先生畢竟赴青島舉行會談了，在事前我是毫無所聞，不過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聞也毫無用處，那時似乎箭已離位，扣弓無益。我心想汪先生實在太危險了，在一般和運的分子，我所稍爲諳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聖兩人。佛海是我在民國十年認識，其後因職務的不同，不但談話很少，就是見面也很少。至於陶希聖是比較諳熟的，現在已和高宗武脫離。在上海汪先生左右的，我實在找不出一個熟人。汪先生脾氣易於衝動，我是知道的，如果逞情直行，對於汪先生的前途，對於中國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憂慮。

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來邀我到上海，我問汪夫人是不是要組織政府。汪夫人說你對於這點贊成或反對，請你到上海對汪先生說。我還記得在我臨行之前數夕，曾和錢新之杜月笙兩先生見一次面，



他們問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覆：「是的。」他們託我最好勸汪先生不要組織「政府」，我說當然要勸汪先生，同時我表示我實在對高陶兩位不滿，倘然他們早些對我明白表示，或者合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後我仍希望他們兩位轉達蔣先生有無更好的辦法，使我得以從中盡我最後的努力。

我是在三月十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時候，還都南京一切都準備好了，我簡直無法開口，我知道勸也沒有用的，不過勸雖無用，也不能不勸。汪先生說政府再不組織，只有宣布和平運動失敗，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無法了，今後只有從事補救的一法了。當時我向汪先生提出兩點，第一點，戰由蔣先生戰，和亦當由蔣先生和，南京地位只好處在一個中間交涉的地位。換一句話說，南京極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優的條件，通知重慶，務必全國一致，然後乃和。第二點，南京對於日本在中國作戰，應當極力阻止，尤其萬勿命令所轄的軍隊參加作戰，以免由外患而轉變成爲內戰的方式。這兩點意見，汪先生極爲贊成，並且說我這些意見就是他的意見。

汪先生允許我的提議，並且要我幹行政院，我堅持不幹，轉而就立法院。我當時極願以閒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寧靜，徐謀補救，使國家和黨復歸於統一。至於我本身又該怎樣呢，我自己也決定應該做的幾件事：

第一是反對中日基本條約。在基本條約簽定以前和在簽定以後，我都一直反對。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簽定了，在正式討論的時候，汪先生叫我參加討論，我堅辭不肯，因爲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參加討論，那麼簽定以後，我再不好反對，我要保留反對的地位，所以不肯參加。在簽定後，阿部信行大將其時是駐南京的大使，他問我基本條約會不會發生影響。我說：「絕對不會發生影響，因爲，第一

，所謂基本條約，顧名思義，應該謀中日兩國友好的百年大計，照這樣條約的內容，連停戰協定都夠不上，更談不上基本。第二，照近衛聲明，口口聲聲說東亞新秩序，但基本條約內容無一條不是舊秩序，而且是舊秩序中最壞的惡例。不過這個條約固然發生了不好影響，也不會發生惡影響。」阿部問這是何解？我說：「一般現象已經壞極了，大家都已對日本不諒解，這個條約不過是對日不諒解中一個證明而已。」其後無論本多，重光來任大使，我都這樣反對。三十一年和東條英機見面，也是一樣反對，並且對任何各界人士，我都這樣解釋和宣傳。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謂中日基本條約廢止。

第二是反對華北特殊化。在基本條約中華北中日經濟合作，只是那麼一句話，但事實上何止合作，簡直是獨立。在二十九年三月底，我得到美聯社一個消息，說北平與亞院的森岡很怕南京政府還都，影響到北方，曾秘密電東京，主張華北應當採取永久半獨立的狀態。我在二十九年五月以答禮的名義赴東京，首先對米內內閣總理和有田內務大臣提出質問，而且更對近衛文麿質問。米內和有田極力否認，而近衛則因已下野，說是否有此事，他以不在其位，毫不知情。然而事實上，華北何止獨立，簡直是一個國家。舉凡政治、軍事、經濟、金融、交通，無一而非獨立，尤其特殊中之特殊的是南京和北平的文書交涉，和一切接洽，都要經日本的手。我在三十一年又寫了一篇文章登在日本雜誌，題目是「告日本國民」，當中一段攻擊華北特殊化，並說我們絕無南北之見，要中國南北分立的不是中國，只是日本罷了。因為那時，日本宣傳說中國的南北見解不同，似乎華北的特殊化是出於中國北方的要求，而不是日本故意使其分立，所以我有這麼一篇公開的言論。華北獨立，一直至基本條約廢止之後，及日本採取所謂對華新政策，才慢慢有統一的傾向，然而也只是到傾向為止，因為日本軍人把持於上，商人把持於下，至日本投降時候，還保存一

種特殊的狀態。

第三是提倡民族主義。南京政府還都之後，三民主義重復在淪陷區內公開宣傳了，我尤其極力提倡民族主義，我深怕人民習慣於日本統治，更怕軍人習慣於日本支配，使得我國永遠不能翻身。我對汪先生提議重復設立政治訓練部，我的用意，因為在南京還都時候一個兵都沒有，所有的僅有任援道的綏靖軍，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謀畧部隊。這些部隊在廿六年底即歸日本軍隊支配，到二十九年已有兩年多。日本所謂謀畧部隊，只求他們不對日本放槍，其餘事情日本是不問的。因此思想龐雜，紀律廢弛，我深怕他們貽害人民，尤其怕他們傾向日本，則國家將貽無窮之患。因此我把各部隊軍官抽調來京訓練，灌輸他們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靠人，更鼓勵他們以國家自由獨立的精神，勿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時對中學生演講的「三民主義與科學」作藍本，另外寫一本「政治工作須知」，最注重「負責任，求知識，守尊嚴」；我所謂守尊嚴，固然一個軍人，一個國民不能驕傲，同時更不能卑屈。我當時實在看不慣有些人對日本那樣卑屈的態度，我不獨引以為國民之恥，更恐怕由此墮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拔。

第四是提倡廉潔政治，我最引為恥辱的是民國二十三四年，聽到日本批評中國無一公忠體國之人，同時我更反省到，中國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悟到四書有句：「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來則已，既來應當示日本人中國並不是沒有公忠體國之人。以此首倡廉潔政治，而為人表率。而且我更標出四句格言：「復興中國，從做人起，建樹人格，從立志起。」我以為不會做人，也無從救國，國家雖然喪敗，如果人人能夠立志做人，不以和平為發財的門徑，或者中國還有出頭的一天。不過我承認失敗了，我雖然這樣標榜，而且在上海實際上幹了四年，

對僚屬發生不了很大的影響，貪污還是層見叠出。社會也發生不了影響，奢侈淫靡還是茫無止境。人們都如食狂藥，似世界末日將至，能夠享樂一天算是一天，什麼是中國的危險，他們似乎不在乎，怎樣才可以使中國復興，他們更以為不干他們的事。這真是使我非常之痛心的。

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說無日不與日本鬥爭。除了和日本力爭和平條件之外，在政治上爭行政的自由和統一，在軍事上爭軍事上的獨立和脫離日本的束縛，在經濟上爭取物資的保存和國家人民的元氣的保存。至於具體事實，我因為沒有檔案在手邊，而且太長而瑣碎，只好問各部門的負責者了。我還記得去年有人對我說：「和平運動是失敗了。」我說：「南京這幾年中對日本就沒有和平過，無日不在那裡鬥爭，和日本的總軍部門爭，和日本大使館鬥爭，更和東京政府鬥爭。」既然沒有和平過，那麼更談不上失敗。至於全面和平更談不上，這都是五年半的事實。

#### （四）敵性的南京和危險的南京

我所謂敵性的南京，是日本人眼中的南京，我所謂危險的南京，是我眼中的南京。現在我分兩段畧述如下：

（甲）敵性的南京 日本人對於汪先生是相當尊敬的，同時也認為南京是含有敵性的。因為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理想，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見解。汪先生的理想：以為我以誠待人，人總是有良心的，也會感格的，近衛既然聲明日本並無滅亡中國之心，那麼日本在華軍民也是一樣的，因此日本應當讓南京統一南北，使南京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南京得以建樹强有力的軍隊以保持和平區的治安；使南京支配一切經濟以

保持國家人民的元氣；使南京可以自由處置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數年以來的戰爭痛苦可以稍得蘇息；使南京自己可以保護人民，排除日本憲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而日本的見解那就大不同了，許多軍隊和官吏曾受日本支持的，他們不得不繼續支持，至於貪污與是否與日本無關，有時或者因為貪污，他們才更容易利用，至於南北對立，更是他們奪取物資的機會。軍隊不必強有力，只須能夠做到日本人的步哨為已足，南京政府軍隊有了力量，總有一天會聯合重慶反攻日軍。

日軍是以戰養戰，物資在所必需。倘然由南京支配，南京一定不肯盡量供給日本的需要。南京是和重慶休戚相關的，對重慶份子，南京必然擁護，就是妨害日本的安全。凡此種種，都是汪先生的理想，和日本的見解完全對立。日本在二十九年乃至三十年，還企圖南京能夠進行全面和平，及後慢慢承認南京為有敵性的政府。幾年以來，除對汪先生表示尊重之外，又發出一種批評，說「重慶是武裝抗戰，南京是和平抗戰。」因為視南京為敵性政府，對於政治，以前採的一種半干涉的態度，不復再打算解除。對於軍隊的調動，故意拖延，使南京無集中軍力的機會。對於經濟，以辦理統制應由民間辦理為名，要求南京在上海成立各種統制委員會，而實際上由日人把持處置。

除了各種束縛以外，更發出南京毫無力量的宣傳，由於這種宣傳，對於各地方政府以及物資處置，更採取一種脫離運動。照我的觀察，假使日本的軍事不失敗得那樣快，南京政府的存在也很成一個問題，倘若美軍登陸，南京的部隊無疑會先給日軍繳械。

(乙) 危險的南京 去年，即三十三年三四月間，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

在中國方面，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爲掩護，出而爲共產黨宣傳。谷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爲進步。汪先生於三月二日赴日本治病，把軍事委我負責，把行政院委佛海負責。我既然負軍事上的責任，我不得不替中國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爲中國統一後打算。因此我決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產黨妥協，只有和日本破裂。同時我得到一個情報，說共產黨決定以蘇北的阜寧爲第二根據地，這樣，東南經日軍破壞之後，更要經共產黨一次蹂躪，我實在對不起國家，並且不能履行離重慶後呈蔣先生信內「國必統一，黨不可分」的諾言，因此我一面決定一種軍事計劃，並一面召集各將領在南京會議。

日本的態度曖昧如此，而南京的軍事情形又怎樣呢？除了任援道的第一方面軍分佈於蘇浙皖各不相聯外，蘇北的李長江舊部和原有的部隊，自經項致莊改編以後成立兩軍，這些部隊以分防的關係，沒有方法訓練和教育，而且械彈缺乏，配備不完。我打開地圖一看，我們沒有一個隊伍不給共產黨包圍，而警衛一、二、三三個師，除了第一師劉啓雄留守南京以外，日本總以分防爲詞，不讓我們集中。至於三個師的內容、配備，比其他各師較優，一、三兩師的軍官多數是軍校學生，雖然反共的意識堅強，但是待遇方面因爲不是地方部隊，無特別的津貼，也較各師爲薄，以是逃兵很多，兵額不足。我經過很長的時間考慮，暫時北以隴海路爲限，南以錢塘江爲限，先作一個防共區域的準備。因此同時將蘇北、江蘇、浙江三省更迭，將江蘇交任援道，將蘇北交孫良誠，將浙江交項致莊，企圖將這個地帶保持住，使東南得一個安全地域。

，一旦有事，不致淪於匪手。

當日我召集各將領會議，我會聲明：爲中國的前途，爲未來的統一，我不能不做這個打算。重慶贊成聯合剿共，我們也剿共，重慶不贊成剿共，我們也剿共。日本不和共產黨妥協我們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產黨妥協，我們也剿共，我是不惜因爲剿共問題和日本反臉的。當時我曾提出（一）由河南調孫良誠的部隊到蘇北，增厚蘇北的兵力。（二）將蘇北三個師調浙江，因浙江除第一方面軍程萬軍一師外，沒有其他隊伍。（三）集中第一方面軍防守京滬綫。（四）以上海交稅警團和保安隊。（五）將警衛三個師集中於南京，清剿茅山匪區，打破共產黨三山一湖的計劃，並防止共黨渡江之路。我這計劃是在三十三年四月提出，而孫良誠的部隊於十二月才完全到達蘇北。因爲孫良誠的部隊是駐在河南，而調動河南隊伍，必須和華北日軍部商量，東一拖延，西一阻撓，竟費了八個月的光陰，才能完成一部分計劃，中間猶幸東條內閣倒台，日本和共產黨妥協的計劃又告停頓，否則今日之南京及東南三角地帶成何狀況，我是無法去懸想的。可是因爲日本的種種障礙，共產軍已得自由來往渡江，浙江各地的共產軍會一時非常猖獗，攻陷天目，威脅於潛、玉山，莫不由此。如果當日沒有日軍那樣障礙，或者可以早遏亂萌，也未可料的。

至於吳化文部隊由山東調駐安徽，還是今年的事。起初我想將吳化文調離海，而將張嵐峰調安徽，末後也因日本的障礙，沒有實行。除了軍隊佈置以外，最缺乏是子彈問題，日本是從來限制我們部隊的子彈的，南京修械所是沒有辦法了，無烟藥是買不到了，我只好囑咐各軍自行設法購買和製造，最好是不要讓日軍知道，以免又發生掣肘的事情。其次更密囑各軍於中央部隊聯合剿共時，設法密送械彈過來，使得增厚剿共的戰鬥力。其餘我專候中央部隊的反應，使東南各地於日本退兵時，不致淪入匪手，致對統一又多

一重障礙。

以上所述的軍事佈置，都是事實，我今日不是以爲還有功可言，更不是以共產黨問題爲投機的題目，政府可以詢問各軍，都可以知道我的佈置和主張。

### （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汪先生終於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我一方面非常悲慟；一方面更想到我對於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樣可以結束這個局面以使國復歸於統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個人主張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脅害，同時也沒有別的機關可以維持治安，如果東南一亂，我仍舊對不起國家，仍舊不能達到中國順利統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職務，只以代理名義維持，等待國家的統一。同時於十二月二十日我發布聲明，宣言「南京國民政府自遷都以來，自始即無與重慶爲敵之心」，更強調聲明「黨不可分，國必統一」。我這個聲明是表示我幾年來的思想，並且回應我離四川後呈蔣先生的那封信。當時南京仍在日軍挾持之下，我不憚率直地表明南京無與重慶爲敵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合作的，我也不憚明白表示黨不可分的理論。我並不是今日要敘述我的勇氣和決心，這只是八年以來的一貫主張，到了我可以發言的時期，應該披肝瀝胆與人以共見。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張也表示過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蔣先生通消息。原來我本有兩個電台，一個是我自己設立的，在上海開納路七十四號，那電台設於三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給蔣先生侍從室劉百川用的，那呼號是CWAZ，XZWW，1XY。我從來沒有直接消息報告蔣先生；因爲總感到關於日本普通的情報自然



有人報告，關於日本謀和事件，總以這些條件我自己都不滿意，那能告訴蔣先生。至於關於個人問題，只有等候蔣先生的命令，我無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個電台是戴雨農先生底下的陳中平的，那個電台有一次爲上海日本憲兵破獲，把人全部捕去了，我出面保釋，並要求交回電台，叫陳中平繼續設立，那電台呼號是OSF，AVI，EOB，JYO，GDT，JOH，YGO。後來陳中平因爲恐憲兵監視，或作或輟，多數電報都送往浦東。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劉百川早回內地，第一個電台已經日本憲兵干涉了幾次，終於把電台封閉了。剩下陳中平的電台，據說沒有和蔣先生通信的密碼，那時我竟沒有辦法，只好企圖蔣先生有人到京滬，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佈置。

我還記得見過幾個人。一位是何世楨先生，一位是顧寶安先生，一位是兩路黨部負責人（姓名我已忘記，可以問傅式說），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趙冰谷先生，我都託他們把我的心情和布置轉達蔣先生。我告訴他們，我對汪先生心事已了，責任已完，現在此間，正候蔣先生指示辦法，至於防共，我已盡我的力量，大致東南不致有什麼問題，將來無論如何，我絕不會割據，我絕對服從蔣先生，我極盼望黨能團結而國復歸於統一。何世楨先生是駐上海的，其餘各人或者回去內地，或者自己去內地的，我並且鄭重告訴顧寶安先生，請他轉告立夫先生，在可能時呈明蔣先生，派一位相當重要人來滬，這樣可以直接聯絡，直接通電。可是至到我離京之時，我依舊沒辦法和蔣先生通消息。

不過軍事方面已和顧墨三和何柱國兩位取得聯絡，大概今年五六月間，有一位姓湯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記，可以問趙尊嶽），奉陶廣軍長之命來見我商量，軍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議之後，派陸軍部督練處處長張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張海帆不但見了陶軍長，並見過顧墨三先生，顧先生還派高

級參謀柏良來滬商議具體問題。我立刻叫參謀次長祝晴川至滬，和柏先生商訂軍事共同行動幾個綱領。後來我回京之後，聽說柏先生因道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時候，他已回達浙江沒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問題，我會和柏良談起日本問題，我主張不必在日本本土登陸，只在台灣登陸，日本即會屈服。在台灣陸登犧牲較少，而成功則一，柏先生主張我派一代表往見蔣先生，可是我實在沒有一個熟人可派，只請柏先生轉告顧先生，請他代達我的意見。

何柱國的代表吳樹滋也來南京見我了，並携有何先生一封信，說奉蔣先生之命來聯絡剿共的。那位吳先生是林柏生介紹的，我囑軍令部次長楊振和吳先生接洽，何先生並要求我派蚌埠綏靖公署參謀長郭爾珍和他接洽，可是郭爾珍患病未行。我後來到蚌埠，還催郭爾珍前往，並親手寫了一封信給何先生。我叫楊振在南京設立一個電台和何柱國先生通電，並會囑張嵐峰和何柱國先生見一面，商議軍事問題。

軍事合作正在進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過因敘述之便，簡單說一個大畧。以下還簡說我的心情，然後說到南京政府解散後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幾個原則之外，我決定第一不批評抗戰，更不願誹謗蔣先生，我總覺抗戰是應該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贊成蔣先生的主張的。因為和平到了南京，目觀日本的種種行動，我更感覺有抗戰的必要。我還記得，內地有人出來，傳說南京的人們以為「抗戰愈烈，和平愈有辦法」，這種傳言，並不是謠言，的確是事實，也是南京的見解和主張。第二，我手寫文章不會稱過日本為友邦，因為我不認日本為朋友，大家覆按過去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請重慶的同志和部隊參加和運，我總以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關係，我是來補救的，是準備受苦，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願拖其他同志受苦。至於部隊，除了後來因聯合剿共之外我始終沒

有和一個內地的長官交過，因為我不願意拆散抗戰陣營，尤其不願以一個師長或一個團長受日本一個尉官指揮監視，我不願和留在重慶一個同志或部隊通過信，或者希望他們出來，除非同志已經出來，那我只好給他找一件工作，這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慶同志有被日軍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則必定設法保釋。我不是藉此以見諒同志，而是援黨不可分之義，實行我的主張。第五凡是被俘的軍官，我都贊助汪先生設法安置，我總覺得內地軍官的民族意識和反共思想比其他雜湊的隊伍強烈的多，中國不幸而敗，可以作復興中國之基，幸而戰勝，則這部分軍隊終可爲國之用。第六，在上海範圍之內，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後，我對於重慶的情報人員，極力掩護，並同意於各地軍政人員和中央人員交通。

至於傳達日本和平條件，我只有兩次，兩次都託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內地報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時間記不清。比較具體的是去年小磯內閣登台以後，由柴山陸軍次官携來五條，內容我已有些模糊了，大致是中日對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國在和平後可以中立。我以爲這都不相干，最要緊是可以談東北問題，撤消滿洲國。柴山答覆可以討論，我認爲比較具體，所以和佛海商量，又託朱先生往重慶一行。朱先生是商人，與政治無關。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動身的，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問日本有無更進一步的表示，那時已過了舊金山會議了。我勸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託重慶調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報告東京。後來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於報上得到消息，日本擬派近衛赴俄，託俄國調停。我當時主張由中國出面調停，以爲可以增強中國的地位，增加中國的發言權，並且將來收復東北不致有其他意外，不料日本倒信蘇聯而蔑視我的提議，大概日本還以爲日蘇有互不侵犯條約的關係，而且在德蘇戰事正猛烈時候，日本不動，總以爲蘇聯可以幫她的忙罷。

### (六) 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歸來的經過

日本於八月十五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鈴木內閣廣播投降，南京政府也決於十六日宣布解散。南京最危險的時期是在十一至十三日那幾天，因為南部陸軍大臣在十三日還發布繼續作戰命令，並勉勵官兵努力作戰，而在南京的日本總軍部態度始終不明。我那幾天分頭和軍部及大使館接洽，以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復，如果我們更要為中日兩國前途計，應該服從日政府命令投降，並且千萬勿在此時更在中國留一惡劣印象，使中日感情萬劫不復。我當時所最憂慮的有兩件事，一件事是日軍繼續作戰，如果日軍不顧一切，那麼中國一半土地地方必會糜爛不堪，人民傷亡更加慘重。一件事是日軍和共產黨聯合，成為長期內戰。因為日軍部許久就散出謠言，萬一無路可走，祇有和延安携手。一直至八月十四日情形已比較安定，谷正之曾勸岡村，說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夠協助中國復興，使中國能為東亞領袖，則東亞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國自存，這也是一種事實，這也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到十四日谷正之正式來見，說明日本投降已沒有問題，軍部的今井少將，海軍的少川少將也分別來見，報告日軍決以最大誠意履行投降條件，並表示一切設備不破壞，俾得換取中國的好感，以留將來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十六日早上，佛海也由上海來京，下午舉行會議，宣布南京政府解散並發布宣言，勗各將領以統一為重，不得有軌外行為，更不得意圖割據，宣言的全文已登在報紙，並即夜廣播，請大家去查考，我手邊也沒有這種原稿了。同時因為辦理各部門的結束是要有機關的，於是成立一個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維持各地治安也要機關的，於是將以前的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我連夜草了一個電報報告蔣先生，說明南京政府業已解散，並報告蔣

先生幾件事，那個電文我已沒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說明日軍投降沒有問題，不過集中是需要時間，由小隊歸中隊，中隊歸大隊，集中於杭州，上海，南京，徐州，聽候繳械歸國，希望中央勿迫之太急，免生意外。第二件是日軍決定不再對共產軍作戰，因為岡村說共產黨也是中國的部隊，是與重慶軍隊無別的，也是戰勝國的部隊，除非共產軍襲擊，否則日軍必定退讓，我特別請中央注意。第三件報告宣城已為新四軍佔領，蕪湖被圍，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並乞指示機宜，這個電報是寫了，可是沒有密碼，更以電台叫不通，十七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楨先生轉譯電呈蔣先生的。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夜，京滬行動總隊發動了，我在下午六時，接有報告，說周鎬擬於是夜行動佔領各機關，我祇知周鎬是佛海推薦為軍事委員會的科長，後又推薦為無錫行政專員。我打一個電話給佛海說，在此時治安是第一要緊，南京一亂，恐無法收拾，勸他勸周鎬不要隨時舉動，等候蔣先生派人來接收各機關，以免南京混亂。佛海說已派人找周鎬勸告了。不久警察總監李謳一又來報告說：周鎬已張貼告示，着銀行不能提款，其他還有幾條，都可以搖動治安的，並揭一張告示來見。我叫謳一去見佛海，請示辦法，因為我那時已解除一切職務，所以臨時政務委員會，治安委員會，只是臨時機關，就是指揮部署也只能指揮原有機關，對於行動總隊，我是無法處理。我又電話問佛海，佛海說找不到周鎬。到了十一時，軍官學校又來電話，說有人至軍官學校演說，要接收軍校。這樣四方八面報告，使我無法處理。如果要鎮壓，必至立刻衝突，以致剛在日本投降以後，同室操戈。如果不鎮壓，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亂狀態。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殘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負責的，佛海既無意見，想或另有辦法，我可以趁這個時候卸責了。拂曉時，軍官學校又來電話，說是否讓人接收。我立刻答覆，倘然於國家統一有好處，於地方治安有

好處，就聽候接收罷。到了十七日八九時，說蕭叔宣受傷，趙尊嶽、吳頌臬及其他許多人都已被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辦公室等候事態的發展，我託人約周鎬和祝晴川於十一時來一談，我想接收機關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南京治安一切善後，我倒想知道他們的辦法。等到十一時，兩人都不來。我決定三件事，一再不打聽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靜坐辦公室內等候逮捕。這樣在辦公室內屹坐，一直十二時半才回家。

到了下午兩點鐘，軍校全體員生都武裝到西康路了。當時我還以為他們奉命來要我表示態度，或是來逮捕我的。我一問才知道他們不肯改編，而是來請示的。我集合了學生的代表，問他們有何要求，並且告訴他們在中國大統一的時候，應該服從蔣委員長。他們說他們絕對服從蔣委員長，但不願受不知那裡來的人改編。我只好向他們安慰，答應去電蔣先生，請示辦法。同時佛海派人送來一信，說已由日軍部小笠原出面調停，周鎬已停止行動，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這次行動之後，南京真是一日數驚，新街口新四軍散發傳單了，四郊的新四軍也蠢動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強維持。十七日下午五時後才會見佛海，我和他兩人打了一個電報報告蔣先生，請即派大員來京維持，以免紛亂，佛海終於十九日上午又匆匆的回上海去了。

任援道在十四日以前曾兩次派人來京，說已就蔣先生委任的先遣軍總司令，維持京滬路及南京治安。我極盼他早日來京，商量一個辦法，不知任先生從那裡聽來謠言，說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十六日和佛海同來的，到時也不來，並且在蘇州車站對佛海說：「公博要幹，那我是不能去的。」我想真是奇怪的，我於去年十一月已發佈聲明，「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為什麼援道還有這種懷疑。而且日本有一百多萬的軍隊力量都投降了，我難道擁這些殘破部隊來反抗中央嗎？我深深自歎，數年來的心情，

而被人誤會至此，真是無話可說。我在十六日見援道不至，和佛海連名去電促其來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軍長徐樸誠來探聽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訴徐樸誠，並囑其轉致援道立刻來京一行，共商維持治安辦法。

任援道於十八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又僵了，第一，岡村說沒有蔣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認有先遣軍可以執行職務。第二，警衛師劉啓雄不願受援道的改編。第三，海軍不願編入先遣軍，更等候蔣先生的命令。我那時的地位已處於萬難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維持的，治安委員會的地位是不夠指揮的，軍校學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蔣先生的後命。江北疊次告急，無兵可調，眼見南京感受極大的威脅。行動總隊還要行動的消息每日還有這種情報。我還能指揮的，僅有軍校一千餘名學生，憲兵，和警察，倘然南京一旦有警，我是無法可對國家的，只有盡我個人之力維持罷。我又草了一個電報報告蔣先生，說明以上情形，那電報是借市黨部許志遠的密碼打的，那個電稿我已不在手中，大概說明援道不便指揮劉啓雄，盼示機宜。海軍最好仍暫以凌霄主持，等候交代，軍校請蔣先生自兼校長，候蔣先生到時再行解決。

最後想到我本身問題，國家能夠統一，能夠勝利，這是我數年來夢寐以求之事。蔣先生如果以我過去數年之事爲有罪，我應該束身歸罪。如果置數年之事政不問，而認我終是統一的障礙，也請蔣先生定罪。因此我決定留京待罪，聽候蔣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後，告訴我許多消息，說蔣先生是對我諒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滯留南京，反使蔣先生處置兩難。任先生直接勸我兩次，間接託人勸我兩次，當時我無法能得蔣先生的真意，而能通電的據說只有任先生。任先生還說蔣先生要我離京是不會來電，而且不好來電的，但我還是等候蔣先生命令，而且我一離京，治安是否發生問題，殊不敢必，我非候至有人來京，我不好輕易離開。

到二十四日今井少將已由芷江見了何敬之先生回京，報告赴芷江經過，並說，冷欣副參謀長將於二十六日抵京，中央部隊將於二十七日由飛機輸送抵京，何總司令可於三十日抵京，這樣負責有人，我可以暫時離京了。在國家大統一的千載一時之機，我怎可以使蔣先生爲難，而且二十四日任援道還帶張海帆來見，海帆勸我急於放手，我想還有什麼手可放，因此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時，與日本使館接洽，借中華航空公司的飛機於二十五日離京。當時預定或飛青島，等候海船赴日，或飛日本京都，沒有決定，因航空已發生種種障礙了。臨行之前，我會呈蔣先生一函，說明我的心情，並謂「鈞座一有命令，公博當出而自首」那封信很長，並沒有留稿，且回京之後，曾問蕭毅肅參謀長，他說已經見過，那麼蔣先生一定也見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淺海和岡田兩顧問轉致何敬之先生和王東丞先生的，我把那封信交淺海和岡田，是我不知我離京之後，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軍是等候繳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們。此外留一函給任援道和胡毓坤，要他們維持治安，因爲他們都是治安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我再留一函給冷副參謀長，有云：「望見之來有如望歲」，請他召集原有軍警機關，維持治安。我預料我二十五日離京，冷副參謀長二十六日抵京，南京治安便沒問題，我也可以放心卸責了。

於此，我附帶說明幾件事：第一，我離南京是不是放棄責任？我記得何世楨先生在八月十六日到南京，携有顧墨三先生一個電報，是給周佛海、丁默邨、羅君強、任援道和我五個人的。那電報據說是侍從室打給他轉的，因日本投降，叫我們協同國軍繳日軍的械，可是那個電報並沒有命令叫我維持南京治安之責。同時另外有一電報是命佛海維持上海，委任援道爲先遣軍總司令維持京滬綫及南京治安。援道已受命維持南京不必說，警衛第一師劉啓雄也已接援道的通知爲先遣軍第一路指揮，既負責有人，我再不能負責了。



我呈蔣先生兩個電報，一個是報告南京政府解散及日軍動態情形，一個是報告警衛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海軍，及軍校情形，中間免不了有所條陳，是亟盼指示的。除第一個電報何世楨先生代發，我恐怕輾轉遲到，後來因重慶和南京電台已叫通，兩個電報一起都借市黨部許志遠的密碼再發，及後又以電告的密碼再發（重慶電台和南京電台約好暫以總理遺囑做密碼），可是截至二十四日，我得不到蔣先生或侍從室的密電或指示。不過我因爲任援道還未能執行先遣軍的職務，依舊勉強維持。這九日以來，真是筋疲力竭，寢食不安。幸而據今井報告，冷副參謀長可於二十六日到了，中央部隊也可於二十七日到了，我在二十四日下午還召集憲兵和首腦，會議治安，這樣我自問已盡了我個人應盡之力，而且我不但顧到南京治安，並且顧到各地治安，我深怕各軍還有疑慮到沒有保障，我於二十前後打了一個通電給龐炳勳、孫良誠、張嵐峯、吳化文、孫殿英、郝鵬舉，勉勵他們，並囑咐他們接受中央命令，維持地方，同時我更廣播，叫各軍接到蔣先生委任的，應該立刻接受和服從，沒有接到委任的，請他們直接電呈蔣先生請示，這個廣播詞也登在各報，都可以覆按。這樣佈置完畢，我才準備離京。第二，我爲什麼赴日呢？因爲當日京滬謠傳我還要擁兵反抗，援道疑我固不必說，而且援道對我說已有人報告蔣先生，蔣先生並說「公博斷不至此」，可見有人報告我擁兵自衛是真的了。我要離京，最近的不外揚州、蚌埠、徐州，那三個地方都有南京前轄的部隊，豈不又要發生謠言，使我無從自明。我想青島是沒有南京部隊的，日本是打敗仗的國家，國軍就要進駐的，這總可以免去擁兵反抗的嫌疑了。第三我要聲明的，這次同行的有五六人之多，或者外間又會謠傳有一種結黨的行動。其原因爲林柏生和陳若慧在那天（十四日）中午，兩個人的狗同時被人毒死了，這事太過於離奇，令各人不由得發生恐怖，他們都願意受合法的裁判，而不願受恐怖的威脅，所以一併暫離，而

且我當時也會聲明，何時蔣先生有命，即何時回來，所以大家同去，大家也同返。

二十五日離京，飛機以天氣關係，一直飛日本米子。事前毫無聯絡，到了米子才找旅館，三日後東京外務省才派吉川科長來見。我當日表明我到日本只是暫居，何時蔣先生有命，即行歸國，並不要求日本任何保護。九月初旬離米子赴京都，住在金閣寺，大概是中旬的十八九日，外務省大野局長來見，說何總司令有一個備忘錄給岡村，說我自殺是假的，要日本護送歸國，日本政府已指示岡村答覆，說陳公博是愛國的，絕不反對政府，希望中國重行考慮。我當時答覆大野，我愛國不愛國，自有國人公評，日本無代為辯護之必要，可是我引為駭詭的，我已留呈蔣先生一函，為什麼有我自殺的謠傳；只要命令我即自首，更何必要備忘錄。我問大野，我留呈蔣先生一函究竟淺海和岡田已交何總司令沒有，他說不知道，我託他打電報問岡村，俟得消息然後歸國。九月廿四日早大野又來，說我那封信到了十九日才由岡村交何總司令，至於何以延誤，他不知道，並說了許多道歉話。他並說何總司令會派鈕處長見岡村，依舊希望我歸國自首。我立時草了一個電報叫他回東京拍發，我又恐怕密碼有錯，自抄一份電文，和致何總司令一封信，交他寄南京，因他說最近將有交通機可以到京滬各地。我現在把函電文稿抄錄於下：

南京何總司令敬之兄勳鑒，並請轉呈蔣主席鈞鑒。公博於八月二十五日離京之前，曾留呈一函，想達鈞覽。數年鬱鬱之私，一旦得達，殊快所懷，公博原決留京待罪，只以當日傳聞，有請公博宜早離京滬，庶免鈞座處置困難，以故對於京中善後事宜，處理完畢，即匆遽離京。此行決非逃罪，故留呈函中，會有鈞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首之語。頃聞本月九日總司令部對於公博之事，有一備忘錄送致岡村，二十日復派鈕處長傳達鈞意，輾轉傳遞，今始得悉。公博能回國自首，本為日夕祈禱以求

。今既出鈞意，歸心更急。惟交通困阻，船機不通，伏望能派一中國飛機至日，俾得早日回國待罪。區區之忱，尙希明鑒。陳公博叩，有。

敬之總司令吾兄助鑒：八月二十五日於離京之前，曾呈蔣先生一函，託兄及東承兄轉呈，內容想已達覽。弟之離京，決非逃罪，只以當日傳聞，謂弟再留京滬，將使蔣先生處置困難，因是不得已匆遽離京，以待後命。頃聞總司令部對弟歸國之事，曾有備忘錄送致岡村，復派鈕處長傳達尊意，弟決本留呈蔣先生函中原意，歸國自首，惟有一事請兄代弟轉達者，當日來東，本非夙願，惟無論暫居國內何地，皆有軍隊，深懼予人口實，造作蜚語。蔣先生之意既明，弟歸心更急，最好能由國內派一中國飛機來日，俾得早日成行，此種請求，或爲逾分，然區區之心，度亦爲兄所深諒。再者：本月二十五日，弟爲自首事，曾有一電致兄，並請轉呈蔣先生，恐電報梗阻，文意或有不明，茲再抄錄一份，尙乞轉呈爲禱。專此即請助祺，弟陳公博謹啓，九月二十五日。

託大野拍了這封電報，發了這封信以後，渺無消息，直至九月三十日夜間，外務省駐京都的辦事人山本來說，已接外務省的長途電話，說中國飛機已到米子。因於十月一日夜間乘火車到米子，翌日下午擬於米子動身，因爲風雨所阻，在福岡又住一晚，在十月三日回京。抵京以後，又聽到兩個離奇的消息，一個謠言說我自殺是收買新聞記者故意放出的，一個謠言是我會和一個共產黨叫做馬隆的接洽過。第一個謠言實在太不知我的心情，我一生就沒有收買過新聞記者，而且自殺是一種消極的反抗。實在說，汪先生逝世後，我對於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對蔣先生的心事還未了，是我所謂未了，是怎樣可以表示擁護統一和服從蔣先生。固然蔣先生用不着我擁護，但我終不願有任何反抗的痕跡。自寧漢分裂以後，或者蔣先生對我

有誤解，我不免對蔣先生也有誤解，但自二十九年到南京以後，身受公私的痛苦，深知以往黨的糾紛，並非我想的那麼單純，非身受其痛者不能自知，所以我決定找一個機會向蔣先生有所表示和自見。在中國千載一時的大統一時候，我應該束身受罪，任何處置，我甘受無詞。我是自命主張「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而有反抗行爲，那麼共產黨破壞統一，更使中央難於處置。至對於死死，我早已付之度外。當二十九年來京，赤手空拳在敵人的勢力下要保護人民，要保護物資，隨時隨地可以死，不過以死而反抗蔣先生我不爲的。我離京時曾留呈蔣先生一函，說若以過去數年爲有罪，請蔣先生處置，就不以過去數年爲罪，而認我是爲將來統一的障礙，也請蔣先生處置，這是我一種對蔣先生心事未了的心情，這是我的一種見解。至於說我和馬隆接洽，任援道先生更對人說他化了二百萬才買到這個證據。我自十六年分共之後，即沒有和共黨來往，前年我曾草過一篇「我與共產黨」一文，登在「古今」雜誌，可以參考。馬隆是怎樣一個人，我不知道，共產黨有無馬隆其人，我更不知道。空穴來風，是丹非素，謠譏之來，我真不知什麼原因和怎麼一回事。

在日本一個月，所得的材料也不少，尤其在日軍投降後的動態，更值得我們注意。我們於十月三日抵京，在五日後會做一個簡單的報告，托何總司令轉呈蔣先生，因我想將來受處分是一件事，而我是一個國民，有向蔣先生報告日本情況的義務又是一件事。現在把那報告抄在下面：

蔣先生鈞鑒：八月二十五日留呈一函，九月卅日有電，諒達鈞鑒。茲將居日一月以來觀察所得，擇要報告，或於將來對日政策，可供採納。

(一)美國在華盛頓公布交麥克阿塞執行處理日本方針，中有只利用日皇及現政府，而不一定支持日

皇及現政府之語，則美國政策，至爲明顯。惟公博觀察，日本皇室有一千餘年之歷史，自明治維新以來，人民迷信已久。恐集體革命須期之第二代，而非目前可以一促即成。目前日本自降服之後，舉國秩序尙大致安堵，軍閥經已剷除，而社會尙無新生之力量可以繼起，我國對日宜注意此點，不知鈞意如何？

(二) 日本降服之後，其政策絕對傾向美國，而感情則絕對傾向我國，以爲日本已無力量，極盼我國成爲實際之東亞領袖國家，不但可以使日本有靠，並可使東亞地位有一轉機，其意正誠，可謂舉國朝野一致，不但日本本土如此，即在華之投降將領，亦復如此。惟日本國力已微，舉措均感不便，例如對英之外交，本有淵源，今亦猶疑不敢進行，因對某一聯合國（按指中、英、美、蘇等國，非現在之國際機構之聯合國）表示親善，深慮其他一國不滿，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苟加上七千萬之日人懷誠，於中國前途，有更大裨益，至於如何運用，則鈞座想已有成竹在胸矣。

(三) 聯軍初進駐日本之時，日本政府對於赤化，非常恐怖，恐美國極端提倡民主主義，或足煽動共產氣焰。最近聯軍總部會秘密通知日政府，令其嚴防赤化，日本政府始告放心，此係近衛文鷹親對公博所言，諒爲事實，亦殊可注意。（公博居日一月來，未嘗與日政府要人往來。上月底近衛以母喪弔於京都，而公博亦決定十月一日離京都歸國，於十月一日上午始允一見，合併陳明。）

(四) 現在日本政府履行波士坦宣言，朝野均具誠意，惟其中尙有若干距離，聯合國所希望，要日本履行該宣言最大之限度，而日本國力太微，希望實行該宣言之最小程度。因此距離，此後內閣將不斷更迭。聞吉田已有組織過渡內閣之議，將來日本內閣不斷更動，政府當然長在動盪之中，是否可以因此惹起向上之革命，抑因此而惹起反動，對中國孰爲有利，深望鈞座預爲考慮。

以爲然，我不願汪先生離開重慶，不願眼看着汪先生犧牲，更不願汪先生受人批評，更不願蔣先生與汪先生有裂痕致爲別黨所乘，這是我個人的心情。而汪先生認爲我的理由是單爲汪精衛而不是爲中華民國的，但是爲汪先生也罷，爲中華民國也罷，我就是這樣，不但民國二十七年如此，就是二十七年以至汪先生逝世也是如此。

汪先生現在逝世了。他的理想，我是不忍埋沒的，他總以爲中日兩國是鄰國，終不能永遠打仗，應該找一個機會和平，他總以爲中國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無滅亡中國之意，不妨講和平。他總以爲中國共產黨要煽動中日戰爭以收漁人之利，因此更應該求和平。他總以爲日本總說中國沒有誠意，我現在表示極大的誠意，這樣可以成立中日間的真正和平。中日能夠真正和平，我汪精衛是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的。中國能夠多保存一分元氣以爲國家復興之基，我汪精衛就是受人唾罵也是甘受的。可是理想常與事實相反的，我不承認日本無滅亡中國之心，可是他無滅亡中國的力量，並且無滅亡中國的勇氣。無滅亡中國的力量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無滅亡中國的勇氣，就因爲日本的文化。大部份的日人除了以武力自驕之外，心中總有日本文化胎息於中國的思想，因此不由得起了對中國有一種說不出的和潛伏的敬畏之心。不過不滅亡中國是一件事，而要控制中國又是一件事，有了控制中國的心，無論汪先生的理想如何遠大，誠意如何真摯，總是格格不入。而且日本是還要戰爭的，在中日事變沒有結束以前，仍然以軍事爲第一，因爲軍事第一，軍需也第一，任憑你的理論如何遠大，日本還是搜括物資，壓迫民衆。

南京和日本無日不在鬥爭之中，「中日協力」是一個鬥爭的代名詞，日本所謂對南京協力就是干涉，而南京所謂對日本協力就是爭取。其初南京以中日合作爲號召，日日向日本爭回中國物資，末後太平洋戰

爭起後，更以參戰名義，日日向日本爭回中國的物資。收回租界，撤消治外法權，取消辛丑駐兵條約，都是南京向日本鬥爭中的一種表現。至於各部門的鬥爭，看各部的檔案，可以知其大要。鬥爭一天天的尖銳化，末後日本已採孤立南京，轉而為直接壓迫民間的政策，所謂商統會，米糧統制委員會，棉紗布統制委員會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種奇妙方法。我認爲汪先生的理想失敗了，以前我在廿八年十二月，也曾勸過汪先生在中國軍閥的軍隊佔據的地方，尙且不能實行我們的理想，何況外國軍隊佔領的地方，而可以實行我們的理想。無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氣，總以爲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以爲日本總會覺悟，而且已慢慢的覺悟，他總有辦法。

淪陷區的人民對日本痛惡極了，我此次在日本還看過日本報紙一篇社評，說日本失敗的原因，和平區內的人民不信任日本比較抗戰區更甚，這是一針見血之論，不過覺悟太晚了。南京不止對日鬥爭失敗，本身的行政也是失敗。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較自由外，各省的長官任免是須當地日軍同意的，各縣的長官任免是須各省的聯絡部徵求軍隊的同意，因此各地有些不肖官吏只知有聯絡部，不復知有政府，無論如何貪官污吏驕兵悍將，一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懲辦他們。而日本反日日宣傳，說南京政府怎樣沒有力量，時時都在那裡鼓吹改組。物資是在日本人手中，金融是在日本人手中，交通也在日本人手中。這樣南京是失敗了，然而還是鬥爭，一直至解散爲止。自然如我文所述，自有南京，國家和人民的元氣保存不少；但保存至何程度，我却不好妄爲臆測。此外，軍隊被日軍監視很嚴，特工更可由日本用一個某機關直接支配。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我因爲特工綱紀太過敗壞，並且影響及於一般政治，報告汪先生應該注意。汪先生也會太息過說：「你今天還以爲特工是我們自己的嗎？」汪先生這一句話，實在非常痛憤。

日本失敗，在日本自己批評說沒有大政治家。在我看來，自從二二六事變以後雖有善者，已無如何，因為權已下移，人各驕縱，日本的皇室不敢過問，而政府只好遷就軍人，而所謂軍人權皆不在將官，而在佐官階級。這一般佐官，對於政治是不懂的，經驗是沒有的，理想是盲動的，意氣是固執的，因為這般驕橫的官佐，日本就這樣失敗，而中國就給這般驕橫的官佐弄得個天翻地覆！



## 幹兒同覽

幹兒：

你今年才十三歲，我從來不和你談政治，因為你還在中學時期，所以我很不想傷害你的小腦經，其實我在你的年齡，已經與聞和參加你祖父的革命運動了。

倘使汪先生不倡導和平，我決不會離開重慶的，而且自己也會決定非抗戰完畢（不管勝敗）不離開四川的。因為我想雖然中國戰敗也急須和平，然而我還沒有資格和聲望來號召這個運動，所以我只有學文天祥國家亡了自己也死了便算盡一己的責任。

汪先生的確可以佩服，他有革命的歷史，有黨國的地位，但他看着中國快亡，不惜犧牲了自己，任人唾罵，希望能夠作萬一的挽救。他這種舉動，或者你年輕還不懂，你大了自然慢慢懂的。

中國是不可以再戰的了，中國還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還沒有走上近代國家之路，我們要知道近代的戰爭不光是靠武器的，國家的經濟，人民的教育，交通的脈絡，都要和武器相副的，假使缺乏了這些條件，就有飛機、坦克車、大炮，還不中用，何況我們根本就沒有這些機械化的武器！

蔣介石先生何嘗不知道會打敗仗的，但他有一個夢想，他以為美英法俄會幫助中國的，他告訴我上海失了英美法要來干涉的，綏遠察哈爾失了俄國一定出兵的，但他始終沒有和這些國家聯絡過，而這些國家的內情也不清楚，上海和綏遠察哈爾都丟了，外國一些也不着急，蔣先生真是太誤國了。

而且軍備始終沒有打算，沒有準備，大炮和坦克車固然沒有，各地年年月月獻飛機，我們總以為最少有五百架，誰知開戰時候，僅得六十一架，這些買飛機的錢往那裡去呢？誰也不知道，蔣先生也真太誤國了。

勝敗是兵家常事，誰能保必勝的，不過蔣先生簡直沒有打算，好像拿中華民國和四萬萬人民去作孤注的，我個人為着國家，雖然心裡十二萬分的不高興，也只好悶在心裡。

自從近衛聲明，我們知道日本不是要亡中國，所以汪先生才和我贊成和平，但日本是不是有誠意呢，靠得住呢？這不獨一般人要問，你小孩子也要問，我自己也要問。但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國家是與個人不同，個人還有感情，國家是沒有感情的，日本最初何嘗不想亡中國，但她到底亡不了中國，這個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日本沒有這許多兵力來統御中國，第二日本在海上還有英美的敵人，在陸上還有蘇俄的敵人，她把全力消耗於中國，她終是不了，第三還有最大原因，民族主義和愛國思想普及於全國人民，我們雖然打敗，但沒有一個人肯做她的奴隸，因此打了兩年多，她知道不但不能亡中國，而且一旦她和英美俄開戰，還要中國幫忙，因此才幡然贊成和平，而要和中中國作朋友，我們既然知道日本不得不誠意，因此才有了把握，趕快設法了此戰局。

我在香港也想過一年了，我不來是可以的，還可以唱高調的，但我是住在殖民地的香港了，固然是安

穩了，然而中國除了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五省之外，各省都被日本全面的或一部的佔領了，四萬萬人有三萬萬人都呻吟痛苦於淪陷區域了，我是一個負責任的人，我是一個革命者，就這樣在香港享樂而忍聽中國這樣淪陷嗎？我徹底想過，我一定不能長住香港的，我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抗戰，一條是和平，抗戰無望，只有提倡和平來救中國，你在上海想也知道，米賣至五十多元一挑，煤賣至兩百多元一噸，去年冬天上海因寒餓而死的有數千人，你想想上海這樣，淪陷區域還不知怎樣痛苦！在這樣紛亂情形底下，蔣先生的親戚藉着統制貿易來發國難財，而一班漢奸更藉着日本人的勢力勾通了來發和平財，你想想能忍得住嗎？因此我只有站起來，拿人格去抗戰，憑我們的人格去和日本講和平，只要中國不亡，我們可以息兵言歸於好。現在國民政府是還都南京了，五色旗也改回青天白日滿地紅了，日本所佔的礦山工廠也歸還中國了，這是第一步的交涉。以後我們更要設法使我們失的都逐漸拿回來，我們以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和人格在刀槍環繞中爭回領土一分是一分，爭回主權一分是一分，蔣介石的抗戰是用武器，我們的抗戰是用人格，蔣介石打敗了還可逃，我們打敗了只好犧牲性命，所以我在此地是有進無退的，我來南京不是爲做官，而是來救人民和救國家，我不知我的性命喪於何時，但我絕不可惜，因爲我將近五十了，死生有何足惜，而且國家到了這個地步，死生尙有何足惜。

不過我要告訴你，你是我的單獨兒子，我自然望你能繼續我的事業繼我的精神，我是沒有財產給你的，但是我必能完成你的大學教育，我死之後，我雖然沒有錢，一班朋友總可以照顧你的，你也不必悲感，男子漢、大丈夫總要望着前途，我的生死你絕對不必介意的，我有幾句話對你說：

第一、你要認識國家，國家若亡，人也不會存在，我是一個愛國者，盼你也要做一個愛國者，我前次

在上海，你不是問我現在有許多人左傾，問我怎樣嗎？我告訴你，我從前就是最左傾的，但左傾要把握住現實，什麼是現實呢？國家要亡，是現實一件事，國家若亡了，什麼傾都談不上。而且左傾是急進的意思，若不承認現實祇圖急進，什麼都沒有用處，現在大家嚷着左傾都是共產黨騙青年的，中國做了殖民地，那裡還有左右傾，我今天祇有盡我的力量先把中國保存，然後把中國建設起，左傾右傾都不必談，因為談是空的，於國家於自己都沒有用處的。

第二、你要負責任，我一生都不談道德，祇談責任，我覺得責任就是道德，除了責任便無道德。

第三、你要時刻維持個人的尊嚴，但尊嚴決不驕傲，你要分清楚。

第四、你要對人仁愛，中國古書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你要將來辦大事，負大責任，首先要仁愛為懷，你現在不是很愛小狗嗎？小狗都愛，人更要愛了，你能愛人，人才愛你，人人都尊重你，那你就能負責任了，天下事不是一個人能辦得了的，必得大家都來，才有辦法。

我今年元旦所作的文章，及來南京後兩次廣播，你可以細細的誦讀，我對國家的態度，對日本的態度，對中國將來的態度，都可以在這三篇文章裡寫盡。

你年輕或者不懂得我的意思，你可以請你母親解釋給你聽，你想想，我知道你必能明白我的一切的。我這封書，你和可以當作是訓詞，你也可以當作是我的遺囑，我望你在報紙上剪下那三篇文章和這封信保存起來，久不久看看，也是將來一篇重要的中國史料。

我祝你康健，我望你留心讀書，我望你愛人，我望你孝養你的母親。

父字（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於南京

## 未完成的致蔣書

蔣先生鈞鑒：

我這封信到達 先生之前，我已經死了，我在死前，決不給 先生這封信，因為我是一個待決之囚，不好妄談時政，而且恐怕別人批評我藉妄異寬宥赦，等於搖尾乞憐。我自命是一個男子漢，生死等閒視之。先生能夠原諒我與否？這是 先生自己的事，我不願在死之前，作這種無聊的事。

我雖然死，我決不對 先生有什麼怨詞。 先生置我於死，自然有許多理由，或者因為我以前隨 汪先生反過 先生，或者因為參加南京的組織，或者因為國際的關係，或者因為國內政治的關係，甚至或者因為恐怕我將來對於國內統一是一個障礙。凡此理由，都可以使我死。而以上幾種理由，我都願意接受。我這幾年來及於我的主張而來南京，無非希望對 汪先生有所補救，更對國家有所補救。一方面希望無負於國，一方面希望無負於黨，更希望無負於 先生，同時也希望無負於 汪先生。這種處境我是很困難的，而這種用心也是很悲苦的。我說這些話，我不是還希望 先生原諒，現在就是 先生原諒，也來不及了

。不過我在民國二十一年曾對汪夫人說過：「我從今以後不再反蔣。」這句說話，我對自己也要負責任的，這是表示我自己的責任，和回應我死而無怨一句話。

我的自白書內無句不是事實，我在政治上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謊語，先生看過之後，就可以知道我的心跡。現在事已過去，也不必談。我心內所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關係到黨的前途，更關係到先生的前途。我雖然死，不得不盡量和先生說，或者死之言可以使先生動聽，也未可知。

現在世界上的反共陣營一個個在那裡崩潰，德國是覆亡了，義大利是削弱了，日本也投降了。希特勒他們的覆亡是有理由的，我看他們的失敗，不失敗於反共，而先敗於方法。舉希特勒為例罷，他的目的是在蘇聯，因為對付蘇聯恐怕力量不夠，於是先行在國內樹威，繼而吞併奧大利、捷克、波蘭，企圖養精蓄銳，一舉而摧共產黨的壁壘。然而因為這樣，惹起英法的恐怖，反而與蘇聯聯合了，致有今日德國的覆亡。日本也不能例外，因懼怕蘇聯而侵畧東北，因侵畧東北而惹起中國的恐怖。以後更有上海之役、塘沽事變、蘆溝橋事變，於是引起八年戰禍，更因此而引起了太平洋戰事，以致根本失敗。雖然日本以反共自命，終之反與蘇聯妥洽，似與德國不同，但失敗的路線是和德國毫無異致，都是想自己先培養實力，穩固陣地，然後對蘇。但在對蘇之前，已使別國恐怖，別國受害，終之惹起公憤，反過來先對這些侵畧國家，而蘇聯反可以從容應付，坐收最後勝利。

中國情形自然和德日不同，中國僅是反共，尚談不到對蘇，僅是自衛，而不是攻擊。中國絕不會像德日兩國先要侵畧別的國家來培養實力，穩固陣營，致惹起別國的恐怖和反對，然而中國也有特別危險的情

形，那就是國家因為科學和教育落後，國家的組織力還不及德日，農村還停滯在封建農業時期，而工業還停滯在家庭資本時期，（例如較大的工業，都是家族關係多，社會關係少，就是一個證明。）以這樣的組織碰到共產黨的組織和宣傳，又加上恐怕的行動，就很容易潰散。

現在聽見有許多人說：英美是不怕共產主義的，我們如果民主，我們也有辦法。談這種話的完全是皮相之談，英美人民有深長的資本主義歷史和思想，農人是一種中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格格不入。不用說，就是工人，他們都有躍為資本家的希望，每個人都有享受中產階級生活的機會和希望。他們用不着一個黨和一個政府指導，不然就可以抵抗共產黨，英美的工會共產黨絕對不能插足，發揮力量，中國可就不是那回事了。

首先就中國的歷史說罷，除了歷代外患和篡奪與中國的社會無關外，秦末的陳涉，西漢的赤眉，東漢的黃巾，乃至明末的流寇，凡禍亂之起，都起於貧農。他們的崛起，儼然政治不良為對象。不過中國在歷史上無論何時，政治的清明時期都很短，其原因在於士大夫的階級和人民隔離太遠，再則地方制度始終沒有確立而官吏太無保障，凡做官的人——除了少數清流以外——除了向人民壓迫之外，他們沒有方法生存，更沒有方法保障下台後的生活。人民既然沒有地方制度，和真正的預算，他們無法保障自己。因此政府和人民無時不處在對立的狀態，一有饑饉或有人禍，必定起而暴動。這是中國數千年的史實，而現在的情形也絲毫沒有進步，因此中國共產黨特別在中國生存、發展，乃至於成了今日的情形，未嘗不踏在歷史上的軌迹。不過共產黨更有一種主義作核心，更有一種組織作推動罷了。

父親臨刑前，和檢察官有一段從容大度的對話。在場記者羣將之紛紛載諸各報刊，其中均提及父親說有一封未完成的信給蔣先生。父親去世後，遺屬在監獄領回之遺物中，得到該信的抄本。諒係監獄中之同情者，在將原信呈交司法行政部前，將此抄本交其遺屬。觀其內容及語氣，與父親一貫思想和作風吻合，刪改之可能性很少。所以，將抄本全文，在這附錄刊出。

陳幹 識

（編者按：此信原本，據云已呈交司法行政部，本書之附錄，係據陳幹先生所藏抄本排印，故請陳先生附識於信末，畧述抄本的來歷。）



## 跋

陳 幹

父親寫「苦笑錄」時，已有「自序」和「卷頭的預白」，似乎無須別人再加解釋，但是「苦笑錄」是差不多四十年前脫稿的，爲什麼到現在才問世，這本書除「苦笑錄」外，爲什麼又加上許多附錄，這兩個問題，對現在及將來的讀者，都應該有個交代。

父親寫「苦笑錄」時，只知道寫完後出版無期，但沒有想到他有後來一段政治歷史，更沒有預料到他最後被處死，「苦笑錄」在他死後，形格勢禁，不能立即發表，況且「苦笑」錄中人物，很多在父親死後，仍在政治上非常活動，爲了尊重作者原意，不願因這本書惹起政海風波，因此母親十年前將「苦笑錄」原稿贈給父親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封緘起來，到現在書中絕大多數人物已經作古才付刊。

「苦笑錄」寫於抗戰初期，那時父親留在香港苦諫汪先生不要組織南京政府，心情沉重，却正好有時聞將他十幾年從政的新鮮記憶，仔細地寫下來，爲了恐怕遺失，他寫完原稿後，還親自謄寫一遍，將原稿及謄稿分兩處保存，他對這本書的珍重，於此可見一斑。

「苦笑錄」的主要價值是歷史性的，其寫作及出版，相隔年湮代遠，故須加註釋，才能使讀者明瞭，并譯成英語，才能有助於不諳中文的史家作研究，這件註釋及英譯的重擔，蒙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高級講師李鐸先生負責主持，父親生前友好及家人，對之深深感激。李先生指出父親不平凡的事蹟，不限於「苦笑錄」所敘述的時期，因此加上許多附錄，都是父親生前自述，使讀者對父親的一生，可窺其全豹。

連附錄在內，這本書包括了父親少年隨祖父革命，青年時組織共產黨，（編者按：因篇幅關係，有關資料，將另刊行。）中年加入國民黨，晚年參加和平運動的經歷。（按：其中除「苦笑錄」外，有他剛入南京參加和平政府時給我的一封信，及他死前給蔣先生一封未完成的信，都是以前沒有發表過的。）父親苦悶時，喜歡寫詩，他最後一首五言詩，是他自分必死前，在獄中所作，把自己一生的為人與事蹟，作了一個總括和評價，謹錄於後，結束這番話說：

束髮受羣書	道義深自矢	遊俠慕朱郭	尚志鄙金紫	拔劍批龍鱗	彎弓叩虎齒	少小從軍行
單騎渡韶水	亡命走山澤	校宇隱蛟市	革鼎遂初服	折節乃下士	恃此肝胆烈	願爲朋友死
祇求心所安	不計身之毀	但得國倖存	寧顧名之圯	友誼泰山重	性命鴻毛比	兆民欣有託
寸心喜無愧	身雖受羈囚	心幸絕渣滓	猶有憂不去	烽烟倏四起	獨有意難平	禍亂尙未已
頭懸國門上	眼看敵師邇	功罪與是非	何必待後史			

一九七七年三月 陳幹誌於美國安娜堡

## 編後記

「苦笑錄」的編註工作，不知不覺已超過兩個年頭。在編註過程中，因新資料的發現而不得不進行增補，除了使出版日期延遲外，同時也使篇幅增加幾近一倍。「苦笑錄」的出版，當可使許多幾乎被遺忘的歷史事實，重現眼前。同時對目前國內正在編撰的民國史，「苦笑錄」當能貢獻很多新的資料。「苦笑錄」是我們進行這方面研究計劃中一部份而已，我們對這時期的人物，將有更進一步的研究。爲了保存歷史的真面目，「苦笑錄」中有關「陳氏年譜」及其他附錄文獻，在文字上都保存原來面目，不加修改。又本書稱「北平」而不稱「北京」，乃沿用當時此地區的名稱，並不包含任何政治意味。其次，本書分上下冊出版，爲了方便讀者翻查，舉凡下冊註釋中第一次徵引的專書和論文，均詳註出版地點、年月及卷數期號。因爲這樣，合訂本裡下冊註釋中重複上冊的地方，未能刪去。上冊面世後，所得到的批評是值得鼓舞的。希望合訂本能使對這時期有興趣的史家或史學研究者，提供更多新的資料。本書的英譯本，目前正在準備中，英譯本出版工作，也有適當的安排。在本書出版之際，日本方面亦翻譯「苦笑錄」的第十五章「汪先生的被刺」爲日文發表，（岡田酉次譯：「汪兆銘狙撃をる」，「中央公論、歴史と人物」，第八十四號，「太平洋戰爭の再檢討」特集，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年）八月，頁一二〇至一二七。按：「苦笑錄」共有十七章，譯者誤作十六章。）但沒有提供新的資料，故本書並未徵引，讀者可以該譯著與本書參照。

「苦笑錄」編註已告一段落，但在工作進行中，如得不到何炳賢老丈從旁指引，工作進行當有更多困難。研究生何冠彪、蘇維初、盧佳定和袁國強等人在編註過程中予以種種協助，減輕了我們許多負擔，這裡備致衷心的感謝。在排印過程中，得宋叙五兄給予種種方便，故本書在印刷上或校對上能達到較高的水準。亞洲研究中心前主任景復朗先生、代主任梁志强先生及陳坤耀先生等人，對是書出版，都給予大力的支持，我們是非常感激的。

編者

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

# 「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上册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	八	三月三十日	三月二十日
十一	十七	張治中號文白	張治中號文伯
二十	四	模糊	模糊
三十四	十	1620 1920	1620—1920
四十一	四	已逝世	已逝
五十二	二	騰不出	騰不出
五十四	十二	<i>In Modern China</i>	<i>In Modern China</i>
五十五	七、八	頁七五四至七六〇。「革命先 烈先進傳」。	「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七五 四至七六〇。
六十五	一	並且	兼且
六十六	五	妥協	妥洽
六十七	九	緣有	像有
八十一	四	前敵總揮	前敵總指揮
八十一	十四	佔上峰	佔上風

	八十八	十三	右派分子		左派分子
	一一三	四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一二三	七	因此約了		因此薦了
	一二四	八	我的意思		我意思
	一二五	十四	更是常事		更是常慣之事
	一二五	十五、十六	和天津相差遠甚		和天津遠甚
	一二五	十六	和天津相差遠甚		和天津遠甚
	一二七	一	張向華第二方面		張向華爲第二方面
	一二九	九	似乎把江西給了朱益之		似乎給了江西與朱益之
	一三〇	七	俄國工人同情		俄國工人們同情
	一三一	七	物價飛也似的騰貴		物價飛也似騰貴
	一三一	九、十	即中央銀行金庫券		即金庫券
	一三三	二	不分共政治沒有出路		不分共也是政治沒有出路
	一三七	十一	鵝蚌相爭		鵝蚌相持
	一四二	十五	難以答覆		難於答覆
	一四二	十六	傳聞		傳聞
	一四四	九	到你家再談吧		到你家談了吧

一四四 十四

盡最後一分力量

努最後一分力量

一四五 邊題

第六章說明

第六章 寧漢合作與特別委員會

一四七 十

調和

調和人

一七四 十二

「革命評論

「革命評論」

一七九 十七

胆敢說出來

敢胆說出來

一八〇 十四

卸去第三軍

解去第三軍

一八一 十三

樂得下身手

樂得試下身手

一八九 十四

在一次北平大學演講中

在一次北平大演講中

一九一 三

甲個

中國

一九八 九

管核

管轄

一九八 十一

「胡漢民先生譜稿」

「胡漢民先生年譜稿」

一四四 十四

盡最後一分力量

努最後一分力量

一四五 邊題

第六章說明

第六章 寧漢合作與特別委員會

一四七 十

調和

調和人

一七四 十二

「革命評論

「革命評論」

一七九 十七

胆敢說出來

敢胆說出來

一八〇 十四

卸去第三軍

解去第三軍

一八一 十三

樂得下身手

樂得試下身手

一八九 十四

在一次北平大學演講中

在一次北平大演講中

一九一 三

甲個

中國

一九八 九

管核

管轄

一九八 十一

「胡漢民先生譜稿」

「胡漢民先生年譜稿」



一四四 十四

盡最後一分力量

努最後一分力量

一四五 邊題

第六章說明

第六章 寧漢合作與特別委員會

一四七 十

調和

調和人

一七四 十二

「革命評論

「革命評論」

一七九 十七

胆敢說出來

敢胆說出來

一八〇 十四

卸去第三軍

解去第三軍

一八一 十三

樂得下身手

樂得試下身手

一八九 十四

在一次北平大學演講中

在一次北平大演講中

一九一 三

甲個

中國

一九八 九

管核

管轄

一九八 十一

「胡漢民先生譜稿」

「胡漢民先生年譜稿」

一四四 十四

盡最後一分力量

努最後一分力量

一四五 邊題

第六章說明

第六章 寧漢合作與特別委員會

一四七 十

調和

調和人

一七四 十二

「革命評論

「革命評論」

一七九 十七

胆敢說出來

敢胆說出來

一八〇 十四

卸去第三軍

解去第三軍

一八一 十三

樂得下身手

樂得試下身手

一八九 十四

在一次北平大學演講中

在一次北平大演講中

一九一 三

甲個

中國

一九八 九

管核

管轄

一九八 十一

「胡漢民先生譜稿」

「胡漢民先生年譜稿」

一四四 十四

盡最後一分力量

努最後一分力量

一四五 邊題

第六章說明

第六章 寧漢合作與特別委員會

一四七 十

調和

調和人

一七四 十二

「革命評論

「革命評論」

一七九 十七

胆敢說出來

敢胆說出來

一八〇 十四

卸去第三軍

解去第三軍

一八一 十三

樂得下身手

樂得試下身手

一八九 十四

在一次北平大學演講中

在一次北平大演講中

一九一 三

甲個

中國

一九八 九

管核

管轄

一九八 十一

「胡漢民先生譜稿」

「胡漢民先生年譜稿」

一四四 十四

盡最後一分力量

努最後一分力量

一四五 邊題

第六章說明

第六章 寧漢合作與特別委員會

一四七 十

調和

調和人

一七四 十二

「革命評論

「革命評論」

一七九 十七

胆敢說出來

敢胆說出來

一八〇 十四

卸去第三軍

解去第三軍

一八一 十三

樂得下身手

樂得試下身手

一八九 十四

在一次北平大學演講中

在一次北平大演講中

一九一 三

甲個

中國

一九八 九

管核

管轄

一九八 十一

「胡漢民先生譜稿」

「胡漢民先生年譜稿」